狱中女友

〔捷〕埃娃·康图尔科娃 著
陈平陵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 江 郑金彦
装帧设计：孙 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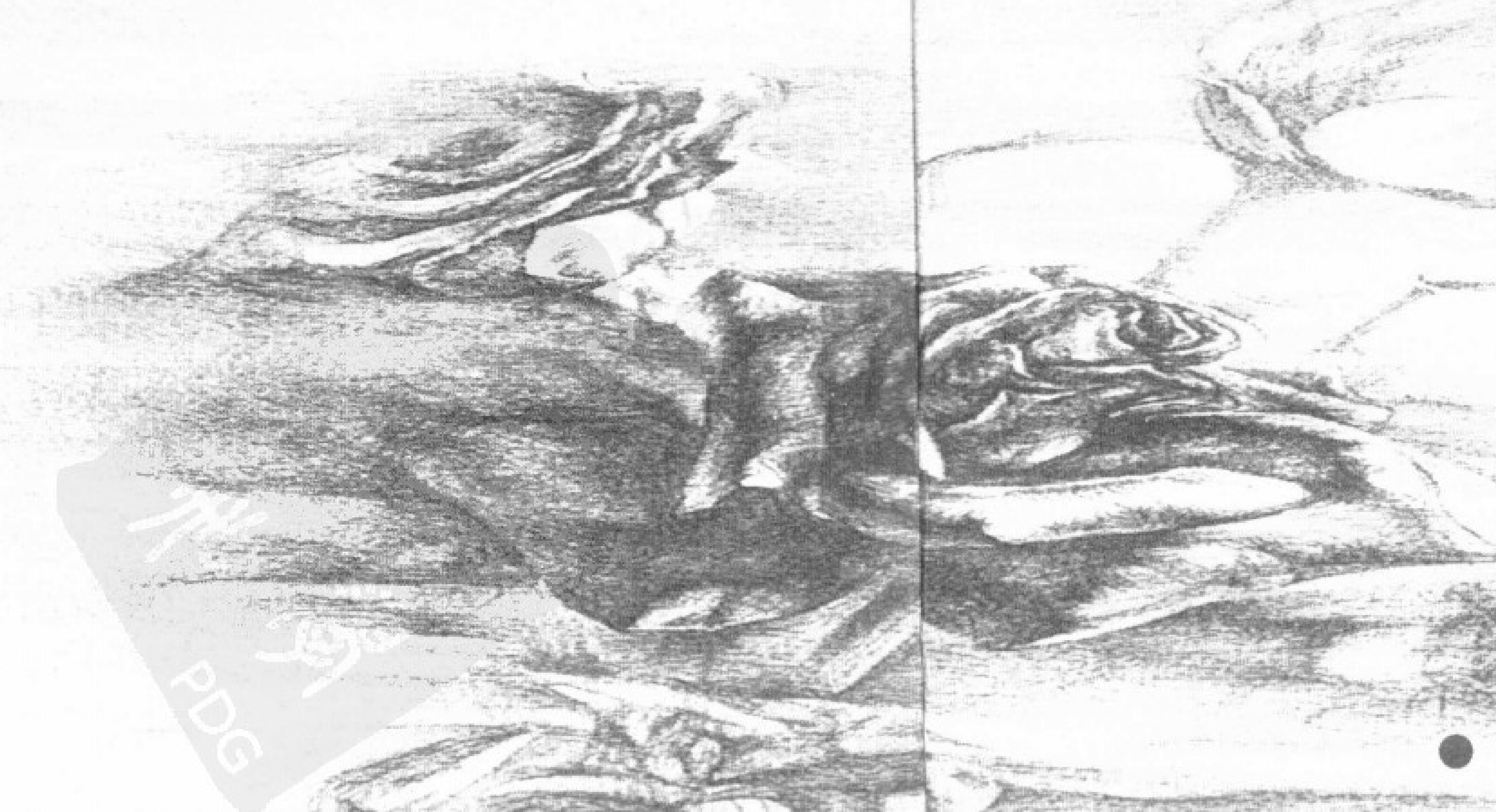


ISBN 7-5012-1781-5/I · 138
定价：20.00元

捷 克 共 和 国 文 化 部 赞 助
北京长泰国际时装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有为赞助

狱中女友

〔捷〕埃娃·康图尔科娃 著
陈平陵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PŘÍTELKYNĚ
Z DOMU SMUTKU**

EVA KANTŮRKOVÁ

Vydal Československý spisovatel
v Praze roku 1990
根据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出版社 1990 年捷克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王　江　郑金彦　责任出版:夏风仙
装帧设计:孙　旻　　　　　责任校对:何　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狱中女友/(捷克)康图尔科娃著;陈平陵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7
ISBN 7-5012-1781-5
Ⅰ.狱… Ⅱ.①康…②陈… Ⅲ.纪实小说-捷克-现代 Ⅳ.I52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2948 号

图字:01-2002-2738 号

狱中女友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邮编:100010)
网址:http://www.wapbook.com
北京力托科技有限公司排版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1/32　印张:11⅛　字数:22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2002 年 6 月第一版　2002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2-1781-5/I·138　　定价: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埃娃·康图尔科娃(1930.5.11～)

捷克当代著名女作家，先后发表了《悲哀的庆典》、《洪水到来之后》、《我们在书中相会》、《阿贝尔先生的遗体》、《黑星》、《钟楼主人》、《首饰盒》等长篇、中篇小说和电影文学剧本，一些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狱中女友》是其成名之作，在德、法、瑞典等国受到广泛好评；1990年在捷克出版时，荣获当年最佳文学创作奖。作者曾任捷克作家协会主席，其间两度来华访问。

译者的话

这是一本关于女人的书，是用女人的目光去观察女人的爱与恨、喜与忧、强与弱、美与丑的书。书的捷克文原名是《凄凉之屋的女友们》，写的是作者在她称之为“凄凉之屋”的捷克知名监狱——布拉格鲁津监狱里认识的十二个女囚，作者本人当时也因为自己的文学创作而无辜地在那里被囚禁了几乎整整一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在那间“白日昏暗无光、夜晚灯火通明”的几平方米的小牢屋里，作者同她们朝夕相处，呼吸与共，在身体与身体的接触中，在心灵同心灵的撞击中，对她们的外在特点和内心世界都有了深刻的了解。了解产生同情，同情驱动创作，于是，作者笔下就出现了描写这十

二个“凄凉之屋的女友们”的纪实小说。

由于苏联入侵后的政治环境，这本小说最初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捷克斯洛伐克流传，后来由德国标志出版社在科隆出版。小说的这种“凄凉”遭遇，不仅未能压制住，相反，更加强化了它的巨大社会反响。1984年它就被舆论评为该年度捷克斯洛伐克最优秀的文学作品。1990年，它终于在布拉格正式出版，第一版就发行了七万册。以后，它还被译成英、法、德等文字，介绍到欧美许多国家。

小说的主人公，是因各种原因遭监禁的十二个女子，也许我们可以称她们为“鲁津十二钗”。她们与《红楼梦》里的金陵十二钗虽有天壤之别，但是，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她们都是一些不幸的女子。作者怀着深切的同情，描述了这些狱中女友的遭遇，特别着力刻画和分析她们的性格，解剖和鞭挞她们的灵魂。透过这一群在文明与野蛮、高尚与堕落之间痛苦挣扎的普通女子，读者可以看到，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的界限其实是经常流动、变幻不定的，它们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人，当然包括女人，都渴望幸福，这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天然权利。然而，人们对幸福的理解，以及追求幸福的方式，却不总是和社会的现实状况相协调，甚至相反，常常与之发生碰撞和冲突。正是这些碰撞和冲突，成为了许多人不幸的根源，同时，这些碰撞和冲突，特别是对待、处理这些碰撞和冲突的态度、方式，也标志着社会的文明程度。而女人在这些碰撞与冲突中，往往遭遇最惨，付出最多。古今中外，概

莫能外。一位伟大的哲人说过，妇女的解放是整个社会解放的尺度。天下女子多不幸。怎样尽量减轻女人的不幸，这也许就是作者通过这本书想要向社会提出的问题，或者用书里的话来说，向这个冷漠的世界发出的一声呐喊。

这本书在写作上也很有特色。它不是一部叙事小说，而采取作者自述的形式，边说边评，夹叙夹议。作者非常善于捕捉人物的特点，通过她们的三言两语、举手投足，就勾勒出了一幅幅生动、逼真的肖像画，或者，如作者所说的，一幅幅人物漫画。在这些画像中，主人公的外貌、性格、心理活动，乃至于灵魂深处埋藏的恶念与善意，都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在刻画人物的同时，作者穿插了许多辛辣而又幽默的评论，读后令人时而陷入沉思，时而又不禁捧腹大笑。请看，阿道夫·希特勒的亡灵被招魂者请来人间，事后他居然不想回去了，因为他在死者的天国里不好受，但人们又不知道阿道夫·希特勒的亡灵会在人间搞出些什么名堂，因而惶恐不安。这里包含着多么深刻的寓意啊！再请看作者对癫狂症的评论：癫狂者总是以自己的尺度去衡量别人，但他的尺度又太短，于是，在碰壁之余，就使用暴力去实现自己的要求。这些话虽写在十几、二十几年前，但是，结合当今世界的现实情况，不也仍然一针见血吗？在跨入 21 世纪、进入一个新千年之际，人们不正是需要百倍警惕那些希特勒亡灵和癫狂症患者吗？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发现作者和我原来还是学友。 50 年代初，说起来都半个世纪了，我作为公派留学生，曾读于布拉格查理大学历史系，和念哲学系的作者同在伏尔

塔瓦河畔的一幢大楼里上课，不过，当时我们不曾有幸相识。

捷克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是欧洲中部的一个文明古国。捷中两国有着长期友好往来的历史，捷克人的心灵同中国人的心灵是能够相通的。我相信，翻译出版埃娃·康图尔科娃女士的这本书将有助于中国读者更多地了解捷克，了解那里的人民，特别是作为社会解放尺度的女人。

陈平陵

2002 年 3 月

目　录

PDG

凄凉之屋

布拉格城郊有一座颜色发黄的建筑物，它的两翼各有横竖两排楼房。竖的两排矮一些，也短一些，从两头同横的两排相连，形成两个天井式院落，一个给犯人放风用，一个供堆放煤炭用。在两排矮一些的楼房里，有办公室、储藏室、衣帽间、医务室、阅览室，以及一间所谓的文化娱乐室——一间空荡荡的大厅，看上去像是被废弃的酒馆。两排高一些、长一些的楼房是牢房，它们的专门用途从外面也可以看出：一排排用铁栅栏封起来的窗户构成了它们特有的建筑风格。

横排的两幢楼房里面，各有一条长长的过道把它们隔成两半，过道两边就是大小不等的牢房。有八人一间的、十

二人一间的、四人一间的、六人一间的，也有两人一间的。但是，所有的牢房里实际关押的犯人人数都大大超额，两人一间的关着三人，四人一间的关着六人。牢房里拥挤不堪的情景，可以透过牢门上的监视镜看得一清二楚。大一些的牢房还在墙上设有一个监视孔，它由外向里扩展，呈漏斗形，从这里可以环视牢房里的一切，连那毫无遮拦的土耳其式蹲坑都一览无余。

每当犯人受审讯后从六楼被押解下来，或者被押解去天井放风时，随着他一步步陷入这座房子的深处，便会有一股越来越浓的臭味迎面扑来，熏得他头昏脑涨。头两个月，我每天要两次被押解去接受审讯，也就是说要被熏四次，一个来回两次，两个来回四次。在来回的路上，押解员要打开和关上许多扇铁栅栏门，每次过门时他都让我在他前面先过去。可这不是出于什么绅士风度，而是规定。他每次让我先过，从不说声“请”，而我走过他身旁时，总免不了要说声“谢谢”。有一次，在一种对人性的幻想驱使下，我竟然对他说：“我们现在可以说是呼吸与共啊！”后来，我的这种幻想很快就遭到迎头痛击。当我又一次被带去受审讯时，电梯里上来了一个下巴结实、留着平头的粗壮男人。那是个炎热的夏天，朝南牢房的女囚们被这散不去的臭味熏得喘不过气来，有的甚至因心脏不适而昏厥。这个在监狱上班的审讯员也满身大汗，而他却还有心思对我说风凉话：“蹲在这种凉快的地方，该有多惬意呀!”

有一次，这使人难以忍受的臭味几乎让我丧失了勇敢

面对命运的意志力。这是 1 月的一天，我们一个紧挨着一个沿主楼梯到天井去放风。为了御寒，我们把睡觉盖的毯子披在破旧的衣服外面，双手裹在毯子里，脚上穿的硬纸壳衬垫拖鞋里塞了许多棉花，以便在雪地上行走。在一个楼梯口，透过一扇玻璃碎了的小窗户，我看到了外面寒冷的晴空，同时，那股臭味从下面向我扑来。霎时间，我脑子里突然一闪：上帝呀！我到这种地方来干什么？我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监狱的臭味沾在头发里，附在衣服上，皮肤、床垫、毯子、地面、墙壁、铁床，甚至犯人的眼睛都浸透了这种味道。这里面有散不去的烟味，因为牢房小小的窗户上不仅有铁栅栏，而且还有一层密密的铁丝网，空气很难透过。这里面有因长时间不洗澡和感染各种疾病而从犯人身上散发出来的臭味。此外，还有厕所的气味，牢饭的气味，以及那被犯人们无数次吸进呼出而陈腐了的空气的味道。所以，习惯这种缺氧的环境，是犯人的身体首先必须完成的任务。为此，你要付出一半的生命，剩下的一半才交给审讯员。

监狱好比一座有许多层次的深渊，犯人要在这里体验一段虽生犹死的经历。放风的天井就是这深渊的底。水泥砌面的高墙把天井隔成两个环形圈，每一圈又隔成一个个小笼子，一间牢房一个。每个环形圈上面都设有一座岗亭，岗亭装有同警卫排长办公室相联的警铃。犯人们把这有顶棚的岗亭称做乌鸦窝，警卫们则把在岗亭里值班叫做站板凳。他们并不喜欢在乌鸦窝里站岗，而愿意在楼道里监督犯人下楼梯。因为站板凳很紧张，必须随时注意不许

任何犯人从牢房窗户里向下探头探脑，也不许任何犯人从天井笼子里向上东张西望。犯人从上往下或从下往上呼喊、裸露身体、打手势，都在禁止之列。警卫排长在办公室里不时用望远镜向窗外观望，他不仅监视犯人，也监视两个岗亭里的警卫。若有犯人违纪犯规，警卫必须装腔作势地给予惩罚，否则，他们的排长就会惩罚他们。一发现高处窗口上有望远镜片闪光，笼子里的女人们就会尖叫起来，而哪一笼最不听话，那一笼的犯人就会被押回牢房。笼子上面覆盖着一层铁丝网，当犯人们出来放风时，从上面往下望去，他们就像是一群从动物园赶出来的野兽，审讯员们很喜欢从四楼办公室里探出头来观看。而在深渊底部的犯人们极目张望，也只能看见一排排带有铁栅栏的窗户。有时会有勇敢的人把身子吊在牢房窗户上探望天井，而此时天井里的犯人透过密密的铁丝网也只能看到他模糊的轮廓。在犯人们的头顶上，耸立着一座高高的水塔，上面也设有岗楼。水塔上有一窝燕隼，受审讯时我曾看见它们孵小鸟，也曾看见它们飞往不远处的白山林场去觅食。监狱楼房的屋檐下还栖息着一群鸽子，有白色的，也有灰色的。四周的楼房都不高，有的五层，有的七层。在深渊底部还可以见到天空，那高高的、呈拱形的天空。然而，这里毕竟是一个无底洞，是世界上最黑暗的地方之一。

这里的一切都是违反人性的。强制性的管理制度表现在许许多多的琐碎事情上，它使人变得不再是人了。你说你只不过是被拘留审查吗？不能证明你有罪时，你还可以（至少从理论上说）从这里被释放出去吗？或者说，你在

这里不过是等候法庭审判吗？不要太天真了！在这个官方称之为教育改造所的绿色大门里（“您不是在监狱里，您是在所里”，一位审讯员这样对我说，听起来差不多像是说“您在旅馆里”一样），你想轻轻松松地出去，是一点希望也没有的。谁要是还抱有这种希望，以为进来后还可以平平安安地出去，肯定要碰得头破血流。因为罪证不足而停止审讯的案例极少，只要检察官提出拘留谁，谁实际上就已经被判刑了，法庭要决定的不过是刑期多少年而已。有的案子法院根本就不审理，比如我们的案子，在这种情况下检察官也不会下令停止拘留。他们可以不经过法庭而长年对你实行拘留，法律只根据案子所涉及的相应条款限定每次拘留的最长时间，在我们国家最长可以拘留十年。也有不少受到刑事追究的反对派人士未被拘留，那是由于国家不想太丢面子，国库也不想花太多的钱，因为法律上有一条规定：对无端受拘留的人，国家应给予赔偿。

在这里，希望通常是以失望告终，因为你只会遭受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我们的拘留审查期限不知道已经被延长多少次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它就会诱使被拘留者为了澄清案情而同审讯员“合作”。他们不是按照公认的准则，把查找罪证作为审讯工作的基础，而是依靠被告的供词和证人的证词。但正如人们常说的：“招供固然可以减轻刑罚，但也意味着一定会受到刑罚。”审讯工作的这种做法，无疑也影响到了监狱的管理状况：被监禁者受到严格隔离和百般凌辱，因为关他进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他屈服。而如果你不及时打消你抱有的希望，你就会把这种

希望寄托在审讯员身上，力求用自己的招供和对别人的指证来争取他为你减刑。所以，在这里与其说是要不放弃希望，不如说是要锤炼自己的忍耐力。

“监狱长同志不把被监禁者当人看。”一位年轻的、受过教育的训导员（国家保安学校毕业生）在一次非正式谈话中这样对我说。她在学校里学过一点心理学，因而愿意区别对待不同的被监禁者。被监禁者不是人，而是罪犯，这是监狱管理人员全部哲学的基本命题，也是他们所施行的“教育改造”的出发点。“瞧着吧，我们会把你们改造好的！”一个快要退休的、整日醉醺醺的低级看守经常在我们窗下的放风笼里这样说。看守们对我倒不大声叫骂，他们常辱骂和殴打那些难对付的精神变态者。监狱里也只是在个别的非常情况下才使用催泪瓦斯、脚链，或者所谓的“熊皮”紧身衣（即用皮条捆绑被监禁者，以限制其活动）等器具。其实，残酷并不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个别的非常情况也往往是被监禁者自己引起的。肯定地说，被监禁者相互殴打要比遭受看守殴打多得多。笼罩这悲惨世界的，是远比这些事情坏得多的东西：这里充斥着一种使人变得卑微下贱的腐朽空气。那种明知被监禁者毫无反抗能力，并且很可能有罪，却还能够按规矩和职责去对待他们的看守，现在已经几乎绝迹了。在我们这片牢房里，这样的人只有过一位。他是那种和善而尽职的人，凡是他能够办到的事，他都乐于去做，比方说给一个信封、一包例假纸，或者添一片面包等等。他不戏弄被监禁者，更不欺负他们。那些不愿在被禁者身上滥用权力的规矩人，对于

在这个部门服役来说，已经变得不那么可信赖了。其实要分清一种制度的文明或是野蛮，最可靠的标准莫过于看用什么手段来管理那些无能为力的人群集中的地方，比如医院、养老院、孤儿院、监狱等等。还应该补充一句，我们这个挥霍无度的国家太穷了，以至于根本无力拨款去建设监狱。

要使人变得卑微，变得渺小（“您太自负了”，一个刚刚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年约三十五岁的衣冠楚楚的审讯员曾经这样对我说），也无须采用戏剧性的方式方法。它更多地是贯穿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反映在令人觉得可笑的细小行为上的一种过程。比方说，那个常称我为康图尔科娃女士的训导员，每次在这样做的时候，脸上总是带着一种自认为是临危不惧的英雄的表情。在缺乏监狱生活经验的被监禁者身上，“平民生活”时期（人们这样称呼狱外的自由生活）的礼节还在惯性地起着作用。所以，每当我把家里寄来的包裹交给训导员，让她们检查里面有没有不许带进来的物品时，总要拿一些水果或糖请她们吃，然而，她们一次都没有接受。我还曾天真地想，这大概是因为她们不愿剥夺我很难获得而她们却随时可以买到的东西吧。实际上，事情的真相并非如此。这里除了看守应对被监禁者保持距离的职责要求外，还有她们对被监禁者的嫌弃或者厌恶。有一次，一个盛气凌人的年轻看守押解我去医务室，回到牢房门前时，我伸手去抓门柄，准备自己开门（其实这也是“平民生活”时期残留下来的习惯在起作用，有经验的囚徒会等待看守替他开门，这种囚徒总是小

心谨慎地留意不代替看守做任何事情）。突然，那个家伙像被什么东西蜇了一下似的对我大声叫喊起来。直到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后来，我进一步了解到其中的原因。我见到另一个押解员（一个比较有教养的人）双手都缠上了纱布，说是染上了疥疮。可以肯定，是被囚犯传染的，除此以外不可能有别的病源。照例犯人进监狱，都要由医生进行体验。给我检查时，医生只问了一下身上有没有长疹子。我倒是没有，但万一我有却不说呢？我们那间牢房就曾领来过有病的犯人，一个长疥疮，一个生淋病，一个满头虱子。还有一个女孩长阴虱，幸好她很快就被转到隔壁一间牢房去了。以后那间牢房的人全都传染上了，不得不带她们去刮光全身的毛发。在她们回来时，我们还听到一个女人穷开心地说：“姑娘们，这下子我们可再没法干那种营生了。”无可奈何的囚犯是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一切都要仰仗别人，很容易传染和染上各种疾病，包括疥疮、淋病、头虱，乃至于阴虱。可是，这里究竟是谁应该受到嫌弃和蔑视呢？

有时候我夜不成寐，坐在那张紧挨着别人的窄床上，这时我仿佛从外部看到了那幅我也在其中的图画，就好像我穿过过道，打开监视镜的盖子，从那个小孔中观察我自己一样。我们六个人紧挨着躺在这间四人牢房的床上，床是铁制的，呈灰色，已经有些塌陷了；毯子也是灰色的，而且很脏；床单早已破旧，洗得也不干净；橘黄色粗布做的睡衣简直不成样子，男女不分，缺胳膊短腿，有的连裤腰间的松紧带都没有；内衣更是破旧不堪。我们六个人就

这样躺在那里，像一只只褪了毛的鹦鹉，没有人比我们的样子更可怜了，谁见了都会感到厌恶。可是，这里究竟谁是人，而谁不是人呢？在文明国度里，狱中允许犯人穿自己的衣服；富有的国度犯人还有收音机、电视机，有自己的图书和报刊，他们可以到院子里散步，接待来访……而这些衣服褴褛、浑身臭味、满脸病容、半饥半饱的囚徒又是什么人的写照呢？

当然，我们不要匆忙下结论。在我被监禁的不到一年的时间中，也曾有两次把我们押出牢房，以便对牢房进行卫生大检查。第一次是在圣诞节前，我们还天真地以为是节前让我们去洗个澡。在牢房里，你只能从门外传来的声响猜想外面发生的事。我们听到一群群人穿着拖鞋在过道上走动的脚步声，还听到别的牢房里传来挪动什物的声音，于是我们推断，在犯人洗澡时还要对牢房进行大扫除。一个女看守听后哈哈大笑起来，并对我们说：“洗澡？那你们就快点吧，要不就没有热水啦。”她领着我们穿过长长的过道时，地上早已堆满了从牢房里扔出来的各种杂物，如信件、内衣、盘子、勺、报纸、药……但是，看守并没有带我们去澡堂，而是把我们领进过道尽头的一间空牢房，在那里，两个女看守命令我们脱光衣服，交给她们仔细检查。有人怕一些珍爱的东西会在大扫除时当做垃圾被扔掉，特意把它藏在胸罩、内裤或袜筒里，结果统统被搜走了。囚犯们总是想方设法要保护自己最心爱的东西，我的一个女友把男朋友给她的信藏在内衣里，一个叫玛仁娜的女看守竟然用她那因喝酒过多而变得沙哑的嗓子朗读

了几段。“这是什么玩意儿？难道说是爱情？你们就没有别的事需要操心吗？”她这样评论那封我的女友连我也没让看的信。这个把头发染成淡金色的胖女人用恬不知耻的傲慢态度瞧着我们，其实她本人也许就属于多愁善感的类型，在家里一定喜欢娇宠自己的孙儿孙女，还会贴钱给儿子买汽车。另一个绰号叫“土豆儿”的女看守在一旁帮腔说：“这些女囚，简直就像一群母狗！”我的女友急忙解释说，这封信不是夹带进来的，是通过邮局正常寄来的，而且审讯员已经检查过等等等等，尽管这些都是一目了然的。这时候，其他看守在审讯员的监视下，已把我们的牢房翻得乱七八糟，好像是一群野猪闯进菜园子一般。我们的小柜子里整整齐齐摆放的各种什物，如书信、洗漱用具、食物等，都被倒在地上，有人还用肮脏的手去翻弄家里寄给我的圣诞节糖果盒。床更被她们翻得个底朝天，床垫、床单、毯子、枕头都扔在地上，床头的小桌子、小凳子被推倒在地。所有的东西都像垃圾一样乱堆在地上，分不清楚哪条床单属于谁，更弄不明白是谁的面包、糖、肥皂、消毒棉、擦脸油、信件和书籍。这那里是什么大扫除，分明是拿我们出气。我的那位女友原本是很厉害的，在其他地方，哪怕是在犯人当中，她也有勇气制止别人对她的无礼或傲慢举动。而此时，她在玛仁娜面前吓得浑身发抖，深恐她如此珍重的情书被没收。我本来应该站出来维护她，应该表示我不愿听人读别人的私信……而此时我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无理取闹。这倒不是因为害怕，说真的，我是决不怕她们的，而是由于惊愕，也是出

于无奈，出于无力制止这种卑劣行为的无可奈何的心情。外部世界的一切行为标准，包括情感方面的标准，在这个悲惨世界里都不适用了。道理很简单，外部世界虽然有时也发生这类粗暴举动和强制行为，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总要用某种东西来加以掩饰，而不会采取如此公开的、肆无忌惮的方式。难道能够随意闯入别人的隐私而又装出一副完全有权这样做的样子来吗？如果有，那也只能是极个别的例外情况，因而鲜为人知。而一旦你制造出这样一种环境，使得那些人们本不该遇到的事情竟然能够发生，甚至必然发生，那么，这就是监狱，就是一个易于为统治者统治的、赤裸裸的受控制的世界。

谁想了解受控制世界的行为机制，那么，监狱生活就是这方面的一种十分重要的经验。在毫不掩饰地实行控制的世界里，埃里亚·卡赞①所说的“默契”也不适用，这里根本不存在任何契约。我曾亲眼目睹这样一个场面：有一次，看守押着我们放风回来，她们自己不愿爬楼梯，想用运货电梯把我们运到七楼去，于是便向一个负责清扫电梯的犯人要钥匙。这个犯人挺老实，他本来可以推托说钥匙不在他手里，或者跑去报告看管他的警卫，但他很客气，痛快地把钥匙交给了她们。但是，钥匙的事情肯定已经不止一次引起过麻烦，所以，他在拿出钥匙的时候很有

① 埃里亚·卡赞（1909~ ），美国著名导演、作家，曾导演过《推销员之死》、《欲望号街车》、《绅士们的商议》、《滨水区》等影片，获得过奥斯卡奖。—— 译者

礼貌地表示，希望她们及时还他，他要对这把钥匙负责。而那个拿到钥匙的女看守却毫不理睬他的好意，竟然破口大骂起来，说他是什么东西，胆敢这样对她说话，他应该把嘴闭上，根本没有人问他什么，钥匙什么时候还，还给谁，她最清楚，自会跟他的长官去说，用不着他废话，等等等等。在这些家伙粗暴地把我们塞进电梯后，那位好心的老实人肯定已经知道，即使这把钥匙不丢失，他也会因擅自借出而挨长官一顿臭骂。

回到牢房，我们还得清理倒在地上的东西，找回属于自己的，再把它们摆放整齐。为了寻找自己的信，看看有没有被扔到门外的垃圾堆里去，有时还不得已读到别人情书里的私房话。当一个粗鲁的声音向你喊叫，照片上和你亲热的这个人是谁，而你还得当着这群泼妇说出他的名字来时，你会感到惊讶吗？也许，真正令人惊讶的是，当你试图把这种凌辱吞在肚里，用牙齿去咀嚼它，用舌头去品尝它，用肠胃去消化它时，你竟然感觉不到特别恶心。而这真的是那么令人惊讶吗？后来我们回忆起这些可怕的往事时，也只是一笑置之。你能怎么办？丢进垃圾堆的照片再也要不回来，只能在心里留下一些隐痛。这是完完全全的无可奈何。有人或许会说，这种埋藏在心灵最深处——除了死以外没有比这更深的地方——的体验会使人变得更高尚，因为，谁尝到了无可奈何的滋味，他就会对一切都满不在乎。这也可能是对的。然而，这种无可奈何的心境也正是控制者想要让你感染上的。你应该在监狱里体验到，你原来是多么渺小，你应该从此对遭受监禁心存恐惧。

另一次卫生检查被安排在三八妇女节那一天。我倒无所谓，我对过什么节都不感兴趣，但其他那些女人却认为这一天无论如何应该用来举行某种庆典，这是她们从过去的工作单位残留下来的一种习惯。当有人问，为什么偏偏选在这一天搞卫生检查时，那个叫土豆儿的女看守说：“你们是罪犯，你们没有什么节日！”而她自己也只好在细心翻腾我们的小柜子中，度过了国家规定的妇女节。

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我们还进行了一场拒绝把双臂交叉放在背后的斗争。每当犯人被押出牢房来到过道上，比方说为了让别的犯人来换牢房里的电灯泡，他们必须脸朝墙站立，双臂交叉放在背后。放风时，各牢房的犯人必须分拨走，为的是不让分属不同牢房的犯人有机会见面。同一牢房的犯人也必须一个紧挨一个地列队行进，不许交谈，双臂必须交叉放在背后。我发现，当这些犯人身上穿着既脏又破的运动衣裤，双臂放在后背上，面对着墙壁站在那里时，已经没有一点人的模样了。他们先夺走你的人样，然后就会觉得自己有权像对待牲口那样对待你。于是，我们首先要求了解，监狱管理法规中究竟哪一条允许看守强迫我们把手臂背在后背上，因为牢房墙上贴的管理细则根本没有这种规定。我们两次打报告提出这个问题，训导员带来了监狱长会议的回答：监狱管理法规定，监狱长有权根据本监狱的情况做出补充规定，这就是补充规定中的一个。另一个训导员似乎更为热心赞成这种规定，因为有一次牢房门旁的壁柜里少了一些药，她就以此为由得意洋洋地补充说：“瞧，这也是必须让你们把双臂背在后

背上的理由之一！”后来我才了解到，偷药的主要是看守，他们拿去倒卖给犯人。鲁津监狱举行过一次公审，还有犯人当庭作证。我们又没有偷过药，干吗这样对待我们?!因此，我们继续把手放在身旁。在去天井放风的路上，每层楼的楼梯口和过道的转弯处都分布有看守，有的看守装着没看见，有一个家伙——恰恰就是后来受公审的那个看守——却大声喊叫“手放到背后去”，同时举起了警棍。被人叫骂或者挨别人打终究也是有损尊严的，于是，我们把双手手指钩在一起，叉在腰部运动衫松紧带里面。我们的手既是放在背后，又没有放在背后，就像涅姆佐娃①童话故事里那位聪明的山里姑娘一样，她按照法官的要求被传唤来时，做到了既不是徒步来，又不是坐车来；既不是穿着衣服来，又不是光着身子来；既不是白天来，又不是夜里来。奇怪的是，他们居然认可了我们的做法。这也许算得上是一个小小的社会“默契”，囚徒们的一个小小的胜利。

有一次，我心脏病发作，被领去看医生。（后来我才了解到，他们并不是要医生为我治病，而是因为我未去接受审讯，要医生开具证明，而这份证明自然也不是为我说话的）押解我去的是女训导员和看守班长两个人。看守班长看上去是个挺聪明的小伙子，平时一定按照女性优先的原则让女人走在前面，而妈妈也一定教过他要大声向人问

① 博仁娜·涅姆佐娃（1820～1862），捷克民族复兴时期的爱国作家，现代捷克散文的奠基人。其代表作《祖母》 50年代已有中译本。——译者

好。一路上他们两人谈笑风生，而我的脸色比我不断用手扶着的墙壁还白。对监狱生活还缺乏经验的我竟然天真地对他说：“ 对不起，头晕得厉害，要站不稳了，可以扶我一下吗？ ”他没有回答，只是转身走到过道另一边。要是我真的跌倒了，要是我需要人抬或者搀扶，他们肯定会叫打扫过道的女犯人来做。所以，直到现在，当我在街上看见押送犯人劳动后回监狱或者押解他们去法庭受审的囚车时，尽管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被监禁，尽管我对犯罪行为的痛恨之心可能比那些负责追究罪犯的人还要强烈，我总是会感到有一股博爱之心和恻隐之情在胸中涌动。凡是在失去一切希望的地方待过的人，都会产生这种情感。凡是在监狱里待过的人，都会把坐牢的人当做自己的兄弟姊妹，而不管他们坐牢的原因是什么。这决非什么浪漫主义的胡想。谁要是感染过那种名叫无可奈何的疾病，他就会懂得，为什么囚犯脸上都有忧郁的神情，眼里都有惊吓的目光。不仅如此，他还会懂得，蹲监狱也并非耻辱。这不是耻辱，而是一种考验。是监狱的状况使得蹲监狱成为一种考验，而把羞耻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监狱制度是人发明的，是人组织和维持的，但是，其方式却又如此缺乏人性，以至于在那些最差的监狱里，你根本分不清究竟是谁更有理由感到愤慨，是监禁者，还是被监禁者？下流无耻，这似乎已成为监狱的天生伴侣，而它在监禁者和被监禁者身上都有充分表现。我们的教育改造所更是直接同其宣扬的目标相矛盾，如果按照它的目标，又根本不存在关押的理由。每一个坐过牢的人都会在狱中更加堕落，我的

堕落也许就在于：当我回顾那段地狱般的生活时，请相信，我已不会惊愕得目瞪口呆了。

我无法选择同什么人一起挤在这只有几平方米、门里面没有手柄的牢房里。这里既是吃饭的地方，也是睡觉的地方，还是排泄的地方。这里阴冷而又缺少空气，白天昏暗而夜里灯火通明。这里既无处逃避监视孔里的目光，也无法遮挡同寝者的眼睛。这里你躲不开别人的臭味、絮叨、眼泪、叫骂，以及粗鲁的举止和神经质的言行。除去这一切之外，你自己还在这里受惩罚，受那充满仇恨的、不公正的惩罚。在自由的正常生活中，我只会在这样一些场合遇见这些女人：或者到饭店吃饭遇见当招待员的她，或者到医院看病遇见当护士的她，要不就是到商店购物遇见当售货员的她。总之，我对这些女人毫无所知，她们的案情我只有在阅读法庭的判决书或者律师的辩护词时才可能知道。但是，当有人一夜又一夜对着你的脸呼气时，当你成为和她一起共度前途黯淡的漫长日子的同伴时，当你甚至成为她夜里噩梦中拼命想抓住的救命的水柳树枝时，你总可以看清她全部人性的是与非。如果说人也有一层外壳的话，在高压的环境里也会自行破裂。而了解总会产生同情。这绝不是说我同情她们的罪行（如果她们是因为犯罪被送来），也不是说我原谅她们。而是因为我观察到，一个人如果不是已经砌头砌尾完全堕落（彻头彻尾完全堕落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当他因干了某件坏事而被当场捉住时，他更多感到的是悲哀，是不幸，是茫然不知所措。罪过似乎离人而去，成为一种客体，受到人的衡量和考

察，也遭到人的拒绝和掩饰。人不愿意同罪过沾边，甚至不愿去想它。人所想的是他的悲哀，而悲哀是一种纽带，是和共同感受到的凌辱一样牢固的纽带。

玛　伊　卡

我刚走进牢房，就受到一个快活的、漂亮的黑发女郎的热情欢迎。她的神情是那么自然，好像见到自家人一样。她微胖，但很灵巧，穿着那套有她两个大的运动衣裤也不显得特别可笑。她教我铺床，而且，尽管我一再谢绝，仍坚持隔两天为我打扫一次床铺。她生性爱撒娇，爱讨好别人。这是一个被领养的吉卜赛孩子，她的养父当了一辈子普通警察，现在已退休，养母在某机关当一名普通职员。他们从乡下迁到布拉格郊区，买了一所有家兔饲养圈和小菜园子的家庭住宅。玛伊卡很聪明，读完了农业中专，字写得很好，文字表达也很流畅。她喜欢大声朗读自己的创作，大部分是写给男人们的情书。她还喜欢

从别人给她的信和她读的一些书中摘录她认为好的句子，尤其是诗句。她的小柜子里有一小摞私人藏书，为此她感到很自豪。她整天不是画就是写，一遍又一遍地抄录自己喜爱的警句，而且，喜欢拿来送人。因此，她除了想法弄到香烟外，还有另外一种需求，那就是千方百计搞到纸张。牢房手纸的封皮全被她拿去写完了，又哀求打扫过道的女人把装例假纸的袋子给她。我和她在这方面有相似之外，我在牢房里也老是写东西，为此不知用掉了多少本信笺。我常把信笺本的封皮撕下来给她，她每次都在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来牢房第三天，我就发现了玛伊卡写东西的爱好。那天早晨点名时，我看见她把一封没有写收信人姓名地址的“密函”交给了训导员。她有足够的时间写这类报告，因为我整天都被传去受审。每次受审回来，玛伊卡都对我亲切地一笑，还多次对我说，很快我就会被放出去了。我倒真的很想知道，她都写了些什么。在监狱里你很快就会认识到，这里对任何事、任何人都不可以匆忙下结论。真相总是要隐藏起来，不管出于什么想法，好的还是坏的。玛伊卡既满足了“官方”的愿望，又保持了热烈的、自然的同情心，这不是所有被监禁者都有的素质。她不是第一次被拘留，还未成年时就蹲过少年犯改造所。监狱对她来说，好像是一块自然而然的天地，她在这里并没有被抛弃的感觉，而且善于在被监禁者和监禁者面前保护自己。她谙熟监狱的习惯和规则，并且凭借着这种知识，在这里进行着自己那种微不足道的、荒诞不经的生存斗争。我应该感谢命运，在我病得要死的时候，恰

好是她和我同在一间牢房里。她对着铁门拳打脚踢，而且促使相邻的牢房和她一样又敲又打，终于让值班看守为我请来医生。这是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在这个时候能够把医生叫到牢房来，简直是一桩了不起的壮举。

玛伊卡还很小的时候，就被养父母从幼儿收容所里领去抚养，长时间里她一直不知道他们并不是她的亲生父母。小时候，她是一个好学的小女孩，长得好看，又善解人意，很讨人喜爱。但是，当她慢慢长大成人时，逐渐产生了寻找自己亲生父母的强烈愿望。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按照她的养母在一封责备她的信中使用的说法，玛伊卡开始堕落了。那是她从少年向成年转变之际，正值青春反对权威的所谓“风暴年华”，对于处理这类事情来说，恰恰是最不适宜的敏感时期。也许真的存在着某种血缘的召唤，当玛伊卡在克拉德诺县一个吉卜赛人聚居区找到自己原来的家时，很快便迷恋上了那里的自由生活，而且开始恋爱了。她放弃了学业，离开了家园，跟男朋友住在一起，四处混日子。她的男朋友以偷百货商店为生，玛伊卡还常以赞赏的语气讲述他如何提着塞满各式毛衣的手提包回家，有一次还给她拿回一件很珍贵的裘皮大衣。后来，她和男朋友一起加入了一个专门偷窃和抢劫街上行人和酒馆客人的团伙，她为他们充当鱼饵。他们是在布拉格市中心火车站被抓住的，当时她的男朋友还没来得及扔掉偷来的东西，人赃俱获，无以抵赖。

领养玛伊卡的那一家人，尤其是她的养母，一直在努力教育她走正道。我倒不是说，他们要让玛伊卡具有多高

的道德水准，更多的是要她遵守社会习俗和规则。从养母在玛伊卡被捕后写给她的长信中，以及玛伊卡对养母充满赞美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女人。即使玛伊卡已被关在牢里，养母也没有抛弃这个忘恩负义的女儿，而且，继续在远处履行她的教育职责。她的方式方法尽管比较刻板，内容也有些枯燥乏味，但用心绝对是真诚的。这一点也是玛伊卡最为珍惜并且备加称道的：“你们懂吗，她没有抛弃我！我知道她会这么做的。”然而，不管那个有责任感的女人怎么努力，甚至假设她就是玛伊卡的生母，因而能用生母之爱的力量牢牢抓住她，也很难使玛伊卡具有一颗能够分辨是与非、善与恶的心灵。心灵决不仅仅是一种激情，更不是尽情陶醉于人间的享乐而别无所求。心灵是良知，是那能够折射出外部世界和我们在其中的一举一动的良知。这是人的心灵最需要的东西。我们甚至无须对良知的意义有多深奥的理解，甚至对良知仍怀有某种神秘感，然而，没有良知，人的心灵就不会充分闪亮。而我不止一次地感觉到，玛伊卡正是缺乏良知。她过着一种表面的、肤浅的生活，对是非善恶无动于衷。她总是轻松地漂浮在自己的行为上面，从不选择，也不思考，等到行为产生后果时，她或者欣喜若狂，或者痛哭流涕，或者怒火填膺。她善于分辨的，只是愉快的行为后果和不愉快的行为后果。“玛伊卡，你出去后能不再跟那帮人走吗？是不是回家去更好？”对于我的问题，她没有直接回答，只是默默地，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我知道这不对，可那边还是更好些呀！”

很难用我们的文化价值来评判一个人，如果他把我们的文化只是作为一种词藻来对待和接受。玛伊卡“知道”，但并没有这种情感。她能够非常机敏地使用诸如忠诚、荣誉、爱情、诚实，以及谎言、真理等词句，而且很高兴——我甚至可以说是怀着一种快感—— 使用这类词句。也许玛伊卡养母的字典中正是充满了这些词句，而玛伊卡在使用它们时还常常略为变换一下语气，以表明她了解这些词句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实际上她根本想都没想过用这些概念来指导行为，她把它们同现实生活完全分割开了。如果对她说，一个人可以不带任何目的自觉地不说谎，仅仅为了做一个诚实的人而不说谎，她会发自内心地哈哈大笑起来。她不是什么时候都说假话，只要对她有用，她也会讲真话。她之所以努力使用一些崇高的词句，是因为她那聪明伶俐的小脑袋瓜注意到，像爱情、忠诚、荣誉这些字眼，如同字写得漂亮、举止有礼貌等，这些外在的标志可以使她从吉卜赛人出身上升到更加有利的地位。她倒不是想成为一名白人，对此她毫无兴趣，而是上升到白人和有色人混合的交界处，在那里两种环境的优越性她都可以利用。也正是出于这种想法，她对于曾经抚养和教育过自己的养母只说好话，从不说她的坏话。她把养母用责备的语气写给她的那封长信和她的其他珍宝放在一起，放在她从书本和报刊上摘抄的诗句和格言旁边。这是她的小圣经，每逢节日她都要翻一翻，而这也足以表明她的不同寻常。有谁能拿出这么有道德水准的文字来炫耀呢！玛伊卡曾两次对我描述，她堕落得有多深，变得多么

厚颜无耻，而母亲的责备、劝说和告诫又多么使她感动。这些都是她的道德装饰品，就像她用来装扮自己的金属丝戒指一样。只要一涉及实际，玛伊卡对母亲的要求就变得十分简单，无非是给她寄些香烟来，要不就是汇点钱来。“您大概也会生我的气，认为我是个不可救药分子。”不可救药分子这个词，她是带着一种内在喜欢、自我欣赏的语气说的，表示她知道并且会用这个词。我可以想像，如果玛伊卡不离开养母，她会轻松地完成学业，找到工作，最后还会有个平常的家庭；但是，即便这样，那些大的概念对她仍旧只是一种外在的装饰。

处理玛伊卡案子的，是一个年纪较大的审讯员，据说布拉格的小偷们都怕他。他因工作关系同玛伊卡的养父相识。玛伊卡的第一个案子也是他处理的，也许这个严肃的男人还曾帮助玛伊卡减轻刑罚，因为她哭得那么伤心，并且保证一定要改过自新。当玛伊卡第二次被带到他的办公室时，她的养母也等候在那里，他们两人一起促使她讲出了一些警察局都不知道的情况。但这并不是强迫或者施加压力的结果，相反，是利用了玛伊卡的不同寻常之处，比如说她的养父母都是白人，连在警察局里都有熟人等等，这才打动了她。玛伊卡的男朋友——她按照自己受过“良好”教养的风格称之为“我的未婚夫”——被关押在天井对面的一间牢房里，透过铁栅栏和铁丝网他们可以看到对方的身影。他们把双手穿过铁丝网伸到外面，几个小时不停地互相打手势。他用手语埋怨玛伊卡把他坑苦了。这是因为当着母亲的面，玛伊卡还供出了他们俩一起搞的一次

极为大胆的冒险勾当。对于这个非同寻常的案例，玛伊卡甚至有些故弄玄虚，夸大其词：“埃娃太太，这件事我得好好讲给您听！”

我至今还能清楚地回想起她当时的样子：大大的黑眼睛使她更像南欧人，而不像吉卜赛人，自然拳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粗壮的腿像土耳其人那样蜷曲在身体下面，穿一身橘红色粗布衣服，裤子是男式的，前面开口。不管是不是真的，人们常说听惯犯讲自己犯罪的故事，就像听猎人讲拉丁语一样，吹嘘的成分居多。但玛伊卡还不是那么老于世故，她讲的这个故事可能是真实的。一天深夜，在火药门和爱尔兰大街之间的某个地方，玛伊卡勾引一个乡巴佬，说她知道什么地方最好玩（现在我也知道了，有好多个那种酒店和咖啡馆，那些地方我奉劝大家最好别去），并且愿意陪他去，跟他一起找个地方玩玩。这是一个从外地来的上了点年纪的男人，钱袋胀鼓鼓的，显然是个理想的对象。他一点儿也不怀疑玛伊卡，认为她是个正经姑娘，虽然比白人女孩黑一些，但捷克话讲得这么好，决不会是吉卜赛人。他问她是不是希腊人，玛伊卡点了点头，于是，他就放心地跟她走了。过了市文化娱乐宫，走到科特瓦百货大楼背阴处，玛伊卡的同伙突然冲出来，劈头盖脸揍了他一顿，把他的衣服扒得精光，抢走了他身上所有的东西，包括衣服，然后四散而逃。男人休克过去，躺在地上。玛伊卡有点害怕，不知道他是不是死了，但等她回到事发地点，人已经不见了。这件案子里令人神秘不解的地方在于，是谁如此迅速地救走了这个光着身子、吓得屁

滚尿流的男人？最刺激的情节是，遭袭击的男人竟然屎尿失禁，拉了一裤子。玛伊卡说，“那家伙浑身臭气熏天，我们不得不把他的衣服全扔进垃圾箱。”更加神秘的是，后来玛伊卡从审讯员那里得知，受害人竟然没有报案。

在未婚夫的目光注视下，玛伊卡不断用手语洗刷自己的罪过，同时也抹去了母亲的影响。她在法庭上翻供，说原来的供词是胡编的。她还通过监狱信检科给未婚夫写过信，其中想必充满了爱情、忠贞、诚信等字眼。但是，如果她不同时又想方设法欺骗自己坚贞不渝地热爱着的未婚夫（而养母则称这个年轻人是使玛伊卡堕落的罪魁祸首），那就不成其为玛伊卡了。在监狱里，男女之间爱的接触仅仅限于写信，谈话，或者喊叫。最勇敢的女人还会在天井放风的时候，为在窗口张望自己的心上人脱光衣服，展示裸体。因为这种爱情的即兴表演，我们大家也跟着受惩罚，炎炎夏日不仅要穿衬衫，而且要套上厚厚的运动衫去放风。监狱看守们搞的这种禁欲主义的恶作剧居然到了如此细微的程度，一次一个年轻看守押解我穿过整个牢区去受审，见我穿着挽起袖子的衬衫走出牢房，还煞有介事地向我提出警告。玛伊卡的男朋友也一再恳求，要玛伊卡为他展示裸体，她却说这有损她的清白，坚决不答应。她在信中装模作样地写道：“我以后在你面前还怎么能直起腰来呢？”她一面写着，一面还哧哧地笑。传说这个牢区还有一个女孩，她在从地下室运送午饭到一楼的途中，居然来得及同一个当厨师的犯人在电梯里做爱。没有谁当真相信这个故事，但看守们值夜班时倒是常常挑牢中一些特别

漂亮的女孩，把她们带到空牢房去，事后给她们一些香烟作报酬，这确实是真事。然而，这已决不是什么爱的交合了，这是赤裸裸的营生和交易。正因为爱在这里受到如此限制，它在囚犯之间反而变得更加旺盛。隔壁牢房有一个叫维罗尼卡的女孩，她也是和男朋友一起被关进来的，俩人的牢房窗户都对着天井。维罗尼卡每天早晨一醒来，总要按照他们爱情的固有仪式，爬到窗口大声喊叫：“兹丹涅克，亲爱的，我惟一的爱人，早上好！我爱你，你睡得好吗？”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兹丹涅克的回答，相反，有传闻说他正同维罗尼卡的情敌保持着书信往来。而维罗尼卡每天都要遭到一个粗鲁汉子的辱骂。她的尖嗓门儿特别刺耳，一大早就听见她撕破嗓子大声喊叫，话都几乎听不明白，这在早晨人们很想翻身再睡一会儿的时候，尤其令人烦恼。粗汉骂的脏话这里不便重述，维罗尼卡也扯着尖嗓门儿回骂，同时，其他好几个男人也因为睡不好觉而卷入对骂，于是，一种被压抑的激情响彻了整个天井。这时候赫尔嘉已经来到我们牢房，每当维罗尼卡叫骂一通停下来时，她都要站到窗前，紧张而又快活地等着那个粗汉的回骂。这是监狱里的一幕悲喜剧，要是听不到那个粗鲁汉子的声音，就好像缺了点什么似的，总觉得这天早上不够劲儿。

玛伊卡早上也要沿着床爬到窗前，通过问候履行她自己的爱的仪式。但是，脚踩两只船的她总是不断碰到困难。她的两只船，一只是求爱的，一只是谋利的。天井对面的未婚夫是她思恋的爱，而我们上面隔两层的期货商皮

埃尔则是她谋求的利。每一个男人，如果她能设法与之联系上，而他又能给她送来烟草，都可以成为玛伊卡谋利的对象。如果未婚夫能同她取得联系，并送来香烟，玛伊卡本来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但现在她每天要用手语同自己的所爱进行无声的交谈，为她的背叛作解释，同时又用声音向皮埃尔问好，但话音低得跟打手语差不多，希望天井对面的那一位在嘈杂中辨认不出她的声音。玛伊卡也常趴在便池旁通过排水口同皮埃尔交谈，这是她能够同皮埃尔取得联系的方式之一，倒不是玛伊卡还有什么别的兴致。在便池旁她顶多只是开开玩笑，或者嬉闹一番，真正倾诉爱情还是要靠那些写在例假纸袋子和信笺本封面上的很长很长的秘密情书。在这些信里，她把爱情描写成不朽的、永恒的、忠贞的、忘我的、销魂的、肉欲的、纯洁得像一汪清水似的……什么样的都成，只要皮埃尔愿意为之送来烟草就行。啊，皮埃尔！好一个自负的男人！眼尖的玛伊卡，按照牢房放风的顺序，挨着个儿数天井里的笼子，居然认出了皮埃尔。她惊恐地在窗口上向我们说，她怀疑皮埃尔是不是害了象腿病，两条腿粗得像柱子一样，几乎走不了路。皮埃尔的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匈牙利人，老婆丢下一个小女儿跟别人跑了。玛伊卡据此展开了她谋求烟草的进攻战略，向他许诺说，如果她先于他出狱，一定帮他照看小孩。但我们也要对玛伊卡说句公道话，为了这个可以利用的心上人，她也在冒很大的风险。如果她在便池旁“打电话”或者同皮埃尔“通信”的事被抓住，作为惩罚，至少会被关到地下室那间令人恶心的肮脏单人牢房里

去，而且，每天的牢饭定量还要减半。而男人们却可以靠这种字面游戏消磨时日，不至于闷死狱中。

第一个向我描述“电话”的，是一个70年代初因不同意官方立场而被监禁的朋友。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对着便池排水口说话？”哎，岂止是说说话而已，还要乖乖地脸朝便池趴下来！而在这之前要先把排水口弯道里的水舀出来，这样才可以听见通过水管传来的说话声。“玛伊卡，把水吐掉！”“莉布什卡，把水吐掉！”窗外不时有人这样喊道。意思就是要她们把排水口弯道里的水舀干净，好一起说会儿话。为了舀水，玛伊卡的手指甲磨破了，从下水道冒上来的沼气把她的眼睛也熏红了，额头上还长出了疹子。玛伊卡一再引诱我也同某个人结识结识，甚至于使我感到布置给她的任务之一就是让我也去使用那种通讯方式，而假如我真的四肢伏地，头伸进便池，就会被他们当场捉住，这时恐怕我已经听不见审讯员的欢呼声了。对我来说，趴在土耳其式蹲坑便池上同别人说话正是监狱就是地狱的直接体现。不过，这种“电话”对我也有很大的好处，因为它促使姑娘们把便池清洗得干干净净。尽管这种事是那样令人恶心，但是，我不得不说，“打电话”对于这些姑娘们简直成了像面包一样每日不可或缺的东西。确实是这样，要不然她们怎么在监狱里还能有办法挣到男人的钱呢？这只能靠说话，话是最直接的沟通方式，话还可以引出话来。玛伊卡倒是喜欢写，但别的姑娘可没有她那样会写。通过敞开的管道口，隔壁牢房的“电话”声也可以传到我们这儿来，那里有个姑娘

可说是干那种营生的天才，她只需要口头描绘做爱的快感，就可以使我们楼上六间牢房里的男人都得到满足，而且，还因此激起了相邻两间牢房的女人们强烈的嫉妒。只要她一开始说话，所有的人都沉寂下来，默不作声。这就是监狱里的集体性生活情景，多么可悲的情景啊！有一个女孩的便池谈话又太下流，以至于男人们一听见，就急忙拉水箱，让她无法说下去。

皮埃尔也更喜欢写信，玛伊卡说他的第二职业是“作家”。期货商兼作家的信多半是描写他的色情梦，一些蹩脚的、幼稚的淫秽故事，但玛伊卡却为之感到骄傲。本来这类书信必须马上销毁，不让看守发现，但玛伊卡却至少要把皮埃尔的信放在枕头下面过一夜，还要把最精彩的句子摘抄下来。信则靠“马”来传递，这是狱中人与人相联系的第二种主要方式。所谓“马”，其实就是绑在线绳上的小包裹。先把信（或者食物、香烟等）卷成圆筒状，用橡皮筋捆紧，从铁栅栏和铁丝网（为此事先早已掏好窟窿）中塞出去。我们牢房的铁丝网没有把整个窗户都拦上，所以，玛伊卡可以轻松地把手从窗台和铁丝网之间的缝隙中伸出去。同时，楼上也会把他们绑在线绳上的“马”放下来，我们要把在窗外晃来晃去的包裹抓住，拖到里面解下来，绑上我们的包裹，并且喊叫：“好啦！拖！走——呐！”喜欢玩笑的姑娘们会快活地叫喊“放马呐！”在捉“马”和绑自己的“马”时，牢房里要有人在门旁放哨，过道上一有点响动就赶紧发出警告，“注意，注意，看守来啦！”整个战役进行得极为迅速，大家也都十分激

动。“快点！快点！玛伊卡在门旁吓得直打哆嗦，而莉布什卡则为解不开缠住的绳子急得直跺脚。看来，这种激动人心的时刻有时比得到的烟草还有劲儿。

“放马”可以把包裹送到隔好几层楼的地方，也可以送到旁边隔好几间屋的牢房里去。送到旁边牢房去的“马”要打秋千，绳子要尽量从高处抛出去，这样隔壁牢房的人才能够抓到。如果要送到离得更远一些或者更低一些的窗户里去，“马”就必须晃得很高、很远，这样相应窗户里的人才看得见，抓得到。“放马”算得上是一项专门技术，绳子荡起来要有重心，通常是把一只装满沙子——本来是为清洗便池发给各牢房的——的袜子绑在绳子的末端。为了“放马”，许多人没有袜子穿了，因为有的“马”会缠在避雷针的地线或者铁栅栏上，有的“马”会因绳子断了而掉到下面去。在放风的路上，我们经常看见一些失败的“马”躺在沿墙的水泥地上，或者高挂在墙上。因此袜子的消耗很大，因而常常在更换牢衣时谎称穿的袜子早坏了，要求另发新的。用来钩住和拖回“马”的工具叫“骑手”，怎么把“骑手”藏在牢房里，也是一门技术。每天检查牢房时，看守都要清点凳子的木腿、窗框上的木条、床垫下的木板，因为从这些东西上取材做“骑手”最简便，它们都是胶合板做的，掰下一块就能用。玛伊卡用报纸做“骑手”（这必须用《红色权利报》，因为它是全开的，幅面宽），用完后又把它抹平，这是最好的隐藏方法。争夺“马”的斗争，是囚犯和看守之间的主要斗争之一。牢房门外老有一只眼睛在窥视，在搜寻，“把那

个‘马’拿过来。”这一声吼叫就会使得囚犯们所付出的努力和期待的享受（烟草带来的享受）全部化为乌有。“放马”是囚犯的狱中生活方式之一，这既是他们创造才能的一种表现，也是他们渴望自由的一种反映。通过“放马”，人们之间建立了联系，同时还感受到诸多乐趣和兴奋。有时候“马”被对过楼里的看守或者楼外巡逻的哨兵发现了，但等他们跑到肇事的牢房时，它已经消逝得无影无踪了。一天晚上，有一个看守看见了“马”，而且准确数出了放“马”的那间牢房，他叫喊道：“这回可跑不了啦！你们休想再捉弄我！”但是，他把那间牢房翻了个底朝天，却什么也没有找到。就在他喘着气爬上楼梯，从过道那头跑来的时候，姑娘们已经把“马”扔到隔壁牢房去了。从监狱管理人员居住的预制板住宅楼里，可以看见部分牢房的窗户。他们的孩子常喊：“爸爸，爸爸，那边在‘放马’！”有一个好上进的乖儿子，哪方面都学爸爸的样子，他还把牢楼外墙上写着的牢房号记了下来，好确认是哪间牢房在“放马”。我的审讯员有时也中断审讯，饶有兴趣地观察对面牢楼窗口抛出来的“马”，它像鸟一样往下飞，飞过三层楼后，突然无声无息地消逝在铁栅栏后面。有一回，玛伊卡被抓住了。看守看见有“马”在我们的窗户上晃动，而这是挺大的一匹“马”，于是，他不顾疲劳，跑步穿过整个监狱三分之二的距离，立即赶过来。“马”运的是一本书，皮埃尔给玛伊卡的礼物。看守简直不敢相信，这私下传递的居然是一本宣扬教化的书，而玛伊卡的解释又是那么荒唐而不可信，于是，他一气之下把

她关进了地下室。

监狱里的通信是个值得考察的现象，要是监狱管理人员把他们下令没收和销毁的信交给心理学家去研究，那该有多好啊！这些信件中，只有极少极少的一部分是同谋犯之间串供，这是禁止被监禁者相互通信的本因。而绝大多数被监禁者通信的主题是："我爱你！"自己没有创作才能的，就抄袭别人的。信里常有诗歌，有的还附有想像丰富、寓意明显的插图。人们明知这些信多半是要被销毁的，却愿意在上面花这么多时间和精力，这个事实证明，整天把他们关在牢里有多么荒诞。人们还运用自己的创造力来保护这些信件不被销毁，他们把私下传递的信伪装成正式邮件，除了家里的寄信人地址和狱中的收信人地址外，还伪造了监狱检查员的印记。尽管私下传递的信件一经发现，便会受到严惩，但它对发信人和收信人都是莫大的安慰。曾在我身旁睡过约一星期的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一直在同一个从未见过面、只在便池旁说过话的男人通信。在我见到这个女人时，男人已被判刑，从我们所在的鲁津监狱押到别的地方服刑去了。这个女人每天晚上点名后都要履行一项仪式：从小柜子深处取出那个男人的信，去掉捆信的橡皮筋，脸朝下俯卧在铺好的床上（为的是不让我们看到信的内容），把信一封一封地在枕头上摊开，虽然信里的话她早已能倒背如流，还是要轻声朗读一遍，而且，每回都再一次受到感动，受到振奋。这个女人其实很低级，很卑鄙，我们牢房所有的人都被她偷过，这在囚犯中可算是最大的罪过。在家时当过看门人，她自己

还述说过怎样把孩子们从院子里赶走，不让他们在那儿玩耍。这个女人一张口就撒谎，她曾教唆自己未成年的儿子去当像她那样低级无耻的小偷，可受审时却说孩子不听她的管教，她不要这样的儿子。在对自己母亲的态度上，她那厚颜无耻的世界观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母亲已是垂暮之年，她却把老人家里的地毯、窗帘和所有装饰物全部搬走，把老人关在只有一间屋的住房里，让老人睡在木板和人造革上，说是免得把其他东西弄脏了。她被关进来后，女儿曾来信说，外婆和狗在这间光秃秃的屋子里被关了四天，才被舅舅解救出来。这个女人还怒气冲冲地写信给女儿，要她立刻从舅舅处要回外婆家的钥匙，说舅舅的目的只不过是想占有外婆的房子。她还有脸在我们面前夸耀她如何有远见，早把母亲家里的东西搬光了。她说，“你们想想看，要不是这样，四天后那些挺好的东西会变成什么样子！”就是这么一个无耻透顶的女人，却让这些信给软化了。她称这些信的作者为“我亲爱的兹丹涅克”，虽然她不敢幻想什么时候能同他见面，也不想从那种“亲爱的”关系中寻求安慰，给她安慰的是那个字眼，以及兹丹涅克信里画的画。字面上的东西有多么巨大的力量啊！

打手语，用击掌和敲打暖气片发摩尔斯电码，“打电话，，“放马”，再加上敲天花板，有许许多多代替交谈的形式。要不是在相邻的牢房里遇到了对手，玛伊卡本可以享受爱情和富足。然而，监狱里也有争夺男人的斗争，而且，因为要冒风险，联系又极为困难，这种斗争往往更加阴险狡诈。听见玛伊卡在便池旁倾诉感情的，会用手语告

诉她的未婚夫；懂得她和未婚夫的手语通讯的，又会通过“放马”转告皮埃尔。女牢房完全沉浸在这种阴谋勾当之中，长短爱情故事都因争风吃醋而纠缠不清。窗户里不时传出吼叫声、哭泣声、争辩声、对骂声，一种奇特的爱情奏鸣曲不断在这一道道铁栅栏圈起来的空间里回荡，监狱似乎快要被压抑不住的激情涨破了！撒谎、规劝、说服、解释、保证、许诺，这些既浇灌着爱情，又滋长着嫉妒，而这两者又都是帮助人们战胜狱中死一样的沉闷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力量。玛伊卡不知有多少次被情敌骂得狗血喷头。她像蝎子一样在两团火中间翻来滚去，一会儿把两个男人臭骂一通，一会儿又对他们甜言蜜语，一会儿向他们许诺爱情，一会儿又威胁要同他们决裂，而每一次她都泪流满面。未婚夫开始用手语同我们旁边一间牢房的姑娘通话，当玛伊卡读到这些不是给她的字母信号时，心里不知有多痛苦！为了抗议这种明目张胆的背叛，她就在那时候剪去了自己的长发，而他是多么喜欢她的一头长发啊！玛伊卡虽然很灵巧，能在三层铁床上像松鼠一样地爬上爬下，但在监狱里发胖了，身子也变重了。有一次，听到“注意，注意，看守来了”的警告声，她像熟透的梨子一样从窗口跌了下来。一次她碰伤了大腿，青紫的淤血久久不散，像是伤了静脉，后来又在铁床柱子上碰破了脚，还有一次碰伤了肾，造成尿血。因为经常在窗户上被抓住而受惩罚，她再不能收到家里寄来的包裹，也不能在监狱食堂采购，这更促使她发狂似的写信，自然是为了烟草。在监狱里，你很容易为所缺乏的东西发狂，而皮埃尔只要

有，是不会吝啬的。她一得到点儿烟草，立刻撕下报纸的边，卷成粗粗的雪茄，然后，腿往小桌子上一放，大口大口地抽起来，直到抽完才罢休。我不抽烟，虽能休谅她们的嗜好，但不理解其中的甘苦。我曾建议留下一部分交我代为保管，以备不时之需，但她们都不同意，说是要享受就痛快地享受个够。而到没有东西可抽时，又为谁多抽了几口而争吵，甚至动起手来，最后又向楼上哀求。这样，爱情和烟草混在一起了。有一次，为皮埃尔送烟的看守缺勤，他自己也不富有了，只送了点儿烟棍儿来，这东西闻着像烟，却点不燃，惹得女人们恨不得把他咒进十八层地狱。我一向给她们提技术建议，这一次建议她们放在嘴里咀嚼，但仍不过瘾。于是，我们又试着把它捣碎，让它至少能冒烟儿。你们一定想像不出，用小桌子的铁腿捣碎烟草棍儿有多费劲儿啊！

莉布什卡

玛伊卡的故事离不开莉布什卡。我看得出，玛伊卡认为莉布什卡是她在狱中堕落的根源。在莉布什卡来这间牢房前，玛伊卡还是个守规矩的姑娘，我是说遵守狱中规矩的姑娘。她不爬窗户，不在便池旁打“电话”，不“放马”，也不对训导员大嚷大叫，因而训导员们都喜欢她。莉布什卡来后，玛伊卡尝到了在狱中捣乱的甜头，结果丧失了守规矩姑娘所享有的一切权利，也就是可以让家里寄来包裹和在监狱食堂买东西的权利。我来的时候，这间牢房的不守规矩已是远近闻名。姑娘们告诉我，在我之前的那位太太不断告她们的状，最后终于调到别的牢房去了。这儿有个女看守，总喜欢蹑手蹑脚走近监视孔，悄悄

往里张望，而且次数比别人多得多。她戴眼镜，每次都看见她的眼镜片在监视孔里闪闪发亮，所以姑娘们给她取了个绰号，叫“小眼镜儿”。这可是个心肠挺坏的女人，有一次玛伊卡的包裹都已经寄到了，她硬是给退了回去。这样一来，玛伊卡就得完完全全靠国库养活，同时也就不得不通过打“电话”、爬窗户，靠男人们私下传递些东西，从而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而玛伊卡还挺喜欢这种堕落，因为在狱中如果规规矩矩，那就离郁闷而死很近了。在这里人们成天无所事事，书都是些残缺不全的，而且毫无意思，读来只会使人觉得可笑，引不起兴趣。惟一允许的娱乐是玩一种叫“好人，别生气”的掷色子游戏，可是除了傻子，谁也受不了整天玩掷色子。相互间可说的话早已说完，远近又没有什么新鲜事发生。姑娘们受过一次审讯后就再也没有人理她们，但在检察官写出起诉书和开庭审判前都要把她们一直关在这儿，而这至少也要三四个月。公正审判其实往往并不公正，而时间却拖得很长。无怪乎被监禁者想方设法自寻乐趣，而且，他们同样也需要人际交往。

在皮埃尔蹲的那间牢房里，关押着同莉布什卡相好的托尼契克。他们与其说是情人，倒不如说是朋友，他们之间的情话也更多是玩笑式的，没有什么挑逗和刺激的意味。托尼契克是个多次被判刑的惯偷，可能已结婚，至少已有孩子，他在私下传递的信中谈起过孩子的情况。与皮埃尔不同，他很沉稳而有主见，常常劝说莉布什卡，要她别胡闹，把莉布什卡当做小妹妹一样对待。但是，说来也

怪，同看守发生冲突的正是托尼契克，而不是皮埃尔。有一次他甚至一连几天被看守用“熊皮”捆绑起来。在上一次坐牢时，托尼契克请人在胸部和肚子上文了一只墨西哥鹰，我不大明白他想用来象征什么，也许是象征力量，不会是象征自由。他曾把这只鹰描下来送给莉布什卡，以示对她的爱。纸上画的，也就是他胸部和肚子上有的，这样的画倒是挺性感的。托尼契克和皮埃尔还以为姑娘们有多么高的智力，特地送来了他们自己编的十字谜语，但莉布什卡连简单的句子都不会造，怎么懂得联字呢？她写信都是请玛伊卡替她起草，她一面伸舌头一面用孩子般的字体抄写。她更喜欢打“电话”，她的声音每天都要在排水口前响好几回“：托尼契克，‘电话’！”她讲话也很特别，常常夹带着一些非常活泼的俏皮话。

我在鲁津监狱期间，莉布什卡竟然两次进出这个地方。她还不到十八岁，本应送到少年拘留所去，但捷克斯洛伐克没有专门的未成年人拘留所，这也许是由于缺乏经费，也许是官府对这种事根本不关心，结果未成年的孩子（有的刚满十五岁）在预审期间竟同有经验的盗贼、妓女这样一些监狱中的老油子关在一起。这些孩子的小案子一般在警察局里就可以解决，却要他们在鲁津监狱里等上三四个月才审理，法院判决后才送他们去少年犯改造所，而此时许多孩子的刑期早就满了。莉布什卡的牢狱之苦还可能有家庭因缘。她妈妈现在就正在服刑，而且，不是第三次就是第四次了，这次据说是因为在酒馆打架，打了一名秘密警察。莉布什卡很爱她妈妈，我只见她哭过一回，那

是她接到妈妈来信的时候。这封信经过长时间的周折，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最后总算送到了。妈妈原来也没有想给她写信，是因为莉布什卡尚未成年，审理她的案子时要妈妈作证，这样她才知道女儿也被关起来了。妈妈第一次坐牢时，莉布什卡才半岁，那一次她父母同时被抓，因为妈妈在酒馆与人争吵，被人打了，爸爸发现妈妈受伤躺在沟里，又去找他们算账。莉布什卡和姊姊一起，被送到幼儿收容院。上一年秋天，妈妈从劳改营回家，只在家里待了几个星期，又被关起来了。妈妈好像命中注定了要在酒馆里同别人打架，为此，几次被判处多年徒刑，最近一次据说判了八年。上一年秋天，妈妈短暂回家期间，莉布什卡自记事以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妈妈，但就在这短短的几天里，妈妈居然使自己的女儿详细了解到劳改营中女犯人的生活作风。我也正是从这个刚满十七岁的女孩那里听到了关于狱中女人的各式各样性满足方法的详细介绍。在那各方面都受到严格限制的条件下，人的创造性表现得真可谓淋漓尽致。我本来不曾想到莉布什卡会同我谈这些寡廉鲜耻的事情，其实事情本身并不一定就那么下流，这要看情况，之所以说寡廉鲜耻，是因为它们出自一个十七岁女孩之口。莉布什卡还恨自己未成年，只能继续蹲监狱，或者被送到少年犯改造所，否则就可以跟妈妈一起去劳改营了。

莉布什卡精神有毛病，但未经医院诊断和证明，只是服用一些镇静药，发病时会变得非常狂暴。她曾警告玛伊卡说：“别惹我，滚一边去，你知道我有毛病，打死你我

也不负责任。”嘲笑和不信任会刺激她，说句好话又会使她平静下来。有一次，我亲手为她洗净了在厕所弄得满是污垢的头发，还给她梳了个刘海。我说：“你瞧，现在你多漂亮啊！”我还把眼镜借给她，让她对着镜片照一照自己。她眼里的神情同我们家的狗受到男主人夸奖时一模一样。她有一副好嗓子，音量大，因为颅骨特别突出并呈拱形，所以音色很好，圆润而浑厚，她的听觉也不错。她听我这么一说，就一连几个小时唱个不停，而且计划着要去学音乐，当专业歌唱演员。她是个无依无靠的孩子，而一个孩子承受这样的压力，又怎么能在精神上不受到伤害呢？她的力气大得惊人，据她说，她到爸爸工作的农场帮忙时，曾一个人拦住一头从圈里跑出来的小公牛。小公牛挣断绳索，跑到菜园里来了，所有的人都吓跑了，只有莉布什卡站在那儿，等它一走近就抓住它的角，把它拉回牛圈。当时她才十三岁。她在幼儿收容院一直长到十岁左右，她喜欢那个地方。经过收容院的抚养和教育，她讲话相当标准，不带任何口音，比布拉格的中学生纯正得多，可她却不知道基督是谁，而玛伊卡尽管是在一个不信教的家庭长大的，却能够给她讲解。她很不愿意离开收容院，回想起离开时的情景，她说这是命运的转折。孩子们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要穿上节日衣服，然后，她们被带到爸爸跟前，爸爸说是来接他们回家的。莉布什卡不愿意，逃到公园里，只是因为姊姊也回去，最后才跟爸爸走了。姊姊后来在家里待不住，很快就去住宿学校学习去了。家里由爸爸的第二个妻子当家，莉布什卡不得不一个人留下来照看

后妈生的弟弟妹妹，还经常受后妈的气。莉布什卡也好打架，谁敢嘲弄她，她就把谁打得鼻青脸肿，因而在村里名声不好。有一次，一个家伙被她打破了头，后妈也挨过她的打。谁要为此责备她，她总是说："你管不着！"

后来她跑到布拉格找奶奶，在奶奶家住下了。奶奶对儿子可不客气，常训斥他，"还打过他一耳光呢。"莉布什卡喜欢奶奶，奶奶既不打她，也不嘲笑她，送她到一所弱智儿童学校去上学。她的第二次命运转折，是毕业后被分配去学园艺，摆弄石竹花。那里就几个女学徒，负责管理一座石竹花暖房。如果让她去整畦、运肥、刨地，也许她还会接受，可给石竹花剪枝却一点儿也不好玩。"您知道整天剪枝有多烦人吗？石竹花枝是用一种网子托着生长的，免得它们折断。而我不知道弄断了多少枝。"她丢下石竹花，跟一伙男孩子跑了，她自己也不像女孩，倒更像个男孩。他们偷了一辆运货车，开着它几乎跑遍了半个共和国，最后被抓获。她因为逃避劳动和不劳而获被拘留，头一次在鲁津监狱待了大约三个月，后来被送到少年犯改造所，以后从那里逃跑，又第二次被送到鲁津监狱，尽管仍未成年，却变得越来越坏了。在她第二次被送来时，我在医务室里见到她，我简直不敢相信她竟然变得那么厉害，这已经完全不是原来那个傻乎乎的、鼻子老是一抽一抽的姑娘，那个虽然很野，但只要好言相待却非常热心的姑娘。记得有一次我为什么事说了她几句，她生气地说："您等着吧，总有一天您会碰到一个真正癫狂女孩的！"那时候她还不认为自己已经疯癫，而我在医务室里看见的却

是一只狼，一只两眼充满疑惧、面带凶相的狼，她身上已经没有一点女性的特征，更不用说姑娘的特征了。一开始她向我投来凶野的目光，后来显得有些窘困而不知所措，毕竟在她的记忆里还留存有对我的亲切感。她的床紧挨着我的床，每天夜里她都会把一条腿或一只胳膊伸到我这边来，有时整个脑袋都伸过来，早晨总会抱歉地说："别怪我，您太像我奶奶了。"儿童收容院里被遗弃的孩子，往往具有非常悲惨的双重性格，他们渴望得到爱，然而他们自己的心里没有爱，也不可能产生爱，这种感情的真空很容易被嫉恨和自暴自弃所填补。

莉布什卡有同性恋倾向，属于所谓的"爸爸"型，而不是所谓的"妈妈"型。在这种倾向尚未爆发前，她已经模模糊糊地有所察觉。她喜欢自己那种男孩子式的举止，欣赏自己的力气，从不穿裙子，老是穿一条牛仔裤。当我告诉她，如果想学唱歌，还应该学会跳舞时，她哈哈大笑起来。上舞蹈课一定要穿女孩衣服，而想像自己那副模样，她觉得非常好笑。她也知道自己长得像男孩，但对此她很敏感。在监狱里，甚至还可能在儿童收养院里，女孩都喜欢让人爱抚，这倒不一定是同性恋倾向，而是环境造成的，但不少女孩的确喜欢同性恋，这已成为一种时尚。监狱里年轻女孩更经常成为成年妇女追逐的目标，莉布什卡不用费力就可以找到一个"妈妈"，"妈妈"还可能自己来找她，替她洗衣服，给她偷食物，为她当保镖。莉布什卡的生母并不崇尚同性恋，而她崇拜自己的母亲，她曾高声发誓，如果劳改营里哪个同性恋者敢碰她母亲，她一定

会把她打个半死。所以，这种倾向在莉布什卡身上还处于一种等待爆发的潜伏状态。

在第一次被拘留前，警察送莉布什卡到阿波里纳什性病医院去接受检查，布拉格所有被怀疑为妓女的女孩都要接受这种检查。正是在这个被隔离的病房区里，莉布什卡看上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吉卜赛女郎，她的名字叫埃娃。这仅仅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爱慕，埃娃也不允许对她有别的行为，但这是莉布什卡的初恋，因而很强烈，因为在这以前，莉布什卡接触的多是些男孩子。当时埃娃和同伙们已经商量好，夜里开车来医院劫走她们。隔离区在二楼，窗外有铁栅栏，还有人看守，但姑娘们发现一条静僻的走廊上有一扇没人注意的窗户，她们让它半开着，夜里就从这里逃跑了。莉布什卡要求同她们一起跑，因为她像小狗一样老是跟在埃娃后面，发现了她们的计划，她们也就答应了。假如她这次不跟她们一起跑，也许就不会被送到鲁津监狱来，谁知道呢！埃娃从窗户上跳下来时，脚扭伤了，她们把她拖到一间堆煤的棚子里躲了起来。要不是其中一个女孩在人们到棚子附近搜寻时忍不住打了个喷嚏，说不定这次逃跑就成功了。这样，她们就和埃娃一起被送进了鲁津监狱。也许是命运的又一安排，埃娃被关在我们牢房对面。每次收餐具或者交衣服时都要打开牢门，莉布什卡每次都要跑到过道上，希望能见到埃娃，还成天求玛伊卡“透过门缝”为她呼叫埃娃。

白天过道上总有看守，女牢区虽然没有老是在一间间牢房门前走来走去并不断透过监视孔往里观望的固定岗，

但过道同样受到监视。“透过门缝”呼叫只能在晚九点以后，那时看守们都撤到传达室，每隔一小时来巡视一遍。这期间，过道和牢房里的每个声响都会通过话筒传送过去，但这并不可怕，等看守从传达室跑上来，牢房之间的对话大多早已结束。有的看守为了当场抓住肇事者，悄悄转动钥匙打开铁栅栏门，静候在过道上，有时他们真能抓住正俯卧在地上，从门缝里向过道大声喊叫的女孩。“透过门透”大喊大叫的，是一些最疯疯癫癫的女孩，那时候莉布什卡还没有疯到那种程度。玛伊卡把为莉布什卡呼叫埃娃当做讹诈手段，“你不给？你不干？好，那我就不为你叫。”莉布什卡也曾想用“电话”叫埃娃，对面的牢房也有管道相通，但管道口终究相隔太远，听不清埃娃的话，要不就是埃娃同牢房的其他女犯人不叫她来听。如果埃娃想同什么人交谈，那也决不是傻乎乎的莉布什卡。“别再去烦埃娃啦！”大家都劝莉布什卡，但不管用。埃娃成了莉布什卡的梦，她使莉布什卡发狂了。“您看见她啦？”我从医务室回来时，莉布什卡满脸兴奋地问我。“我说她很漂亮吧？”她一再催逼我表示同意。埃娃在某些方面使莉布什卡想起她的姊姊，她童年时的感情依托，同时，埃娃又是她的性偶像，是她的第一次性激奋，所以莉布什卡像个初恋的男生一样，不停地折腾。埃娃是个美丽而又傲慢的姑娘，她不仅不会顺从莉布什卡的愿望，相反，认为受到莉布什卡的崇拜是一件滑稽可笑的事，而且认为莉布什卡的行为会使她当众出丑，因而非常伤心。但莉布什卡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可笑。“小埃娃，你说，你

也喜欢我，是吗？”由于弱智而永远处于幼年状态的莉布什卡常常对着便池排水口高声喊叫：“小埃娃，说话呀！你说什么？我听不见。大声点！你爱我吗？”

这段浪漫曲的终止是玛伊卡这个心存嫉妒和不讲信义的伙伴促成的。有一次，玛伊卡出于嫉妒，同时也是出于一种故意要经受痛苦的变态性冲动，把莉布什卡挑逗得发狂了。“我就是要笑你，就是要，就是要！”莉布什卡不需要比这更强的怂恿和挑逗了。我早已感觉到，玛伊卡渴望得到肉体的痛楚，莉布什卡常在粗野的游戏中把她打得浑身青一块，紫一块。“你不该惹我，”在玛伊卡舔身上的伤时她笑着说，“你知道我有毛病。”可那一次却从打闹、斗嘴、嘲弄和对骂演变成了一场令我目瞪口呆的斗殴。莉布什卡越来越狂暴，她把全部力量都倾泄在玛伊卡身上，玛伊卡嗥叫起来，但由于渴求痛楚的性狂热发作，仍不停地刺激莉布什卡。莉布什卡使尽全力挥动拳头，劈头盖脸狠狠地打，玛伊卡一面敲门呼叫看守，一面还嘿嘿笑着继续挑逗莉布什卡。“小傻瓜，小傻瓜。”她们叫喊着，喘息着。玛伊卡用指甲抓莉布什卡，血和眼泪一起流着。墙上的灰泥往下掉，凳子、桌子打翻在地。我挤在窗户下面一个被床挡住的角落里躲了起来。后来莉布什卡举起铁凳子朝玛伊卡扔去，幸而没有打中，凳子从我身旁飞过去了。到最后莉布什卡把铁桌子也朝玛伊卡扔过去了。

看守们一开始在外面看热闹，没有开门。当时过道上有好几个看守，她们正在一间牢房一间牢房地押送女犯去接受体检。直到玛伊卡因害怕被打死而惊恐地大声尖叫起

来时，她们才进来干预。这时候莉布什卡满脸通红，汗水淋淋，正拳脚交加，不停地踢打。突然，一个看守又马上把牢门嘭的一声撞上了，因为莉布什卡把一个铁凳子朝她扔了过去。她们赶快去叫狱警，过了好一会儿叫来时，只见莉布什卡正摁住玛伊卡，把她的头往地上撞。也就在这个时候，命中注定的事发生了。狱警打开牢门，吼叫道：“这是怎么回事！”玛伊卡刚刚从狱警胳膊下钻到过道，莉布什卡就向她扔来一把凳子，而这一切却让埃娃看见了。那个她所爱的美丽而高不可攀的小埃娃刚好站在牢房门口，准备排队去医务室。莉布什卡终于又这么近地看见她了，而她却轻蔑地说：“莉布什卡，我真没想到你是这么个人！”说完转身就走了。

在这一瞬间，在狱警还没有来得及为了防备她冲过来而把牢门撞上的短短一刹那间，莉布什卡明白了两件事，一是埃娃看见她了，一是玛伊卡正从埃娃的牢房里朝她笑。门关上了，留下我一个人陪着这个发疯了而且现在又绝望了的姑娘。她是这般震惊和悲痛，以至于当我递给她一块抹布，要她在调查人员来前先把斗殴的明显痕迹清除掉时，她立刻就听从了。她一面清扫掉在地上的墙皮，一面眼泪不住往下掉。“小埃娃不会饶恕我，她不能容忍打架斗殴。”她还对我讲，她在阿波里纳什时同人打了一架（为了谁？喏，当然是为了小埃娃！），为此，埃娃再也不跟她说话了。玛伊卡这个坏蛋回到打扫完的牢房后，讲述了埃娃的情况，说她现在有烟抽，扭伤的脚也好了，等等。她很狡猾，没有说埃娃如何谴责莉布什卡，只说埃娃

如何怕看她身上肿起来的青紫块。

懊丧摧毁了莉布什卡。玛伊卡同小埃娃谈话了，她们俩在一起待了两个多钟头，而这是埃娃正在谴责她的时候！莉布什卡四肢着地趴在便池旁，忏悔般地向托尼契克讲述了事件的经过。“她永远不会再愿意见我了，托尼契克，我该怎么办？”托尼契克的建议也没有用，她怎么能不再理睬小埃娃呢？到了晚上，玛伊卡这个坏蛋把耳朵紧贴着门缝，讲述从过道上传来的响动。莉布什卡什么也听不见，她有很好的听力，但是，除别的原因外，老是感冒使她的耳朵差不多聋了。

“安静！别出声。有谁‘放马’被抓住了。”

“埃娃她们那儿！”莉布什卡担心了。

“已经把她带走啦。”玛伊卡说。

被难圆的梦迷住了心窍的莉布什卡，只要一提到埃娃的名字，就什么都相信。当玛伊卡说，从声音判断抓走的是埃娃时，莉布什卡一点也不怀疑。他们把小埃娃关到地窖里去了！她又双膝跪在便池旁，找托尼契克商量。“我该怎么办，托尼契克，他们要把埃娃关进地窖！”

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被关过地窖的犯人不再回原来的牢房，小埃娃回来后也有被安排到过道另一头的危险。她再也见不到小埃娃了！小埃娃将消逝在遥远的地方！莉布什卡在愿望和罪过的锁链中辗转反侧，坐卧不宁。（“托尼契克，我总要向她解释清楚，那场斗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最后由于故意向训导员寻衅，她被关进了地窖里的单独监禁牢房。玛伊卡面带微笑，像一个顺从、听话的小

姑娘一样，在一旁看着。“收拾你的东西。”训导员说。这时莉布什卡眼里突然闪出了一道希望之光，说不定会把她关在小埃娃所在的过道那一头，这样她们就能说话了！她要讨香烟来给小埃娃抽。你们一定已经想到，小埃娃根本就没有被关到地下室去。

莉布什卡故事的结尾是娜金卡后来告诉我的，娜金卡是女人中最有女性味的一个，轮到她的时候我将很高兴讲述她的故事。她是在临时拘留室——全监狱最肮脏的地方，同时也兼做单独监禁牢房—— 见到莉布什卡的。她们同时被押了进去，莉布什卡是第二次了。这间牢房原定睡两人，现在三人用，莉布什卡的单人床上还有一个女孩，娜金卡在她们旁边惊恐得把头裹在毯子里：莉布什卡笨拙地试图在那个女孩身上发泄她那已不再仅仅是潜伏的同性恋激情。那个女孩一边纠正她，一边喊叫：“哎哟，你摁在我的尿道上了。”娜金卡听到这句话犹如置身于噩梦中的地狱里一般。如果以后在街上碰见莉布什卡，她会吓得大叫起来。就这样，一个未成年的女孩成为狱中吓人的鬼怪。这已经不是那个误入歧途的羔羊，而是一个粗壮的打手，这个打手会第一个猝然出击，并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莉布什卡终于癫狂到适合于她将要过的那种生活的程度了。

海伦娜太太

带走了玛伊卡，领来了一个神秘女人。她五十八岁，看上去却只有四十五岁，这也足以说明脑力劳动者比一般人衰老得更快些。尽管已经这般年纪，她仍然很美，五官端正，满头天然栗色鬈发一点也未变色，修长的腿，优美的身材，丰满的胸脯，只是肚子微微凸起，正是人们常说的那种保养得好的女人。我没有勇气问她，是什么使她能够保持美貌，是不是节制情欲。一身运动衣裤使她显得既可笑又可怜，也是因为牢里寒冷，她把毯子像贝都因人的斗篷一样裹在身上，毯子的一角拖在身后。但是，我能够想像得出她年轻时穿得漂漂亮亮地在斯拉维亚或者萨瓦林这些贵人出没的地方喝咖啡的情景。她来到牢房

后，用一种听起来非常可信的诚恳语调，零星地讲述了她的案情：她是从泰莱辛城养老院—— 一所她暂时居住的条件比较好的养老院 ——来布拉格看儿子的，儿子在布拉格一家很大的快餐厅当吧台招待员。下了火车，她坐上了一辆有轨电车，在那里拾到一个钱包。她不知是从谁的手提包里掉出来的，里面有二百克郎、一百外汇券，或者五十外汇券、三百五十克郎，准确数目不记得了，反正按官方汇率总共不超过五百克郎。然而为了这区区五百克郎是不会被关起来的，但她很自然地解释说，这是因为她没带身份证（“我匆匆忙忙就这样出门了”），而准予离开养老院的医生证明又被她在惊慌之中销毁了，因为她怕警察局给养老院打电话，从而使那里的人知道她被拘留了。可这样一来事情就复杂化了，她既不能向警察说明身份，警察局也对她失去了信任。她不知道，强行把她拖下车，并当场找了个证人的那个女人，原来就是她从地上捡起来的那个钱包的主人，但是，警察不相信她的话。

那个女人和证人把海伦娜太太从儿童商店一直拖到巴塞洛梅依大街，并在那里向警察报了案，说海伦娜太太偷了她的钱包。钱包当时在谁手里，我没有听明白。那个女人和证人从两边像钳子一样夹住海伦娜，不断辱骂她，她根本没有想到挣脱或者逃走，被动地，好像被麻醉了似的，让她们沿着那条充满行人的街道拖了好长一段路，一直拖到警察局。而她的样子也真像是受了麻醉，迷迷糊糊，瘫痪无力。她那惊吓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由于激动而全身发抖，口角不断流涎，嘴唇和舌头难看地抽动着，而

且坐立不安，像一只被捕捉的动物，不断地在牢房里走来走去。幸好我有香烟，她贪婪地大口往里吸，然后从鼻孔里喷出一圈圈细细的烟雾。头一天夜里只有我一个人和她在一起，我真怕睡过去了，谁知道这样一个受到刺激的精神失常者会干出什么事来？后来她拿到了法医的诊断书，她还曾问我精神失常一词是什么意思，我不好意思伤害她，对她说激动时嘴唇和舌头抽动就叫做精神失常。后来我逐渐把钱包事件的一些零星情况加以整理，把可能真实的情节从臆想出来的情节中分离出来，也就是说从她为自己进行的辩护中分离出来，这时候我明白了，我大可不必对她感到恐惧，真正感到恐惧——那种令人惊慌失措、心惊肉跳的恐惧的，正是她自己。坐牢像一块大石头压在她心上。慢慢地看出来，她并不是个厉害的人，除了哭哭啼啼表示抗议外，她也没有力量采取别的行动。第二天她就被传去接受心理测试，以后天天都要她服用镇静剂。其实她是个很有经验的患者，在法院审理前的几天里，她把药都吐到便池里了。不过，即便不这么做，在法庭上她同样也会因为惊吓而语无伦次。

海伦娜太太出身于一个有名望的“江湖艺人”家庭。有一次我偶然在报上读到一篇来自西捷克的报道，文中把乡间庙会描写成当地田园风光的标志，在一个地方还提到她的名字。我把这篇报道念给她听，海伦娜说：“那是舅舅，我们走另一条路线。”舅舅在捷克西南部活动，从复活节（4月初的第一个星期一）到圣马丁节（11月11日），每一个地方的庙会、每一处教堂守护神的节日庆典

他都要去。妈妈也在南捷克活动，但离舅舅东面一点。舅舅表演车技，外公演木偶戏，妈妈经营旋转吊椅、木马和汽枪打靶。她们用大篷车为人们送来娱乐，妈妈在吊椅售票口卖票，美丽的海伦娜在打靶台后面出租汽枪，一克郎打五枪。妈妈很富有，后来在企业转让给国家时，她拥有两台拖拉机、三部大篷车和相关的娱乐设施，她们——妈妈海伦娜和姊姊——靠转让得到的钱生活了好多好多年。这可是事实，海伦娜太太说的都是事实，当然，除非她没有撒谎。但是，随着时光流逝，谎言编织的神话慢慢褪去外衣，庙会的镀金也开始脱落，现实生活的粗俗真相无情地显露出来，这是连我这个庙会崇拜者都不愿看到的。海伦娜太太各方面都要依赖周围的人，她自己只会愉快地生存（当然还会出租汽枪），作为这种依赖的代价，她不由自主地向我们提供了一些情况，这些我们并不想打探，但不能不记录在案。

她依赖性强，但并不愿任人摆布。为了维护自己，她进行了顽强的抗争。她写了很多封信为自己辩护，比我写的还多得多，尽管当局不断向我提出各种问题要我回答。给人的印象是，她写信不仅仅是作为一种辩护方式，辩护可能也不是她写信的主要原因，更主要的是，这些信函能使她超脱出现在所处的可怜境地，也可以说她压根儿就喜欢写信。她的这种爱好使得泰莱辛城养老院专门为她颁布了一项规定，禁止无缘无故地老是向上级机关告状和不断请求上级机关派人来养老院检查。在监狱里她却可以无限制地写，虽然私信在这里只允许十四天写一封，但因公信

函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写，而且不受检查，对没钱的犯人监狱管理处还有义务提供信纸、信封，代为支付邮资。海伦娜太太每星期至少有两次在点名时要求：“请给我纸和信封。”但是，不管是出于强烈的爱好，还是出于顽强的辩护，反正她自己不会写。由于她离不开文书，而文书又不时需要问清一些情况，这样论据才有说服力，于是，她就不能不一点一滴地吐露一些真情。一开始是我替她写，后来是赫尔嘉。我们给检察官、辩护律师、法官、泰莱辛城养老院院长、养老院心理医生、法院心理专家等都写过信，而且不止一封，我们甚至冥思苦想，看看还可以再给什么人写信，而写来写去所有的信无非是说明一点：海伦娜是无辜的，不该受惩罚，因为她早已被剥夺了行为能力。

是的，海伦娜太太被认定“有毛病”，无行为能力一词是她所有辩护信的主要论据。遗憾的是，她只是根据家庭的建议在财产问题上被剥夺了行为能力。在刑事问题上，法院专家却认定她应负全部责任。这是因为，当这位专家问她偷窃是否对时，她作为一位有良好教养的太太自然是回答说不对，而专家就据此得出结论，认为她既然知道不对，又做出了这种恶劣行为，法院当然应判她有罪。海伦娜太太不知道为什么一会儿说她无行为能力，一会儿又说她有，对于这种法律上的细微差别，她既不理解，也不接受。在判决她有罪后，她就捡钱包一案写了自己的最后一封信，这次径直写给了共和国总统。起初有人建议她写信请求赦免，但在写的过程中她决定改成申述。这是惟

——封她自己写的信，我不希望再给我加上一条诱使无行为能力的人向国家元首无理取闹的罪名，赫尔嘉出于其他原因也拒绝提供帮助。那封信我看都没有看，赫尔嘉说我错过了一次开心的大好机会。海伦娜太太认为旧式写法更高贵，因此，信封上写的是：总统府共和国总统大人台鉴。不过，训导员反正也没有给她寄出。

海伦娜太太除了爱写信外，总还要和我们说说话。她不喜欢谈自己，关于捡钱包问题也只是在刚刚关进来时的紧张心情下向我们作了简单叙述，以后就再也不谈了。总的说她很少谈话，除非直接问她，更很少谈及自己的情况，大部分时间她都在牢房里忧郁地来回走动，要不就躺着装睡。但有时情绪好也愿意交谈，而我们又有那么多轻松的、高尚的话题可谈！海伦娜太太最喜欢谈的话题是吃。她是那样地贪图享受，吃对于她来说简直成了世界的中心。再看看她怎么吸烟。我可以活生生地想见她坐在大篷车的台阶上，长长的头发细心地梳向两边（每天早上她都要伸过头来问："我的发缝整齐吗？"），护理得很好的双手，指甲涂满了指甲油，眉毛轻轻描过，眼睛舒适地微微闭上，鼻翼张开，就这样长长地、深深地吸上一口。她分两次吸，先是狠狠地把烟吸进嘴里，再从鼻子里喷出一小部分，品尝一下烟的味道，然后再深深地吸进肺里。一会儿工夫她一枝烟就吸完了，至少比赫尔嘉快一倍。她也很喜欢喝浓咖啡，但在狱中弄不到。她心驰神往地讲述起养老院午饭后大家坐在阳台上喝咖啡的情景，还说，其他一些老太太有钱，常让她去城里买蛋糕，她不吃蛋糕，但为

了香烟和咖啡，她甚至连灵魂都宁愿出卖。在没有烟抽的日子里，她确实显得肉体上十分痛苦，脸拉长了，身子发抖，嘴也开始抽动。

她真能吃，每餐都吃得一点不剩。但是，为了得到监狱中最好的饭菜，她却弄巧成拙，反而吃了苦头。她要求吃病号饭的结果就是如此。病号饭有两种，一种是不咸的，其实就是其他人吃的普通饭菜，但是不放盐，这根本无法下咽；另一种是清淡的，这倒是挺不错的，里面有很多—— 按监狱的标准来衡量—— 奶、肉、干酪和鸡蛋。为了让她不敢再取闹，给了她一份不咸的病号饭，而牢房里又不许有盐，结果我们只得把她的饭倒到便池里，另外要求添主食，使她至少可以靠主食填饱肚子。在她回忆什么地方的饭不好吃，什么地方好吃时，我们发现她一生中去过的地方并不多，很容易就知道了她都在哪些劳改营和监狱里待过。这位个人和家庭历史都很好的太太，一谈起劳改营的情况时，不由自主地显得那么熟悉，简直可以说是如数家珍。她绝对不喜欢巴尔杜比采的饭菜，而且，在那里就餐时还要排很长的队，等排到跟前时饭菜都凉了，好的菜也没有了。可在奥帕瓦就不同了，那儿有一回还吃烤小鸡呢。她承认，她最爱吃炖鸡汤—— 我禁不住又想像开来：大篷车，篝火，锅里煮着一只鸡。她还常求我：“ 埃娃太太，请谈谈您的社交应酬。 ”准确一点是说，请谈谈您在哪儿吃过些什么好东西。我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有“ 谈谈社交应酬 ”的那份荣幸，但为了使这个可怜的女人高兴，只好凭空编造了一些菜名。她还要询问细节，我不

得不以巴尔扎克式的认真劲儿，绘声绘色地讲述那些盛宴。有些名人的名字同她熟悉的菜一起出现，她觉得似乎自己也参加了这些饮宴，不禁露出了梦幻般的微笑。有一次我讲到在亚历山大利亚餐厅吃对虾，她竟产生嫉妒，她连对虾这个字都不知道。可是，她有丰富的想像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她是根据字面含义去猜想世界，而不是根据直观了解去认识世界，所以当她把“对虾”这个字收进自己的字典后，竟说她后来“记起来了”，其实她也吃过，并以这种方式克服了她的嫉妒心理。

就是这样，她一点一滴地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有一次，她又以自己常用的那种令人感动、使人无可奈何的方式，亲切的招呼一个星期六、星期日来值勤的看守。当这个看守从小窗口里给我们送盘子时，海伦娜太太把头伸到过道上，像在社交场合遇见熟人那样十分高兴地问道："您现在到这儿来啦？”“这是托尼契克。”事后她对我们说。她为在鲁津监狱有了一位熟人而感到非常高兴。托尼契克以前曾在波赫尼采精神病封闭治疗区工作，他感到看守正常人要比那里好受些，“他们满身屎尿”，因此离开了。海伦娜则夸奖他在波赫尼采时待人特别好。她在奥帕瓦时也是住监狱精神病院，后来监狱当局建议送她去泰莱辛养老院，原来泰莱辛养老院也没有什么令人愉快的养老设施，而是一个强制住院治疗严重精神病患者的地方。它不是监狱，但也不允许随意出走，所以海伦娜说她销毁了允许到布拉格旅行的医生证明，其实她根本没有拿到什么证明。奥帕瓦监狱释放她时，对她还是很照顾的，为了使

她有点钱支付在泰莱辛的费用，批准她享受最低退休金，虽然她从未就业，只不过在监狱里干过些活，而且，在监狱里也从未挣过多少钱。就这样，尽管她销毁了给她的所有官方文书，因为这里有关于她真实生活的一些令她伤心的细节，尽管她为掩盖残酷的真相而在意识中编好了一份随时备用的固定不变的自传故事，尽管她努力不谈自己的情况，真相的泡沫还是不时地涌出，从而冲淡了她为自己制作的自画像。而随着对捡钱包一案的逐步审理，现实终于无情地露出了头角。

在我思考她究竟是什么人的时候，海伦娜太太提出了一个复杂的哲学社会学问题：人可以也是他所装扮的那种人吗？好一个庙会公主，我心里想，可今天那些热闹的庙会又都到哪里去了呢？在这个小小的封闭空间里，我和她呼吸与共地一起生活了整整四个月，不管我怎么怀疑她的话，惟一我没有想到的是，她竟然是一个地道的扒手。我们想，她在那辆电车上不过是碰到了一桩倒霉事，她捡到了一个钱包，而钱包的主人就在近旁。我们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海伦娜太太给人的印象正是那种毫不防备而无能为力的人。会不会是有意偷窃？绝对不会！在电车里发生的，是同那次要求吃病号饭一样的糊涂事。总之，她不会办事。海伦娜太太讲话的声音很柔和，尽管是在那样的一种环境里长大的，她从来也不说粗话。有一次，楼上几个小伙子要和我们在便洗旁通话，被我们拒绝了，他们就把整桶整桶的水泼到我们的窗户上，浇了海伦娜太太一身。她生气了，向他们喊道：“你们这群野象！”虽然身处

如此粗鄙的环境，她也想不出其他的骂人话。时至今日，我似乎还听到那个尖尖的、因为生气而有些紧张的声音："你们这群野象！"这也是我从她嘴里听到的惟一一次骂人的话。她的样子是那么脆弱，那么无辜，可实际上她却在说谎，张口就是谎话，而且说谎时神态那么自然，就好像呼吸空气一样。我猜不出，她同我和同赫尔嘉说话时，装腔作势的程度有无不同，这我无法比较。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现实与梦想之间的鸿沟。当一个人无力实现自己的梦想时，谎言便是惟一可以用来保护自己的手段。海伦娜太太竭尽全力想成为庙会公主，她强要我们相信，她所臆想出来的形象就是她的真实形象。有时我想，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她想要掩盖什么，同她相处是不是容易一些呢？如果她的家庭条件和个人能力使她只能用不光彩的方式去获取谋生手段，她又怎么能够梦想成真呢？也许只要她拥有那个汽枪打靶场！或者有那辆大篷车和拖拉机！再不然她除了美丽之外还有青春，背后还有一个守护着她的妈妈！人的命运是猜不透的。被现实逼得走投无路的她，只好假装成梦寐以求的那个人。但是，当她被判刑后，现实的悲哀就完完全全显露出来了。

训导员给我布置了一项任务，要我帮助海伦娜太太填写一份犯人去"服刑"——一个多么漂亮的专业术语呀！——前应该填写的调查表。这份调查表共四页纸，上面印好了必须回答的项目。可以明显看出，这个可怜的女人多么想自己一个人来填写它啊！她用含有敌意的目光看着我，因为我被授予了帮她填表的任务。我也不着急，反

正她自己不会填写。谁叫她这么美貌却又如此愚笨呢！她把表格拿到床上，背朝着我和赫尔嘉，一遍又一遍地念那些项目。她什么也不懂，但知道这份表格里包藏的危险。我们还不知道表里都要填些什么，因而也不知道此刻海伦娜太太内心里的矛盾和冲突。她先挑了一些最无害的问题，问该填些什么，想试试自己来填，但后来还是放弃了。我感到奇怪，为什么她这么全神贯注地研读这份表格，很可能她已经有过经验，知道填写时撒谎不划算，更没有勇气拒绝填写。最后她不得不按照每个项目的问题向我说出实情，由我来写。原来她从未出嫁，并不像她那么逼真和详细地向我们讲述过的那样；也不是寡妇，像她为了表示自己的贞洁而伪装的那样（为什么要把寡妇形象同贞洁观念联在一起呢？是因为寡妇对死者忠贞不贰吗？），她的儿子瓦塞克其实是个非婚生子。姊姊是她的监护人，但不让她回家。妈妈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她们姊妹俩都是妈妈的私生女儿，只是妈妈和姊姊都没有她那样美貌，没有想入非非，也没有那么愚笨。姊姊已经老了，靠在某个部机关当清洁工维持生活（“姊姊在部里工作”，在一次闲谈中海伦娜太太这样说过），瓦塞克尚在襁褓中就由她照料。海伦娜太太在家时是一只只会蹦蹦跳跳和张嘴啄食的小鸟。她在战争期间也没有穿过裘皮衣服，也没有擦过迪奥尔牌香水，尽管我得承认，她能够正确地说出这些东西的名称。当我们填到“你曾几次被判刑”和“你曾在哪些地方服刑”时，我的心都紧缩了，她说那个数字时声音是那么的低沉。捡钱包案件已经是第十八次了。第十八次被

证明有罪和判刑。我和赫尔嘉一起算了一下，从海伦娜太太成年时起，她每隔一年就要被判一次刑。

为偷窃这个里面只装有不到五百克郎的钱包，而且还没有偷成，海伦娜太太被判处一年监禁，立即执行。尽管她已经快六十岁了，还是个丧失行为能力、一天都离不开精神病药物的人。为了替自己辩护，她给医生和检察官写了大量信函，肯定比那个法院为她指派的、审判时根本没有到庭的律师多得多。法庭审判却是很认真的，有法院精神病理专家和几个证人出庭。出庭指证她的，除了那个被偷的女人外，还有泰莱辛养老院——就是那个令人愉快的、午饭后有咖啡喝的、时常还可以吃到炖鸡汤之类的好菜的舒适的养老休闲机构——的精神病医生，她说海伦娜太太把用国库的钱为病员购置的内衣都拿到城里去卖了。为了弄到钱买香烟，她还卖掉了所里的床单。我慢慢明白了，海伦娜太太之所以抗争，不是为了否认对她的指控，也不是反对给她判刑。在她的心灵深处，犯罪和刑罚都是不重要的事情。指控总是有办法可以抵赖的，不得已的时候刑罚也是可以对付的。压在她心头的不是良心上过不去，而是彻底被遗弃和一贫如洗，她奋力争斗的是，今后究竟在何处度过她剩余的岁月。

她的家，也就是姊姊和儿子，早就被她折腾够了，所以，上次刑期一满就把她作为无行为能力者送进了精神病院。现在精神病院也不要她了。法院精神病理专家曾向她许诺，一定要说服养老院院长收容她，但结果却未获成功。老院长主事时情况还好些，海伦娜曾感动地回忆起

他，因为他总是能够原谅海伦娜为“看儿子”而不时偷偷溜出去。但老院长去年因心肌梗塞死去，而继任的年轻大夫却又极其刻板地注意遵守规章制度，一有机会就把这个老找麻烦的女人甩掉了。后来法医还试图送海伦娜太太去精神病治疗中心，但是那里没有她的位置，最后还只得由监狱来管，因为她被判的是“严格监管”徒刑。而海伦娜直到最后一刻都以为法院会把她押送回原来的养老院，宣判后的最初惊恐一过去，她又找到了新的希望：她年纪大了，又有病，不会再让她回到劳改营里那些她很害怕的年轻女人中间去，很可能把她关在牢里。而因为有病，上一次已经给她免去了部分劳动定额——她干的活是穿珊瑚项链——现在说不定根本就不会让她干活儿了。她又回想起了奥帕瓦，那里每个星期还可以吃上一顿小鸡呢！此外，奥帕瓦关的尽是些被判长期徒刑的女人，她们是监牢里的贵族，是在大盗窃案中发了财的富婆，她们有足够多的香烟抽，有足够多的好东西吃，而且她们并不吝啬。生活永远不像看上去那样可怕。

于是，在以哪一处牢狱为家尚没有确定的时候，她已经在幻想如何尽可能享受，已经在做梦了。多么美妙的梦啊！虚拟的东西也可以有现实的价值，如果你能促使周围的人深信不疑的话。海伦娜太太身无分文，但却不缺香烟。一开始是我给她买，尽管我不抽烟，但这不是出于行善的动机，而是为了使她不再烦我。因为她没有烟抽时的样子实在可怜，全身发抖，不断咬嘴唇，叫人看了实在难受，而不仅仅是怜悯。一旦有了香烟，她会往凳子上一

坐，漫不经心地跷起二郎腿，点上火，贪婪地吸起来，这时的她又显得那么幸福。以后，好发号施令的赫尔嘉来到牢房，她就把照料海伦娜过烟瘾的事揽过去了。她甚至慷慨大方地用巧克力和饼干偿还了我为海伦娜买烟花的钱，尽管我并没有要求她这样做。她为海伦娜太太还“债”是要把海伦娜连同其嗜好一起据为己有。她这样做也不是为了行善，而是因为她相信了海伦娜异想天开的无稽之谈。主要是因为海伦娜说起她原来在布拉格的住宅（她说现在是儿子住在那儿，儿子事实上住在姨妈家），那里还有丈夫留给她的许多很值钱的东西，有整整一仓库各式各样的商品！臆想中的这位丈夫是做衣料、内衣和毛衣买卖的，他到各地庙会和集市上去摆摊，在海伦娜太太四十岁那年，也就是十八年前，因心肌梗塞去世了。海伦娜太太直至今日还常去取毛衣，取胸罩，可见这个仓库之大了。她上一次把这些东西卖给了养老院的护士和有钱的休养员，这一次来布拉格也是为了取胸罩，她同当局第一次发生冲突，也是因为这些毛衣。丈夫死后她生活无着，就拿毛衣到一些商店去卖，也在维尔索维采区一些住户的家里卖过，结果被人告发，当局指控她隐匿不报已被取缔的商号存货，从而盗窃了国家财产。海伦娜太太很有经验地、值得信赖地用眼睛打量了一下赫尔嘉的胸脯，“你穿了 8 号，”她说，“也许 9 号，10 号的我也有，都是些带花边的成型硬胸罩，毛衣都是纯羊毛的，绝不是现在那种人造毛的次等货。”

我心里暗自想了想，十八年前都戴些什么样的胸罩，

庙会上的货摊又卖些什么样的胸罩，但我没有吭声，我只想观察她是如何狡猾地编造这场富贵梦的。赫尔嘉不以为海伦娜是一个连香烟都没钱买的乞丐，而把她看做是富有的女人，有朝一日也许可以把她的仓库接管过来，就像现在接管她过烟瘾的事一样。就是这样，海伦娜把关于丈夫的梦，关于她成为一个贞洁寡妇的梦，变成了大口大口吸进嘴里的香烟烟雾。她们像姊妹一样你一支我一支地一起吸，而早晨赫尔嘉还在睡觉时，海伦娜就一个人偷着吸。赫尔嘉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同海伦娜分享。海伦娜进来时带了半管护肤霜，她留着以备他日之需，却用赫尔嘉的，并且抹得挺多，手上也抹，而这可是真正迪奥尔牌的昂贵东西，哎，怪不得以后当赫尔嘉知道这个女人的全部富裕生活史只不过是臆想出来的谎话时，气得都快要发疯了。并没有什么胸罩，也没有什么毛料和丝绸，有的只是被她气得不知所措的亲人和她自己的无行为能力，所以就算是真有什么毛衣，她也无权去拿。家里对海伦娜太太又闹出新的丑闻感到非常气愤，也知道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姊姊还真有良心，给她寄了个包裹，但没有署自己的名字，儿子则根本不理她。海伦娜写信要求再她寄给些东西，结果是渺无回音。

“没人理你啦，”受骗的有钱女人对狡猾的没钱女人吼叫道，“你只好认命了。儿子不管你啦，姊姊不理你啦，把你塞进了精神病院，你什么亲人也没有啦。你别再自欺欺人了，没有任何人会给你任何东西。我真想知道，你拿什么来偿还我在你身上投下的资金。”赫尔嘉不曾料到，

她行善的结果是上了别人的当，她把一腔怒火都倾泻在海伦娜太太头上，想方设法欺负她。她不放过任何机会要让这个愚蠢的傻瓜明白，她已被所有的人抛弃了。连赫尔嘉自己也在一种乖戾的报复心驱使下把她抛弃了，她不再给海伦娜太太任何东西，甚至烟头也直接扔进便池，不让那个没人理的穷光蛋捡去用报纸卷了吸。“我可不会再养活你了，你一辈子也无法还我。”她生气是可以理解的，但大可不必这么粗鲁。而海伦娜太太倒显得更为大方，当她收到上面说到的那个包裹时，还抓了一把糖果请我们吃。“拿吧，尽管拿吧，拿两块。要不然我会生你们的气的。”她高兴极了，因为她也有东西可以请我们。

在海伦娜收到那个包裹时，赫尔嘉还是新来不久的，当时她什么也没有，吸我买的烟，等着家里给她寄东西来。但她是真正有钱的女人，欠债是一定会还的，所以，二一添作五，她不客气地同海伦娜太太平分了她的咸肉、香肠、糖果和香烟。她们坐着聊天，一会儿工夫就吃完了一公斤咸肉，连面包都不用。她们把香肠掰成差不多二两一段，就这么吃。可是，以后，赫尔嘉和她翻了脸，海伦娜太太不由得后悔起来，早知道不该让她吃掉那些火腿和香肠。于是，牢房里飘起了敌意。而家里似乎真的把她忘了，既没有来信，也没有寄食品包裹。最后一个月里，垂头丧气的海伦娜太太连写家信的权利也不利用了，眼见她一天比一天消瘦，一下子显得苍老了，又开始颤抖和流口水了。而这以前，那还是安蒂在牢房里的时候，她还用带有童音的嗓子为我们唱歌来着呢！她只会唱一些战前流行

的庙会小调。有一次她恳求说：“ 千万不要当着我唱那首《黑头发的小男孩》 !”

“ 为什么 ”?我问道。

“ 我一听就要哭。”

那首歌的歌词是：黑头发的小男孩，跑来向妈妈告状，说他在堤边玩耍，总有人来把他撞，问为什么撞他，因为他没有爸，他是个不害臊的私生娃。

然而，世界有时也会从倒在它身上的公道和正义的废墟中抬起头来吸一口气，海伦娜太太也终于等到了家庭温暖的胜利。这是她在拘留所牢房里待的最后一天，她知道下午就要送她去临时牢房，从那里她不知要被押往何处，但愿是到奥帕瓦那些有钱女人的地方。她显得筋疲力竭，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吸烟了，只能闻赫尔嘉为了故意折磨她而喷出的一股股香味。这真是可怕的一天，我也没办法帮她，我的律师没来，不然还可以向他要烟。离到监狱厨房采购的日期又还有十多天，而我又不是那种可以向男犯人讨烟的女人。已经是午饭后了，看来是没有任何希望了，我只好给她一些巧克力和肥皂作为送别礼，不然她被押解上路时未免也太可怜了。就在离出发还有半小时的时候，训导员给她送来了包裹。我们一起把盒子放在床上解开，里面有整条整条的香肠、咸肉、香烟和糖果。她没有说“ 你们瞧见啦！ ” 她什么话都没有说，只是急忙拿起香烟来抽，一枝接着一枝地抽。可别说什么福无双至，为了使幸福变得圆满，惊讶万分的训导员竟给她送来了第二个包裹。家里攒下了好多监狱寄去的准许寄包裹通知单，所

以一下子寄了两个。噢，要是不相信赫尔嘉说的大家都把她抛弃了的话就好啦！要是继续给姊姊写信就好啦！那她就可以要求多寄些包裹来，也许早就寄来了两个，三个，四个……她没有被抛弃，她得到了馈赠，她为自己的富有而兴高采烈！我不得不把自己的人造革提包借给她，好让她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走。但她不仅没有偿还欠赫尔嘉的债，反而在临时牢房里说了她许多坏话：“注意那个胸脯挺高的女人，她可坏了，她有的是烟抽，却舍不得给别人。”

这可伤了赫尔嘉的心。她算了一下，为了海伦娜异想天开编造出来的财富，她至少赔进四百克郎。从此以后，谁要是在监狱里碰巧和赫尔嘉在一起，都会因为她从海伦娜那里得到的教训而吃亏，都会碰见一个十足的吝啬鬼。她向我发誓，“任何时候再也不给任何人任何东西！”她还责怪我不该在牢房里兴起一种不负责任的风气，因为我太大手大脚了。

作为一个超脱凡尘的梦中人，海伦娜太太离超自然力量很近。有一天早晨，她好像还在做梦似的坐在床上宣告：“我梦见一条条香肠，真好吃啊。”就在那一天下午，她收到了上面说到的那个包裹，里面有香烟、咸肉和香肠。这是梦幻与现实的一次令人快活的、使人兴奋的巧合。从那以后，我们开始向她讲述夜里做了些什么梦。干净的水预示快乐，肮脏的水预示麻烦，河水泛滥是大的危险，水上的白色泡沫是悲伤，预示悲伤的还有白衣服，特别是白婚纱。“梦见的粪便越多，挣到的金钱越多。”赫尔

嘉一次梦见了许多牛粪，而我老是梦见水。火不总是危险的征兆，但梦见死人是好事，因为死人是来为你分忧的。

海伦娜太太并不喜欢我。我在她心目中地位下跌的原因是我虽有可能，但并没有把吉卜赛姑娘变为自己的使唤丫鬟。对于她想像中的高贵来说，我的性格过于民主了。她刚来几天就在土耳其式蹲坑旁摔倒了，而且不幸摔断了胳膊。也是因为骨折，她的拘留期延长了，要等胳膊好了才能押解她去服刑。还好是左手骨折，所以她能吃饭，能吸烟，但既不能打扫卫生，也不能铺床叠被。我们还帮她穿衣服，放风时扶着她走。我还替她剪指甲，为她洗头。而一去掉石膏，我又是那么民主地递给她一块抹布，叫她去擦便池，完全没有把她当做一位夫人。她差点儿哭了，还向赫尔嘉诉说：“在奥帕瓦时，都亲热地叫我海卢什科，替我打扫卫生，为我洗衣服，裤衩什么的都帮我洗。”我反驳说，我不是也在擦便池吗？另外，发僵的胳膊也需要通过轻微劳动来锻炼，而拧拧抹布正是一种轻微劳动。后来她乖乖地说：“今天星期三，该我做值日。”但是，对于我强迫她去尽自己的义务这件事，她始终也没有原谅。

因为她嘴馋，凡是我们从国库里领到的，她都要去领一份。一次发通便药片，她还特意到医生那儿去要了一份。结果，放风时在天井里拉了一裤子，闹得大家都骂我们，因为无处可躲避那股臭气。内衣和运动衫裤不愿给她更换，她只好自己一只手在凉水里洗，屁股是我们帮她洗干净的。除了药和香烟外，她对玩“好人，别生气”的瘾头也很大，但只有赫尔嘉和她玩，我是一次也没有奉陪。

监狱里有某些界限，它们是无论如何也不应逾越的，就算是作为行善也不可以。如果玩这种愚笨的游戏，那你就会逐渐适应监狱的环境。有些女犯人还组织比赛，其实是使自己在愚昧中变得麻木。我用糖果盒为赫尔嘉做了一副扑克牌，我们邀请海伦娜也来玩，可她不懂得怎么玩，连小孩儿们玩的扑克游戏她都没有学会。可是玩起“好人，别生气”来，她却会巧妙地做假。她能随时掷出六点来，即便出来的是小点，她也会暗中扯桌布让它变大。她一玩起来就兴头十足，玩得再久都不厌倦，只要赢就高兴。而等到赫尔嘉开始检查起色子来后，她就兴味索然，很快就不玩了。对于我给赫尔嘉做扑克牌，她还很生气，因为赫尔嘉玩起扑克来，就没有那么多时间陪她玩了。赫尔嘉还是个赌徒，我们用笔画了筹码和钱，好多好多钱，星期天下午，在值班员不注意的时候，就在我们床上开起了赌场。赫尔嘉坐庄，我和海伦娜下注，我赢了，而海伦娜却输了画的四万假钱。她就连这次赌输了，也算在我的头上，不予原谅。

关于这个人物，我写的故事没有结尾。在我和赫尔嘉一起凑拼她的真实生活图画，并且相互嘲弄对方怎么会上她的当时，意识处于半昏睡状态的她带着装满香肠——这可真是些好吃的东西啊！——的手提包，正在梦幻的庇护下走向生活的下一站。

安蒂——酒心巧克力

大约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海伦娜太太、安蒂和我简直成了一组三位一体的展览品：我们的那副可怜的模样引起了看守门一阵阵哄堂大笑。从天井放风回来时，那个绰号叫“翘翘板”的看守站在楼梯口从上往下看着我们，龇牙咧嘴地笑着说：“你们可真是凑在一堆儿了。”这是在嘲笑我，我本来是可以而且应该感到气愤的，究竟是谁把我置于这种可笑的境地呢？但是，客观地想像一下我们的模样，我也不由得感到好笑。正处在危急时刻的我，身体抗拒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我每天都好像上班一样，被带去接受几个小时的审讯，然后回到那不平静的牢房。第一次发病后医生给我开了药，但我都吐在便池里了。

每天早晨训导员都要把一小袋辗碎的药片倾倒在我的手心里，等我把药粉放进嘴后才走，但谁也不告诉我那是些什么药。我可不敢冒风险，万一吃下这药后变得傻乎乎的，审讯时什么都承认，那就糟糕了。所以，在没有确实弄清楚是什么药以前，我宁愿不治疗，因此，这些日子我一直昏昏沉沉，随时都像要晕倒一样。在我身旁的海伦娜太太也是东歪西倒，她因服用镇静药而变得更加愚钝，一只胳膊抱着打上石膏的左手，好像抱着一个穿白衣服的婴儿，而要照看好这只手，就会顾不得身体的其余部分，特别是腿，所以不断地失去平衡。而第三位就是和我们一起的安蒂。

唉，安蒂！牢门一打开，站在那里的是一个个子矮小的吉卜赛姑娘。她的右脸有一大块青紫色肿块，一只眼睛被血污蒙住，那样子简直吓死人。她看上去是那样可怕，又那样凶狠，显然，没有自己方面的原因，很难被打成这副模样。我心里想，姑娘呀，你一来可有我们好受的啦。但安蒂那剩下的半张脸却带着微笑，她怯生生地把自己狱中的家当——一条肮脏的毯子，两个床单，枕头和枕套，还有两条蓝色的毛巾——放在空床上，站在那儿等我们告诉她哪一把凳子她可以坐。训导员冷冰冰地说了一句“注意检查头”，意思是要我们提防不要传染上吉卜赛姑娘头上的虱子。安蒂并没有因受辱而生气，也没有在训导员关上门后把她臭骂一顿，而是很情愿地把头俯在桌子上，让我们检查，她也不愿意让她美丽的头发在那个睡了一夜的肮脏地窖里染上虱子。她就这样一步步抹去了我们最初对

她的坏印象。

很少有看守帮助犯人减轻进监狱时的痛苦。接纳我的看守倒还是个好心的女人，她先让我在淋浴喷头下尽情地洗了个澡，而领安蒂来的那个看守却连淋浴都没有让她洗。牢房里的规矩是要对新来的犯人表示热情欢迎，最叫人受不了的感觉莫过于当新犯人来到时，牢房里的人转过脸去，对他的来到无动于衷。一个人被捕时，各种可怕的印象旋风般地袭来，他像是跌入了深不可测的鬼怪之窟，一阵阵钥匙响，铁门关闭，阴暗的过道上一排排装有监视镜的牢门紧闭着，真是阴森可怖。而牢房里的囚徒则是被捕者遇见的第一批人，因此通行着这样的规矩：欢迎你，新来的伙伴，以后再告诉我们你是什么货色。因为我在这儿已不再是一个不敢提任何要求的新手，而那位训导员又是个挺守规矩的人，所以我请她给安蒂拿些热水来。安蒂感激地洗干净了满头的鬈发，羞答答地躲在土耳其式蹲坑的角落里，用水桶浇水洗了个淋浴。

以后她总是羞答答的、怯生生的，轻声慢语，不急不躁，很讨人喜欢。我可以说，如果不是被人揍得那么惨，她的样子还带有几分高贵。无论如何，她决不是那种胡搅蛮缠、厚颜无耻的女孩。她一直不说话，直到我们招呼她后才同我们交谈。说我们，其实就是我一个，海伦娜太太为吉卜赛姑娘的到来深感不安，她怕吉卜赛女人，同她们有过不愉快的交往，瞧不起她们，因而她只是嫉妒地注视着我请安蒂吸烟，第一支烟是为了表示欢迎，她接受了，后来的却都谢绝了，说她自己有烟，她的烟总共不过五

支，但她还是要拿出来请别人吸。她非常有礼貌地接受别人的馈赠，好像是要使馈赠者因此获得快乐。当她核实了我是真的在用“您”称呼她，而不是她听错了，她为这种平等相待的态度而深受感动，从此对我更加关心，好像是随时准备保护我一样。

就这样，我们三个人从放风处归来，步履蹒跚地沿着楼梯一级级往上爬。我在天井里几乎晕倒，个子只到我肩膀的安蒂把我的一只胳膊绕在她的背上，一步一步地拖着我上楼。她的脸上还带着那个可怕的青紫色肿块，一只眼睛被发黑的血污蒙住，我的脸色则苍白得像一张纸。海伦娜太太跟在我们身后约两步远的地方，脸上带着一副愚钝的神情，一摇一晃地走着，好像是我们的看守，或者是我们的卫士。我们可笑的样子是那么有感染力，以至于那个最愚蠢的绰号叫土豆儿的女看守居然也想出了一句俏皮话，她对翘翘板说：“你瞧，她们好像是打了败仗回来的，不是吗？”可是，究竟是什么样的仗打败了，又是什么样的仗打赢了呢？土豆儿和翘翘板站在上面看见我这副样子简直欣喜若狂。土豆儿还对我怀有明显的“阶级”仇恨。有一次，和我同牢房的两个犯人都被传去受审讯，我一个人去放风，整个笼子都归我用。我倒是很愿意加入到旁边的放风笼子里去，但他们对我实行严格隔离。过去我们这间小牢房里的犯人，放风时通常都和旁边一间大牢房编在一起，我来后才改变。和我住在一间牢房的另外两个女人显然由于我而倒了霉，因为同别的牢房一起放风可以更多地交换情报、香烟和其他物品。不知是不是老天爷恶作

剧，那天凑巧轮到我们牢房进一间大笼子，而土豆儿也恰好那天站在木板上值班，她从上面朝着我说："哼，倒挺像个女公爵！"好一个监狱笼子里的女公爵！或者按照旧时贵族的习惯，称为来自科泰茨的女公爵！[①]那个土豆儿还因为我拥有的生活用品感到愤慨。我有一个优越条件，就是我丈夫可以来探视，他给我带来了许多珍贵的东西。他特别担心我缺少化妆用品，担心得超过了我的实际需要，所以有一次，土豆儿好奇地打开我的小柜子，竟惊讶得差点儿没有中风。她家里都没有这么名贵的、这么好的护肤膏、面乳、香皂。"噢，她们在这儿住得好舒服呀！"她脱口而出，"快来看，她们住得多舒服！"第一次来探视时，我丈夫还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抗议方式，他用一个透明的盒子给我送来了五朵兰花。我们把兰花插在花瓶里，摆在牢房窗台上，引得翘翘板两次开门来看，她想弄明白，是她看花眼了，还是真的是正在开放的兰花。她很快就计算出来，我丈夫开这么一个玩笑要花多大一笔钱。我甚至有点可怜这个女人，听说她丈夫时常打她。

那天爬楼梯时，安蒂对我连扶带拖，我感觉到她那股顽强的力量，那股无论如何不让我跌倒的力量。就像以前玛伊卡一样，安蒂把我扶到床上，用凉水润湿毛巾，放在我的前额，为我做冷敷。那时候我的审讯员刚好换了，来

①科泰茨是捷克语笼子的读音，旧时贵族称号都冠以其领地名称，称来自××的公爵、侯爵等，这里作者戏把囚笼的读音变成地名，以示嘲讽。——译者

了个自命不凡的年轻公子，他很为自己的速成法学博士学位骄傲，当然他也读过一些书，而且不断在我面前炫耀。他感到很奇怪，我为什么会碰到这么严重的健康困难。我问他有没有到牢房里面来看看，了解一下关押我的这所监狱状况究竟怎样，他说监狱的状况与他无关，因为这不是归内务部管的，而是归司法部管。当他听说我和一个精神病患者和一个吉卜赛女人关在一间牢房里时，他倒显得很高兴。这期间终于允许我白天也可以躺在床上休息了，安蒂坐在对面的一把硬板凳上，用她那只可怕的眼睛和未被打伤的半边脸上的微笑守护着我，让我在两次审讯之间能够睡上一觉。任何时候，我只要一睁开眼睛，总会看见安蒂就在近旁，脸上带着慈母般的微笑，而那紫得发黑的淤血块更给她的微笑增添了奇迹般的震撼力。有一次她对我说：“亲爱的埃娃，劳改营会毁掉您的，您根本不适合去那种地方。不过，您也别怕，我会保护您的。”还说：“您谁也别相信。这里可真的是谁也不能相信。”她压低了嗓门又补充说：“连我也别信。”土豆儿，这是什么？是失败吗？可当我失去了安蒂以后，我倒真的遭到过许多次失败。

安蒂把她的床放在牢房中间，紧挨着我的床，而把海伦娜太太挤到一个小角落里。晚上七点，她也可以上床的时候，安蒂坐在自己蜷曲的双腿上，开始同我说话。我很困倦，有时几乎不明白她在说些什么，而且，我还要考虑审讯员在审讯中给我设下了什么圈套。但安蒂却像土耳其人那样安稳地坐在那里，晚上七点是她的钟点，她一边把

头发编成小辫子，一边说呀说呀，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不管她说的是真情还是假话，是抄袭别人的故事还是诉说自己的经历，安蒂的叙述才干确实可贵，表达方式也很丰富。她有不可思议的想像力，有一种描述人和事的天赋。她一边说着一边微笑，在说中笑，在笑中说，用微笑抹去了所描述的现实生活的严酷。她断断续续地说，昨天没有说到今天再说，不费力气去解释哪些事件准确涉及到哪些人物，完全像现代派作家的风格，让读者用自己的才智去理出故事的线条。对于她来说，我好像是一株落水时可以伸手抓住的岸边垂柳，又好像是一座可以把一切秘密都放进去的坟墓，大概谁也没有像我这样耐心地注意听她诉说。我也许还是有朝一日可以使她闻名于世的希望，因为所有吉卜赛女人都非常迷恋影片《吉卜赛人进天堂》，这部电影的主题歌成了她们的国歌，安蒂也会唱，而安蒂在知道我的职业后，给我讲故事也更加用心了。不过，她对我还是有某种感情的，因为在我身旁她的一切压力和紧张都消失了。她的嗓音柔和而感人，比一般女人深沉，又略有几分清脆，特别是讲捷克话时。吉卜赛话喉音重，她还教我说吉卜赛话，但按她的解说，吉卜赛话的词汇也实在太少了。也可以说她的嗓音温柔得好像马鬃，手感粗糙，摸着发黏，而唱歌和说却美极了，像潺潺溪水在牢里流淌。下面就是她给我讲的故事和她的生活经历。

爸爸活着的时候，一切都很好。他们一家住在东斯洛伐克，有自己的房子、牲畜棚和菜园子，离森林很近，离河边也很近，他们养了猪、羊和母鸡，妈妈也不是惹是生

非的女人。可是后来，嫉妒的姨妈用魔法把爸爸诅咒进烟囱里了。魔法据说是这样的：先选好烟囱，找一块干净的抹布，包上黏土，贴在烟囱里面，这样，受魔法诅咒的人就会越来越胖，越来越胖，直到胖得像那根烟囱一样，选的烟囱越粗，胖得也就越厉害。爸爸的情况正是这样，因为姨妈选了一根挺粗的烟囱。他们知道爸爸中了魔法，可就是不知道是哪根烟囱。不然把抹布取出来，魔法也就破了。他们没有想到，起嫉妒心的会是姨妈，而烟囱就是她们家的那根。把爸爸送到医院时，他已经胖得像那根烟囱了，后来就死在医院，丢下了孩子们和妈妈。没了爸爸，妈妈很快就变坏了，家里所有的东西也都没有了。姨妈什么都没有得到，不管是牲畜棚、房子、山羊、猪，还是母鸡。他们从斯洛伐克迁到捷克，孩子们的生活全由坏妈妈主宰。安蒂视爸爸为正派、爱心和佑护的化身，她讲述了爸爸杀蛇的故事，这可是心理分析的好材料。这是一条既长又粗的大蛇，有男人胳膊那么粗，他们家乡有这么大的蛇。说起蛇来，他们家乡的蛇可多了，它们藏在草莓丛中，藏在覆盆子树下，孩子们有时候和妈妈一起去洗衣服，还会看见蛇在河边石头上晒太阳。这条又粗又长的蛇爬到他们家的山羊圈里，用它长长的身子把羊圈团团缠住，让谁也无法进去，然后就吮吸山羊的奶。山羊又惊恐又疼痛，尖叫起来。爸爸知道得想办法把蛇打死，但很难把蛇从羊圈里赶出来。于是，爸爸轻轻把羊圈门推开一条缝，不让蛇跑掉，他刚好有一把杈，就用杈刺把蛇钉住杀死了。然后，他还要把蛇架在火上烧掉，因为大蛇只是打

死还不够，它还会作怪。蛇在一堆柴火上燃烧起来，从它身上流下来好多油或者别的什么东西，爸爸把这种液体盛到一个小杯子里，用它来给孩子们擦头发，人们说用蛇油擦头，头发长得好。蛇全部烧尽后，爸爸在我们家屋墙下一个小洞里发现了一堆小蛇，可能是那条大蛇的，爸爸把它们也打死了，不过不用烧，打死的小蛇不会作怪。在所有的孩子中，爸爸最喜欢的是安蒂，这在他死后也有表现。人们把死去的爸爸从医院抬回来，放在一扇门板上，再把门板架在椅子扶手上，给爸爸穿上节日衣服，头戴礼帽，脚穿皮鞋，身下铺了床单，把他平放在房子里，让亲戚和熟人和他道别。有钱的还给一些钱，用来支付葬礼费和租灵车的费用。大家都把钱放在死者的身旁，妈妈、两个哥哥、姊姊都这么做，惟有安蒂想到把一枚钱币直接放在爸爸的手掌上。钱币刚一放上，爸爸就把手掌合上了，同时还眨了眨帽沿下的那只眼睛，朝安蒂微微一笑，却又不让任何人看见。后来，谁也没有能够打开那只手掌，爸爸就这样把安蒂的钱币带进了坟墓，可见他是如何地爱她。

因为和妈妈在一起，安蒂的生活变得糟透了。妈妈成了个坏女人，怎么个坏法，安蒂没有详细说明。两个哥哥到舒玛瓦山一个农场去工作，年纪较小的一个淹死在当地的一条河里，大概是修建利浦诺水坝后水位提高了的伏尔塔瓦河。“他喝醉了，”安蒂伤心地说，“又不会游泳，可他们却故意激他，逗他，让他从桥上跳下去，看着一个吉卜赛人被淹，他们在一旁取乐。也不知道他被冲到了什么

地方，死后才被人打捞上来。”安蒂和妈妈一起住在布拉格，这时候，按我的推算，她大约十五六岁。不久，妈妈就把她嫁给了一个不争气的吉卜赛男人。他特别懒，骨瘦如柴，却很粗暴，安蒂从一开始就不怎么喜欢他。但他和她有了孩子，又是她的丈夫，对于自己人安蒂总是要努力护持的。这时，有另外一个年轻的吉卜赛女人勾引她的丈夫，同她丈夫一起去了一处工地。安蒂知道后也跟着去了，她已经到了妊娠后期，可是，你一言，我一语，那个吉卜赛女人就把安蒂推倒在地，用砖头猛击她的肚子。“当时疼得好厉害啊！”安蒂说。肚子太大了，妨碍安蒂挣扎，她又没有砖头可以用来抵抗，于是，只好使用她惟一拥有的武器—— 指甲。她本想揪住对手的头发，扯下一缕来，但指甲伸得太深了，比她原来瞄的还深。而这些挺可怕的指甲，弯弯的，尖尖的，像鹰爪一样锋利，又硬又长又不易折断，它们既可以作为装饰，又可以当做武器（吉卜赛女人到了监狱后，宁愿剪去头发，也不让人碰她们的指甲），正是这样一些指甲刺进了那个姑娘的眼睛。这就是安蒂的漫长囚犯旅程的开端。

休克中的她被送到波赫尼采精神病院，醒来时，发现自己已被关进了隔离室的笼子。由于她尚未成年，也由于那个眼睛瞎了的姑娘在法庭上声明安蒂不是故意要伤害她，而是一个不幸的偶然事故，法庭只判了她四年监禁。后来她被监狱假释回家生产，四周产假后又回去继续服刑，生下的女孩有先天缺陷，安蒂确信是砖头打的，她把女儿送进了儿童收容院。

根据安蒂的回忆，劳改营里的生活还挺不错。她是在巴尔杜比采劳改营，按照她所描述的故事情节推断，我感到她不止去了一回。第一次可能是在未成年犯劳改区，但她也讲到了一些成年妇女劳改区的典型情况，比方说不容易搞到妇女同性恋的卫生器具，食堂里排长队，新来的犯人有早上取早餐、晚上倒营房水桶的义务，床头未上锁的箱子常常被盗等等，总之，尽是些劳改营生活的愉快事件。就是最糟糕的事情，安蒂也总是从一种旁观者的角度带着微笑温和地诉说，这对于她是最难受的，对于我也是最难受的。听安蒂讲故事时必须特别注意，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想法解释她的感受。虽然她随时随地都可能伸出自己的狼爪，但同时又保留着某种最古老、最原始的听天由命的心态。我们不能主宰命运，但只要按人性的本能去挣扎，去抵抗，或者至少可以自欺欺人地混生活。她并不凶狠，而且有怜悯心。对于同她的命运和性格相似的女孩来说，干活是最令人头痛的事，可安蒂不怕。这一点我相信，因为就像打扫牢房卫生这样的活儿她也很乐意干。她有一种适应环境的天赋，在劳改营里也心甘情愿地完成劳动定额。旁边一间牢房里正好送来一个姑娘，她因害怕干活而在安蒂待过的同一座劳改营里吞下了许多大头针，由于她为逃避服刑而自我伤害，她将受到新的审判和刑罚。

有一段时间，安蒂生产电动钟表的保险装置，后来安装胸针上的雕花玻璃块，两种都是极其可怕的细致活儿，除了犯人外恐怕没有谁肯干。安蒂还描述了怎么从车间偷着把胸针带回劳改营，这是非常难的，但可以用来换面

包。还有些女犯人把胸针送给来探视她们的亲友，或者把胸针带回家去作为劳改营的纪念物。我曾努力想了解劳改营中的劳动报酬制度，可是从安蒂和别人讲的来看，情况简直一塌糊涂，荒谬之极。定额是固定的，但实行集体连坐，也就是说，要是组里有人不干活，其他人就必须替她们完成定额。许多时候不得不加班加点，吃不上午饭，或者吃不上晚饭，有时星期六也要赶任务。劳动报酬由小组长（也是从犯人中挑选的）计算，常常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而最大的随意性、专横性表现在劳改营当局清算工资的时候：犯人用劳动挣来的工资要分成几部分，一部分用于支付赡养费（如果有这种义务的话），一部分用于支付劳改营生活费，一部分用于义务储蓄（犯人离开劳改营时必须至少带上八百克郎，这笔钱由犯人自己来攒），剩下的才作为零用钱发给犯人。如果完成了定额，犯人每月最多也只能得到八十克郎的报酬。看到橱窗里陈列的那些昂贵玻璃首饰，那些国家还用于出口的玻璃首饰，我不由得多次想到，监狱原来还是一座金矿呢！

在安蒂关于劳改营的描述中，还可以听出她的某种睿智。有一次，她在全营大会上被宣布为营里的劳动模范。劳改营主任在致词后宣读了一份名单，其中就有她的名字。她幸福地蜷缩着坐在文化娱乐厅的凳子上，还获得了一面奖旗。但安蒂并不是为这种荣誉而工作的，她只是想拿零用钱，这样就可以去买茶叶、香肠、肉罐头，或者香烟。而模范劳动的额外奖励有五十克郎之多！她蜷缩在那里，计算着用这笔钱可以额外在食堂买些什么好东西。可

当她走出大厅时，那些曾经由安蒂代替他们完成了定额，然而不仅不感恩反而心存嫉妒的不愿干活的女人们，却故意装着打架，而且把安蒂也卷了进去。同时，她们做得非常巧妙，让恰好从大厅走出来的劳改营主任一眼就看见安蒂，当场把她抓住了。受奖人还打架？刚举行完隆重仪式就打架？安蒂没有拿到那五十克郎，代替奖励的是送她进了地窖。“噢，生活可不是温暖的被窝！”这是安蒂一句最好的口头禅。

当然，营地里也不是只有愤恨和仇视。星期日下午——这是营员们惟一的休息时间，这时候她们不必在营地广场（她们叫它瓦茨拉夫广场①）上整装列队进行操练，而在其他日子里，不管是下雪，下雨，还是烈日当空，她们都必须穿着长筒棉袜和紧身制服在那里演习步兵队列，体格弱一些的常常晕倒过去，——姑娘们总要举办一些娱乐活动，而且，目的正是为了抵消那些立正报告、原地踏步等愚弄人的训练科目造成的身心影响。有一次，她们还根据安蒂想出的主意举办了一次吉卜赛婚礼。婚礼上既有传统礼仪，也有婚嫁歌曲，一应俱全。安蒂为我用东斯洛伐克方言唱过这些歌曲，那是她对故乡的怀念，对有爸爸的身影在其中的故乡的怀念。婚礼上安蒂充当新娘，这是她最美好的一次婚礼，她穿着用白色床单和窗帘做成的结婚礼服，头上戴着花环，正如她说的，“打扮得

①瓦茨拉夫广场是布拉格市中心最大的广场，广场上有被封为捷克王国守护神的国王瓦茨拉夫的铜像，故名。——译者

真是美极了。”她们在一个有镜子的洗脸间里进行准备，最困难的是从哪儿去搞新郎穿的男式便服长裤。新郎和新娘在歌声陪伴下，从婚礼客人们组成的夹道中穿过，两个女孩装扮成爸爸，另外两个装扮成妈妈，女傧相们为安蒂捧着裙摆。安蒂喜欢在讲述中把自己置于情节的中心，她说：“那婚礼真是美极了，连劳改营的女教官们都来看我们的表演。”

在安蒂身上确有某种纯真的东西，某种她自己特有的东西。我们这些初次被监禁的犯人很希望了解，我们前面还有些什么东西在等待在我们，因而常常打听劳改营的情况。其他的姑娘们也讲述过巴尔杜比采劳改营，但她们首先谈的是电视和收音机。劳改营每座营房里都安装有收音机喇叭，早晨同起床号一起开始播放，晚上同熄灯号一起关闭，想起来都觉得可怕。电视可以在休息时间到文娱室去看，那里除了几把凳子、几张桌子和一台电视机外，别的什么都没有。安蒂根本不提电视和广播，营地生活中一切有特色的、有意思的东西都来自她自己，来自她的内心。营地里令她着迷的还有带公用厨房的单间宿舍，那是供在劳改营生活多年、就要回去过正常生活的犯人使用的。回去前她们先要重新学习怎么过正常生活，所以她们在那里学煮饭、学洗衣、学打扫房间、学使用餐具、灶具……“她们那里有真正的电烤箱，”安蒂说，“还有窗帘，一切都那么干净。”安蒂是在这些单间宿舍刚建好时被派去打扫卫生的。

也许安蒂除讲故事外，还更喜欢唱歌。她席地坐在角

落里，整天哼个不停。她随着歌声任意漂泊，再也不感到缺少什么了。她会的歌简直不计其数，为我唱的一些斯洛伐克歌曲，包拉吉卜赛歌曲，我以前从未听过。她学会这么多歌，唱得这么好，一定有一个幸福的童年。

所有的歌她都转换成一种动人的、伤感的情调，歌声是那样地令人陶醉，又是那样地扣人心弦。在她的促使下，许多年以来，也许也是许多年以后，我惟一一次敢于不躲在人群身后唱起歌来。随着凝结的血块慢慢被吸收，安蒂恢复了她的美貌，她在自己的微笑中轻松愉快地调养着，显得那样安宁，那样祥和，在牢房里脱离开冒险生活，平静地休息。她还教我懂得了，写出来的文化并不是全部的文化。她的叙述虽然并不系统，当我现在把她说的往事一丁点儿一丁点儿地拼凑在一起时，我发现还缺少很多东西。安蒂仍然是隐藏起来的，充满神秘的。但是，她很善于烘托气氛，经她一描绘，无论情节还是感觉都立体地凸现在你面前，至今我还记得许多活生生的景象。然而，有一次我替她写信给她的孩子所在的收容院院长（她还欠着收容院一些钱），而当我要她在信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时，她一开始讨价还价，要我连名字也替她写，后来看出我确实不会这么做，才笨手笨脚地抓起圆珠笔，满脸羞惭地转过身去，用笨拙的印刷体字母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她再也不让我看这封签字写得那么难看的信。我终于明白了，她原来不会写字。劳改营里肯定有扫盲班，但同样肯定的是安蒂很少学习。于是，我们赶紧把签字的事放在一边。

安蒂也许真的要感谢和爸爸一起度过的幸福童年，否则，和不正经的妈妈在不正经的环境中长大，以后又蹲过好几所监狱的她，怎么可能还保留了那么一些相当细腻的文明品格呢？比方说，她很喜欢洗澡，我甚至有一种感觉，对她来说常洗自己的身子似乎是某种显示。显示什么呢？显示自己的教养？或是显示她正在克服她所憎恶的、所抗拒的生活？安蒂常在冰凉的水中搓自己的身子，直到全身通红，干净的身子对她有着很深的象征意义。一到晚上她就要把头发梳成辫子，尽管没有镜子，但至少要在心中知道自己是漂漂亮亮的。我已经说过，她不厌恶劳动，这是很少见的。她从不央求，无论用语言还是用眼神，从不提任何要求，这倒不是因为她傲慢，而是一种庄重。她吸烟，我的香烟就放在桌子上，海伦娜太太常常自己拿去吸，而她却可以等上几个钟头，直到我受审讯回来请她吸。也许可以这么想，她大概是出于某种原因喜欢迎合我，因为吉卜赛女人虽然会对侮辱她们的出身作出敏感的反应，却并不为自己的出身而自豪。但是，不管确是如此还是并非如此，安蒂的高贵品格表现得惊人地彻底，也就是说，在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情上也不例外，她的言谈举止确实使人愉快，令你觉得她好像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夫人。监狱里的生活对她要比对我容易得多，因为她熟悉情况，能够在事前就猜想出所有的可能性和限制，而她把这方面的经验无私地全都传授给了我，这也很不寻常，决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做。她的良好举止同海伦娜太太的不良习气恰成对照。例如，牢房里的桌子很小，不可

能三个人都挤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于是，我在床边的茶几上吃，安蒂和海伦娜太太共用那张饭桌。这样一来，她一日三餐都要目睹海伦娜吃饭时的那副肮脏样子。有时海伦娜太太甚至会把菜汁弄到屁股上，但她又不能端起盘子到茶几上来和我一起吃，海伦娜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这样做未免会使她太难看。她同我商量，要不要过来和我一起挤在茶几上吃，让海伦娜一个人用餐桌，我说如果您想这么做，过来就是了，可她还是没有过来。“这像什么样子。”她说。她很知足，从来没有流露过贪婪的欲望，能够安于贫困，这无论如何是一种高度文明的表现，不管它是教养出来的品质，还是困苦生活锤炼的结果。海伦娜太太到处找好吃的，安蒂从不。而她什么都没有，甚至没有希望能够收到一个生活必需品包裹。她所有的仅仅是公家发给她的那一点点东西：牙刷、梳子、一次性塑料杯、泡沫很多的劣质肥皂。她被捕时，身上穿了一条牛仔裤，一件衬衣和一件羊毛衫。她刚到牢房，还没有来得及换上监狱里发的运动衣裤，就看见一个只穿一身无袖单衣的女孩正准备出狱回家，而外面的天气已经很凉了，安蒂毫不犹豫地把自己那件很漂亮的毛衣送给了那个女孩。“等到开庭审判您时，已经是冬天了，您就只穿一件衬衣去出庭？”安蒂笑了笑说：生活就是这样，它可决不是一床温暖的被窝。

安蒂讨厌奥拉赫吉卜赛女人。她对我解释说，奥拉赫人是来自罗马尼亚的一个吉卜赛部落，这个部落的女人至今仍穿她们特有的服装——花裙子外面罩上黑围裙，并以

镶金牙为荣。这里所有的女人都一致认为，奥拉赫人有钱，而我在鲁津监狱看见的奥拉赫女人确实都镶金牙，她们把财富存放在很难抢走、却又容易看见的地方。当奥拉赫女人说话，或者——哎哟，我的天呀——裂开嘴大笑时，她们满嘴里闪出的金光可以照亮整个世界。奥拉赫女人说话的声音特别尖，安蒂也听不懂她们说的吉卜赛话，每当晚上她们“透过门缝”交谈的时候，我们的耳膜里就只有一片玎玲玎玲的响声。她们简直像一群母鸡。看守已经打开了牢门，已经站在她的正面，甚至已经抓住了她的上衣，可奥拉赫女人还在地上尖叫着，向旁边牢房里的女儿下指示。而当她终于明白自己已被当场捉住时，她会毫不停顿地由尖声向女儿下指示转为对看守破口大骂。安蒂说，奥拉赫女人把财产变成黄金，“但不会用刀叉吃饭。”安蒂还描述奥拉赫女人如何在巴尔杜比采劳改营把白人女犯赶出她们的营房，只把吉卜赛女人留下，因为她们“连上厕所都不会”，“只会在篱笆跟前拉”，她轻蔑地说。她们的文明外壳有多薄，从安蒂接着讲的故事中就可以明白。在问到奥拉赫女人从哪儿搞到这么多财富时，安蒂讲述了他们典型的抢劫方式：让一个美丽的奥拉赫女人去吸引孤独男人，常常是在夜间的瓦茨拉夫广场，这是他们最喜欢的地段。当男人和奥拉赫女人正玩得开心的时候，跟踪他们的其他人就会跑过来，用痛打一顿和抢个精光作为对这个男人的“惩罚”。安蒂描述奥拉赫女人的原始状态时还说，她们在街上“工作”，在空地上“干活”。我们旁边那个尖声对女儿说话的奥拉赫女人，是因为偷一只母鸡

被抓的，而文明化了的吉卜赛女人已经不屑于偷母鸡了。为了施展自己的偷窃技艺，吉卜赛女人需要去一家酒楼，至少也要去一家小酒馆。安蒂也曾和她的团伙一起袭击过夜间的孤独者。她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他们已经在布拉格火车总站前对一个醉汉“做了工作”，突然听到警笛声，赶忙撒腿就跑，跑得好远好远，一直跑到奥赫拉地区，气都喘不过来了，可仍然听到身后有警笛声。他们吓得发抖，以为是警察听见了受袭击者的叫声，开车追来了，其实那是一辆救护车，正沿着他们逃跑的路线运送一个拆除房屋时受伤的伤员。引起安蒂反感的，倒不是奥拉赫人财富的来源，她瞧不起她们的是，她们有钱却不会生活。如果安蒂有钱，她可知道怎么花，但她决不会把黄金存放在嘴里。也许她会买那种漂亮的电铐箱，或者买窗帘，买地毯和床罩！再不然就买甜酒来洗澡，那她会有多香啊！假如有朝一日我也想去袭击什么人的话，倒用得着安蒂给我出的好主意：“埃娃，记住要抓住他的头发，把他的脑袋往人行道上撞，这是最可靠的。”

安蒂还讲过一个很有戏剧性的故事。她同一个女伴一起在一家酒店里勾引上了一个皮包里装满钱的家伙，但当她们把他搀出酒店时，发现那个家伙并不像她们想的那样醉得厉害，女伴害怕了，关键时刻丢下安蒂跑了，安蒂单独和那个男人留在房子后面一堆柴火旁。如果是两个人，那是很容易的，一个迷住男人，另一个掏他的钱，然后两个一起逃掉。当时天已经黑了，安蒂知道钱包在哪个口袋里，但就是手够不着，那个家伙把她搂在怀里，身子吸附

在她的身子上，像钳子一样紧紧地把她抱住。在这种情况下，要同时完成两项密不可分的任务，也就是说既要偷那家伙的钱，自己又什么都不给他，可真是很难的事。最后，安蒂不得已拿起一根木头，砸在了那个家伙的头上。她讲的时候，好像自己还挺在理。

我说："不，安蒂，这不漂亮，一开始自己送上门，到头来却只想偷人家。"

"可他不是正派人，"安蒂振振有词地说，"干吗跟我走？想占便宜，活该！"

白人女孩的职业规矩是，先侍候顾客，再索取报酬，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妓女也是一种体面的营生。但安蒂不认为自己是妓女，她只是一个诱饵。作为女人，她还非常自信。"我们会的事情，白人女孩连想都想不到。"但谁要是以为安蒂的情爱艺术，像店铺里的商品一样，可以随便去买，那就未免太愚蠢了。安蒂是去偷的，不是去卖的。她由此引申出的逻辑也是驳不倒的：假如他是个正派人，就不会遭到袭击；而他想要，又不配要，因此活该。这个解释包含了吉卜赛人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我们只是追求自己的目标，休怪我们利用你们的愚蠢。

安蒂获取金钱的方式并不都那么粗暴，她也有柔和一些的、巧妙一些的办法。她邀请一个很年轻的女友去酒店，有意寻花问柳者——通常是两个——早已在那里等候。四个人一起聊天，喝酒，一切显得非常自然，年轻的女友觉得自己慢慢被引向了快乐之神。这时安蒂对男士们说，是不是邀请女士们再到别处玩玩。男士们在酒店门前

叫出租车，两辆要四个座位的小车，他们还推让了一阵子，看两人中谁陪安蒂坐下一辆车，结果一切都搞乱了，安蒂好像是一个人留下来等下一辆车。她看着那个上当的姑娘被人带走，不过从来也不曾有姑娘从出租车里挣脱出来，一来她不会很快想到今夜再也见不到安蒂，二来她已经醉得够呛了。事后也没有人找过麻烦，因为安蒂会挑选合适的人。我不知道，提供一次这样的服务，她可以从中得到多少钱。

万一出现真正的困境，安蒂也有准备。“每人都有一个老家伙。”她说。老家伙可真是个年纪大的人。“只要我有钱，我从不去找他，实在没法子时才去。”老家伙只是抚摸她，看她，她的身子还像是个小姑娘。安蒂是这样认识老头儿的：她帮一个女友去他家偷东西，但是看到家里简陋的陈设，又可怜起他来了，她劝那个女友放弃偷盗，打发她走了，从此她就成了老头儿家的常客。老头儿心脏不好，病退在家，并不富有。安蒂并不常去，但若实在困难，老头儿总会有五百克郎给她的。“他可好呢。”安蒂这样说他。

这是一些可怕的夜晚，屋顶上吊着不熄灭的灯泡，门上的监视镜不时地转动，一只眼睛往里张望，海伦娜太太在梦中呻吟，窗外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鸟儿叽喳的叫声。正是在这样的夜晚，安蒂在我面前打开了一个阴森可怖的、无穷无尽的人性的宇宙。安蒂像一只羚羊一样，在杀人的本事和沐浴的嗜好之间灵巧地来回跑动。看上去很文静的姑娘，却有着一套区分什么对什么不对的固定规则。

如果我对她说“别杀人”，她会从这些规则中找出三条理由来说明，为什么非杀不可。我时常想，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才是生而自由的呢？安蒂这个具有天生的丰富感情和想像力的姑娘，如果生长在一个自觉接受教化的环境里，又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呢？很难说。父系氏族制是吉卜赛人最公正的法律，让他们解脱出来后，我们的现实状况又能向他们灌输些什么东西呢？国家强行要吉卜赛孩子接受文明教化，用以取代他们的父辈已经失去的父权，然而，国家一只手迫使吉卜赛孩子学会结结巴巴地讲几句捷克话，也许某一天还可能使他们学会刷牙，另一只手却又揪住他们的耳朵，不是把他们领向文明，而是先送他们进儿童收容院，在那里孩子们学不到爱，然后再送他们进监狱，这就是上述做法的逻辑结果。有时我想，人先要感到畏惧，然后才会渴望成为自由人。但是，千万不要让安蒂产生惧怕别人的心理，因为惧怕别人，或者甚至惧怕国家——其实这正是国家力图从安蒂和同她相似的人那里得到的——只会使人变得更加原始、更加愚昧。我，一个不信教的人，面对着安蒂却产生了认为宗教有理由存在的离经叛道的想法。

从劳改营放出来，安蒂已经会用印刷体字母签字，而且不厌恶劳动，在人民政府官员或者其他什么官僚看来，她已具备了不坏的生活基础。“劳动是进步之母……”安蒂在瓦茨拉夫广场上一家很大的快餐厅找到了一份工作，洗餐具，因而她在描绘那段时间的情况时说，她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她生了自己的第

二个孩子，一个小男孩。“大家都很喜欢我。”安蒂说。顾客弄脏了桌子，她很快擦得干干净净，杯盘铮光发亮。她能吃饱了，挣钱了，有时还可以带些菜回家，小男孩可以带到快餐店来，在那里喂奶，其他员工也不歧视他，她很满意。但是，这一切都被安蒂的丈夫给破坏了。他借口说，在监狱里染上了肺结核（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进的监狱），身体弱，不能干活等等等等，可没有一位大夫承认他可以领取疾病补助金，所以，他早晨一睡醒，就到快餐店来找安蒂，在那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破坏安蒂的名声。一个大男人，完全可以自己去挣钱，却在那里偷吃偷喝，还死气白赖向安蒂要钱。安蒂在顾客和其他员工面前为他感到羞愧，最后，为了不让这个游手好闲的家伙在那儿白吃白喝，她终于离开了快餐厅。从那以后，安蒂再没有就业了。有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对丈夫的憎恶扭曲了安蒂对世界和自己的看法，然而，她对于丈夫的母亲还活着时的那一段婚姻生活的描述却又并不那么充满憎恨。婆婆对安蒂很好，安蒂也喜欢她，安蒂不爱自己的母亲，而把她当做自己的母亲。婆婆遭遇不幸，害了糖尿病，锯掉了一条腿，虽然装了假肢，但她年纪大了，又胖，没有学会戴假肢行走，整天坐在家里。安蒂给她买东西，她烧饭，有人陪伴她，她觉得很幸福。“她的头发很长很长，”安蒂说，“洗起来不方便，我用香波替她洗得干干净净的，为她吹干，帮她梳理。”安蒂喜欢谈她对别人如何好。有时还烧热水给婆婆洗澡。但是，安蒂婚姻的守护神后来去世了，安蒂的妈妈取得了完全的支配地位，而她却偏袒女

婿，亏待安蒂。

除了有先天缺陷的的女儿以外，如果我听得不错的话，安蒂还生过一个女儿，就是说她一共有三个孩子，而她只爱小儿子，老是谈他。但是，或者是由于她被捕入狱，或者是她不好好照料孩子，孩子们都长期在收容院里生活。当她谈起怎么把孩子从收容院拐走的故事时，可以看出她为此从心底里感到由衷的高兴。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她去看孩子，她的兄弟媳妇陪着她一起去，她也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在同一所收容院里。她们把孩子们领到火车站餐厅，那是一个小地方，天气又冷，没别的地方好去，只好去火车站。孩子们见到妈妈，特别高兴，尤其是大一点的小男孩。“他们是那么幸福。”安蒂说时脸上露出了她那动人的微笑。她给孩子们一人买了一份巧克力甜饼，一杯甜酒，孩子们规规矩矩地坐在餐桌旁，一个六岁，一个四岁，这以前他们从不知道甜酒是那么好喝的东西。没有香烟，安蒂也能过，但对甜酒却馋得要命。我们曾经想过，怎么才能弄点儿这种神仙喝的饮料到牢房来。最容易通得过的办法是把甜酒注入装洗发香波的塑料罐里偷偷弄进来，但这很麻烦，也很费时，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安排时，安蒂就被押走了。安蒂曾梦想着有朝一日再到酒馆去，一边聊天一边喝上一瓶甜酒。所以，这里人们都叫她酒心巧克力。孩子们觉得好喝，他们终于和妈妈一起尝到了生活的甜美。他们身上发热了，拥到妈妈怀里，让妈妈亲吻、爱抚。安蒂心里涌起了被唤醒的母爱，她把孩子们领上火车，带回布拉克。兄弟媳妇对她喊叫：

“别这么干，安蒂！”但是安蒂不听，这是她的孩子，她想拥有他们，尤其是小儿子。“他是那么美。”安蒂这样说过。

孩子左右着她的命运，为了第一个孩子，遭砖头打的那个，她不得不出嫁，而且进了监狱，为了第二个，这个小男孩，她不仅要受丈夫的气，而且还会不止一次地尝尽铁窗的滋味。拐走孩子后，安蒂同当局之间开始有了大的麻烦。孩子大概是法院决定送收容院的，区政府民政科来了一位女科员，要把孩子带走，安蒂殴打了她，构成了攻击执行公务的公务人员罪。但是，那个场面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您有孩子吗？”安蒂问。“没有”，科员回答说，她不理解这个无耻的吉卜赛女人怎么可以把她的不育同这个案子扯在一起。“那您就没有发言权”，安蒂说。但是女科员仍然坚持要把孩子们从安蒂身边带走，交由国家举办的社会机构照管。这时安蒂跳了起来，越过那张女科员坐在那里发号施令的桌子，把她揍了一顿。为此她大概又被判了刑，但她那么热爱的孩子们还是从收容院里被送回家来了。可这对安蒂来说并不是什么值得庆幸的事，因为她如果想要孩子，就必须留在丈夫身边，而这又是她怎么也没法做到的。孩子既是欢乐之泉，又是痛苦之源。小男孩已经上学了，学习成绩也很好，但就是因为他，才使安蒂落入陷阱，导致最近一次被捕。

安蒂因为自己的另一个幸福中的不幸事件——这个故事我下面再讲——而不得不出逃，在逃跑的路上她绕道来丈夫家看小儿子。她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了，究竟

有多长时间，也许已经一年了，也许更多，这就说不准了，反正是到了非见到他不可的时候了。当然，也可能是安蒂想去同丈夫和妈妈讲和，或者只是因为没有别的地方躲藏，谁知道呢，安蒂又没有细心解剖自己的行为。总之，她在焦急中来到自己熟悉的地方，而小男孩又苦苦求她留下来陪他一夜。安蒂说，“他见到我，哭得好伤心啊！”安蒂陪儿子躺在床上，儿子向她表演自己已经会认字写字了，她和儿子亲热着，用她那能让人宁静、感到放松的神奇微笑抚慰着儿子，孩子沉浸在妈妈回来的幸福中慢慢入睡了。不幸的是，安蒂也和儿子一起睡着了，而此时她自己的妈妈却向警察告发了她。警察局派人到她丈夫家，在她和儿子都还在睡觉时，直接从床上把她带走了。天快亮时，安蒂被一些可疑的声音惊醒，但已无处可逃，她睡在厨房后面的一间小屋里，听见丈夫在厨房里说：“她在那儿！”警察要她穿好衣服，在带走她时儿子哭了，喊着要妈妈。安蒂后来一一列举了可能构成她被捕的理由，竟然有好几种可能性。在她最后一次和丈夫分手时，法院判决她应向丈夫支付孩子们的生活费，她一直没有付，大概丈夫又把她给告了。安蒂一审、二审都没有到庭，法院的传票都没有送到，因为她没有给家里留下新地址，不知往哪里送。但法院的判决仍然有效，也许是因为安蒂拒不履行赡养子女的义务，所以到处找她，至少带她走的那些警察说是对她发出了拘捕令。但也很可能是因为某次抢劫事件走漏了风声而被捕，安蒂一直在回忆一个出租车司机，他可能会证明曾经从什么地方把她送到什么地

方去过。最轻的是指控她不工作，过寄生生活，这对于安蒂来说可就是小菜一碟啦。

但是，她也可能因为差点儿害死自己的情人而被关押。这件事是她在一天深夜里对我说的，当时海伦娜太太早已在梦中呼噜开来，安蒂把嗓门儿压得低低的，越说越懊丧，简直控制不住自己了。她向我倾诉她最珍惜的、埋藏得最深的秘密，至少我是这样感觉的。这个秘密压得她再也承受不了啦，到了非倾吐出来不可的地步啦。她一口气向我讲述了关于她宁肯为之丢弃自己的孩子的那个男人的故事。海伦娜太太也听说过一些情况，而且，差点儿被这场狂野的恋爱吓晕了。但是，要讲述她怎么差点儿没杀死他的，就需要等到在监狱里死一样的寂静中不能入睡的时候，等到无可奈何的感觉快把人活生生地拖进坟墓的时候。唉，安蒂爱得多么狂热啊！当安蒂已经感觉不到自己麻木的上唇和半边牙齿的时候，才发现那脸上的青紫块、充血的眼睛和被撕裂的神经，原来都是那场爱情的后果，而不管它们是情人在嫉妒心大发作时打的，还是丈夫为她的不忠在告发她之前打的。“ 埃娃，真正的男人只有瓦尔蒂采才有。 ” 安蒂对我说。她是在布拉格维索昌尼区某个地方遇见这个真正的男人的，她撵走了原来跟他在一起的那个女孩，马上就跟他同居了。他的名字假定就叫卡米尔吧，是个建筑工人或者铺路工人，穿一条满是泥污的，用一个扣子在肚脐眼儿下扣住的裤子，汗湿过不知多少回的衬衣，惟一的一件夹克衫冬夏都披在身上，干完活儿也不洗澡，头发被灰尘和汗水粘成一团。 “埃娃 ，他的头发直

是美极了，浅金色的，波浪形的。”卡米尔可以说是男人中的佼佼者，但正因为是瓦尔蒂采人，所以有些事情他想不到。“他又臭又黏，”安蒂说，“他真的很美，就是满身臭味儿。”有时候，安蒂还能够在厨房烧一锅温水，给情人擦擦身子。有一次她又在洗脸盆里倒上了温水，卡米尔倒是去洗了，但作为罚惩，到她的衣柜里撒了一泡尿，那里挂的全是安蒂的衣服，卡米尔总把自己的夹克挂在椅子背上。很多时候安蒂都必须施展自己全部的爱的力量，以免男人发现她屏息闭气不敢闻他肮脏的臭味儿。

然而，他们的爱情有时好像深深的旋涡，有时又像激流旁边宽阔而平静的水面，有时好像清澈见底的深潭，有时又像浑浊的鱼塘。卡米尔宁愿抛弃一个白人姑娘而爱上安蒂，因为白人姑娘不善于做爱，“而我们会”，安蒂带着神秘的表情说。海伦娜太太赶紧用毯子蒙住自己的头，我的上帝，这个黑姑娘大概不会在这儿讲述她那一套做爱的鬼把戏吧，而安蒂却晃动着自己的身子，像一条神奇的眼镜蛇。安蒂有时充满了刺激，有时柔情似水，有时陶醉地任人尽情摆布，有时又顽强地微微抗拒，她是这一切的组合。她不是藤也不是蔓，而是男人身上可溶解的盐。卡米尔当然也好酒，如果安蒂是酒心巧克力，他就是一只啤酒桶。一干完活就直接去酒馆，直到把挣的钱全都喝光，才从酒馆一摇一晃地回家，倒在床上一觉睡到天亮，然后再开始新的一轮，如此周而复始。有一次安蒂无意中说走了嘴，说她从卡米尔那里也没有享受过多少爱，情人回家时常常醉醺醺的，已经是一枝蔫了的花。有时他还招呼一些

在酒馆偶然相遇的熟人，喝得醉醺醺地同他们一起匆匆赶回家，在家里接着喝，把所有的东西都喝光吃尽后客人们散去，他则早已躺在那里起不来了。有时吐得满身都是，有时还尿一裤子，十足的一条死猪。而有一次，他就像这个样子醉倒在桌子上，双手双脚分别向两边张开。他身旁放着一把他们切香肠或者面包用的刀子，一把长长的、锋利的刀子。安蒂已经握住了那把刀，只要用力一刺，一切就了结了。然而，此时卡米尔睁开了眼睛，他那美丽的蓝眼睛，时机就这样错过了。

“您既然爱他，还会捅死他吗？”

“啊，埃娃，您可一点儿也不懂得什么是爱情。”安蒂回答说。要知道，爱情也可以是拳打脚踢，也可以是鲜血直流，也可以是鼻青脸肿，也可以是相互斗殴。卡米尔虽然有时是一枝蔫了的花，而且所有的钱都拿去买酒喝了，但仍然发疯似的猜忌着安蒂，不许她出去工作，要她待在家里，等着他回来，她照料他，他养活她。但是，他并不能告诉安蒂，既然钱都被他花在酒馆里了，叫安蒂又从哪儿去拿钱来买吃的，买穿的，付房租呢？她只好不让卡米尔知道，偷着去干活儿。可他的猜忌往往变成可怕的发作：你哪儿来的钱买这只鹅？你怎么有钱买新裙子？你的新鞋是从哪儿来的？爱情就是这样的。有一次，她正在结了冰的井台上提水，被他一棍子打在头上，她倒下去，头碰在石头上，半昏迷的她头上流着血，慢慢爬回了家。“但是，后来他又多么可怜地向我求饶啊，”安蒂说，“他是多么为我担心啊！”这时候他愿意把一切都奉献给她，

全部工资他都拿回家交给了安蒂，让她买件漂亮衣服穿。

但是，安蒂在维索昌尼地区树敌过多，比方说那个被她挖走了卡米尔的白人姑娘，她还不断去酒馆。有时安蒂去酒馆，看见情人坐在那里，被一群对她怀有敌意的狐朋狗友包围着，她只好喝一口甜酒为自己壮壮胆，但她从不在酒馆同情人吵闹，许多次她都只好在酒馆厕所旁守候着他，这才保住了他们的爱情。酒店经理，一个叫卡莱尔的家伙，也对她不怀好意。他曾想把安蒂据为己有，但她不怎么看得上他，他长着黑胡须，人挺瘦。因此，这个家伙就存心报复，他故意想法让卡米尔把钱都花光，一点儿也不留给安蒂。而安蒂为卡米尔烧饭，他觉得好吃，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连卡米尔有时也注意到厨房归置得那么井井有序；只要他愿意，裤子也会给他洗干净。同时，安蒂爱他的肉体，那一身有着瓦尔蒂采文身的肉体确实很美，但要是没有文身，他那副肥胖的、被啤酒灌得圆鼓鼓的皮肉也会令人讨厌。安蒂脸上也文了一个美丽的记号，据说可以根据记号的形状判断是从哪一个改劳营出来的。而卡米尔也一定认为安蒂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要不然就不会由于猜忌的可怕发作而把她绑在桌子上，就在那张她差点儿没用刀子捅死他的桌子上，把她身上所有的毛全部刮光。安蒂洗澡的时候，特别留意不让我们发现她蒙受的羞辱。就在那个心潮澎湃的夜晚，她向我吐露心声，说她还是捅了他一刀。她终于使用了那把刀，当她把刀从他的肚子里拔出来时，竟然也没有流多少血。而当双方的愤怒一旦发泄出来，感情的汹涌波涛一旦平息下去，他们也就和

好了，卡尔米也就一大早上班去了。但是，他的伤口变黄了，发绿了，活儿也干不了多少，肚子老是疼痛，不断有液体流出。她一再苦苦求他去医院，他都不愿意。当他开始出现剧痛，伤口也开始发黑时，她打电话为他叫了医生，随后就逃跑了。她是这样描述的：黑夜，她奔跑着，不知钻到什么地方去，维索昌尼区已是无处可藏了，突然想起了第二个自己热爱的人，她的小儿子。到监狱后她已无从知道，卡米尔是在医院里，还是在家里？医生有没有去？如果在医院里，他说出了是她捅的吗？

“安蒂，他怎么会对您做出这种事呢！”

安蒂坐着，微笑着，轻声细语地说着。生活不是温暖的被窝。她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梦：她来到那个叫“黑色桥边”的小酒馆，不知道卡米尔旁边是不是坐着那个白人姑娘，不过，尽管让她坐在那儿吧。安蒂穿着新皮鞋，身上的毛已经长出来了，而卡米尔一见到她，马上站起来，推开那个白人姑娘，从已经愈合的肚子上提了提裤子，衬衣谁知道有多久没洗了，身上散发出一股汗臭，但安蒂对这无所谓，安蒂对什么都无所谓，甚至发现厨房被那个白人姑娘弄得乱七八糟，也不会因此对卡米尔发脾气，她只是微笑着，卡米尔大步走向酒台，给安蒂要了一大杯甜酒。甜酒发出诱人的香味儿，安蒂终于为这个幸福的时刻喝下了经过那一段长时间后的第一口甜酒。“要是您也出去了的话，”安蒂对我说，“您一定要到那儿去找我。”我向她保证，如果找到她，一定和她一起喝它一整瓶甜酒，不管有没有卡米尔或者别的什么人在场。

后来，安蒂突然被带走了。监狱里的一切事都不会事先打招呼，训导员突然走进来说：“收拾你的东西。”安蒂立刻听从命令，马上开始收拾，我甚至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她对可能发生的事感到害怕，但她在匆忙中还是朝我们笑了笑。结果只是把她移到了相隔不远的另一间牢房，而她每次经过我们的牢房时，总要敲敲门，或者叫喊一声。她后来因为什么罪被判刑我就不知道了，可我不能不感到奇怪的是，时间的作用是那么没有规律，有的人我们相识了好多年，却不曾去想他，而我和安蒂相识才不过三个星期。

赫尔嘉（第一回）

为了给赫尔嘉腾出地方，他们带走了安蒂。牢房里带走一个犯人，也会给人留下某种体会。“收拾你的东西。”训导员走进来，说话，门咔嗒一响，又关上了。收拾东西的意思，就是把毯子、枕套、床单、睡衣、备用袜子、内衣、毛巾卷在一起，用第二条床单包好，谁要是还有一些私人用品，如食品、信件、梳子、牙刷、面油、肥皂等——我甚至还时常有些花——都一块儿包进去，然后就在那儿等着。腾空了的床，虽说又硬又窄，但曾经是你的，现在光秃秃地躺在那里，你看着它都觉得厌恶。你的行李卷打好了，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要把你这个永不安分的流浪者从已经马马虎虎算是安顿下来的住处赶

走，也不知道会把你带到什么地方去——两种人例外，受惩罚的犯人会被告知去地窖，已经宣判的犯人知道是去准备押往服刑地的临时牢房。要控制你，就要让你捉摸不透，从而使你感到恐惧。有时我感到，他们之所以把犯人从一间牢房调到另一间牢房，仅仅是为了向他们显示自己的权力。有一个女孩曾发问："我到哪儿去？"年轻的女训导员开了个完全符合她身份的玩笑："去刑场！"

就这样，她们也对安蒂说"收拾你的东西"，安蒂赶忙包好了自己的那一点财物。就在这个时候，一堆像座小山一样的肥肉和脂肪涌进了牢房。直到现在我还能感觉到那时候耳朵里的嗡然一响，记得那山崩地裂般的印象。当然，这倒不是由于那堆肉和油，而是由于那惊天动地的登台亮相。已经够拥挤的牢房，好像要在超高压下爆炸了。那个肥胖得不成样子的女人，一屁股坐在我的床上，那梳理成复杂发型的一头金发更加突出了她的庞大块头，接着就像火山喷发似的道出了她的开场白："喏，你们倒是说说，我是法官，他们竟敢把我给关起来！"

法官？在1981年的捷克斯洛伐克谁能当法官？当局又为什么要惩处自己的人？在监狱里，只要有一点小事，人们就会缩头缩脑地躲进观察所，仅仅在一旁观察。上帝呀！在这个牢区的一百四十个女犯人中，为什么偏偏送来这么一个胸脯挺得老高的凶猛女人，让她来占据秀丽文静的安蒂走后留下的空位？那个女人还在不断地咒骂这个不知好歹的世界，而我的床——我在那里的惟一领地，那个我可以跷起腿来，背靠着墙仰望外面的一片蓝天，从而忘

记自己身居何处的地方—— 在她伸开的大腿下面不断呻吟，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啊，床呀！白天可以在床上躺着休息的权利是要由医生开条子批准的，而且像阿斯匹林一样，开一天、两天、三天。卧床休息的条子要面朝外挂在牢房门边的衣架上，好让值班看守知道谁被允许躺着而谁不许躺。电影里常有把可怜的犯人带进牢房后，犯人颓然倒在床上的镜头，鲁津监狱的犯人们会说，这些场面只不过是一种田园幻想曲，而他们白天只能坐在一把没有扶手、没有横档的铁凳子上，要躺也顶多只能躺在光秃秃的地上。我来后头一个星期曾把枕头放在冰冷的墙上靠着，结果副监狱长亲自对我吼叫了一通。枕头以及毯子、床单都必须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多层床的底层。赫尔嘉来的时候，我已经经过奋斗争取到一张挂在门旁衣架上的小纸条，而我的床又是单独的，没有同其他两张床靠在一起，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屋子里最舒适的地方。令我生气的是，她怎么可以径直坐到我的床上？要是她不是那么大模大样地伸腿坐在那儿，要是她说一声“ 请允许 ”，同时，要是我不是那么舍不得失去安蒂，又不被她那番司法部门没有保护她不受刑事惩处的惊人之语所激怒，也许我也不会对她说：“ 您不经允许不能坐在床上，要是被他们看见，您会挨骂的。 ”而同时我又感到自己令人恶心，为什么我不直说“ 这是我的床，请您站起来 ”呢？出于一种荒谬的客套，我竟然以监狱的规定为借口，而这种规定我自己也认为是毫无道理的，极为可耻的。所以，我又接着尽可能温和地说：“ 这是我的床，知道吗？您的在那下面。 ”安蒂

走后那张床垫上没有铺床单的三层床底层还一直空着。

她有点吃惊，停止了咒骂，马上站了起来。她还不了解这里的情况，是个新手，必须留意别人说的每一句话，而且，显然她也想给人一个好印象。特别是，我后来了解到，她是一个决心从生活中尽可能索取一切可以得到的东西，然而又不央求别人施舍的女人。所以，她没有觉得自己受了冒犯，尽管她肯定期待着我们至少会对她表示好奇，提些问题问问她，或者对她的到来表示惊讶，而决不会想到我会为了一张床这样的区区小事去说她。她的反应很克制，这一点我应该承认。我们大家都曾经多次违反白天不许在床上躺或坐的禁令，安蒂只要一有可能就会蜷缩在三层床的底层，我用身体为她挡住从门外射来的目光。当值班看守看不到牢房里的三个女人——人数是写在牢房门上的——时，就会用警棍敲门，同时吼叫：“从窝里滚出来！”睡眼惺忪的安蒂从里面探出身来，值班看守一走过去，铁栅栏一响，她又会躺下。人们会为在床上躺一躺的权利而不断争斗，可赫尔嘉因为我的一句话就放弃了。后来我们在一起待了四个多月，这四个多月她一直是在来的第一天为自己挑选的惟一的一个地方度过的，那是在多层床和小桌子之间靠墙放的一把铁凳子。从那里她可以看到窗户，也可以看到门，而且那地方对她来说足够大，她齐腰坐在里面，像个黑人王后似的坐在那里，直挺挺一动不动，乳房和肚子吊在大腿上，脚踩着地，背靠着墙，一只胳膊撑住床沿，另一只靠在桌子边上。天冷的时候，她不到温暖的地方去暖和暖和，只是披上毯子，坐在凳子上

的姿势一点儿都不变。四个月后，她的胳膊上磨出了老茧，而一次洗澡时，她摸摸屁股，发现竟变得和猴子屁股一样又扁又平，长期不变的坐姿使臀部变形了。

一种本能的冲动使我违反了牢里的文明原则：犯人进牢房后先为他排忧解难，然后再看情况。我为此感到羞愧，同时，令我惊奇的是，赫尔嘉马上很乐意地改变了自己的举止。他们把一位复仇女神塞进了我们这间牢房，可她一转眼却变成了一位淑女，我不能用别的词来形容，如果说她是一位少女或者小姑娘，同她的重量未免太不协调。这位淑女用细柔的声音，比她此前说话的声音要高好几分的细柔、清脆，甚至可以说是银铃般的声音作了自我介绍：“我叫赫尔嘉。”同时，用娇弱的、可亲的、上流社会的姿势向我伸出手来。我指了指海伦娜太太，她几乎一点儿也没听懂赫尔嘉像火山一样喷出的那些话，只是惊吓地在角落里注视着赫尔嘉的凶猛神态，当她看见该轮到她说话的时候，才很有教养地回应了一声：“海伦娜。”

我刚说了声“我叫埃娃”，赫尔嘉就急忙插嘴说：“埃娃·康图尔科娃。”使人觉得她似乎急着要抢在我的前面说出我的姓来，同时用她那圆圆的蓝眼睛——也是她周身上下惟一漂亮的器官——亲切地把我打量了一番。

一般说来，他们带一个新犯人去牢房时，不会告诉这个新来者，他在那里会遇见什么人。他们根本什么也不会告诉他，显然是为了让他无法提出任何要求，也无法对任何事情表示异议。“她们一切都会向你解说的。”女训导员在关上牢门前这么说，而“一切”主要指的是如何正确叠

被子和床单，否则检查时会对你叫骂一通，以及什么时候轮到你打扫牢房卫生。新来的必须自己去打听怎么办理邮件，包括包裹，有病怎么去找医生治疗，以及在狱中赖以生存的其他一切事情。女训导员对我很关照，在带我到牢区来的路上曾对我说：“您去的牢房经常有违犯纪律的事情发生，注意不要卷进去。”

“您怎么知道我的姓名？”我问道。

“原来就是您呀！”赫尔嘉不回答我的问题，却兴奋地说。我想，也许她可能在门边衣架上挂着的允许我白天卧床的医生证明上读到我的姓名。但我注意到，附近其他牢房的医生证明上有关人的姓名都是就这么挂在那里的，惟有我的诊断证明每次都细心折叠起来，背面朝外挂着，谁也不许看到我的姓名。而赫尔嘉不向我作解释，却满怀同情地向我讲起他们住的那所房子里住着我们这个案子的一位被告，并详细叙述了怎么对他家进行了整整一天的搜查，怎么逮捕他并在夜里把他押走等等，一直讲到她怎么和他建立起友好关系。在她滔滔不绝的讲述过程中，我已经注意到她的潜台词无非是要争取我相信她。她一个细节又一个细节地讲个没完，可是，她嘴里说出的那些关于我的同事家庭生活中的许多事情，恐怕我的同事对我也未必会讲。我得到一种印象，这个女人好像是一发炮弹，正在你的手心、脚边劈啪劈啪作响，你只好等着看它什么时候整个爆炸。

在这以前，我在牢房里对谁都没有具体谈起过我的案情。当我的同牢难友得知我犯的是哪一条，和我这一条的

量刑幅度远远超过她们犯的那些条款时，特别是我犯的这一条还带有政治的神秘色彩时，她们都很有礼貌地表示尊重我对具体案情避而不谈的态度。甚至连莉布什卡都能够如此克制自己，没有在便池旁和窗户口对托尼契克说出她原想说的话。她只用一个巧妙的比喻道出了我的神秘性：“我们这儿有几位夫人,但她病了。”

我大声地、足够明确地对赫尔嘉说：“可是我并不知道，我们原来还是同案犯。”

对于这一句话她也不予理会，而是以一种高兴而又惊愕的语气说，这真是太巧了，我们居然在这儿会面了。她像放连珠炮似的不断说着，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注视着我，又说起她和我的同事一同居住的那所房子，说起搜查引起的轰动。在一系列把我们两人连在一起的奇妙偶合中，她还说出了她的辩护律师的名字，当然，他同时也是我的辩护律师。这肯定又是一个巧合，但是，在所有那些最无关紧要的事实中，正好是这一件事使我不得不从观察者的地位转入警惕状态。她知道我，同情我，是和我在同一案件中被指控的一位同事的朋友，我们又有同一位辩护律师，又相会在同一间牢房里，慢慢地，我们简直像是亲戚一样了！要说这是为了使我高兴的话，又未免太好了点儿。过于热心反而坏事，这一点对于原本聪明的人来说也不例外。而赫尔嘉却在刚见面的第一个钟头里就说出了正常情况下需要几个星期才会吐露的事情。

“对不起，请允许我问一下。这有点叫人无法理解。当然，我对于您到这儿来并不介意，在监狱里人们不可以

选择同谁在一个屋里吃饭、睡觉。但我仍然很想知道，您是怎么到这间牢房来的？这里原来并没有空地方，您知道了吗？他们先要把安蒂带走，才能让您来。”

“不要老是护着那个吉卜赛女人，”海伦娜太太嘟嘟囔囔地说，“她喜欢吉卜赛女人。”她向赫尔嘉告状。赫尔嘉对我作了解释，而且就事论事，仍然一点儿也不生气。夜间她在地窖里听两个姑娘讲了些情况，这两个女孩后来同她一起被带到牢房区来了。她们自己割破了手腕上的血管，还有一个已送医院，大概已经死了，因为她们在路上跟女训导员开玩笑，问能不能放她们出去参加葬礼。她们手腕上缠着绷带，散发出一股野性。“我被这两个女孩吓坏了，”赫尔嘉说，“所以我求看守安排我和文明点儿的人同住一间牢房。”

一切听起来都很像是那么回事儿，只有一点：决定犯人去哪间牢房是接收科的事，而且我以后还核实过，不存在看守更改决定的事，这涉及许多行政方面的问题。“看守为您更换了牢房？”

“我不知道是谁更换的。楼梯上走来了一个金发女人，我向她说了那两个女孩的情况。”后来她指给我看过，金发女人原来是在天井值固定岗的狱警，她无权过问牢房的事。

“是她把我的姓名告诉您的？”

她立刻中了这个并不高明的圈套。出于自我保护的意识，看守们非常注意在哪些犯人面前说哪些话，什么该给他们说，什么不该说，甚至比犯人对看守还更加小心谨

慎。因为他们了解这片丛林里的法则。

“她向您说了，我为什么来这儿？”

赫尔嘉好像是要纠正我的想法，特别强调地说：“埃娃·康图尔科娃只有一个。”

有些话让人听后身上会起鸡皮疙瘩，而这个女人却接二连三地说了许多蠢话。对于我，她很难有多少了解。退一步说，就算她真的和我的同事住在同一所房子里，同事被搜查和遭拘捕可能引起她如此大的好奇心，以至于促使她去收听国外广播，而国外广播里可能提到我的名字。但是，我已经了解到，我们当中遭拘捕、被指控的人很多，难道就在这么些人中她恰恰就记住了我的姓名？疑点接踵而至，而赫尔嘉那种强加于人的友好姿态更大大加重了我的不信任。我的第一印象并没有错，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代替安蒂的歌声和故事的是我和赫尔嘉之间的较量，一场意志对意志、身体对身体的较量。可以说，我和赫尔嘉一同演出了一场戏剧，它拖得很长，一直延续到我在鲁津监狱的大部分时间，而这是一场沉闷的、不能涤荡心灵的戏剧。

赫尔嘉一来就把海伦娜太太据为己有，但海伦娜对牢房状况的影响本来就微不足道，她只顾自己享受，吃了药经常睡觉，要玩也顶多玩玩“好人，别生气”，谁争取她都无所谓，只要她可以从中获得吸烟的权利。这是一个老小孩，总是不断给我们找事做，一会儿梳理发缝，一会儿剪指甲，还得在淋浴时为她搓背、洗头，甚至于劝阻她不要剪掉或者碰坏手上打的石膏板，总之，作为同盟者的她

是很差劲的。但是，赫尔嘉会向她透露一些自己的案情，在监狱里谁也不可能避口不说自己的案子。有一次赫尔嘉翻刑法汇编，寻找跟自己有关的条款，海伦娜太太纠正她说："您的可是第二百五十条！"刑法第二百五十条是关于诈骗罪的，赫尔嘉生气地对海伦娜喊道："您给我住嘴，您真是个笨蛋！"从那以后，海伦娜太太什么事都不插嘴了。

我描写别人时，力求既用自己的眼睛也用她们的眼睛去看她们，而用她们的眼睛看我却很困难。在别人的印象中，我一定显得很不自然，甚至显得可笑。每天早晨我都要做健身操，白天还用头朝下倒立来解除紧张，她们认为重要的事，比方说食物，我却不在意，可是我每天都要洗几回冷水澡，该我说话时我常常沉默不语，一天到晚只想着看书，要不就写些什么。海伦娜太太曾用不信任的目光观察我写些什么，直到她发现我每天写的不过是连载的家信为止。我并非待人不亲切，但总要保持相当的距离，而且常常心不在焉。在监狱里的刑事罪犯心目中，政治犯总有一种既叫人明白又叫人摸不透的印象。明白的是他们都有"反现政权"的特征，并因此而受人欢迎，政治罪名甚至会引起刑事罪犯的某种无言的赞赏和钦佩。有一次去看牙医，一个因一长串入室盗窃案被拘捕的名叫拉茜奇卡的女人问我："为啥来这儿？"我告诉她后，她嘘了一声说："妈的，我可不想跟你对换。"而看不透的是他们的个性，在许多事情上他们的行为总是和刑事犯所习惯的不一样。我和她们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每天早上都要带我去受审

讯，中午带我回来吃午饭，下午又把我带走，而她们则整天坐在牢房里。海伦娜太太就是刚来的时候受过一次审讯，从那以后再也没有问过她什么，对赫尔嘉总共也不过审讯过四回。早晨被带走前，我常常还抓紧时间为她们卷烟，她们两个谁都不会，而有时候除了点儿烟草外又没有别的可吸。审讯情况我不对他们讲，回来时我常常已经十分疲倦，所以既不骂娘，也不向她们吐露什么。从牢房窗户望去，可以看见审讯我的那间房子的窗户，那扇窗一打开，我就知道要来找我了。赫尔嘉激动地观察着，哦，她是多么希望和我一起叫骂一通啊！我的东西随便放着，她们可以任意翻看，安蒂已经不在这儿了，她曾帮我照看它们，不让好奇的海伦娜去翻。后来海伦娜和赫尔嘉闹翻了脸，这才对我说，赫尔嘉去翻看过，什么都被她看了。我倒无所谓，反正我所有的东西审讯员在我之前早已看过。至于我的案子，我也不隐讳。两个法国人，一男一女，到捷克斯洛伐克来过复活节，他们在小轿车的双层外壳里偷运了一些境外出版的图书和杂志，显然是有人告发，他们在边境上被抓获并拘捕了。有几个包裹写有具体收件人姓名，其中也有我在外面出版的几本书，运来的杂志里还刊载着我的一篇关于波兰团结工会和莱赫·瓦文萨的杂文。我就是为这坐牢的，我的案子涉及刑法第一章第九十八条，罪名是反对国家，颠覆共和国，量刑幅度是三年至十年徒刑。有一次我受审讯回来时，心里憋着一肚子火，赫尔嘉见了高兴地说：“这下可好了！您终于也骂了他们一顿。”她描述自己受审讯的情况，除了争吵和叫骂没有别

的，她还骂审讯员是笨蛋。我对我的审讯员可以有各种看法，但他不是笨蛋。赫尔嘉认为我太克制，并因此生气，可我在监狱外也不主张对现政权进行廉价的谩骂，何况现在是在这种地方。她讲政治笑话时我也不笑，顶多只是提醒她注意，牢房肯定是有监听设施的。

安蒂走后没几天，被赫尔嘉搞得头昏脑涨的我，体力上也垮了下来。我发病时的情况是很危险的，就好像超负荷的电网突然断电，神经完全自行其是，做出一些完全料想不到的事，事前想不到，事后也想不到，一下子好像我已经不存在了，醒来时会发现自己瘫在地上，简直不成人样，全身软弱无力，好像就要死去似的。玛伊卡说我失去知觉时眼睛一直睁着，因此她曾认为我已经死去。这次是赫尔嘉在场，又是发生在星期六，赫尔嘉为我突然发病而感到十分紧张，但牢房里要有玛伊卡在才会叫来医生，或者有安蒂在才会把用凉水浸湿的毛巾放在我的额头上。海伦娜太太对我的病痛甚至完全没有察觉，赫尔嘉敏捷地观察着，但什么也不做。我对值班看守长说过我很不舒服，他给我出主意说：“您被批准可以卧床，穿上发给您的睡衣躺下吧。”我的睡衣腿上有好几个洞，裤腰上还缺松紧带，送午饭来的时候我穿着它走到过道上，要求为我请大夫。当时我正难受得很，竟然没有注意到自己那副可笑的模样。过道上的女看守们看见我穿着那身破睡衣，轻蔑地把我上下打量。大夫迟迟不来，赫尔嘉也只是高声叫骂。一直到星期日上午才来了一位医生，整个这段时间里赫尔嘉一直骂个不停，但就是没有给我一条湿毛巾。我感到，

她那种人为的愤恨吵得我越来越难以忍受。我意识到，不管她到底是谁，我都会很难同她相处。

同我的克制相反，赫尔嘉总是滔滔不绝地谈她自己。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她编造出了另外一个赫尔嘉和她的案子。她像一辆坦克，不断地向我发起猛烈冲击。

有时我想，她说的也是有可能的，你别把自己扯进去，你不是那种什么都怀疑同自己有关的人，你真的值得别人费那么大的劲吗？但是，她不会为了海伦娜太太而编造这么多故事，而牢房里又没有别人。有一次我想，她可能是为了自己而编造，为了使自己在我身旁感觉好一点而编造。有些人具有一种倾向，总想使自己成为同别人相类似的人，他们并无其他目的，只是觉得非同别人般配不可。为了替赫尔嘉辩护，我回想了一些往事，我不是曾经让一些人因为他们在我面前自然流露的情态而感到尴尬吗？第一个想起的是我的母亲，她为在我面前讲一些轻浮露骨的笑话而感到羞愧。也想起了一些在我面前装腔作势的男人。我设想，这个女人也许太好虚荣，过于自负，因而不愿在我面前痛痛快快地承认她到底是什么人。正是因为我希望赫尔嘉的面纱最后会自然而然地揭开，所以没有把我知道的真实情况作为炮弹射向她那辆坦克。同时，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空气本来就沉闷得连呼吸都困难了，我又何苦再去加重它呢？要是我显露出，我知道她在掩盖些什么，她怎么能在我身旁待下去呢？此外，我还有兴趣看看监狱里的这类事情会怎么发展。

赫尔嘉生性喜欢编造故事，她有这种天才和禀赋，故

事编得也很好，她给我讲的故事从情节上说也没有很多逻辑的跳跃或者漏洞。凭着她的聪明和口才，凭着她强加于人的本事，一个中等水平的编剧甚至会同意把她的故事拍成电视剧。安蒂也编造了不少故事，她们都在那里编造，或者是为了替自己辩护，或者是因为缺乏尊重现实、尊重实情的精神，但要是我把她们两人加以比较，那么，安蒂是在做诗，她通过自己讲的故事而飞向爱情，赫尔嘉则是有目的地为了生活而编造。赫尔嘉编造的东西决非艺术，而是艺术家们称之为“混面包”的那种东西。赫尔嘉“混面包”的本事已日臻成熟，她对此道已颇有经验。但如果她是因为在我身旁对真实的赫尔嘉感到羞愧而编造的话，那么，很遗憾，她所冒充的那一类人却恰恰成为她自我暴露的又一个原因。很奇怪，我很乐意接受安蒂编的故事，从未想到去琢磨她哪些地方在编造，哪些地方在讲真情，我对此不感兴趣。安蒂就是安蒂，哪怕她喜欢做诗，就像海伦娜离开自己的梦想就活不成一样。而赫尔嘉却老是引起我的怀疑，这全怪她自己。如果她只是感到羞愧甚至于假装只是感到羞愧，她可以诳称自己是一家账务上发现亏空的酒店经理，或者一个开车压死了小孩的车祸肇事者，可是，她那过分的政治化却不能不使人怀疑。她力图装扮成一个我想像中的值得信任的人，而我的想像当然又是别人向她描绘的，而且描绘得很愚蠢。如果她装扮成一个做假账的人，或许我不会这么重视她的可疑之处，甚至还可能对她的假话信以为真。可是，她显然过分地根据我们之间可能会谈到的话题来设计她要扮演的角色：我们应该有

共同的熟人（她向我打听过多少人的情况啊！她真走运，恰巧和我的一个受到指控的熟人住在同一所房子里），她还应该有会引起我的深切同情的遭遇，我们的谈话更应该涉及一些会受到刑事制裁的内容（大概是要让我在牢房里发生我在审讯中竭力要避免的事情）。我观察她，看她怎么使劲，看她怎么逼我，我甚至有点可怜她，又对她感到恶心。我不由得想起了杨·贝奈斯①写的一篇绝妙的短篇小说：一个政治犯，也是鲁津监狱的，在牢房里迎来了一个完全无害的半呆半傻的犯人，他叽里咕噜地说一口奇怪的方言，自称是因强奸罪被关进来的，还讲了不少生活中的笑话和故事，可后来庭审时，他却既不讲方言，又不再装扮成半呆半傻的乡巴佬，而是出庭指证小说的主人公反对现政权。当然，实践中不会做得这么露骨，但每一个政治犯差不多都有这种经验。很难确定，这一切是不是赫尔嘉自己一个人想出来的。令我赞叹的是，她的故事中对于我们国家最近三十年的历史，完全是准确根据有觉悟的捷克文学作品和政论文章的说法来描述的。而她向我编造的个人经历和家庭遭遇正是这些作品的精髓，是这些作品内容的一般化了的浓缩物。

但你又不能不感到惊讶，她的描述是如此缺乏个性，缺乏生活，缺乏独到的情节和特色。由此可以想见，就是那些血腥味最强烈的题材，一旦在文学中或者非文学中加

① 杨·贝奈斯（1936~ ），捷克斯洛伐克作家、政论家，60年代因受迫害而流亡美国，1989年后返捷。——译者

以滥用，都有可能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可怜的赫尔嘉，如果讲自己的实情，倒会使自己觉得轻松一些，而且，倒有可能获得我的同情。那样的话，也许我还会同她一起，痛痛快快地在牢房里骂一通娘呢。

好啦，让我们听听她讲的故事吧：她出身于二月①前的一个较好的家庭，诚实的马萨里克②派家庭。关于马萨里克她知之不多，但家里有国父的照片。作为马萨里克的追随者，她的信仰可很不虔诚，她的人生哲学倒不如说是属于斯特希贝尔尼③式的小业主类型。爸爸从奶奶那边继承了波兰的贵族爵位（波兰题材在她的叙述中不断出现，例如说波兰的团结工会正在为生存而斗争等等），他的爸爸，也就是赫尔嘉的爷爷，波兰女贵族的丈夫，是小学校长。另一边的奶奶，赫尔嘉妈妈的妈妈，是农业党人施维赫拉④的表妹。妈妈家里在离布拉格市不远的郊区乡镇上有一个大农场，爸爸的父亲就在那里任教。婚姻使妈妈的社会地位下降了——当然，那个波兰血统问题除外！——但他们的婚姻是爱情的结合。妈妈在大农场的小宫殿里生活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年纪不小的大小姐了，她学习唱歌

① 指捷1948年2月事件，经过这次事件，捷克斯洛伐克由共产党和资产阶级政党联合执政，变为共产党独掌大权。——译者

② 托马斯·马萨里克（1850～1937），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缔造者，1918～1935年任总统，有捷克斯洛伐克国父之称。——译者

③ 伊日·斯特希贝尔尼（1880～1955），二战前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法西斯分子。——译者

④ 安托宁·施维赫拉（1873～1933），大地主，二战前捷克斯洛伐克农民党领导人，一度出任政府总理。——译者

和弹钢琴，而校长家的学生让她着了迷。她比他大七岁，赫尔嘉讲这番话的时候她七十六岁，爸爸六十九岁。赫尔嘉出生时，妈妈已经三十好几了，她本不愿为了孩子而牺牲自己的歌唱事业，只是因为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才决定要孩子。因为爸爸虽然只是个校长的儿子，但他爬到了外交官的地位。尽管他因同妈妈结婚而成为施维赫拉的亲戚，但同时又是贝奈斯①圈子里的人。说到这里，要是让我来当电视剧编剧的话，我会否决这种逻辑上的跳跃。要么是施维赫拉一边的，要么是贝奈斯一边的，否则需要费很多口舌去解释。慕尼黑事件后，父母双双逃到英国，妈妈作为歌唱家的发展道路中断了，所以才允许自己的两个孩子出世。赫尔嘉和她的弟弟填出生地时都写伦敦。战后爸爸同总统一起回到祖国，地位升至公使，到过南斯拉夫，爸爸作为外交家参与创建了小协约②。赫尔嘉的描述有点混乱，创建小协约的时间是在二战前还是二战后？可以肯定的是同南斯拉夫有关。我为她在历史方面发生这样的纰漏而感到遗憾，因为小协约成立的那一年她爸爸才七岁。而且，如果她不给我这么多机会去戳穿她，我反而会

① 爱德华·贝奈斯（1884～1948），二战前长期任捷克斯洛伐克外长，1935年任总统，希特勒占领德国后在伦敦组织流亡政府，苏军解放后继续任总统，1948年2月事件后引退。——译者

② 一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三国的军事政治同盟，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开始构建，1920～1921年间基本形成，1930～1933年间得到加强，1938年慕尼黑事件后解体。——译者

高兴得多。战后爸爸和杨·马萨里克①合作，关于他的死，爸爸知道许多情况。1948年2月以后，爸爸是第一批被捕者之一，他是在米拉达·霍拉科娃②案件中受审的，差一点没有上绞刑架，判了二十年监禁，蹲了十四年。赫尔嘉当然不知道爸爸是在什么地方被捕的，是在布拉格还是在贝尔格莱德，可以肯定的是，他是穿着外交官的燕尾服被捕的，因为十四年后，略显消瘦而且服饰可笑的他，就是穿着这身燕尾服从监狱回家的。赫尔嘉至今还同丹尼娅·霍拉科娃③是好朋友。妈妈多年一直献身于歌剧艺术，战后最初几天她就曾在皮尔森为美国人演唱过《被出卖的新嫁娘》④，而且获得了惊人的成功。他们在布拉格巴朗多夫区有座花园式小洋房，孩子们有保姆。赫尔嘉小时候学习过古典芭蕾舞，她为我演示过双人舞和四人舞的区别，震得牢房水泥地轰隆直响。她可以站着把两只脚掌连成一条直线，单腿可以垂直踢到头顶。她还教我一些芭蕾舞练习舞步，如果有芭蕾舞鞋，她会穿着行走。她行走的姿势也是芭蕾舞式的，还向我们演示过怎么才能正确地从

① 杨·马萨里克（1886~1948），托马斯·马萨里克之子，二战期间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外长，苏军解放后继续任外长，二月事件后跳楼自杀。——译者

② 米拉达·霍拉科娃（1901~1950），捷克斯洛伐克50年代冤假错案受害者之一，曾任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社会党议员，1950年以反共和国罪被处死。——译者

③ 丹尼娅·霍拉科娃，捷克新闻工作者、作家，与米拉达·霍拉科娃同姓，但并非其女。此处作者嘲笑赫尔嘉牵强附会。——译者

④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音乐家贝·斯梅坦纳的著名歌剧。——译者

脚后跟踩到脚尖上。她的体重有大约一百公斤，脂肪集中在胸脯和肚子上，因而她的每一个芭蕾舞动作都使人起敬，而不是令人好笑。芭蕾舞残留在她的动作中，就好像美的残余停留在老妇人的脸上一样，这是完全可信的。她说，妈妈在民族剧院演唱期间，她作为小孩参加了剧院的舞蹈队，有时还让她扮演个小角色，如《被出卖的新嫁娘》一剧中杂技班子的小舞蹈演员。爸爸被捕后，妈妈不得不去当清洁工，但主要的生活来源靠保姆提供，她在孩子们长大后成了管家，最后成为一家人的供养者。亲戚们都不理妈妈了，当局把她迁出了巴朗多夫的洋房。我一直没有弄明白，她妈妈怎么能弄到这么漂亮的住宅，现在他们又都住在哪儿。妈妈现在只能留在家里唱歌，钢琴总算是留住了。赫尔嘉第一次见到爸爸，是在她十八岁那一年，她到监狱去请求同意她结婚。性格高傲的妈妈在那里大闹了一场，结果提前中止了他们的探视，爸爸伤心地哭了。赫尔嘉先上了铁路中专，后来又念完了高等铁路专科学校。我还略懂一点铁路方面的事情，而她学的就是这方面的专业，应该是有大专学业的线路设计人员，所以我请她勾勒一下驼峰的设计图是什么样子的。这倒不是故意考她，我并不想加重自己的疑心，而当我看到的不是专业的剖面，而是画着两根铁轨的儿童画时，我更多的是感到遗憾。爸爸在大赦中被释放回来后，先是当锅炉工，后来只能替人看看门。妈妈倒是有更多的可能去继续她心爱的歌唱，但仍然只能在家里，只要一有空她就练嗓子，她还会用歌剧的唱法唱民歌。是的，我听见有人在说，这些话听

起来多么带有漫画的味道啊！漫画的味道并不在于我的写法，而是在于所编造的故事本身。她的故事是不连贯的，支离破碎的，现实也是支离破碎的，但一些片断是可信的。当我开始把她妈妈这个人物塑造成歌剧名人时，我就已经在制作漫画了。妈妈喜欢浓妆，擦很多香水，衣着也很奇特。作为一位夫人，她各方面都有一种追求新奇怪异的倾向，主要表现在她对任何人说话都是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因而常给自己招来麻烦，结果家里还得为她去进行弥补。有一次，人民委员会女科员拒绝给她办理去温泉疗养的证明，她就在那儿闹得不可开交。爸爸倒是个正直而善良的人，热心真理，注重品格。他在给赫尔嘉的信中写道："小姑娘，坚持住！做一个勇敢的人。"赫尔嘉还把这封信给我看了，从字迹看爸爸有一双当工人的粗壮的手——他也的确是个工人，赫尔嘉的父母多年来一直是我的同事居住的那所房子的管理员。爸爸倒是没有写错字，但外交风格肯定并不突出。爸爸从来也没有蹲过监牢，而丹尼娅·霍拉科娃也并非被处死的米拉达·霍拉科娃的女儿。

按照赫尔嘉的叙述，她第一次出嫁是满十八岁那一年，当时爸爸在米洛夫监狱向她表示了祝福。她生了个女儿，但婚后不久丈夫就流亡国外了。后来她再次出嫁，这次可不同凡俗，而是表现了她所钟爱的爱国主义精神。那真是个鬼使神差的奇妙巧合，他们的婚礼订于 1968 年 8

月 21 日[①]在布拉格新市政厅举行。早晨他们获悉，我们国家已被占领，但赫尔嘉给自己，给新郎，给所有婚礼参加者的身上都披了一条代表民族的红白色授带，并且和自己的婚礼队伍一起，骄傲地围着停在市政大楼和旁边的法院大楼前的苏军坦克走了一圈。女儿跟在后面当她的傧相。（要是我当编剧，我一定要核实一下， 8 月 21 日那一天究竟有没有人举行过婚礼）“以后到我家来吧，我给你们看照片！”她用小姑娘般的声调故意炫耀地说。她婚后的生活是快乐的，和睦的。有时她在什么地方和朋友聚会，乐而忘返，丈夫总是很乐意地开车来接她。有一次她回家时只穿了件衬裙，丈夫也什么都不说。她引导我也讲讲这类趣事，但我丈夫总是和我一起去参加所有的聚会，为此她感到很不高兴。当她的丈夫也在什么地方陶醉在酒中而回不来时，作为回报，她也立刻出发去接他。有一次他打来电话，说他在某某地方，但只讲了广场的名字。那天天气很冷，他穿得又少，一接到电话她就赶忙开车去接他，然而却没有找到。可笑的巧合是，布拉格城外相反的方向上有两座小城，它们的中心广场有着相同的名字。总之，两口子间的趣事多得很。但丈夫和她不同，比较贪图安逸，而她却总是要想出些新花样，不断改造住宅，变更家具，粘贴壁纸。她随心所欲，在家里发号施令。她给我画了一张住宅平面图，是一套很好的房子，一半父母住，

①前苏联为镇压捷克斯洛伐克 1968 年“布拉格之春”改革而出兵侵捷并占领布拉格的日子。——译者

女儿有一个小房间，她和丈夫带着她的达克斯母狗住卧室。丈夫大概给她寄过三封信到监狱来，信中称她为“小猫咪”，特别描写了小母狗如何想女主人，说它睡在床上赫尔嘉睡的地方，裹在她的睡袍里。以后好长时间都不再有信来，我们两人一致痛骂检查员把我们的信件扣留得太久，其实并没有扣留她的，那个男人把她遗弃了，她出庭受审时也没有来，只有爸爸一个人去了。那个男人也不是她的丈夫，也没有什么 8 月 21 日的婚礼。以后爸爸的来信也少了，她感情上很眷恋的弟弟根本没有给她写过信来，只是有时在他老婆写的信上签个字。只有女儿的信写得亲切、快乐、坦诚。对于自己的这些真实的痛楚和悲哀，赫尔嘉一个字也没有提起过，也不可能提起，因为她用编造的情节把自己的真实故事完全搅乱了。有时夜里我听见她久久地低声哭泣。她不是那种会引起别人怜悯的人，我倒很佩服她独自一人去面对烦恼的能力。海伦娜太太常常在梦境里寻求慰藉，而完全仰仗赤裸裸的理智的赫尔嘉有时却不能不感受到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带给她的阵阵刺痛。这是个坚强的女人，她企图强行让别人和生活服从自己的意愿，却又因为自己的笨拙而使这种努力归于失败，这甚至是值得同情的。我也能理解她那种过分的自信心，这是性格坚强的人往往会表现出来的一种不带感情色彩、却有过多理性的自信心，他们不善于反求诸己，往往孤立无援，非常不幸，他们执意要做的事情常常根本办不到。就是在赫尔嘉卷入的这件坏事上，她的同伙们也把她一个人孤零零地扔下不管了。

关于她的案子，她是这样向我编造的：她是铁路上的线路工程师，荷勒尚达工程负责人，由于高速公路要经过荷勒索维采，所以要改建那里的铁路线。她是星期六在工地上被捕的，当时她正在指挥一个作业队赶任务，她被押到巴塞洛梅伊大街的警察局，在那里连夜对她进行审讯，一直到星期一。

“晚上都没有带您去牢房？”

她不知道巴塞洛梅伊警察局里还有牢房。

“夜里也审您？”

“夜里也审。”

“不给饭吃？”

星期一把她押到鲁津监狱，这才吃了头一顿饭。我丝毫不想为公安部门的工作做无根据的辩护，绝无此意，但我可以凭着良心说，她讲的情况是根本不可能的。她也没有仔细想想，为什么必须毫不迟疑地逮捕她，又为什么必须如此冷酷地审讯她，因为拘留她的理由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不过是她签字同意一个下属工程师去德国休假，后来又同意延长他的假期，结果这个工程师带着全家流亡德国不回来了。说是怀疑她知道他要逃亡，并且为他作掩护，可为了这种事情，如果不涉及盗窃国家财产或者谋杀，而仅仅是流亡国外，大概也不至于抓人吧。

过了一阵子，她明白了，仅仅参与某人的流亡，对于她想在我眼里扮演的大案来说（而她的案子确实是大案，看守们还一个个到窗口来瞧她），分量未免太轻了。所以，随着夏天天气逐渐变坏——整个7月一直在下雨，鲁津地

区被水淹了——她慢慢变成了荷勒尚达工程的破坏者。荷勒尚达工程没有接通排水管道，雨一来工地被泡在水里，路基下沉。这些消息她是从我们订的报纸上看到的，报上还有关于雨水造成的损失情况的报道。她每天都故作激动地翻阅气象公告，好像雨下得越大她的罪恶也越大似的。荷勒尚达改线工程被水浸泡的原因，其实也是我们工地上常见的：为了让企业年底能发奖金，特别是领导人员的全年奖金，投资方在接收工程时把两只眼睛全闭上，只是把工程缺陷和未完工程项目记入验收单，让施工企业作出在一定限期内改正的保证，就在验收单上签字，工程就算移交了。这样，双方企业都完成了计划，而且，积极的数字还会计入全国统计资料，所有的人，包括部里，都感到满意。只是荷勒尚达工地上的未完工项目在整个1月、2月、3月期间都没有动，原因是天气太冷，无法浇灌混凝土，而4月又因人手不够没有开工。现在下雨了，赫尔嘉又因为同意她的下属去休假，而休假又变成了流亡国外，于是，企业里那帮狡猾的家伙把荷勒尚达工程的全部问题一古脑儿全推到她的头上，她又很难反抗，她既不能参加讨论，又看不到文件。有一次，她受审回来时带来一个好消息，说已正式提出请部里派人对工程进行核查。后来又气得无法控制地回来，说审讯时让和她一起工作的一个工作人员同她面对面地进行对质，那个人早就觊觎她的工程负责人地位，现在当然不会作有利于她的证明，所以，除了协助逃亡外，又给她加上了一条破坏工程的罪名。这样，原先把我们凑到一起的那些绝妙的巧合，现在又增加

了新的一项：我们触犯的刑律条款是紧挨着的，我是第九十八条，从事颠覆共和国的活动，而她是第九十七条，从事破坏共和国的活动。难道这还不足以使我们成为朋友吗？好强的性格使她走得这么远，以至于在第一次庭审回来时——这时候一般人总是会感到十分惊恐——还向我（仅仅向我，因为她在任何别的地方都不可能运用她所编造的故事）编造了一套同实际情况完全不同的庭审经过。她叙述了检察官的发言，证人们的发言，说后来法庭决定推迟进一步审理，并同意她的辩护律师提出的请求，要求向法庭提交专家审核报告。赫尔嘉真的是在建筑业工作，但她只是一个绘图员，她练就了一套绘图专业字体，海伦娜太太请她帮助写信时还曾赞扬过她的书法。

但是，两个赫尔嘉毕竟还是有一个使她们成为整体的框架，那就是赫尔嘉的人生哲学，她的意识形态。她是一个狂热的反共分子，又是一个狂热的爱国分子，但这两种狂热却表现为言词上的激进和行动上的怯懦，民粹主义是她为自己画的一幅漫画。赫尔嘉常常挂在嘴上的箴言有：这边大吃大喝，那边民族走下坡；到处行贿到处偷，民族堕落何时休；家庭乃民族之本，等等等等。她一切都从客观上考虑，从民族的角度考虑。她憎恶流亡，认为这是背叛民族。她仇恨吉卜赛人，说他们硬往我们的民族里钻。她认为拯救民族要靠那些精力充沛、积极有为的人，而她是很积极的，体制内部出现任何机会，她都要积极利用。儿女上中学，她当然是家长和学校之友协会的主席，为学生组织郊游，为教师举办聚会。除此以外，信不信由你，

她还是某个民主党派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呢。曾经有人建议她——那是在 1970 年——加入捷共，她却反而加入了这个非共党派，并且在那里飞黄腾达。她是一位颇有名气的中央委员，报纸上报道过她。团结工会一开始公开活动，她就组织中央委员会成员去波兰旅行。她还被提名作为非共党派候选人竞选捷克民族议会议员。她还是一名法官，人民法官，参加交通违规事件陪审团的会议。也许她真的当过那样的法官。

“可是，为什么呀，我的上帝？为什么您要当法官？您，那么有看法的人！”

她怀着一种优越感回答说：“您难道不明白？这是为了帮助老百姓！”

帮助什么？帮助他们出了交通事故不受处罚？她曾经在法庭裁决之前就帮那个留在德国的朋友要回了驾驶证，安排他开着车去休假，一走就不回来了。“等到到处都有我们的人时，情况将会大大改善。”而鉴于她自己向别人提供过的那种帮助，她如此愤恨地咒骂司法部门收受贿赂就不合乎逻辑了。她对检察官和法官的受贿行为是多么愤愤不平啊！她举的例子真是令人震惊。我默不作声，我并不想贿赂任何法官，而她却利用自己当过法官来为自己辩护。

训导员下午四点送邮件来。她一路走来，牢门上的小窗口就一个个咔嗒咔嗒地响起来。如果她走过去后小窗口还不开，人们会感到很悲哀；而当小窗口朝着过道方向打开时，人们的希望又是多么殷切！听见叫你的名字，你会

非常激动；而如果收到的只是一纸再次延长拘留时间的公文，你又会多么失望！训导员给赫尔嘉带来的是通知她出庭的传票，这种格式的公文在远处也能看出来。赫尔嘉匆匆看了一下传票后说：“ 喏，现在来了，要免除我的职务！”她解释说，为了能够开庭审判她，必须先剥夺她的法官身份。她说话时一点也不犹豫，口气非常肯定，倒使我对自己的判断感到有些犹豫不定。我不了解对法官追究刑事责任需要遵守哪些规则，既然她的人民陪审员职务是公众选举产生的，也许他们真的需要通过庭审先免除她的职务。我们在一起商量了好一阵，她该怎么样面对自己的同事们。关于这些人的过失她知道得很多，她向我谈论过他们，她跟他们很熟。她在猜想谁会卖身求荣地出来主持这种可耻的仪式，谁会有意躲避，谁又会对她保持善意的中立。在那命运攸关的一天早晨，我也感到很激动。夜间值班的看守要在起床铃响前半小时叫醒当天去法庭受审的犯人，当值班看守给受审犯人送面包和咖啡的手推车在过道尽头刚一响起时，我们就都醒来了。上帝知道，他们为什么偏偏挑选了这么一辆轮子倾斜的手推车，它那鬼怪般的响声把当天不去出庭受审的犯人也吵醒了。牢房的小窗口开始咔嗒作响，有的姑娘默默数着，想知道今天有多少犯人要受审。手推车的响声渐渐近了，但却没有打开我们牢房的窗口。赫尔嘉一上午都在疯狂地咒骂，他们居然在她缺席的情况下公开免除她的职务！她为他们付出了多少辛劳！别的不说，光是在法庭上消磨掉的时间就不知有多少。庭审应该在十一点举行，我们根据对面楼的窗户铁栅

栏上太阳阴影的移动来推断时间，赫尔嘉还在十一点时为自己的法官职务默哀一分钟。尊敬的读者，骗术可也是一种才干啊！那个女人从来没有演砸过。事实真相其实非常简单，她所在的区法院用传票通知她，有人通过民事诉讼控告她骗走了几万克郎，鉴于她在押，不要求她出庭。

我上面写过，我和赫尔嘉一起演了一出戏。开始的时候，肯定有足足两个月的时间，我们相处的情况还不像是一出戏，我把自己的怀疑埋在心底，我们之间可能的冲突还几乎是隐藏着的。它只是无声地发挥着作用，对赫尔嘉来说它表现为一种精心掩饰的愤恨，因为我不向她屈服，我的言行也和她所预计的完全不一样；对我来说它表现为一种顽强的执著抗争，因为我不愿上她的当。所以，我们暂时不过是在一层一层地堆砌着冲突的理由，爆发不爆发还不能肯定。赫尔嘉是在奋力激化这出戏的情节，没有一天她不为我设一个或大或小的圈套，但我一直很小心，因此，剧情的发展就操在我手中了。冲突爆发不爆发，什么时候爆发，主要取决于我。脑子不够灵活的观众，假设我们的戏还有观众的话，会觉得我们演的这出田园小景——如果在监狱里还谈得上什么田园风光——实在太无聊。我们的关系表面上非常友好。如果其中没有那个暗藏的冲突，我甚至可以说我们的关系正如在监狱环境中应该的那样，是亲密无间的。但愿果真如此！我们相互帮助，生活上不分彼此，在一起聊天，赫尔嘉很风趣，善于交际，我们相互讲一些生活中的趣事，逗得我们有时腰都直不起来。赫尔嘉的笑声很有感染力，我也爱笑，只有海伦娜太

太不知所措，嘿嘿地跟着笑，可怜的她从来就没有弄明白可笑之处究竟在哪里。既然我们同在一处坐牢，让我们至少在一起自寻一些乐趣吧。晚上我们把床紧靠在一起，背对着门坐下，把床单打上些褶子，让看守看不到铺在上面的牌，就这样饶有兴味地玩起来，赫尔嘉肯定玩得特别起劲儿。牌是我用发亮的糖果盒纸做的，样子很可爱，在检查牢房或者出去放风时我们都把它藏在身上。对于赫尔嘉的那副容貌，我也慢慢习惯了。当她的鼻子底下、下巴壳上、肥胖的脖子上长出挺硬的黑色小须毛时，赫尔嘉就躺在海伦娜的床上，像在美容院里那样，让我用两根火柴棍夹住，一根根替她拔掉。每拔一根我都要颤抖一下，她一定会很疼的，但赫尔嘉却挺得住。我还用同样的方式替她修整长得过多的眉毛，护理她那一头柔软的、浓密的、像锦毛犬一样的头发。我用硬纸壳、卫生棉和撕成条的碎布做成发卡，晚上为她把头发卷上，早晨再梳开，这些事赫尔嘉一点儿都不会做。发卡我们也像扑克牌一样细心藏着。赫尔嘉则替我按摩酸疼的腰背，作为对我的回报。外面的人看见我们，无论在过道上、放风时，还是在澡堂子里，都以为我们是好朋友。我们共住一间愉快的牢房，从不惹麻烦，年轻的女训导员有时还在我们这儿停留一小会儿，非正式地交谈几句。看守过道的女狱警还塞给我们几块好一点儿的肥皂，从来不给我们太破的内衣，赫尔嘉请她们吸烟，我则请她们吃糖或水果。有时候我们还打破顺序求女训导员把还没有翻破的书先给我们看。她还照顾我们多洗几次澡，把我们同监狱里负责打扫卫生并因而能享

受各种好处的女犯人一起带到澡堂去。因为我们放风时的模范表现，加上牢房里整齐清洁，看守班甚至提出要给我们奖励，发给我们一份允许从家里多寄一个包裹的特别证明。但后来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证明又被他们收回去了，他们私下告诉赫尔嘉说：“你们那儿有那个作家，她不能受奖。”田园风光是如此和煦，以至于赫尔嘉都没有为包裹的事责怪我，如果这不也是她编造的一个故事的话。从可能发生的戏剧性冲突的角度，也可以说，是我在用田园般的和谐景象欺骗赫尔嘉。赫尔嘉很长时间一直以为我是相信她的，我暗自希望，不要弄到非发生冲突不可的地步。

我们还一起经历了两次强烈的震撼，它们是可以真的使我们亲近的。这是8月的一天，赫尔嘉刚从审讯室回来，看守就带我们去放风。我们俩紧挨着在小笼子里走着，那天恰好轮到我们用一个最小、也最差的笼子。它在水塔下面，紧靠着新楼的墙，笼子里除了带铁栏栅的窗户外什么也看不到。这里水塔遮住天空，风也刮不进来，一年四季不见阳光，是一个铁丝网罩着的、满地都血痰的、令人恶心的水泥窟。我们来前下了点儿雨，水泥地上的水还未干，海伦娜太太穿着硬纸壳衬底的鞋在泥地里摇摇晃晃地走着，我和赫尔嘉走在一条狭窄的干地面上。赫尔嘉在审讯中受到强烈的刺激，一个女友出卖了她，作证指控她，而这是赫尔嘉常常谈起过的惟一的一个女友。她是个技术员，有教养，很能干，家境很不错，据说作为女人也是很令人感兴趣的。可是她却迷恋上了一个异族人，一个

骗她说是匈牙利人实际上却是吉卜赛人的男人。这个女人为了爱情牺牲了一切，先是婚姻，当然连同住宅和全部财产，后来是工作岗位和社会地位。她被吉卜赛人抛弃后开始酗酒，工作单位也不要她了。她孤单单地带着两个孩子，整日为生活奔忙。在那个一地是痰的臭烘烘的天井里，赫尔嘉没有责备那个女人，而是痛心地向我诉说，当女友被丈夫赶出家门时，她如何让她住在自己家里，给她钱，邀请她带着孩子们来吃午饭，在她支持不住的时候还替她照看孩子，给她们喂饭、穿衣服。家里人为此生她的气，警告她说这个女友不可靠，爱打小算盘，但她还是坚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因为友情的价值是非常珍贵的，可能比家庭关系还要珍贵。她把女友的出卖归罪于她酗酒无度：她可能是为了弄钱买酒喝而让人收买了。赫尔嘉说女友指证她事前知道下属要逃亡，这些细节可能是编造的，但此时此刻赫尔嘉说谎已不是主要的了，因为她所感受到的并且向我流露出的那种痛苦，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她很少这样向我流露自己的真实心情，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之间似乎毫无隔阂。水泥地面蒸发出一股臭味儿，铁栅栏后面的窗户上吊着难以辨认的男人躯体，女看守大声吼叫：“滚下来，再不就把你从窗口上揪下来！”旁边的笼子里吉卜赛女人在唱歌。赫尔嘉急切地低声诉说着，有些话我都没有完全听明白。我甚至可以想像，我们有一天也能从她的背叛行为中解脱出来，并且把她狠狠地嘲笑一通。

另一次是监狱中的恐怖使我们紧紧靠在了一起。那是在夜里，我们玩了好长时间的牌，海伦娜太太轻声呼噜

着，我和赫尔嘉睡不着，她悄悄地说着什么—— 我们不想让值班看守听见我们说话。就在这时，听见了一阵响动，许多人压低了嗓门悄悄说着什么，有人在轻轻走动，门外传来了脚步声和穿衣服时发出的响声，显然是我们近处一间大牢房的犯人被赶到过道里来了。这样的事过去发生过，当外面的看守看见窗户之间有“马”在飞来飞去时，会马上来检查牢房。但在这种情况下，看守们会不分白天黑夜高声叫骂，姑娘们也会大声反抗，而这次却全都静悄悄的。我们挤在门边，赫尔嘉把耳朵贴在门缝上。在压低的话音中，在挪动脚步的沙沙声中，在断断续续的响声中，包含着某种不祥的征兆。这时，清楚地传来了一个姑娘的一句话：“这是她奶奶的照片。”她是朝着牢门里说的，看来是在检查她们之中某个人的小柜子。后来，我们在一片混乱的话声中又听出了一句：“她干吗要这么做？”话声被窃窃私语声、轻轻挪动东西的响声所掩盖。过一会儿听见有人拖着什么东西朝过道出口处走去，地板革上发出沙沙声叫人毛骨悚然，听起来像是拖着一具死尸，或者一副瘫软的身体。随着铁栅栏一次次咔嗒咔嗒作响，看守来了，走了，又来了。姑娘们仍然不能回牢房，在过道上来回走动，一个男人轻声说：“这下可闯祸了，刑警肯定要来查。等他们来了，你们再回去。”姑娘们一声不吭，没有丝毫怨言。透过牢门底下的缝隙，不断传来阵阵轻微的响动和听不明白的耳语声，我们觉得那是一种被吓坏了的声音。后来姑娘们回牢房去了。关于这天夜里发生的事，我们再没有听到什么，也许我们为那些响声和话语添

加了不恰当的含义，但是，那一场共同经受的恐怖，那一个突如其来的、很不正常的、像是把什么人在地上拖着走的声音，都牢牢地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中。

我使用了一种在监狱里算是极为平常的方法，获得了有关赫尔嘉的事实真相。在这里，就是最微不足道的犯人也会收到一些公文，它们有这样几种：说明拘押理由的公文，首先是审讯员签发的，然后是检察官签发的，而如果你再次上诉，还会有法院签发的；接下来有检察官和法院签发的关于延长拘留时间的公文，检察官的起诉书，出庭传票，判决书等等，总之，都是些非常可爱的东西。其他犯人往往是根据你是不是隐藏和怎么隐藏你的来往公文，也就是你的案情，来判断你可信赖的程度。只要你让别人看你的文件，还会由此而产生友情，甚至爱情。“为啥来这儿？”这是任何人一见面都有权向你提的问题。你倒不一定非回答不可，你也可以撒个谎，但其后果你必须考虑。你犯的条款就是你的身份证，具体案情你可以捏造，这是普遍认可的，因为说谎是对付法庭的好办法，但你不能把犯的条款朝好的方面更改，这样做会使你信誉扫地。要是谁想败坏你的名声，他会背着你偷偷把你犯的条款往坏的方面改动，女人们最喜欢采用的是诬称某某人杀害了自己的孩子。犯人们对自己的公文抱有一种拜物教似的态度，海伦娜太太虽然每次都把实质性的段落撕下来，扔到便池里，不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但从来不把整份公文扔掉。也许犯人有一种感觉，似乎公文会抬高他的身份，也可能是害怕把它扔掉。缺乏经验的犯人还老是去翻看这些

东西，同它们辩论，好像对他确信是不公正的内容还可以做点什么改动似的。我遇见过一个年纪较大的男人，大家称他“博士”，他带来了一大捆公文，但他既没有被带去接受审讯，也没有上法庭，而是被送到精神病院去了。那些给自己编了许多谎言的人也隐藏自己的公文，但谁要是想看，总会找到机会的。这也不单是出于好奇，在监狱里根本就没有多少值得好奇的东西。如果你同另外一些人身体相连、呼吸相通地生活在一起，他们会觉得有权利了解你，知道你是谁。如果他们翻出你的公文来阅读，这不被认为是粗野无理，而是一种强行保持监狱公平的举动。同时，很少有人会幻想在你的文件中找到关于你和你的案件的真相，翻看你的文件不过是一种手续，一手仪式，就如同一切社会交往都要有手续和仪式一样。

赫尔嘉把她的公文藏在旧信封里，她有一套特别的系统，把公文和私信按顺序穿插着放在一起。有一次，赫尔嘉受审讯时，海伦娜太太被带去看医生，牢房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读了赫尔嘉的公文，同时注意不搞乱它们的顺序。当然，我的行为不是一位夫人所应该做的，后来也遭到赫尔嘉狠狠的一通指责，不过，从其他来源中我也逐渐对她的案情有了更多的了解，尽管我自己并没有费力去打探。最严密的保密，比如犯人对真情的保密，也往往是保而不密，什么也隐藏不住。而我通过了解这些情况得出的主要看法，并不是关于赫尔嘉的，是关于我自己的，我把了解到的有关她的情况咽到肚子里。我知道真相了，但我并没有因此而把赫尔嘉编造的故事同事情的真相进行对

比，尽管这可能是令人激动的。在自由自在的时候，这也许会令我产生兴趣，即便如此，我也顶多做一次，然后就会把它束之高阁。在这里我每时每刻都要面对赫尔嘉的矛盾，可能正因为如此，我不愿去搜寻那些对不上茬儿的地方。我的脑子把它们记载下来，我的感情由于它们而不时受到可怕的打击，但总的说来，受本能的驱使，我对这一切采取了中立和保持距离的态度。我不想在我心里唤起对赫尔嘉的厌恶，或者甚至仇恨。我观察自己时还发现，了解真情反而对我有妨碍，有一段时间我的心理机能甚至要求压制它，要我“忘记”在赫尔嘉的来往公文里看到的东西，把它抛到脑后。为我着想，我要在赫尔嘉面前小心谨慎；为她着想，我只好把她的事交给上帝安排。这样还可以活下去。如果有谁对赫尔嘉所犯的罪过特别感兴趣，那么，她犯了大规模的诈骗罪，星期日报纸的法制专栏有一整版是专门写她的，她的照片还在电视台的《公安机关在搜寻》的定期节目中播放过。她诈骗钱财，数额很大，电视节目播出后很多人声明受骗，这就是那个应要求进行的“官方核查”，正是因为这个核查而延长了对她的法庭调查。

冲突是突然发生的。星期五下午训导员带走了赫尔嘉，她去了肯定有两个小时。训导员带她回来时，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那您就去找医生要包裹吧。”她显然是要告诉我，赫尔嘉这两个个小时是去交涉包裹的事。关于水果包裹的争论是我引发的：既然不能按照监狱管理章程所作的保证在监狱里买水果，监狱领导就应该允许在正常的

每月一个包裹之外再寄一个水果包裹。“水果包裹是一种奖励，要受奖励者才能有。”训导员这样回答我。于是，我就给决定拘留我的总检察院写了一份申诉。他们那里曾几次派人来询问我们对监狱生活有没有意见（何等关怀！），每次我提的意见都是针对拘留本身的，如果同监狱当局发生什么纠葛，我将自行解决，不需要他们帮助。这次我却写了一封信，但被训导员扣了下来，交给了监狱监察长。后来他们承诺每月给我两份寄包裹的证明，我撤回了申诉。因为赫尔嘉也提出像我一样的要求，监狱领导决定，凡是在狱中关押三个月以上的犯人，如果提出申请，可以由监狱医生批准再寄一个水果包裹。这是星期四通知我们的，星期五已经没有什么包裹问题要交涉了。聪明的赫尔嘉也发现训导员的话缺乏可信性，所以她说是受审讯去了。

“星期五下午？”

“真不可思议！”她生气地说。这儿的情况就是这样，连星期五也不让人安宁。

“您的审讯员倒真勤奋。为什么押解员没有来？”

“可能他没时间。”她漫不经心地说。

押解犯人去受审是一项公务，监狱归司法部管，监狱看守要把犯人移交给归内务部管的审讯员。审讯员（来找犯人的律师也一样）必须填写有犯人的准确姓名和出生年月日的申请，押解员把申请记入登记簿（登记簿存放在楼层尽头的审讯室里），移交犯人时审讯员要签字，犯人回牢房时也要登记。总之，犯人在监狱和审讯员以及法庭之

间的往返交接都要记录在案。

“但训导员不负责押解。”

“她只带我到铁栅栏门边。”

要不要再问下去？要是她吞吞吐吐也就罢了，可她却在挑战。“那后来呢？”

如果她说押解员在铁栅栏门外等着，训导员要到对面楼去，顺路替押解员带了一段，这倒还可信。但是，她却莫名其妙地信心十足，竟然信口雌黄：“后来我就自己去了。”

“自己去？”我突然翻身上马——上马去迎战坦克——也不知道这样做是高兴还是不高兴。赫尔嘉如果不犯这个错误，我还会长时间保持沉默。可这个错误太大了，决不能置之不理，如果我不想到最后都一声不吭的话。

“那又怎么样？”她粗暴地说，她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您怎么能穿过铁栅栏门？”

这是一条法则：你不立刻纠正第一个错误，就只能错上加错。“没锁。”她顶了一句。

“铁栅栏门？”要从女牢区到内务部审讯员办公的那层楼去，只能或者乘电梯，或者沿主楼梯走上去，但无论怎么走都必须穿过过道尽头有人把守的三道上锁的铁栅栏。“为了您才不锁？”

“我怎么知道！”

“谁也没有注意？您无人押解一个人在监狱里走？没有一个固定岗哨拦阻？”

“我一个人也没遇到。”

这时候我不能不说了：“赫尔嘉太太，您根本没有去受审讯。”

“去了！”

“监狱里犯人是不许随意走动的。除非您不是犯人，而是别的什么人。”

她气坏了，脸都涨圆了，一句话不说。

“您可别忘了，我们有共同的熟人。您一定很在意，等我们回去后我会说您些什么。”

她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好强压下怒火，做出友善的样子。我们再没有谈起过这件事，也没有机会谈。在以后的整整一个星期里，一场令人震惊的共同经历又使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了。挑起事端的人名叫伊特卡·帕特尔科娃。

帕特尔科娃

幸福的海伦娜太太，带着塞得满满的一包包给养，被押走了。去哪儿她不知道，大概是去奥帕瓦吧，她老了，又有病，不会让她干活儿，而会把她同那些服长期徒刑的暴发户一起关在一所永久性监狱里，会有香烟抽，也会有好咖啡喝。同时送来了一个留短发的姑娘，眼睛里透着哀求的目光，又一个少年犯。这是个患有神经官能症的道德败坏的女孩，但同时又很聪明，居然在有关机构考虑她的问题的时候，机敏地捕捉到了一个能够原谅她堕落的理由：爸爸是个酒鬼。既然爸爸是个酒鬼，女孩就有权堕落，也有权受到关照。她那副低三下四献殷勤、求爱怜的样子简直叫人害怕。她一进门就亲昵地用教名称呼我

们，用甜言蜜语讨好我们，一步一步靠近我们，试探着我们能够容忍的程度，活像一只饿极了的小跳蚤。她神经质地向我们讲述了关于她和一个小伙子的伟大爱情故事，一个还没有编圆的故事。小伙子在萨瓦河边一个疗养院当助理医士，他的一个嫉妒心很强的朋友在当中挑拨，使她和小伙子闹翻了。后来这个朋友为了甩掉她，又以过“寄生生活”的罪名检举她，她是夜里在靠近年轻人住的一些临时房屋的树林里被捕的。我们推断，这个女孩很可能是属于在萨瓦河沿岸一带偷盗别墅的一个团伙的成员。她已被判过一次刑，这是第二次被拘留。她死皮赖脸地纠缠我们，好话说得让人肉麻。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她早已是女牢区里人人都害怕的一个小魔鬼。你在鲁津监狱一提起帕特尔科娃，训导员们会连忙画十字，默念上帝保佑我们，让妖魔鬼怪离开。而训导员在牢房门口刚一说出帕特尔科娃的名字，里面的女囚们就会齐声喊叫：“不，我们不要，训导员太太，求您啦！我们听话，我们一定好好听话！可千万别送到我们这儿来！”帕特尔科娃把争取释放的赌注押在她表演的精神变态上，关于这些变态，她可能含糊地意识到一些，也可能在什么地方读到过或者听说过一些，但她的表演却不含糊，而赫尔嘉就成了她的受害者。

巧合有时也会故意捉弄人，帕特尔科娃恰巧在地窖里遇见了海伦娜太太，海伦娜那身漂亮的衣服引起了她的注意。她忠实地复述了海伦娜对“那个高胸脯吝啬女人”的愤恨，说“她有好多好多香烟，却不给别人吸，对这个女人可要多加小心”。赫尔嘉还在为海伦娜太太没有还她的

债而愤恨不已，现在又听见这些忘恩负义的诽谤，而这却是一个吸人血的小跳蚤转述的。她一来就用贪婪的目光扫视了我们小柜子里所有的一切，而且吃光了我们储备的面包。说我吝啬，那就吝啬好啦，赫尔嘉冷酷地下了狠心。不久后，帕特尔科娃吸完了从过道上的烟灰缸里捡来的烟头，开始要烟了，赫尔嘉却说：“不给。”我惊愕地发现，她居然能够变得这么铁石心肠。帕特尔科娃又是哀求，又是哭闹，又是威胁，她把补助给未成年人的那点可怜的猪油也拿出来，还跪倒在地上，可赫尔嘉连烟头都扔进便池，并且立即冲掉，不让帕特尔科娃捡去吸。不给！她像抽鞭子似的甩出这句话。她心里发生了像上次我叫她从我的床上站起来时的那种内心活动过程。说不给，就不给。从今以后再不考虑这顾忌那，我就是要狠心点儿。帕特尔科娃说，男牢房的惯例是大家都把烟放到一个盒子里，只要有就一起抽。不给！帕特尔科娃说，劳改营里那些有东西不拿出来共同享用的，后来都没有好下场，总是要被其他人揍一顿或者偷个精光。不给！帕特尔科娃向赫尔嘉的母爱之情发起进攻，说她爸爸是个酒鬼，因此，周围的人应该对她，对堕落的帕特尔科娃负起责任。不给！帕特尔科娃还直接向作为母亲的赫尔嘉发起攻击，当时赫尔嘉恰好收到女儿的来信，使她很受感动，帕特尔科娃趁机说：“喏，现在请您想一想，如果现在是您的女儿处在我的位子上，她要命地想得到一枝烟，但谁也不给她。”伴随着那一声“不给”，赫尔嘉喷出了一连串疯狂的恶骂，“你不要在这儿提我的女儿！你怎么敢同我的女儿相比！我女儿

决不会落到这种地方来。”

“可是您在这儿。”狡猾的帕特尔科娃反驳说。

“像你这样的滥货没资格同我女儿比！”

“那我就是滥货啦，嗯？那滥货又是什么意思？”

“滥货就是滥货，不用我给你解释！”

“不就是衣服破破烂烂的穷光蛋嘛，不是吗？那好，您等着瞧，看我怎么对其他人说。他们会为这个滥货找您算账的。您是这儿惟一的贵妇人，嗯？”

那一次我头一回看见赫尔嘉失去了脸上的光彩：“你别威胁我，你这个混蛋，你……你……你……”——等等等等。

在双方的愤怒情绪沸腾起来的时候，又发生了故意捉弄人的巧合，家里给赫尔嘉寄的包裹到了。像往常一样，包裹里有一大堆香烟，尽是些柜台上见不到的劲儿大的斯巴达牌香烟。这一来，帕特尔科娃更是烟瘾大发，全身颤抖。她求我替她说情，“您对她有影响，她听您的。”她讨好地说。我也这么做了，提出一天给她五枝，让她别再闹了，我还答应赫尔嘉下次采购时还她。

“可我只有劲儿大的斯巴达，”赫尔嘉说，“这种烟您弄不到，您无法还我。”

于是，帕特尔科娃就在夜里下手偷了。我们醒来时，满牢房都是烟味儿。赫尔嘉威胁说要揍死她，并且，晚上把香烟从柜子里取出来，放到床上过夜。帕特尔科娃开始像狗一样地嚎叫，吵得赫尔嘉往耳朵里塞了许多棉花。值班看守从小窗口往里望了望，看见是谁在那儿捣蛋后自言

自语地说，噢，又是那个帕特尔科娃，然后就走了。我们只好坐着，不睡觉了，赫尔嘉守护她的香烟，我听嚎叫。帕特尔科娃还挺卖劲儿，一直像狂犬吠月一样叫个不停。

第三天，嚎叫还没有起作用，顶多我们白天睡觉，补回晚上的睡眠。这时候，为了整我们，那个狡猾透顶的姑娘想出了一个可怕的坏招儿。这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坏蛋才想得出的，同时又是很有心计的一招儿，用它不仅可以对我们进行报复，而且，可以显示她的精神失常有多严重。她居然在土耳其式便池边上的一块陶砖上——这块陶砖我们每天至少要擦五次，保证它绝对清洁，星期日我们用纸生上火，在上面烤面包吃——拉了一泡屎，而且用小木棍搅得到处都是。我曾经考虑过，我在鲁津监狱的见闻中哪些写，哪些不写，最后我决定都写出来。人的可悲和卑微是无穷无尽的，同情人的可悲和卑微一般被视为一种高尚情怀，但在鲁津监狱里没有什么值得怜悯的可悲和卑微，那里的一切可悲和卑微都是人所不齿的。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最大的可能是监狱把一切都扭曲了。要是谁觉得我的不文雅的写法太臭，请他跳过这一页吧。

在来牢房时，帕特尔科娃就曾骄傲地宣称，她在被捕时吞下了一枚头发卡子。但她吃饭时，却把肚子里的发卡给忘了。她一定是在萨瓦河畔给饿坏了，吃饭时狼吞虎咽，没个饱。自从和帕特尔科娃同住一间牢房后，我们连那装在十公斤一桶的铁皮罐子里卖的着色的南瓜酱都不扔了，每人每天发的两块变硬的面包——过去我们只吃外面的一层皮——也不退了，相反还要求多给一些，汤也不倒

了。在两顿饭之间的空闲时间里，帕特尔科娃还要摸摸肚子，查看一下发卡在什么地方。可能是在肠子里，而不在胃里，她很内行地作出判断，毕竟是从当助理医士的情人那儿多少学了点儿医学知识。她说吞的是个大发卡，往下咽的时候好长时间一直是张开着的。让我们想像一下，要是我们哪怕是只吞下个小的、合拢着的发卡，会是什么情况呢？由此我们判断，如果卡子是在肠子里，帕特尔科娃早就不在这儿了。我们并不和她争辩，话题一触及肚子里的发卡，她的眼珠子马上就瞪得大大的。

帕特尔科娃在入狱时已通知医生，说她肚子里有个发卡，所以天天等着什么时候带她到潘克拉采监狱医院去透视。上次坐牢时她吞了根别针，结果给她在胃上开了一刀。她还让我们看了那个难看的伤疤，像根香肠一样，监狱里的医生可不娇惯病人，特别是对故意自残的犯人。帕特尔科娃翻搅粪便，说是要找发卡，看看是不是偶然给拉出来了。她一边翻搅一边在厕所里喃喃自语地胡说什么要真是拉出来了，她要拿去给他们看，以便取消透视。因为如果透视时找不到发卡，她必须自己付透视费，而她又没有那么多钱。粪便里的发卡！我真不知道有比这更可怕的噩梦。

牢房里的空气几乎是不流动的。高高地装在靠近屋顶处的窗户半开着，只留了巴掌那么大的一条缝。它所造成的空气流动和小学校长用点燃的蜡烛向我们演示的那种冷空气向下、热空气向上，冷空气往里、热空气往外的循环对流可完全不一样。牢房里大约五米高的空间分成了两

半，夏天外面的空气比朝北的牢房里热一些，透过窗户口进来的新鲜空气在我们的头顶上流动，我们要想吸一口，必须爬到床上去，而在我们身高以内的地方则仍然保持着那种像地窖里的空气似的冷空气；冬天却又相反，我们呼出的和暖气片提供的那点儿热气上升到高高的屋顶，从窗户口流出，而外面的寒流则冲破地窖里的小气候，使它变得更冷。我和赫尔嘉用点燃的火柴做过实验，我们琢磨过这是设计者无心的失误，还是故意的安排，我们几乎同时发现：它是现代建筑中人为修造的古代苦行僧的修行密室。怎么驱散这密室里的恶臭？我和赫尔嘉一起坐在我的床上，床和厕所之间有短短的一块隔板，在共同的威胁面前我们之间所有的隔阂都消失了，我们用擦手的香纸巾捂着鼻子—— 我丈夫作为花露水的代用品送来的，并用眼神商量着：打死她？可是用什么？要不把她的头摁到粪便上？我们还没有商量好，帕特尔科娃已经把她的排泄物冲掉了。

她这样做了三次，每次那股恶臭都像一群马蜂似的悬浮在牢房里，就这样，她狠狠地报复了我们。在点名时我报告了帕特尔科娃的发卡问题，她竖起耳朵听着，希望送她去医院。那个叫小眼镜儿的女训导员却打官腔说，他们是有意把一些年轻姑娘送来和明白事理的女人住在一起的，目的是希望她们引导这些姑娘走正道。

“ 我在这儿是被拘留的，” 我反驳说，“ 我又不是来这儿当保育员的。”

小眼镜儿保证帕特尔科娃会平静下来，上次也是跟一

个明白事理的太太在一起才平静下来的。帕特尔科娃也很有感情地回忆起那位明白事理的太太，不过，唤起她的感情的是那位太太什么东西都同她共享。小眼镜儿又把我们同帕特尔科娃一起锁在牢房里，可赫尔嘉坚决不肯“明白事理”。给还是不给，监狱里一个命运攸关的问题。问题不在于你不给也会给你偷走，因为这不是一个生活琐事问题，而是一个生存理念问题，是一个怎样在如此不体面的环境中保持体面的问题。用体面去保持体面，我这么说，因为对体面用的是加减法，对不体面用的是乘除法，体面和不体面相比，有时候它有力量一笔勾销不体面。任何地方，即便是在监狱里，也会有人因为你的体面而回报你，也会有人加入到体面的一边来。“胡说，”赫尔嘉反驳道，“您回想回想，那个老骗子是怎么回报我的，诽谤！”

后来另一个女训导员把帕特尔科娃带走了，但赫尔嘉还没有因此而摆脱帕特尔科娃。事情是这样的：我那个老熟人莉布什卡就在离我们牢房不远的过道尽头一间牢房里，她发现过道狱警收拾脏盘子的时候没有把牢门上送饭的小窗口关好，她推开小窗口，试图伸手从牢门外面去摸门柄，哎呀，牢门居然没有锁上！她一摁门柄，就走到过道上来了。她扫了一眼，过道上没有人守卫，训导员们也不在办公室里，莉布什尔可以自由自在地一直走到铁栅栏门前，可以在过道上跑跳喊叫，可以用监视镜看别的牢房里的情况，还抓住门柄试试别的牢房是不是也没有锁。赫尔嘉听见我说起过莉布什卡，这下可把她吓坏了。帕特尔科娃就从我们这儿被带到对面一间牢房，她恨死了赫尔

嘉，她现在可有机会了，还会同那个疯疯癫癫的莉布什卡勾结起来。这时候菠芝奇卡已经来了，也是个暴发户，她俩的柜子里整整齐齐码满了香烟。

莉布什卡一开始只是在过道里乱跑，当整个牢区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一些人开始从牢房里向莉布什卡喊叫，要她别犯傻，另一些人则要她把她们的牢门也打开，赫尔嘉把耳朵贴在门边，她发誓说她听见喊得最凶的正是帕特尔科娃。要是莉布什卡把她放出来，她就会带莉布什卡来找赫尔嘉。赫尔嘉眼里露出了无法掩饰和控制的恐惧，她开始和菠芝奇卡一起堵门，把桌子推到门前，上面放上凳子，又把她们两人那两张挂在一起的床也拖到门前。她们的恐惧并不是佯装的，莉布什卡和帕特尔科娃肯定会抢走她们的香烟，还可能狠揍她们一顿。莉布什卡打开了几间牢房，姑娘们出来跑了一阵，然后又回去了，自由竟然如此危险！莉布什卡还到办公室里寻找铁栅栏的钥匙，噢，要是能出去，到楼梯口，再顺着楼梯到院子里，那该多好呀！但钥匙不在办公室里，于是，莉布什卡开始试着挨个儿打开其他牢房的门。我们对面的帕特尔科娃大声吵着要出来，莉布什卡越来越靠近了。此时，赫尔嘉说，“这两个疯子甚至会把我们打死的。”她真是这么想的。但是，对面的帕特尔科娃失望地嚎叫起来，她们那间牢房是锁着的。危险暂时过去了。

“但她可以煽动莉布什卡来找我们。”赫尔嘉说。

她和菠芝奇卡一起搜寻着每一个可能昭示守卫已经来到过道的声响，哦，什么时候才有人来把莉布什卡铐上

啊！“这么粗心大意，”她激动地说，“给他们工资就是要他们在这儿守卫的！监狱里都乱了，真可怕。”

凭良心说，我承认我是同情莉布什卡的，要是她真的闯进来，我会感到高兴。门口的路障其实很可笑，因为门是朝外开的。然而，我们的牢房是锁着的，莉布什卡只是狠狠地在门上敲了一阵，随后“造反”之火很快就熄灭了，她还是害怕被在过道上抓住。莉布什卡享受了一番自由以后，也在训导员回来之前自己把自己关进了牢房。训导员很聪明，她装作所有牢门都是锁好的，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看见啦，”除掉路障后赫尔嘉以教训的口吻说，“这就是您的那个体面。谁不打人，人就打他。”

帕特尔科娃一次次地从一间牢房被带到另一间牢房，到处惹事生非，不是她打别人，就是挨别人打，闹得无法忍受。最后她吞下了一把汤匙的手柄，不得不送她去医院做手术。要是还在老伤疤处动刀的话，新伤疤的样子就简直不敢看了。但即便这样，她也未能证明自己精神失常，又被送回到鲁津监狱，这已是在圣诞节前。回来后，就在当天晚上，她就开始攻击所有同牢房的人。那间牢房就在我们隔壁，叫声、哭声我们都能听见。那边的姑娘们也很厉害，帕特尔科娃挨打了。后来她举起一把凳子，扔向窗户，打碎了玻璃，又掰下一块缠在铁丝网上的玻璃碎片，开始割自己的喉管。同牢房的姑娘中有的叫骂窗户洞里刮进了寒风，有的则因看见流血而惊叫起来。她们拼命敲门，而训导员过了好一阵子才来。当她押着帕特尔科娃经过我们的牢房时，我们听见她说：“你该把脑袋割下来，

这样就都安静了。”帕特尔科娃后来以寄生罪被判了几个月徒刑，整个刑期差不多都是在这种极难对付的胡闹中度过的。可是，她刚刚获释，才走到劳改营营门，门房里又有一道新的拘捕令在等着她。控告她的是那位训导员，帕特尔科娃朝她扔去的凳子打伤了她。这场新的官司是娜金卡在地窖里听帕特尔科娃说的，此时她又回到了鲁津监狱。我不禁要说：上帝保佑我们，让妖魔鬼怪离开。

菠芝奇卡——小市侩

帕特尔科娃走后，领来了菠芝，菠芝奇卡——菠芝。这个女人看上去不起眼，说起话来可真叫人受不了。她年纪不小了，比我还大一些，个子瘦小，给我的印象是属于小学校里常常可以见到的那一类同学，她们不是躲在角落里窃窃私语，耻笑别人，就是跷起瘦腿玩跳房子或者抓石子儿。其实我的印象也并不怎么错，有一次，我们彼此都觉得无聊透了，书也没什么好看的，赫尔嘉连玩牌都没兴趣了，家信早已写好，牢房里又冷得要命，这时候菠芝奇卡在床与床之间的空地上画上格子，我们仨玩起了跳房子，真是好笑极了，特别是跟赫尔嘉。菠芝奇卡活泼得像只银鼠，她的灵巧掩盖了她的年纪和小姑娘般的动作

之间的不协调。她干什么都快，吃饭快，说话也快，她在笼子里不是走动，而是跑跳，上下楼梯也跳，动作像闪电一样灵巧，而最灵巧的是她那双手，那双勤劳的手。菠芝奇卡最喜欢的是按照规定的图案编织挂毯，下班回家，往沙发上一坐，丈夫给她把咖啡煮好，她就一心织她的挂毯，连电视都不看。她的挂毯卖二千五百克郎一条，还卖编织画，卖得最好的是春天的布拉格宫和发情期的野鹿。

在稍许安静一点儿，不老是跳来跳去、爬来爬去、晃来晃去的时候，她喜欢一个人哭一场。她说哭就哭，不需要明显的起因，泪珠像一颗颗珍珠从她短短的浅色睫毛上掉下来。哭泣也不会使她的眼睛发红，而是像一滴滴雨水把它们冲洗得干干净净，哭完她就轻松了。“我得哭哭，”菠芝又露出微笑，一边用手擦眼泪一边说，“马上就觉得好多了，哭哭总比把伤心事藏在心里好，什么心肌梗塞、胃溃疡，还不是那么得的。”

而说说又比哭哭好得多。早晨一睁眼她就开口说，直到睡着了才闭嘴，而她的睡眠却既轻又沉。有时夜里睡好一觉醒来，又一边抽烟一边说呀说，自己对自己说，直到把我们中的一个说醒了，而这样又有了继续说的合法理由。她说话时常常采用内心独白的方式，脑子里正好闪现什么，就都统统说出声来。人们会说，出声的语言要比脑子的思维活动慢得多，思想无言地飞腾，把一个个概念像指路牌一样甩在后面，但菠芝奇卡的脑子还处在人类幼年时的那种甜蜜状态中，还没有思考的负担，只是记录感官的印象。“现在我坐下来洗牌，哟，凳子冰着我的屁股蛋

啦，还真硬，小坏蛋，您可以把您的小垫子借给我吗，谢谢，那我们发几张牌，十三？我老是记不住，两张，两张，两张，四张，四张，四张，我闻到股味儿，好像炒洋葱的味儿，闻闻，闻闻，我闻到菇拉司汤的味道，今天是星期五，是吗，这是晚饭的汤，哼哼，菇拉司汤，您也闻到那股洋葱味儿啦？六张，六张，六张，什么，已经八张啦！我什么时候发的第五张和第六张，给我看看，我来数数，一，二，三，四，五，六，啊哟，您说得对。”如此这般，整天都这样。

菠芝一天到晚走来走去，跳来跳去，说来说去，香烟也一根根吸来吸去，吸烟和走动分不开，有时她刚点燃一根又点一根，把第一根给忘了。反对？求饶？说我们是三个人，牢房又小，如果我们每个人……反对没有意义，也不起作用。想要让她饶了我们，除非把她一棍子打晕。我只有一次制止过她说话，我告诉她从今往后不许再在我面前描绘她的排泄活动。她像个调皮捣蛋的小淘气鬼一样对此津津乐道，我对她说，“够了，鼻子底下都闻到臭味儿了，还说！”

她听后很不高兴，耸了耸肩膀。“这有什么关系？您还挺娇气嘛。我在家里都敞开着门，维纳还帮我，使劲儿，菠芝奇卡，慢慢张开往外压，这样会轻松点儿。”

“可维纳是您丈夫，他爱着您。”甚至赫尔嘉也这么说，尽管她很快就跟菠芝奇卡亲近起来了。

菠芝奇卡对自己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也想不到要给自己编造些什么，只是每谈到一个话题都要补充一些自

己生活中的趣事。而我至今还不敢肯定，什么更糟糕，是描述肉体的排泄，还是描述心灵的排泄。每一种太贴近个人的东西，都是充满污秽的，那上面有汗液和生活中的腐烂物质，有我们的失败和不光彩行为，而人总是沉默着，用自己的唾液洗去污秽。菠芝甚至不知道有人会把她说的一些东西称做污秽。她的生活缺乏连贯性，缺乏自我评价，有的只是对现有一切的记录。她会评价别人，对于自己却只有一个信念：我做的一切都只能是这样，因为不可能有其他的做法。这样她就觉得自己对什么都没有过错，有过错的总是周围环境，或者其他的人。她之所以很自信，认为有关她的一切都可以公开，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不是由于愚蠢。幼稚是非常特别的一种自信，而周围环境造成的这些有自信心的幼稚者却都有一副硬朗的身体，因为他们总是能找出别的一些人来为他们承担责任，自己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在三十七八岁以前，如果我推算得不错的话，也就是说在妇女的最好年华行将到来之前，菠芝奇卡的生活很艰难。幼年时妈妈不太喜欢这个小姑娘，妈妈是个很专横的人，连爸爸对孩子们的爱都要抢夺到自己身上来。孩子有两个，菠芝还有一个弟弟，他们最幸福的时刻不是在家里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候，而是在邻居一家没有孩子的博士夫妇的小洋房里。他们常去那儿玩耍，还经常得到一些好吃的东西和漂亮的礼物。菠芝说，“博士夫妇把我们当做自己的孩子。”有时圣诞节孩子们都到博士夫妇家去过。而妈妈又不是没有时间照料孩子，她在家待着，家务活儿也

不多，据说她更喜欢一个人消磨时间。爸爸倒是很喜爱孩子，尤其是菠芝，但他有点儿怕妈妈，总是处在妈妈的影响下，而且，同妈妈不一样，他很少有时间。他是一家医院解剖室的职工，这可是个好差事，专门整理尸体，把尸体放入棺材，但有时也到医院一些科室去帮忙。论工龄爸爸是医院里除院长外最老的职工，他很看重自己的地位，有时晚上和星期日也待在医院里。他对疾病的了解超过了医院的护士长，对尸体的了解超过了县里的验尸官。有时有的人不想去看医生，往往来找他要药或者求他做些应急处理。他常从医院带回许多有用的东西，大部分是死者的遗物，也有不少是病人或者死者家属给的。爸爸在城里肯定是个受尊敬的人。

父母在小城里有一座带小花园的小楼，楼下三间，楼上两间，但两个孩子长大不久都离家而去，房子没有留住他们。菠芝违背父母的愿望出嫁了，主要是爸爸不同意她嫁给这位新郎，妈妈倒更愿意让菠芝离开。菠芝离家后好多年一直对家里怀恨在心，外公外婆甚至不知道他们已经有了外孙子。菠芝是因为固执而不愿主动同家里联系，妈妈对此表示冷漠，只有爸爸通过他时常提供物质帮助而结识的朋友才找到了菠芝。也许菠芝出嫁并不是出于爱情，那个男人不过是她用以表示桀骜不驯的一个工具。在生活的田野里，面对远处纷纷到来的各种可以选择的轨道，她总是只留意一种，最前面的和最靠近的一种。她不作复杂的考虑，是什么就是什么。她渴望摆脱自己的母亲，可一个姑娘想要独立，除出嫁外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呢？于是，

菠芝见到什么就抓住什么，结果自讨苦吃，给自己招来了很不愉快的生活，而她却不断为此埋怨母亲。

她同男人一起远离家乡到山区去了，那里好像生活刚开始复苏。①

边境地区的德意志族人被迁徙出境了，私营工商业被消灭了。市镇当局给了新婚夫妇一家照相馆，连同洗印间和铺面，远近除了他们再没有别的摄影师。从谋生的角度说，这是个不错的开端。这是革命后一切都按照新鲜的社会主义秩序严格管理的时期，但是菠芝没有让这种形势给弄昏了头，她发现经营是自己生活的主动脉，自己个性的源泉，也是自己眼前的救星。她可能在一切方面都很蠢，但在经营头脑和勤奋工作方面谁也比不上她。如果有一个好一点儿的男人，也许她根本不可能发现自己的才干，而这个男人好酒，懒惰，又爱追别的女人。既然家庭生活从她的手指缝里溜走了，菠芝只好听命运安排，去占有她影响所及的东西—— 照相馆。也许这是母亲的遗传基因，她很看重自己那座小楼，而且积攒了很多鸭绒被、被罩、家用器具、玻璃器皿、瓷器，但也可能是向父亲学的，他靠着死者的家属或者感恩的病人给的许多小礼物，给家里安排了颇不寒酸的生活。只要一有可能，菠芝就把广场上的店铺关上，跑到山里去。她靠身份证照片、婚礼照片、葬

①二战后捷克斯洛伐克迁走了捷德边境地区，主要是曾引起希特勒德国干预并导致慕尼黑协定及后来法西斯德国肢解和占领的苏台地区德意志族居民，从全国各地迁来捷克和斯洛伐克族移民，重建这一地区。

—— 译者

礼照片，还有儿童照片、学生照片，就能完成规定的营业额，在山上照相的收入全归自己。她和一些休养所的管理人员签合同，他们请她去为他们举行的晚会和郊游拍照，而哪一个休养者又不想拥有几张自己在山里游玩时拍的照片呢？她干得很辛苦，整天爬山，参加晚会，常常天黑才回家，有时踏着厚厚的积雪，有时顶着凛烈的寒风。她带着一卷卷胶卷回到山下，当天夜里还要冲洗、加印、上光，以便上午就能再到山上去，趁休养者还没有四散回家前把照片卖给他们。“当我带着洗好的照片到山上去，而人们又都喜欢这些照片时，我真高兴极了。每次卖完后，我真后悔没来得及多洗一些。”

“这凑巧是个好买卖。”赫尔嘉说。

“我很喜欢。”

“您喜欢照相？”

“哪里哟，照相可烦死人了，可怕的细致活儿。我会，但不喜欢。好玩的是那种风险，照片成功不成功，卖得出卖不出，我能不能及时赶到。”

还有经营企业材料的那股聪明劲儿。她用企业材料做私人生意，每个月填写完成计划指标的表格时都要冒一场风险，外出拍照的收入多少计到企业的账上，多少流入自己的腰包，都要计算好。菠芝没有意识到，早在当时，在社会主义信心十足地消灭了所有私营工商业的最初阶段，她已经是另外一个经济圈的开拓者，一个在封闭的国有体制内部越来越需要的、始终压不垮的、越来越繁荣的私营小工商业的开拓者。而且，在山上无疑会比坐在店铺里等

顾客上门要有趣得多，这些顾客来店里也不过是照张身份证上用的照片，或者照张新婚夫妇的双人合影。

那么男人呢？儿子呢？男人已经学会几个星期几个星期地在外面游荡，而好不容易回来时，又和没有出去时一样，总是喝得酩酊大醉，并且还打她。如果没有经营的快乐，日子简直没法过。至于上幼儿园的儿子，她要是很晚还从山上回不来，则由一位女邻居照料。有一次小男孩上山去迎菠芝，结果两人走岔了路，天气又冷，很晚了才在养路工人放工具的小棚子里找着他。小男孩已经睡着了，他没有碰见妈妈，就躲到那儿去了，差点儿没有冻死。“有时我从山上回来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只有灯光，他一个人站在那儿，这么个小人儿，大概是邻居不在家，广场对他来说显得那么大，他很害怕，看见他可怜巴巴的样子我都快要疯了。他的童年生活糟透了，不幸的孩子。”

“您干吗不离开这个男人另找一个家？”

“到哪儿去找？到处都是一个样。反正都得一个人带孩子，反正都得把孩子一个人扔在家里。”

“您非得到山上去拍照？”

“不去还有什么滋味儿？要我坐在家里哭？因为我男人是个醉鬼？同时我还要挣钱呢，为自己也为孩子。”

“您干吗不回父母家呢？”

“决不,回去让他们笑话？”

儿子长大后曾为自己不幸的童年责怪她，她认为这是忘恩负义。她能怎么办？“他应该可怜我，而不是他自己。我拼死拼活地干，我的生活被搞得一塌糊涂。”

“他当时还是个孩子，他没有任何责任，他又没有任何影响力。”

“是我照看他，不是他照看我。他该感谢我，而不是责怪我。他现在该偿还我对他的关怀。”许多母亲认为自己的生活应该由孩子和孩子的利益来决定，菠芝奇卡离这种思想太远了，在她的观念里孩子应该同母亲一道受苦，应该同母亲保持一致，应该从属于母亲。

她还生过一个儿子，但这已是在爸爸患癌症去世以后，妈妈因爸爸去世受了刺激，自己一个人留在那座小楼里，所以把小外孙抱过去了。哥哥罗贝尔特仍然留在菠芝身边，他们住在照相馆后面的那所小房子里。父亲变得越来越狂暴，有一次把窗帘都烧着了，菠芝带着小男孩顺着避雷针的地线管道逃了下来，躲到女邻居家，女邻居打电话叫来了警察。“爸爸，别打死妈妈。”据说罗贝尔特曾这样喊叫，但奇怪的是，他长大后也喝上酒了。男人后来长久消失了，有传闻说他成了一个在各处饭馆里转来转去，央求人们给点儿残酒喝的讨厌鬼。也许菠芝是他与生命相连结的惟一纽带，因为菠芝同他离婚（这时菠芝已经和妈妈和好了）后，他又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喝得烂醉，睡在外面，挨冻，染上肺炎，最后死去。“我该等等再提出离婚，”菠芝说，“再等上那么几个月，我就是寡妇啦。”

以后菠芝奇卡终于遇上了巨大的幸福，巨大的、浓稠的、终身的幸福！他看起来并不惹人注意，是个个子不高的、肚子圆圆的、半个脑袋光秃秃的男人，大约比菠芝大五岁，但很会说笑话，善于交往。她曾在山上给他照过

相，后来在州府一家餐馆里偶然相遇。是他先认出菠芝的，并提起曾和她见过面，两人一起喝了杯咖啡，然后菠芝就忙着赶公共汽车去了。男人在一个不大的乡镇上管理一家饭馆，是到州府来订货的。“这真巧，”菠芝说，“我也是来订货的。”以后的相会就不再是巧合了。菠芝已经快四十了，而在她身上突然绽开的爱情，同时也是她第一次体验到的爱情（如果不算少女时期的迷惘和山上短时间的冒险），却是极为强烈的。它因迄今的感情空虚和情人的百般体贴而倍增，又随着对情欲的了解逐渐增加而扩大。菠芝不会疼爱孩子，在孩子身旁她好像还未成年，而在爱男人方面她的心早已熟透了。她用双手捧着幸福，抓紧它，抓住不放。很少有女人能在男人那里找到自己所渴求的一切激情，总是有的过多，有的又不足。而菠芝却在这个男人身上完完全全地实现了自我。有一种激情她早就熟悉了，那就是卓有成效地卖和买、买和卖，在这个方面她同这个男人可说是心心相印，而且，他除了菠芝的主意和勤劳外还多一样东西，那就是男人的深思熟虑。而另一种激情则是由于这个男人才使她发现的，那就是情欲。

菠芝抛下了照相馆，同自己的爱人一起周游全州各地，像一对自由的鸟儿一样比翼双飞，直到他们双双被捕，而这是好多好多年以后的事了。菠芝是自由人，第一个男人已经死了，小儿子有外婆照看，大儿子在学厨艺，她和情人一起携手并肩，卿卿我我，每人只对自己和彼此相互负责。他们从一家商店到另一家商店，从一家饭馆到另一个饭馆，哪里好就在哪儿经营。菠芝经常根据需要变

更职业，一会儿卖疏菜水果，一会儿管账房，一会儿是饭馆老板娘，一会儿又是旅店老板娘，照看厨房，招待客人，运送菜筐，什么都干。而爱情一直照亮着他们的辛勤生活，那贪婪的、饥渴的、急躁的、体贴的、优雅的、淫荡的爱情。菠芝奇卡终于成了一个完整的人，在店铺里、酒馆里大胆地经营，在私生活里熟悉了当女人的滋味儿。冲破性的冷漠！哪一个女人没有感受过性冷漠者痛苦的空虚和转变为女性时的快感！菠芝在男人的爱中找回了自己的身体。在那些山上，她肯定也曾违犯禁戒，因为她一直是贪恋男人的。有一次她说漏了嘴，说妈妈把她赶出家门是由于嫉恨爸爸，因为菠芝奇卡跟爸爸太亲热了，而博士太太突然一天决定再不允许菠芝去他们家，也是因为她到了“那种年龄”，而博士先生又老是用一种可疑的爱怜目光瞧她。但贪恋是一回事，而给这种贪恋以具体形态又是另一回事。在鲁津监狱时，她已经五十大几了，但是由于她作为女性的性本能觉醒了，总感觉自己不过才二十岁，而她的表现也像个二十岁的女孩。“谁感觉多大，他就有多大。”我曾试着给她画一张素描，她脸上的线条比较简单，我连嘴边和鼻子附近的皱纹也给她勾画出来。她生气地把素描扔在一边说，“我还没那么老！”她不可能老，因为她正被爱着。

“我亲爱的小屁股蛋儿，”她边哭边说，“你在干啥呀！”什么都能使她想起自己的男人。晚饭给我们拿来了一些令人作呕的煮胡萝卜拌面条，我和赫尔嘉都把它倒进便池了，菠芝却喜欢。“每天两顿热饭，我的小屁股蛋儿

在这儿至少可以好好地吃个饱了。”菠芝作为家庭主妇一钱不值，根本不会煮什么好吃的东西，甜饼都不会烤，想给当兵的儿子寄点儿妈妈烤的甜面包去时，就请常来店里买东西的女顾客代做。他们开饭馆时，小屁股蛋儿或者厨师做饭；开商店时就去饭馆吃午饭，晚饭时菠芝买些浓缩汤料回来煮一煮，星期天丈夫会在她还睡觉时开车去餐厅订午饭。菠芝奇卡倒觉得监狱的饭好吃，盘子里所有的东西她都吃得一干二净。他们虽说是暴发户，却连吃的都没有享受多少，等他们从商店来到餐厅时，菜单上常常已经没什么好菜了；他们自己管理饭馆时，又常常因为活儿太多而顾不上吃，或者宁肯把好点儿的菜卖给顾客。在监牢里小屁股蛋儿倒能每天吃上两顿热饭了！我没敢问，小屁股蛋儿这个亲昵的称呼是怎么来的，我想大概是来源于那种永不熄灭的我拍拍你、你拍拍我的欲望吧。我猜小屁股蛋儿还会在店里当着女顾客们的面拍菠芝，喏，夫人们，瞧，我一巴掌刚好握住她的小屁股蛋儿。这时，菠芝奇卡会叽叽叽叽地尖叫，因有人献殷勤而感到骄傲，并且显得更加妩媚动人。

从来到鲁津监狱这座迷宫后的第一天起，她就开始寻找自己的男人。他们是同时被捕的，在县城里曾让他们同在一间牢房里睡了一夜，同乘一辆汽车来布拉格，在鲁津监狱的地窖里还相互从窗户洞里扔香烟，但后来就把他们分开了。他们以为监狱不太大，所以约定维纳放风的时候咳嗽一声，以此作为信号。可是，我们窗户下有上百个犯人在走动，他们的脚后跟踩在地上发出沙沙的响声。如果

我们的计算正确，仅我们这一层楼就有一百四十名女犯，而这样的楼层在鲁津监狱有八个。牢房里又冷得要命，所有人都咳嗽。我们坐在窗下，天井里人语嘈杂，我们尽力在其中寻找每一个稍微明显一点儿的咳嗽声。菠芝奇卡不时地爬上窗户，往外张望，但小屁股蛋儿有可能正在天井的另一面咳嗽，也有可能他看见约定太难实现，因而放弃了。菠芝奇卡一次也没有见到自己的男人，于是就破坏了我们牢房的一项默契，开始在窗口呼喊：“哈罗，我是菠芝，谁在那儿？我的维纳在不在你们哪儿？”倒是有人乐意回应，菠芝奇卡还找到了几个来自他们那座小城的年轻人，虽然此时没有她所爱的那个男人的触摸，但她的女性魅力仍然四处飞溅，迸发而出。

不管同什么样的男人说话，哪怕是同一个男看守，或者同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菠芝都要加进一些轻佻调情的色调。每一次同男人相见，她的举止都在表示，她是个懂得爱情价值的女人。我不禁感到惊愕，她根本不是个漂亮女人，一身瘦骨头，大腿像根棍儿，门牙都没了，嘴巴也塌陷了，头发失去了光泽，一撮撮往下掉，为了少掉些头发，她很少洗头。其实她只是对自己的小屁股蛋儿有吸引力，而她对此竟然没有察觉。“我是菠芝！”她在窗口呼叫着，活像一条诱人的美人鱼。“菠——芝！”一个多情的名字。她学不会手语，为了不老是高声喊叫那些新交上的朋友，她让我们剪下报纸上的字母，把它们拼成字，然后她再往窗上贴。有一次，对面楼七层——从那里看我们的牢房可谓了如指掌——关了六个等待押解到别处去的小伙

子，菠芝也同他们结识上了，还应他们的要求唱了几首歌。晚上灯光亮了，该洗澡了，我和赫尔嘉两人彼此为对方在厕所前撑起一床毯子作为帘布，而菠芝却在明亮处光着身子晃动，她在感受做女人的甜美。迟到的爱情把她身上的性冷漠彻底压下去了，不管是对什么人。

饭馆和旅店是性爱的适宜场所，是浸透着性爱的地方。菠芝和男人一起在一处旅游者常去的地方管理着一个新装修的漂亮饭馆，楼上有几间供情人们使用的小房间，厨房里还有一个患性狂热症的厨师。这是条壮汉，对他来说一天一夜一个女人还不够，但所有女人都爱他，都要把他据为己有。饭店职工不断忙着防止他闹出丑闻，有时候比招待客人还要忙，尤其是当厨师在房间里同一个女人幽会，而另一个女人又快要来了的时候。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厨师关在房里好几个小时了，他还要捂住正在同他做爱的那个女人的嘴巴，而此时另一个女人已经坐在饭馆里等候。这时，小屁股蛋儿做菜，饭馆里人人都忙得四脚朝天。

“那他不妨碍你们吗？”

“聘这么个厨师值得。”

一到晚上，饭馆里的事忙完了，外地的客人已经吃饱喝足回房间去了，酒台前只剩下些本地客人。这时，厨师邀请他们和饭店职工一起去餐厅，为他们各要了一杯酒，接着就要跟他们打赌。“他把他那玩意儿放到桌子上，”菠芝讲述说，“我当时在厨房，我觉得奇怪，他们干吗都凑到一块儿去。小屁股蛋儿朝我喊叫，别到这儿来，菠芝，

别把你吓着。厨师说，谁摸它一下，给一百克郎，谁亲它一下，给五百克郎。”

“您吓着啦？”赫尔嘉问。

“那玩意儿挺粗壮，整个儿发紫，胀得老大，所有人都惊叹它竟有那么长。”

“有人赢了那一百克郎？”

“男人们只是围着看。但有个女招待总要去摸摸，这是个妖艳的女人，三十五岁，活活的一只馋猫，她以前被关过，据说是谋害亲夫，不过没人提这事儿。”

“五百的她也干了？”赫尔嘉想了解。

“那个狡猾的坏蛋，她笑着说除非到她的小房间去。厨师用那玩意儿往桌子上敲打，两只眼睛盯着她，恨不得把她一口吞下去。厨师是个活宝，可他那些把戏增加了饭馆的收入。乡下的老爷子们遇见这些玩笑可以坐到天亮，他们说这可比电视强，他们一直要喝到我们赶他们走才罢休。”

旅游旺季过去后，菠芝把楼上的小房间租给幽会的情人。这地方既僻静又舒适，情人们开车来，女的是出嫁了的，男的是结过婚的，她领他们走后门。有一对是常客，男的是县里的官员，女的是他手下的职员。菠芝让人在门上方钻了个洞，窥视镜正好对准床，全饭馆职工都轮流来看，厨师夸那个官员够得上等级。看的时候要站在一把凳子上，必须注意不让凳子发出响声。菠芝略带反感地描绘看到的性爱场面，她自己没有领略过这类玩意儿，小屁股蛋儿是以应有的体面方式和她做爱的。

“ 您认识那些人 ?”

“ 怎么不，我既认识他的老婆，也认识她的男人。 ”

“ 要是他们知道你们在偷看他们呢？ ”

“ 我很放心，这些事儿谁也不会对他们说。 ”

“ 但是有可能传开去。”

“ 那又怎样 ?”

“ 他们以为在你们这儿安全，并付了钱。 ”

“ 那是房间费。”

“ 也包括保密 ,不是吗 ?”

“ 我干吗不看呢？ ”菠芝大笑起来， ”既然有好看的。 ”

允许她第一次写家信的时候快到了，菠芝一直在犹豫给谁写。妈妈在医院里，不给她写。倒不是担心收到从监狱来的信会把妈妈吓坏了，而是因为信会由护士交给她，她会当着护士的面拆开，医院就会到处传扬他们被捕了。妈妈住院是靠关系进去的，这样一来关系就可能不起作用了，那让妈妈到哪儿去？也不给大儿子写，儿媳妇要是知道公公婆婆在监狱里，就会迫使罗贝尔特到他们住的房子里去偷他们的东西。给正在受军训的小儿子也不能写，一来不知道他的地址，过去所有的信都是维纳写的，二来从监狱给他写信，只会使他在军营里受到伤害。剩下的就只有她热爱的那个小屁股蛋儿了。从监狱到监狱的信，是一件令人非常悲哀的事。一个无可奈何的人向另一个无可奈何的人诉说，而这还要让几道关口的检查员过目。有权看菠芝的信的有：本牢区的训导员、本案的审讯员、菠芝男人所在牢区的训导员。而菠芝信里写的是：“ 我亲爱的小

屁股蛋儿，我真想死你了，我在这儿真寂寞，我想去你那儿，哪怕是牢房，这没关系，我要抓住你那个小东西，摸摸它，想你想得要命，我没法都写出来，我想摸摸你那个小东西，你别以为只是轻轻地摸一两下，我亲爱的小屁股蛋儿呀，你那个小东西也一定想我啦。”这惟一的内容她翻来覆去写了好多遍，直到把四张纸全部写满，然后签上名字：“你的爱你的菠芝。你给我看好了那个小东西，它是我的！”她一边写一边快乐地笑着，自认为最精彩的地方还给我们念了好几遍，最后才把信封上。她感到自己很幽默，会让人无法抗拒地捧腹大笑。

我的责任感往往要大于我的聪明劲儿，所以，我尽可能委婉地说：“但这恐怕……它不会使您的丈夫难看吗？您又不知道他和什么人住在一间牢房里。还有那个审讯员也……,,

她生气了。“您什么都想得太多。老像您这样动脑筋，人们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儿。您要知道您这个样子是挺让人讨厌的。”

信送走后过了一段时间，大约是几道检查所需要的时间，值班看守长，也是男牢区的一个男训导员，因为喝了几瓶啤酒，也因为这个笑话本身而兴奋起来，傍晚的时候在我们这边的过道上，把菠芝那封信里最精彩的地方，大声背诵了好几遍。然而，情欲是万能之神，菠芝奇卡一点儿不觉得不好意思。她笑着说：“喏，怎么样，你们羡慕我吗？”

对菠芝的指控并不复杂，她和丈夫一起因为倒卖走私

货而受到追究，但菠芝老是弄不清案情。其实审讯员在拘留她的理由中已经写明了她倒卖的货物一共值多少克郎，但她老是凑不拢这个数目，要不是多出一件男皮夹克，就是又少了二十个人造棉的花提包，彩色电视机还根本没有算进去。菠芝奇卡倒更想算清楚这个数目会判她多少年，如果查出一万克郎大约判一年的话。她坐在小桌子旁，鼻梁上架着眼镜，但不管她怎么加来减去，数字总是对不上，审讯员举出的数字不是太少，就是太多。“可是，苦难的上帝啊！”赫尔嘉生气了，“您应该知道他们到底查出了些什么呀！”有时觉得问题好像快解决了，可菠芝又突然提出还忘记了人造绢花。然而，她毕竟是女王，是特洛伊的海伦娜，是埃及的克莱奥帕特拉，到最后总是把文件往柜子里一放，而把伤脑筋的事留给丈夫。她相信丈夫总有办法说服县里那些或多或少欠他情的头头们，而他们会帮助她丈夫和她出狱的。这可激怒了赫尔嘉，她既要当女人又要当男人，家里一切都听她的，菠芝奇卡这种女性的轻浮使她很生气。“法庭上您丈夫可不能代替您招供，您必须事前把一切都想好。”

审讯结案的日子到了，菠芝奇卡被带去看结案材料，包括丈夫的供词，她自己的供词和证人的证词。赫尔嘉一上午都被一种虚荣心缠住，总想在菠芝回来前弄清楚彩电和皮夹克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她怎么也算不出个眉目来，就把审讯员给骂了一顿，说他弄了一笔糊涂账。午饭后菠芝奇卡踏着舞步进了牢房，她蹦蹦跳跳地像一只快乐的白色母山羊，脸红红的，显得非常兴奋。“我看见他了！”一

进门就喊道。

“谁？”

“维纳，我最宝贵的小屁股蛋儿。”

“这是意料之中的，”赫尔嘉说，“会让你们一起看材料的。那么，怎么样呢？夹克的事怎么样啦？这是最大的一项，如果不考虑电视的话，反正他们也不会因为电视机指控你们……”

“我一见到他，就扑到他身上！”菠芝奇卡焕发着幸福的光彩，发灰的皮肤显出了玫瑰色，脸上欢乐的表情使她变得漂亮了。

“谁身上？”

“我到的时候，他坐在桌旁，我喊了一声，就从门边向他扑了过去，可怜的人，”菠芝奇卡拭去了蓝宝石般的泪珠，“他也穿一身运动衣，而且是破的，膝盖都露出来了。他们的训导员可凶了，动不动就打人，谁要说点儿什么，立刻就挨打。他们的牢房在楼的那一面，不是朝天井这边，在一层，对着窗口就是岗哨，哨兵老是盯住他们，屁都不放一个。他显得瘦多了。”

“你们能在一起商量吗？”赫尔嘉问。

“他病了，感冒发烧。他是新来的，没有空床给他了，他在靠门边的地上放了一张床垫，在上面睡了一夜，风也吹了他一夜。医生给他开了阿司匹林，训导员给他拿来的时候，那儿牢房里有个下流的吉卜赛人，老把他那个工具从裤子里掏出来，让人看他在这儿被关着有多么可怜，他从维纳手里夺走了阿司匹林，说他也要补补，不能光给白

人，就连纸包一起吞下去了。训导员不愿再给他去拿，说他应该看好自己的东西。结果小屁股蛋儿的病也没好好治，他真可怜。”

“审讯员也在场？”

“审讯员坐在另一张桌子旁，看什么材料来着。”菠芝奇卡一蹦一跳地绕着牢房走了一圈。“我一屁股坐在了我的小屁股蛋儿怀里，一点儿也不觉得害臊。”她按捺不住满心的喜悦，搂着我的肩膀说：“我就这么摸他，这么拥抱他，这么抚爱他……”

“审讯员让你们一起交谈了吗？”

“我说了，他在看什么材料。我把我的小屁股蛋儿狠狠地亲了一阵。”

“听我说，菠芝奇卡太太”，赫尔嘉终于怀疑到正确的地方了，“您在那儿究竟都干些什么了？”

“我坐在他怀里，紧紧地搂住他。”

“您至少看了看那个检举您的女人的证词吧？”

“我什么都没看，”克莱奥帕特拉王后和神女海伦娜说，“我幸福极了，他就在我身旁。”

“那您的丈夫，他至少看了点什么吧？”

“我没让他多看什么。他越过我的肩膀看了点儿材料，但没看多少。”

“你们不是商量好了？”

“没时间顾这个。我把我的小屁股蛋儿捧在手上！那个审讯员碰巧还是个多情种，他看到正在发生什么，就走开了，让我们单独在一起。”

“啊，您这倒做得很聪明，”赫尔嘉仍然顺着自己固定的思路往下去，“然后你们就把一切都商量好了，是吗？如果您丈夫在法庭上说起那些皮夹克……”

“没时间谈这些。”菠芝充满幸福地说。

“那你们那么长时间都干什么啦！”赫尔嘉生气地从凳子上站了起来，她的神色那样威严，完全是一副瞧不起人的架势。

那个并不诱人的女人仍然带着梦幻般的微笑说：“要说时间那么长，倒也不是，要说短，我也不能那么说。”她微微前倾着坐在我旁边，瘦小的膝盖紧贴在身上，双手紧握着挤在怀里。

“这您能够理解吗？”赫尔嘉又惊讶又反感地说，“审讯员给他们机会好好商量一下,而她却只顾着去搂搂抱抱！”

“哪能只是搂搂抱抱？”那个丑陋的、被爱着的女人说。

“这您能够理解！”毫无办法的保护人重复说。

他们是理想的一对。开始时什么都没有，作为共同经营的头一站，他们接过了一个谁都不想要的偏僻乡村饭馆，那里只有几个老汉晚上来喝杯啤酒，拖拉机手停下来吃点儿灌肠加洋葱。饭馆所在的房子很古老，菠芝还在阁楼上找到一套很早以前乡村爱国志士演木偶戏用过的木偶①，

①捷克民族曾受德意志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近三百年，民族语言文化几乎消亡，一些爱国志士通过用捷克语演木偶戏等形式传播捷克文化，在捷克民族复兴中起过重大的历史作用。——译者

都是些古色古香的一米来高的大木偶。她拿走了一个手持镰刀的死神，有朝一日，等她有了自己的房子时，她要在里面装一个吧台，把死神放在饮料柜里，谁要去打开柜门倒酒，就会看到一副照得明晃晃的骷髅。饭馆带给他们的利润极少，但营业额有了提高，他们的勤劳出了名。后来就给他们换了个好一些的地方。在私营小工商业刚刚复苏的那些年里，维纳曾有过许许多多极为出色的主意，但后来环境又变了，开始管得紧了，他们只好离开餐饮业，管起了一家新开的大型自动售货商店。这个企业表面上很红火，实际上不赢利，偷盗现象无法防止，损失太大。后来他们又搞起了饭馆，就是那个在旅游景点附近的、厨师患性狂热症的饭馆。这下可好了，旅游者来的很多，还常有人到这儿来举办婚宴。菠芝讲述说，有一次维纳搞错了一场婚宴的时间，早晨他们还在睡觉，职工们都放假回家了，突然来了许多参加婚宴的客人。肉也没有准备，糕点也没有烤制，连餐桌布都还没有从洗衣店运回来。一开始他们还想遮遮掩掩，推脱责任，后来维纳承认了错误，于是好心肠的妈妈们、婶婶们一齐涌进厨房，爸爸们、叔叔伯伯们则忙着去斟烧酒、倒啤酒。多亏维纳的殷勤微笑，最后这场婚宴办得很热闹，充满了家庭宴请的欢乐气氛。他们财运的顶峰是在出城公路旁新办的一间汽车旅馆，这时候菠芝已经有了足够的钱，可以考虑兴建自己的房屋、安排自己的家园。这里少不了又要置办那些家传的各种东西：床单，被子，被套，家用什物，餐具，玻璃器皿，瓷器，台布，地板革，镜子，各式地毯（她还向我们介绍过

一种诀窍，怎么去购买这些主妇非常喜爱的东西，说最好挑选那些没有厂家商标的产品，可我羞愧地发现我后来居然把它忘了），而这又需要钱，好多好多钱。不过，从带给人们的欢乐来说这些东西本身还是次要的，主要的欢乐在于要善于巧妙地去购买它们。关于这个问题，菠芝为我们上了好多个小时的课。

人们不应靠低级的盗窃活动发财，这点请不要搞错了，低级的盗窃很快就会被发现。问题在于既要发财，同时还不损害好的名声。这就需要会做买卖！在他们的饭馆里顾客吃得很好，在他们的铺子里可以买到优质好货。上一次他们得到一间新开的疏菜商店，店里运来西红柿时，菠芝要一个一个地挑，把烂的扔掉，好的先用抹布擦干净再放上柜台。利润从哪儿来呢？饭馆主要挣培训班的钱，挣婚宴的钱，挣旅游团组的钱。大轿车在汽车旅馆门前一停，五十个人在预订的餐厅里各要一份炸猪排，您说会消费掉多少猪肉？而一辆大轿车刚吃饱，下一辆又来了。菠芝要客人们一吃饱就离座，好给后来的客人腾位子。这样做可忙了，可累了，无论是在厨房里还是在餐厅里，都一样，但挣的钱不少。蔬菜店则主要靠学校、幼儿园、医院的大批订货挣钱，货物是二等质量，供货单上却写的头等质量，商店经理当然按二等品价格上缴利润。病人或者孩子们并不会因此而吃多少亏，他们反正也搞不到更好的蔬菜，吃亏的是国家，它一只手供应蔬菜，另一只手又为这些蔬菜付钱。当然需要抹油！汽车司机、押运工人、仓库管理员，还有检查员，都要让他们有油水好捞。菠芝有数

不清的办法对付各种检查人员，商店经理还把这些经验作为经营机密相互传授。司机和押运员不好骗，他们是流通领域的老爷，你要是不给司机油水，他们就把顾客需要的好货运往别处。对付这些运货大卡车的司机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只能或者给他们钱，或者在货物的重量和品种都不符合实际的供货单上签字。你还不能多问，这是规矩，以信任对信任。也正是为此，维纳给企业经理部送去了一台走私进来的彩色电视机，菠芝则给会计室的姑娘们送了咖啡。

当你用这种办法获得了能人的名声后，你的周围就会聚集起其他一些能人。有时候做买卖的能人也会出点儿纰漏，被关进监狱，这就是经营的风险。凡是市场上搞不到而人们又需要的东西，都可以从中赚到钱。农村养猪养鸡，饲料粮很难买到，善经营的农业合作社员会同供销社经理私下协议，把谷物摆到供销社柜台上，谷物不一定是偷来的，有可能是他自己的，或者别人自留地上种的，收款不入账，利润三方平分。我还知道怎么做调味汁，尽管加过三次水还老是显得很稠，怎么加热放了三天的熟土豆，让它吃起来像新鲜的一样，怎么给猎人牌烧酒搀茶水，怎么往葡萄酒里兑白水。菠芝还讲过这样一个故事，饭馆接连换了几任经理，每任经理都要清点并接收仓库。仓库尽头有个货架上面整整齐齐放着满是灰尘的瓶装猎人牌烧酒，接收时都只是清点一下瓶数，登记在册，谁也没有想到开几瓶去卖，而更愿意卖新运来的，因为谁都懒得去清扫那上面的灰尘。最后来了一个好挑毛病的检查员，

他开了一瓶粘满灰尘的猎人牌烧酒，结果喝的是茶。最能赚钱的是从零售店买进酒精饮料，再按饭馆的加价卖出，这是每个小孩都知道的事。商店里有条原则，这种事必须由经理单独和维纳两个人亲自办，不能有第三人在场，连清洁女工也不例外，否则人多眼杂，他们俩虽然累得够呛，却还可以换来个勤劳的好名声，也挺合算。饭馆则相反，必须抱成团，要是抱不成团，最好把所有职工全辞掉，另换一拨儿。还有一条，一个地方最好只待三年，顶多四年，太长了各种关系和活动就会变得太显眼。

菠芝奇卡给我们讲的课，展示了一个消费类型的人并不宽广的个人利益范围，以及社会主义的贫穷对这类人的扭曲。如果你想获得什么东西，就必须以你所拥有的别的什么东西去交换。当菠芝的商店收到一些抢手的好桃子时，她会挑出几箱最好的，把它们藏起来，以便拿到对面铺子去换回好猪肉，再到拐角一家店铺去换他们那儿刚到的长筒皮靴，再用长筒皮靴去为一个邻居换一套瓷器，而她又……如此这般，环环相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令人信服地描绘了这样一个道理：社会关系的水平直接与交换的水平相适应。在一个因物资短缺和社会关系、社会生产落后而被折磨得苦不堪言的社会里，交换自然会退回到实物形态。在捷克斯洛伐克市场上，消费者四处寻觅使用价值的惨状就像一则童话里讲的一样：公鸡快要渴死了，母鸡为它去找水喝，水井可以给母鸡水，但先要人把水井清洗干净；人可以清洗水井，但先要猪给他鬃毛；猪可以给他鬃毛，但先要奶牛给它奶；奶牛可以给它奶，

但……母鸡一面奔跑一面哭诉说，公鸡躺在那边笼子里，两只脚在空中乱踢，它真怕公鸡快要死去。童话中的公鸡没有渴死，但纺织商店的经理却把菠芝奇卡和维纳给告发了，原因是万圣节前没有给她送去波兰的人造绢花。

于是乎，一种激情起来反抗另一种激情，菠芝奇卡的生活被掰成了两半；她获得了一份够几年用的财产，而正好在她还有兴致装成二十岁的女人好好玩玩的这几年中，她又将失去自己的男人。财产呢？毯子、被套、鸭绒被，她经营饭馆积攒下来的整个一大堆家当都好好地收藏着，但是，她听男人说，在搜查时他们家被翻得乱七八糟，没有来得及清理，要不及时回去，老鼠又会把整个家当给毁了。她特别担心的是钱，好大一个数目的钱，她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少。“维纳不相信储蓄所，他不想让人知道他有多少钱，全部现金都放在身边。倒也不是全部，有些埋在花园里了。”

“您知道埋的地方？”

“不知道，这些事我不问。但是，拘捕他的时候他身上有一包五百一张的钞票，你们说会不会给没收了？”

“你可以说是卖房子的钱。”

“要是他能想得到就好了。”

“他是个有头脑的男人。”

“卖房子也没有得到这么多钱，我们还买了另外一幢。”

“他又不会把这写在脑门儿上。”赫尔嘉安慰她。

是的，房子。现在我们就来清理围绕着这些房子的一

团乱麻。

菠芝奇卡和维纳这两只自由自在的小鸟，突然想起要有个自己的安身之处，而不是老在别人的屋檐下栖息。他们买下了一位老奶奶的农舍，用作他们乡村住宅。菠芝奇卡给我们画出了它的平面图，的确是一个幽静舒适的去处。他们还果真造了一个装有那位死神的吧台。但是，乡村住宅之美在于它是乡村住宅，而菠芝奇卡还是希望有一幢自己的小楼房。妈妈有一幢小楼，她和菠芝奇卡的小儿子住楼下，楼上住的是菠芝奇卡的大儿子和他的第二个老婆。菠芝于是决定把妈妈的小楼卖了，用卖来的钱再去买一幢更好些的。菠芝和维纳同他们商量，给大儿子在奶奶住的这座城里买一套住宅，但儿媳妇不答应，她不想要单元住宅，而要继续住在自家的小楼里。争议拖而不决，菠芝奇卡从心眼里恨死了这个儿媳妇。于是，房子的故事又同家庭的故事纠缠在一起了。

大儿子罗贝尔特第一次同一个波兰姑娘结婚，并且生了个儿子，后因感情不和把她遗弃，波兰姑娘一个人回到波兰，儿子也没有让她带走。罗贝尔特受不了孤单，开始喝酒。菠芝奇卡倒很喜欢这个波兰儿媳，她为人善良，生活节俭，知恩图报。起初维纳雇用罗贝尔特到汽车旅馆当第二厨师，当时他们都住在一起。但罗贝尔特成天喝得烂醉，工作上又靠不住，后来把他辞退了，他带着小鲁道夫搬到奶奶那儿住了。

“他在面包房干活，把小鲁道夫一个人留在家里，常常吃不饱，老是生病。奶奶年纪大了，自己照料自己都困

难，顾不上小孩。”

“可您才是奶奶呀！”

“我们给小鲁道夫交涉到了一个好幼儿园的位子，好的幼儿园可不容易进啊！没有熟人根本办不到。可他却不让孩子去，说是宁肯让他饿死，也不让他跟外人一起生活。还说早知如此，还不如让那个波兰女人带走。”

“您自己不能……”

“您知道什么是汽车旅馆吗？谁也想像不到那儿有多少麻烦事。”

“您可以请个人来看孩子嘛……”

“干吗我请？我已经给他出了好主意！可他根本不听我的！”

“罗贝尔特在一次舞会上认识了他的第二个老婆，不久后她说怀孕了，于是两人就结婚了。

“那个小女娃不是他的，一看就知道！一对小斜眼，两岁了还不知道夜里起来撒尿。我警告过罗贝尔特，要他别跟那个女的睡，他老是喝得醉醺醺的，让她给瞄上了。我们询问过她，她老跟当兵的一起混。”

罗贝尔特的第二个老婆既要照看自己的女儿，也要照看小鲁道夫。

“去看他们的时候，我给小鲁道夫带了块巧克力，她马上拿过去掰成两半，她的那个小女孩后来把小鲁道夫的一半也抢去吃了。小鲁道夫老是听她说你是老大，你是老大。他总是受那个小杂种的欺负。”

“您只给小鲁道夫带礼物？”

“那个小女孩不是罗贝尔特的。”

菠芝奇卡找到了愿意按优惠条件交换妈妈那幢小楼的房主，那是一对年轻夫妇，她们在城外有一幢小楼房，但想搬到城里来住，菠芝奇卡还要贴给他们一些钱。本来菠芝的弟弟在妈妈死后应拥有小楼的部分产权，但菠芝巧妙地抹去了他的权利，她和妈妈签一纸赠予契约，房子归她，她保证妈妈死前由她照料。契约经公证后，她通过关系为中风的妈妈在医院里安排了床位，就把房子卖了。她同新房主商量好，一楼再让罗贝尔特一家住一年，然后他们就不得不接受儿媳妇拒绝过的单元住宅。

对于新换来的那幢 小楼，菠芝奇卡早有许多打算。朝公路的那一面装修普通一点儿，以免招人嫉妒，里面则要装修成自己的小天堂。院子里准备建一座暖房，这样一年四季都有蔬菜卖。工具房的屋顶改建成一个平台和一座冬季花房，夏天菠芝奇卡可以光着身子在平台上做日光浴。院子外面准备搭建一间小屋，给妈妈用。

双方商定在新主人迁来那一天，菠芝和维纳开车去，在原来妈妈的小楼里当面交钥匙。那天商店里恰好有件急事，他们走不了啦，但他们并没有多动脑筋，反正原来妈妈住的一楼早已腾出来了，新主人的东西有地方放，楼里还有儿媳妇在，会给他们开门。可是，当他们第二天去取他们未来天堂的钥匙时，钥匙已经不在了，罗贝尔特和儿媳妇也不在了。妈妈房子的新主人认为他们母子不是外人，没有区别，就把钥匙给了罗贝尔特，结果，菠芝的新楼房就被儿媳妇抢占了，她雇下了那辆把新主人迁来的搬

运车，装上一些最必需的物品，主要是床和窗帘，就搬过去了。

“那个混蛋！那个禽兽！您料想得到会有这么无耻的人吗？她搬过去了，好像那幢楼房是给她预备的。而且，她马上挂上窗帘，找来了装修工人，还跑到警察局去申报。”

“您就这么算了不成？”赫尔嘉说。

“维纳不喜欢争吵，她老是在上个什么培训班，维纳有点儿怕她。她还到处扬言，说我们已经有一处房屋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我们被关押前一个星期。妈妈还不知道房子已经卖了，我们不想惊扰她。”菠芝还向训导员借了一本刑法汇编，想找找可以根据哪一条控告儿子非法闯入别人的房屋。

“您想跟自己的儿子打官司？”

“他是个笨蛋，什么都依她的。”菠芝的生活像个纱锭，总是要围着一个她憎恨的人转。最初是妈妈，后来是第一个丈夫，现在是儿媳。“她有自己的洗衣机，却用妈妈的那台洗衣服，自己的省着不用。我给妈妈搬家时，到阁楼去找备用鸭绒被，都不见了。妈妈有好些瓷器也不见了。”

“可是……罗贝尔特是您的儿子，您把他的家给卖了。”

“这是我的家，我有公证人的证明。给他的住宅也不是不花钱白得的。我一直在给，只要我愿意今后还会给，

他只要乐意接受就行。如果他还嫌少，让他自己努力去挣。”

所以，菠芝身在监狱，外面却没有谁可以写信，也没有谁可以用她寄去的包裹证明给她寄包裹来。我曾主动让她把包裹证明寄到我家里去，多寄个包裹还不至于要了我丈夫的命，但她怀疑我耍什么花招，没有接受。当她和自己的小屁股蛋儿调情的时候，还是在材料里读到一份证词，儿媳的证词。那个可爱的年轻女人推断她婆婆是个小偷，作为证明她把一件从波兰私带进来的夹克衫送到了警察局，而这是菠芝送给罗贝尔特的圣诞礼物。“我不愿家里有偷来的东西。”记录里记下了这位有觉悟的培训班毕业生的话。

“她不愿在偷来的家里有一件我花好几百克郎偷来的夹克衫。”菠芝奇卡带着苦涩的幽默说。

她最幸福的时光是像小鸟一样在州里各地游荡中度过的。菠芝奇卡不会理财，也不习惯过有钱人的生活。“我什么都没有享受过，只知道干活儿，干活儿。”维纳给她买了好多好东西，她从来不穿不戴。她有好几个柜子放满了各种衣服，她有五件呢大衣，两件裘皮大衣，那么多裙子、短衫、毛衣！她把它们整齐地放在透明塑料衣袋里，有时还带着商店提供的衣架。菠芝夏天穿件短衫，冬天穿件夹克，此外有两条裤子、三件衬衣用来换洗，在商店工作时外面罩一件工作服。有一次维纳向经过他们城市的波兰游客——他们到处买食品——买了一条漂亮的银狐领给她，一转手她又高价给卖了。卖了买，买了卖，这简直成

了瘾，成了病。我们从监狱食堂订购的东西一送来，菠芝马上开始把她选购的东西拿来和我们交换。从不间断的商业游戏！也许只要看看没有开包的物品，对她就是一种精神安慰。有一次我和赫尔嘉订购了好多火腿肠，每人整整一公斤，因为赫尔嘉说过要多吃肉才有力气。后来原先通告的火腿肠没有了，给我们按相等的价钱送来了多一倍的马肉肠。多吃肉才有力气，赫尔嘉强迫自己吃，我却不行。我把它送给一个打扫过道的男犯，他曾来为我们换过灯泡，也送给一些打扫过道的女犯，可还有整整一长条挂在窗口，后来我把它给了菠芝。菠芝尽管很爱吃马肉，还拿了一些赫尔嘉的马肉肠放在燃烧的纸片上烤了吃，但自己的这一条却保留着，挂在那里欣赏它的完好无缺，直到发现火腿肠里面长绿霉了才扔掉。思想家们现在有一种时髦，喜欢把拥有和存在两个概念尖锐对立起来，我一想起菠芝奇卡就不觉得这两种人生态度仅仅是相互对立的。菠芝奇卡并不因为拥有而能享有，她既不善于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中享有快活，也不善于从馈赠所拥有的东西中享有乐趣，而这正是她的存在的一个错误。我要悲伤地说，菠芝奇卡不会生活。

把她从监狱里救出去的，还是她最宝贵的小屁股蛋儿，维纳。他在结案前的最后一次供词中说，菠芝对他们被指控的一切事情毫无所知，从而把一切罪责全揽到他自己头上。菠芝奇卡说，他大概花钱买通了什么人，不然的话他是不会下决心舍弃他那辆非常棒的客货两用车的。但他并没有能够使自己摆脱牢狱之灾，因为他已经由于财务

方面的某些非法勾当被判过刑，这次恐怕又要坐几年牢了。于是，训导员又来说“收拾你的东西”了，菠芝奇卡欣喜若狂，欢跳得快要碰到屋顶了。“回家了，我回家去了！”

这时候黛妮萨已经到我们这间牢房来了，她悄悄对我说：“您瞧见啦！她对男人连想都不想，只要她自己出去就行了。”

“到家会想起他的。”

“她？”黛妮萨说，“她可能是赶紧去刨花园，寻找维纳埋的宝藏。”

对菠芝奇卡来说，监狱似乎已经不存在了。她还在里面待着，但已经把它忘记了。她忘记得如此彻底，以至于根本没有意识到把自己的男人留在这儿了。她也谈起过他，只不过是说她现在一个人在布拉格可要抓瞎了。怎么回家去？怎么回到他们那座小城去？她连怎么乘长途公共汽车都不会。多年来，一直是维纳开车接送她，她连怎么买公共汽车票都不知道。家里的钥匙也没有，在维纳那儿，要从维纳的东西里找出钥匙来给她，她该在释放科办公室里向谁提出这件事呢？

她向我借了一个塑料提包，好装自己的香烟。这天夜里她还要在地窖里睡一觉，她问训导员：“这些烟够吗？”她还有差不多三条烟，一条二百支。进来时，她在接收科幸运地领到一条干净毯子，又厚又暖和，冬天快要来了，黛妮萨领的是一条又脏又薄的毯子。有一个习惯，从监狱回家去的，或者被送到押解科去的，都要把他们最好的东

西留在牢房里，而把别人的差一些的东西带走。

“您不同黛妮萨换换毯子？”我说。

“这个我不换，”她干脆地说，“我还要在地窖睡一夜，既然我有干净的，干吗要用脏的？”

“您可以用自己的床单蒙着睡。”

“她不是也可以用自己的床单蒙着睡？”

晚饭时训导员问：“她真的连一盒烟也没有给你们？”

“她？”黛妮萨轻蔑地说，“那个市侩？”

这一个字就使我懂得了菠芝奇卡，从而解除了我的困惑。

“明摆着是个小市侩，”她说，“我真不明白，您为什么会因为不喜欢她而感到内疚？”

赫尔嘉（第二回）

不管赫尔嘉高兴还是不高兴，事实是菠芝的到来对赫尔嘉没有产生好的影响。当然，这是我的看法，赫尔嘉可能会有别的说法。眼看着一个被囚禁者一步一步转变成一个典型的罪犯，是很令人痛心的。照我的看法，被囚禁者拒绝不自由，抗拒囚禁，而罪犯接受不自由，适应囚禁，这大概就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被囚禁者的区别所在。菠芝奇卡是第一个使赫尔嘉开始改变对囚禁生活的厌恶情绪的人，而这种情绪正是我和赫尔嘉此前一直共同抱有并且不断增强的。在“菠芝奇卡之前”的时期——在度日如年的监狱生活中，几个月对于被囚禁者也可以说是整整一个时代——赫尔嘉力求装出一副有教养的形象。她是

带着关于人的尊严的明确观念进来的，很注重人的教养程度，自认为是有很高教养的人。其实高级诈骗不仅是一种才干，不仅需要有能够操纵别人、强制别人、利用别人的毅力，也需要了解各行各业，熟悉各种环境，需要有独特的风度、吸引力、诱惑力，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教养。这是诈骗能够取得成功的前提，粗俗的骗子是没人相信的。赫尔嘉正是想用她的教养来欺骗我，争取我，但同时又拼命要保持住这种有教养的形象，这对她也非常重要，这是连接自由的纽带，通向文明的桥梁，也是她回到女儿、爸爸和弟弟身边去的一条通道。只要她和我一起谈论卡赞札基斯①，她就会觉得自己摆脱了监狱里的粗野和肮脏。如果她和我一起争着阅读施蒂弗特②（我们从监狱图书馆借来了他的小说《晚来的夏日》，说不出它有多枯燥乏味），她的一只脚就仍然在自己的女儿，一个漂亮的、很有志向的姑娘身边。甚至就是那本枯燥乏味的书，也会使她超越粗俗，有朝一日她会说："在我和埃娃太太一起读施蒂弗特的书的时候，你们猜猜，是谁把它读完了？你们准猜不着，是我！埃娃太太中途放弃了。"

但是，和菠芝奇卡之间能够谈到一块儿去的，却正是赫尔嘉身上最粗俗的东西。她们夜里一起低声交谈，赫尔

① 尼柯斯·卡赞札基斯（1885～1957），希腊作家、哲学家，作品范围广泛，代表作有《奥德修续纪》（荷马史诗的续篇），以及小说《米海利斯上尉》、《再次受难的基督》等。——译者

② 阿达贝尔特·施蒂弗特（1805～1868），奥地利小说家，《晚来的夏日》是他的成名之作。——译者

嘉把她不能或者羞于在我面前说的事情都告诉了菠芝奇卡，特别是，她们还争着诉说了各自参加的狄俄尼索斯①式狂欢的情景。她们之间的差别在于，菠芝奇卡在这种场合满足于当客人，而赫尔嘉却一定要当演员。赫尔嘉向我描述他们如何饮酒作乐时，最多是说有一次在布拉格城外一家葡萄酒馆里，大家都喝得酩酊大醉，快乐已极；她乘出租车回家，下去时才发现自己只穿了一件衬裙，当时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就这样回家了。她向菠芝奇卡讲的就更多了，那天夜里她还曾脱光了衣服在桌子上跳舞，男人们贪婪地盯住她看，她还允许他们摸她。而她身上有的是好摸的，我的上帝，确实如此。“因为我有这个。”她夸耀地对菠芝奇卡说，同时双手托起了她那几公斤重的一对乳房，这是她步入如饥似渴的两性交往的入场券。几乎所有的男看守也都对赫尔嘉的胸脯怀着欣赏和想摸摸的心情。尽管作为女人对此不好评判。但同赫尔嘉纵情作乐一定是非常令人激动的，别的不说，只要看看她身上长的毛有多密多长就足以说明一切。要是我想写淫猥行为，我就会把她的那个地方描绘一番的。

后来，菠芝奇卡又把赫尔嘉告诉她的话统统讲给我听了，她也不会有别的做法。“她藏的有钱，大概很不少，不然她不会这么担心，是藏在某个旧轮胎仓库里。她不知道该不该告诉家里，让他们去取走。”她不敢告诉家里，

①古代希腊、罗马神话中的酒神、狂欢作乐之神，传说是宙斯与凡人女子塞墨勒生的儿子。——译者

因为家里人谴责过她。“她常哭，”菠芝奇卡说，“因为弟弟不给她写信，而弟弟家的洋楼还是她给盖的。她可真滑头！洋楼是她的钱盖的，用的却是弟弟的名义。就是判她刑，也别想从她那儿拿走一分钱。汽车也不是用她的名字登记的，住宅又是父母的。”

菠芝奇卡把我们牢房的关系搅乱了。我感觉到赫尔嘉在疏远我，她的言谈中原来想用以博得我的好感的内容消失了，再也不提歌唱家母亲和父亲的燕尾服了。在监狱里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友善的听众，在菠芝奇卡面前她可以夜里哭着诉说爸爸不给她写信，在我面前则因为她要向我装扮的角色，不得不诳称家里如何敬重她。破坏铁路工程的事儿也不谈了，书也不怎么读了，整天和菠芝奇卡一起玩牌。她那不祥的决心一天天更加坚定了，她不断有意显示自己今后对谁都不会心慈手软，对什么事都会寸步不让。

菠芝奇卡给我们这儿带来的是狡诈和滑头，同菠芝奇卡在一起，赫尔嘉会习惯于过监狱生活。虽然她还指责菠芝奇卡不该向窗外大声喊叫，不该和对面的男人们讲一些淫秽笑话。由于训导员抓住了菠芝奇卡私下传递的信件，而我们又没有阻止菠芝奇卡这么做，我们失去了多到澡堂去洗几次澡的好处，赫尔嘉为此也曾经发过脾气。但是，菠芝奇卡把违犯狱规视为理所当然，这种态度慢慢钝化了她对囚禁的反抗。在她所喜欢的菠芝奇卡身上，她看到了在监狱里也可以按另外一种方式生存，而不一定非要像这以前我和她一起所做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也可能在别的一些人的影响下改变对监狱环境的看法，并且自然

而然地接受它。但是，第一个使她打破 6 月里刚来牢房时那种受委屈的女法官的心态的，正是菠芝奇卡。这个世界可真是神奇而又充满着矛盾，菠芝急着回去守护自己的那些房子、那些埋在乡村住宅后面什么地方的一包包五百克郎一张的钞票、那些鸭绒被和从未穿过的裘皮大衣，以及那个餐具柜里的死神，而她留在身后的赫尔嘉此时却远远离开了她原来的复仇女神形象。

对于我来说，菠芝奇卡也像一副催化剂一样产生了作用，使我对这两个女人都感到厌倦了。一个人老是吸入泔水的味道，是一定会产生反感的，当然，我不是说造成这种使人厌恶的空气全是菠芝奇卡一个人的责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她很可能会成为一个体面的小业主，可能在市场上开一家大商店，我们甚至可能乐于到她那里去买东西。当然，如果她开旅馆，我会留意门板上有没有窟窿眼儿。而在我们国家的情况下，她的经营活动必然会受到压制，变成一种半买卖半偷盗的活动，但同时她也会成为市场和消费者的主宰。“生意就是生意。”她曾经这样对赫尔嘉说，因为赫尔嘉从爱国主义出发对维纳竟然同苏联军人做买卖表示义愤，这些苏联军人有免税进出国境的权利，他们常运来一些电视机，而把吊灯、家具、地毯运回去。我反驳说，在文明国度里一切都应该能够自由购买，我讨厌为了买点儿东西而四处奔走，甚至还要向女售货员行贿。菠芝则对我说：“那您就试试看嘛！您不去奔走，您会连饭都吃不饱的。”

“我会吃饱的，肯定吃得比您的那些纸袋装的汤料好

得多。”

在监狱里待一段时间后，会出现潜艇综合症。我慢慢失去了好奇心，理解别人的意愿也减弱了。菠芝奇卡的无聊话使我厌烦，赫尔嘉的进逼令我生气。为了尽力窥探我的世界，赫尔嘉使用的手法简直到了可笑的地步。比方说，早晨我们时常听到飞机从不远的机场起飞、从我们头顶上飞过去的声音，赫尔嘉就很在行地说：“现在是八点半，是去慕尼黑的飞机。”可实际上这时大概已经十点了，飞机也可能是飞往津巴布韦的，当然，赫尔嘉是不会动脑筋去考虑这类小事的。她接着就说开了，告诉我她曾经多次乘坐这架八点半的飞机到慕尼黑去找她弟弟，八点半起飞去那边，下午四点钟往回飞，回来时经常私带一些马克进关，因为弟弟不想申报所得税。她显然是想让我跟着说：“可是上次他们从慕尼黑给我送钱……”她最想通过谈论波兰来套我的话，因为波兰团结工会的斗争正处在高峰期，看报时可以找到很多机会谈论波兰，那上面天天都有攻击波兰工人的文章。她说，他弟弟刚好在波兰表演舞蹈，她把自己说成是弟弟的经纪人，经常为他在东方以及西方联系各类演出。她到华沙看望弟弟时，带回了整盒整盒的银餐具，贫穷的波兰人现在什么都卖，而且还带回来一些团结工会的徽章。而那个想挤占她的位子并作证指控她的男人，也曾从她这儿要走了一枚，现在却拿出来当做指控她的证物。“您想想看，我多难过！他把手伸进口袋，一枚徽章就放在了桌子上。这时，只听见审讯员大叫了一声。

有几个星期，我确实有一枚这样的徽章，那是一个常去波兰的友人捎来的，当时波兰连交通警察都配带着团结工会的徽章。后来，这枚徽章大概是被某个不该看见的人偶然看到了，我就把它送给了别人，警察来我家搜查时没能找着。

“团结工会的徽章是什么样的？”我问。

“圆的，红颜色，也不太大。”

我真想具有赫尔嘉的这种自信心和干脆劲儿。徽章其实是长方形的，底色是白色，只是上面的波兰国旗有一部分红色。为了准确无误，不要冤枉人，把巧合当成了恶意，我问了一位知情人，在赫尔嘉的案子里是不是有个什么徽章的问题。这位一向寡言少语的男人只是笑了一笑。

在波兰工人总罢工期间，每天夜里都不寻常地有大量飞机从鲁津机场起飞。所以鲁津监狱上空时刻都有飞机起降，从朝南的牢房里可以看到它们的底部，可以欣赏这些栖息在地上的鸟儿的飞行。然而，它们的起飞往往在被囚禁者心中引起无限的惆怅。在那些夜晚，飞机引擎的轰鸣传到牢房里，陪伴着我们的不眠之夜。我们与世隔绝，要是他们不愿意，早晨连报纸都不给我们送。于是，在飞机起飞时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响声中，我们可以展开思维的翅膀随意想像：它们会飞到那边去吗？还是就到边境上？这响声还使我联想起了 1968 年 8 月 21 日夜里的情形：丈夫不在家，去拍一部介绍工人民主的电视片去了，我和儿子坐在床上，飞机的轰鸣响彻布拉格上空，我们不由得浑身发抖，紧紧靠在一起。就是在鲁津监狱里，我也曾经历过

一次这样的恐惧，那是在 12 月 13 日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政变之后。在那激动的时刻，赫尔嘉却利用波兰工人斗争的失败向我紧逼，令我实在难受。

赫尔嘉还对“博士太太”很感兴趣。监狱里有许许多多不惹人注意的方式，可以向政治犯透露一些对他很重要的事情。我在被捕后的第一天就知道了同案被告人的姓名。审讯员很小心，不在我面前提起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名字，我也小心提防着赫尔嘉。直到审讯结束，让我们看了所有被告供词和证人证词记录，并且把检察院的决定按名单送到我们手上后，我才在牢房里随意谈起我的同案被告人。女友伊琳娜最初是作为本案主犯被关进来的，我在牢房里同赫尔嘉共同订阅的报纸上也是不点名地称她为“博士太太”，并对她百般辱骂。从外面掀起的反对我们的宣传声势看，他们在准备一场大审判。赫尔嘉问我：“您同那位博士太太在这儿见过面吗？”

有一次我的确看见了伊琳娜，当时正在送午饭，我到过道上去拿盘子，恰好押解员正带着她从审讯室回来。押解员一见到我就做了一个想阻拦她的动作，伊琳娜向前迈了一步，问他：“干什么？”在那个屋顶高高的、长长的过道上，她显得那么娇小，细小的头上梳着剪得短短的头发，眼睛炯炯有神，一身运动衣裤在她身上也显得很合身，她看上去好像是刚从运动训练场回来的。训导员看见情况不妙，就迅速把我推进了牢房。他们在同一层楼里对我们进行审讯，不得不采取很复杂的措施，以防止我们相互看见。

“不知道，”我对赫尔嘉说，“因为我并不认识她，即便见面我也不知道是她。”

从看守不经意的谈话中，我了解到这个牢区只有两间小牢房，窗户都朝向天井。我想，既然把我关进小牢房，肯定也会让伊琳娜进小牢房。于是，我在放风时根据窗户的顺序和牢房的小大推算出了伊琳娜的窗户，其实我们就隔着两间牢房。这时我已经摸熟了鲁津监狱里的情况，已经能够猜出哪些事情做了会引起哪些后果，要不是有赫尔嘉在，我说不定会呼叫伊琳娜。但我在受审讯时说过我不认识伊琳娜，要说清楚我是怎么知道她和我关在一起的，也会令我很为难，所以，我托人用别的方式向她表示了问候。

赫尔嘉还在另外一件事情上影响了我的“囚徒声誉”。大约在我们之前半年左右，一位年轻工人，伊日·格隆托拉德受到拘捕和审讯，并在夏天被判刑，法院认定他抄写了几位遭禁止的作家写的诗歌和散文。有一次我经过一处“养鸡笼”——放风笼子，看见铁皮门上刻了一朵美丽的菊花，旁边写着：“献给埃·康——伊·格。”这可是比什么都珍贵的礼物。赫尔嘉放风时同我寸步不离，她也看见那幅图画，并问我：“这是送给您的？”

“什么呀，谁会送我这个？我又不认识什么伊·格。除非是伊日·格鲁沙①，他倒是会这么做，可他在德国。”我

① 伊日·格鲁沙（1938～），捷克斯洛伐克诗人、作家，70年代受迫害流亡德国，1989年后返捷，并出任捷驻奥地利大使。——译者

始终未能向这位年轻朋友表示感谢，我倒捡了一块有棱角的石子儿，但是，要么由于以后我们被带到别处去放风，要么由于赫尔嘉对我的每一步都盯得很紧，结果没有做成。要是我往门上的漆皮上刻画，她会干出什么来？因为未表示感谢，至今我内心深处仍不能平静。我们获释回家后，我立刻给仍在狱中的伊日写了一封信，但是，对于他给予我的巨大欢乐，我一直未能回报。后来伊日了解到，我们一批人都遭到拘捕，所以，他在自己刻的花上又加上了“和其他人”几个字，杨·鲁莫尔①倒是在上面刻写了感谢他的话。

被捕后，我曾想起一些有过这种经验的朋友提出的忠告。忠告之一：别上当。忠告之二：别提名字。忠告之三：要求做记录。忠告之四：保持平静和微笑。忠告之五：不要多说话。忠告之六：别损伤了身体。忠告之七：每天至少一次超越凡尘。最后一个忠告是一位神父给我的，他在牢里经常热切地做祷告。这也可能是最珍贵的忠告，因为仅仅就事论事是承受不了监狱里的卑劣环境的。本能还告诉我，也要采用马基雅弗利②式的手段。当我这么做了以后，我又感到惊愕，我竟然能够沉着冷静地使用阴谋诡计。我并没有立刻意识到是怎么回事，因为本能是暗地里起作用的。

① 杨·鲁莫尔（1953～），1989年后曾任捷内务部长，议员。——译者

② 尼科罗·马基雅弗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思想家，在欧洲政治学、历史学方面有重要影响，代表作有《君主论》等。马基雅弗利式指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译者

赫尔嘉准备第二次出庭，法院可能要做出判决了。我们搞来一点儿热水，让她洗了一洗，我替她拔去了下巴和鼻子底下的须毛，卷了头发。后来，赫尔嘉呆呆地坐在她那把黑人王后的凳子上，不说话，几乎没怎么吃饭，不停地吸烟，连和菠芝奇卡一起玩牌都没有兴趣。这是怎么回事儿，她没有说。

“这儿什么东西这么臭？”快到晚上点名的时候菠芝说。

赫尔嘉一只胳膊靠着桌面，一只胳膊撑在床沿。脚踩在地板革上，两只脚旁也都积了一汪汗水。她因为害怕而汗流浃背，脸色灰白。

早晨我们帮她修整好，梳理好，让她带上一些用花露水浸泡的纸手巾，送她去受审。训导员通常要把押去受审的犯人带到更衣室，让犯人换上自己穿来的衣服——每个犯人受审都要穿上被捕时的衣服，不管是斗殴中撕破了的衣服，还是参加舞会的盛装，然后领到院子里举行有副监狱长出席的交接仪式，由值班看守长交给押送车车长，再由押送车把犯人分送各处法院。

赫尔嘉可能还没有走出牢区，菠芝就像放连珠炮似的向我讲起了她们夜间交谈的秘密。这个女人已经按捺不住了，她急着要跟我谈论赫尔嘉。

“这些您干吗不当着赫尔嘉说？”

“我不想引起争吵。”

“要是我告诉她呢？”

“您？”她笑了。

“既然您并不喜欢她，干吗还老是对她微笑？”

“我是饭店老板，饭店老板要善于跟所有的人打交道。”

“您干吗不对她说，您在电视上的公安通告中看见过她的照片？这也许在受审讯时会对她有帮助。”

“我干吗要对她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您为什么要对我说呢？”

“喏，现在我们不是可以随便聊聊……”

“菠芝奇卡太太，到我离开牢房后，您大概也会这么随便聊聊我吧？”

她笑了。“那您怎么想呢？”

于是我就那么做了。我打开了赫尔嘉的小柜子，找到了她藏邮件的信封，公函和家信搀和着放在一起，我把它们都摊在床上。菠芝奇卡像一只尖嘴耗子一样在公函里翻来翻去，她惯于算账，很快就算出了指控赫尔嘉诈骗的钱一共有几十万。她非常气愤，“盗窃国家的，我没的说，可欺诈像我这样的普通人！”赫尔嘉用花言巧语骗取了一对老夫妇的 14.5 万克郎，他们一辈子的积蓄。而她一个子儿也不会还给他们，因为按照法律她没有任何财产。即便法庭判决她从工资里偿还被骗人的钱，赫尔嘉也会想法找一份差不多只能挣钱维持最低生活的工作。“她早就想好了！”菠芝奇卡明白了，如果再这样同赫尔嘉友好下去，可能会成为她的下一个受害人。

“菠芝奇卡太太，您可不要对赫尔嘉说我们看过她的东西。她大概会很不好意思，因为她也没有把自己的真情

对您讲过。”赫尔嘉受审回来时，不像早晨走的时候那么垂头丧气。她激动地讲述说，她用自己的胸脯和一个留着小胡子的漂亮男看守调情，他居然抽空到法庭旁听，后来他在汽车里赞佩地对赫尔嘉说：“我还真不知道，您犯的案子会有这么大！”但关于庭审她几乎什么也没有说，破坏工程的事只字未提。宣判再度推迟，赫尔嘉认为是好兆头，相信时间对她有利。同案受审的有一大批人，她的赌注是其他人的坏事也会暴露出来，这样他们就不可能把一切都推在她一个人头上。她的律师估计会判五至七年，他争取判五年，判五年的会被送到一级劳改监狱服刑，那里如果表现好可以减一半刑期，判五年以上的要去二级监狱，那里刑期最多可以减去三分之二。赫尔嘉已被证明骗取了近百万克郎，如果只坐两年半牢，这个买卖还挺合算。

夜里我被一阵窃窃私语惊醒，她们正坐在角落里吸烟。早晨赫尔嘉没有跟我谈话。她坚持沉默了整整一个白天，晚上就爆发了：“我可是真没想到！我完全把您看错了。偷看别人的信件恐怕不仅仅是不体面吧。”

“这是事实。过去我对谁都没有这样做过。只是对您。”

“这样一来，我们之间就一切都结束了。别跟我说话，也别碰我的东西。”

“您怎么能说我们之间一切都结束了，其实我同您还没有开始呢？”

“我还禁止您为我端饭。”

这是我在牢房里承担的惟一一项义务，从窗口把盛着饭菜的盘子端到桌上。这是一项并不合算的义务，因为我总是把最差的一份留给自己，以便她们无法指责我滥用职权。盘子上沾满了油污，而且很烫，烫得手都疼。同时，看到过道女勤杂工的大拇指伸到盘子里，也决不会有助于食欲。但这项义务总比早上点名时向训导员报告牢房情况那类事情要好受些。这样，点名时我可以漫不经心地站在后面，看别人出洋相。“好吧，我不给您端饭。”

“道个歉吧，”菠芝奇卡劝我，“我也道歉了。”

“主要是您承诺什么都不说的。现在您在牢房里造成了令人窒息的空气。”

“是赫尔嘉套我说出来的。她一再恳求，最后我只好说了。”

“她怎么可能知道您那儿有什么要套呢？”

“是吗？我可不知道。”

我没有道歉。我说：“您是个性格坚强的人，赫尔嘉太太，您很讲究实际。我已经没兴趣再跟您玩捉迷藏了。”

她发了一阵火，自己去窗口取饭，她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色、每一句话都是为了在我周围形成一种蔑视我的气氛。说实在的，她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心眼儿不好而又非常自负的人往往装备有一种特殊的本事，那就是对自己的过错极不敏感。

这样持续了一天。既不跟我说话，也不看我。

后来她被带出牢房大约一个小时，回来时那副愤恨的神情已不见了。她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中午我用

烫伤的手为她端汤，她还向我道谢。但事情还是发生了。下午训导员来了，就是假装带她去受审讯，并且非常亲切地向她微笑了两次的那一个。她用公事公办的腔调说：“收拾你的东西。”

“我？”她显然受到了惊吓。

训导员带走了她。

这是个偶然事件？还是有意的安排？牢房里带来了黛妮萨，女检查官因为她的健康问题确定送她进小牢房，但为此她们同样可以把菠芝奇卡调走。后来赫尔嘉还在鲁津监狱待了三个月，她被关在一间八个女人的大牢房里。这以前她可以觉得自己享有某些特权，现在则说明她在监狱之神的心目中已经失宠了。她肯定会把调走她的事同我联系起来，如果我不把知道的东西表露出来，也许并不会调走她。虽然我不好十分肯定地这么说，但这种想法也确实常在我脑子里显现。

在这以前我就曾经试着想像，一旦她的臆想破灭，她的表现会是什么样的。是暴跳如雷，还是表示憎恨？是恶语伤人，还是表示蔑视？对于掌握了她的罪证的审讯员，赫尔嘉恨之入骨。在她行骗的胆大妄为中，含有很大的幼稚成分。她像个厚脸皮的小学女生，总是不会正确估计自己可以做些什么。小孩子在做错事被抓住时是不知道害羞的，而只会大哭大闹。她后来肯定会恨我，也可能蔑视我。如果她进入了自己演的角色，如果她已经把自己等同于在我面前伪装的那个人物，那个在政治名利场上跌倒的爱国英雄，那么，她会觉得我把真相公之于众是不仗义的

做法。如果她真有模仿我的愿望，那么，我就伤害了她心灵中的一颗向善的微粒子，一根和鱼钩一起投进体面人生之洋的细小鱼线。我不知道，对于伤害这样的一小点儿善良愿望，如果她真有的话，我是不是该感到负罪。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察觉出她开始陷进去的那一瞬间，没有察觉出这个很有才干的人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完全变坏的。一个人会为了什么、在什么时候被这种道德败坏的恶念所控制？这个人不是曾经傲慢地说过，她是无所不能的吗？也许是她的身体摧毁了她抗拒恶念的意愿。后来我曾和一个一同受到指控的同事谈起过赫尔嘉，他就是这样想的。她是女人其外，男人其内。柔软的女人皮囊包藏着男人的性格。就是皮囊也不完全是女性的：她的臂部、腿脚和胡须都是男性身体才有的。所以她找男人如此困难！而男人们又如此轻易地抛弃了她！她头脑里装的野心是如此之大！她又具有如此多的才能！可是，生活却不遂她的愿，总是从她的手掌中溜走。

黛　妮　萨

终于走了！黛妮萨来到了我们这间牢房。这是个矮小的、细嫩的、长着一头长发和一张娃娃脸的可爱女人，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人，一个不断向生活挑战的女人。但此刻她悲痛欲绝，只是靠意志的力量强压着。我想争取让她去澡堂洗洗澡，未能成功，只好要了一桶热水，在厕所里帮她浇着洗，她很感激。洗完了一头长发，她环顾四周：一张灰色的金属桌子，三把不带靠背和扶手的金属凳子，三张灰色的金属床，灰色的毯子和固定在墙上的灰色小柜子，黄色的地板革，绿色的墙，屋顶上沾了一些软奶酪，显然是什么人抗议狱中饮食的见证，高高的窗户外面装有铁栅栏，铁皮门上没有门柄，却有朝里看的

监视镜。好啦，就这些，她见得多了，她见过精神病治疗室的凄惨情景，见过医院里快要死的病人周围的幔帐，但是，没见过比这里更差的地方。从她的眼神里一点儿也看不出她心里的悲痛，她越是痛苦，越显出一副快活、调皮的样子。她用嬉戏驱赶悲伤，把它逐出视线之外。圣诞节前，正是狱中最难受的时候，她用面包做成一株小小的圣诞树。用吃完巧克力剩下的锡箔把它装饰起来，我们还在它下面放上了礼物。她还想出一种游戏，先用面包做成钱币，放在暖气上烤干，然后大家往洗脸盆上漂浮着的小碗里扔，看谁投中得多，谁中得多，谁就可能先获释回家。她投中最少，于是又转而要改变游戏规则，真是好玩极了。为了能有一些惬意的寂静时刻，可以一个人看看书—— 这样的时刻对她来说却是很不好过的，她很不情愿多给我一些 ——我教会了她玩扑克游戏。这种游戏我早玩腻了，她就自己一个人玩，她可以几个钟头不停地在床上摆牌，我只是偶尔放下书，站起来欣赏她拆开时的高兴劲儿。她掷色子的运气真好，色子也是我们用面包心做的，她轻柔、悠然的投掷却往往赢得大点。她在爱情方面的运气也很好，常跟她一起掷色子玩的亚洛斯拉夫就是她终身爱情的寄托。

很快我就发现，不喜欢她很难，而爱她却更难。如果她喜欢上谁，同时又害怕自己的感情有以失望告终的危险，这时候她会是非常凶狠的。

“ 埃娃，您喜欢我吗？ ”还没有一个外人这样问过我。我那位幼稚可笑的妈妈 ——她早已不在人世 ——在感觉到

有可能陷于孤单的时候，其实这往往都是她自己造成的，曾经多次问我：“小埃娃，你喜欢我吗？”黛妮萨是用开玩笑的口气问的，她很自傲，尽量做出一副随便问问的样子，但又不能不问，因为她不能忍受对别人的态度还有任何一点儿怀疑。

“哦，这您知道，我才不呢。”我也用一种轻松的语调回答她。对这样的问题该说些什么呢？只能躲躲闪闪，似答非答。

“埃娃！”她警告我说，“您可别惹我！惹急了我会很凶的啊!”

她的爱情之泉永不枯竭。爱就是她的存在方式，一种迷恋之爱、轻狂之爱，纯净的女性之爱，但同时也是友人之爱、女儿之家、母亲之爱、姊妹之爱。作为一个为爱而活着、一心追求爱的人，她往往全身心地沉迷于现存的这一时刻。爱情就在于它的现实存在！她从中推断，现有的就是存在的！存在的才是惟一有价值的。至于后果？啊，现有的这一时刻离后果还远着呢？可是，尽管她如此充满着爱，还是尝到了比想像中更多的后果，而且是恶意制造的后果。而在监狱里，爱情更直接转变为对她的痛苦折磨，监狱就是爱情的最坏后果。对于那些生性就只顾眼前一时之欢的女人，人们说她们是些小妖精，她们在生活中填塞的情感、爱情，填塞的那些眼前的一时之欢，要大大多于那些有责任心的人，那些把现在仅仅看作是过去与将来之间的交汇点的笨头笨脑的人，或者那些早已把生活以及包含于其中的情感计算清楚了的头脑冷静的人。至于黛

妮萨，我不仅会犹豫，而且会反对称她为小妖精，因为黛妮萨在每一个现有时刻和每一次情感投入之后，都是重新作为一个纯洁的女人去迎接下一个现有时刻和下一次感情投入。她每一次委身于人，都是毫无保留地，完全彻底地，不带任何背后的想法，“别无他求”，仅仅为了这美的体验。对于这些人也有一种说法，说他们的生活犹如闪电一般，一闪而过。黛妮萨一年中不知有多少次闪电，而雷鸣则隐藏在后果之中。

在可亲的命运之神派黛妮萨跨入我的生活之路前不久，监狱图书管理员把一本介绍苏美尔①的书分给了我们。他每隔十天推一辆流动图书车来到过道上，按照牢门上写的人数随意地为各牢房犯人更换借阅的图书。那本书里有一篇关于女神伊南娜的叙事诗，说的就是那位为了爱情而勇敢地把火种从父亲那里偷来交给人们的女神。诗中叙述一个花匠栽了一株树，女神伊南娜在这株树的树阴下睡着了。因为她太美了，花匠就把她奸污了。“黎明来临，太阳升起。女人环顾四周，惊恐不已。伊南娜环顾四周，惊恐不已。为了自己的阴户，女人后来造了多少孽。她让所有的林木和花园都充满了鲜血。奴隶们去拾柴火，喝的尽是血。她让地上所有的水井充满了血。女奴们来汲水，水罐里全是血。汲的全是血。”诗歌采用平行复述的方法

①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个民族，聚居于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地区，创造了现存最古老的书面语言。苏美尔地区是世界已知的最古老的文明发祥地。——译者

来加强印象，拓宽被叙述事物的背景，掩盖诗体的单调。我一想到黛妮萨，就自然联想到伊南娜。苏美尔文化只是平铺直叙地记载现实情景，它的思想还只会感受，不会提炼，它用诗句的重复来增加空间的厚度。苏美尔文化也还没有创造宗教和哲学，在它的史诗中众神是和凡人并列在一起的。关于伊南娜的那篇叙事诗的体裁使我懂得了大部分人是如何体验生活的。黛妮萨的经验也是不断地融化于生活之中，她总是如饥如渴地投入现在的生活，而她又依然是那样真诚，就像苏美尔的诗歌依然那样有魅力一样。

她注意一些琐碎的细小事情，其实她就生活在这些琐碎的细小事情之中。在我觉得只是一些细枝末节的地方，她却看到了小说情节的展开。她把世界作为许许多多非本质的东西的总和来加以考察，而对于理智梳理出来的本质的东西却不闻不问。但她又并非肤浅之辈，她那强烈的感情使她得以避免陷于肤浅。尽管她并不探求深刻，说不出深刻的道理，甚至对它们不感兴趣，却又活得很深沉。她善于把琐碎的细小事情组合起来，时常令我这个有点儿瞧不起这些小事情的人感到吃惊。我不得不承认，一个人如果上升到普遍真理之中，而忽略了日常琐事的细微线索，那么，他在探求生活高度和深度的过程中也会因之而失去一些基础性的东西。本质的东西发生在非本质的东西之中，非本质的东西托举着本质的东西，伟大的事业总是建立在诸如日常杂务和生活琐事这样一些不屑一顾的细小事情上。而一个人要成为好人，也不一定需要先弄明白善的概念，这些都是我从黛妮萨那儿学到的。

对于同我在一间牢房里待过的女人们，我是很了解的。我天天同她们见面，和她们谈话，听她们诉说，提防她们，也帮助她们。同她们一起经历过许多事情。过道上充当勤杂工的女犯人，每天要和我们见几次面，对她们以及对某几个女看守，我也有不少了解。关于那个长头发的吉卜赛姑娘维拉，都知道她已经多次被关押，这次是因为她喝醉酒后竟然允许自己的男人玷污他们的小女儿，甚至还帮他按住小女儿，醒来后又绝望地抱着撕破的女儿到医院，小孩最后在那里死去。其实维拉人挺随和，脸上常带着微笑，她还有几个孩子在家里，眼睛里总是透着一种迷蒙的目光。每天早晨她把面包从窗口里递给我时，我总觉得那上面留有一个孩子惨死时的气味。至于女看守们，我知道有一个丈夫对她不忠，还常打她；另一个离婚了，同大女儿一起生活，但她有的是男人，想要多少有多少，因为她尽管年龄不小，却很有诱惑力；第三个女看守的男人是个残废。但我并不很想了解看守们的命运，因为你了解了她们，就会对她们产生同情和亲近感，而这正是我不屑于在她们身上寻求的。

被黛妮萨当做小说故事的那些细小事件，是她从别人脱口而出的几个字眼儿中捕捉到的，是在去医生那儿看病时的偶然相遇和短暂交谈中捕捉到的（医生的候诊室成了监狱里的主要社交场所和信件转递站），也是从对着过道和向着窗外的呼喊中捕捉到的。她把这些细小事件排列起来，把它们同相关的人物联系起来，而这些人物中有些她只不过是在远处见到过，主要是根据声音来了解她们，可

她居然对这些女人和姑娘的事情了如指掌，就好像她们向她做过忏悔一样。只要稍微有一点儿动静，黛妮萨就竖起耳朵听，什么也逃不过她的耳朵，而且她的记性又好，几个星期后她就能肯定地说：“那个米璐什卡，埃娃，您记得吗，就是那个头发长长的姑娘，有一次我们和她一起在一个笼子里放风来着，您还说她眼珠子睁得大大的，脸上一副失魂落魄的表情，好像病了一样，您一定知道，就是吹嘘说在电梯里同厨师发生过关系的那个，当然这是不可能的，电梯不会走得那么慢，喏，您该想起来了吧，就是把自己的所有文件捆成马，想放马送给一个叫佩里·马森的律师，结果掉到院子里，后来正巧在那儿修理屋顶的犯人替她捞上来的那个，您已经知道是哪一个啦，好啦，说得够多的啦，我只想告诉您，她根本不是像她装的那么无辜，她也不是教师，她只是在冒充高雅，她是在学校上班，但只不过是个少先队助理辅导员……”还有一次她说：“埃娃，您不要这么愚笨好不好，您现在不是搞混了两个人，而是一下子把三个人都混在一起了！伏拉斯塔是那个对着过道唱歌的，就是隔壁的那个美貌姑娘，您自己说过她很美，有一次在澡堂子里碰见我们的时候拿毛巾遮住自己的身子的那个，那个女同性恋，法院精神病专家给她做过检查……可这根本没关系，有儿子又怎么样，为什么女同性恋就不能有儿子，还不是哪个男的把她强奸了嘛，所以她才这么厌恶男人，而且孩子反正有老妈妈替她照看……哎呀埃娃，您想想嘛，她是和那一伙入室行窃的人一起关在这儿的，她是那个袭击老太太的小伙子供出来

的……哎呀您刚好弄颠倒了，那个米哈尔是她从我们左边那个伊尔查手里抢过去的，伊尔查尽管还老是在窗户上向米哈尔问好，可米哈尔现在却给伏拉斯塔送香烟，您回想一下，昨天不是还有一匹马从我们窗前飞过去吗，后来伏拉斯塔还说了声‘谢谢你，米哈尔……’可是为什么米哈尔一定知道伏拉斯塔是女同性恋呢，伏拉斯塔不过是要那些香烟，您动动脑子，埃娃……喏，正是嘛，伊洛娜是伏拉斯塔的朋友，是伏拉斯塔爱着的女同性恋，不过伊洛娜已经看不上伏拉斯塔了，至少是装做看不上她的样子，伊洛娜现在透过过道同米拉聊天，伏拉斯塔正骂她呢，才不是呢，埃娃，伊洛娜不唱歌，唱歌的是伏拉斯塔，而且正是唱给伊洛娜听的……伊洛娜是那个三十五岁的瘦高挑，剪短发，脸上有块小伤疤，您跟她一起去找过牙医，您回想一下，她还替对面牢房拿信来着……伏拉斯塔在伊洛娜那儿被抓住了，伊洛娜怪伏拉斯塔那天夜里不该去她那儿，伏拉斯塔大概已经被暗中盯上了，要不是在伊洛娜那儿抓到她，伊洛娜也不会受惩罚，因为伏拉斯塔还未成年……为什么未成年就不能生儿子，埃娃，您是生活在什么地方呀，我见过一个十一岁就生孩子的……现在您弄清楚点儿了吧？”

娇小的、可爱的黛妮萨像个小洋娃娃，可她的精力却有三个人那么多，而且她也曾至少同时过着三个人的生活。为了使任何人不要存有疑惑，认为她或许没有这么大本事，她可以从她那向各方面和各种人都开放的生活中随手就举出几个例子。“请注意，埃娃！我们是在饭馆里，

嗯？而只要我在饭馆里这么着一站，这么着把椅子往后一踹，那就坏了，说明我要打架了。”饭馆在火车站旁边，我到那儿去看过，当地老住户把那儿当做自己的家，但一到星期六星期日，在河两岸密密麻麻的夏季别墅中度假的人也到那儿去。饭馆后面有个足球场，夏天当地的球队——队长兼教练就是黛妮萨的丈夫——在那儿同度假的人组成的球队进行比赛。星斯日一场比赛后，喝冰镇啤酒特别舒服。当然，下火车后来杯啤酒也很舒服，黛妮萨在下了火车往家走的路上也常常拐到这个小馆子里来。星期六饭馆里就更热闹了，这里洋溢着平等和兄弟之情，这是野营者们的老传统，当地人也学会了尊重这种传统。在这儿谁也不是老爷，也没有谁是下人，不管你是博士还是泥瓦匠，都一视同仁。只有黛妮萨除外，她往往被默认为饭馆里的王后。而她的律师也在附近有一处别墅。

就在一个星期六的傍晚，客人们围着桌子谈得正高兴，整个晚上的欢聚刚刚开始。这时候，饭馆里来了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妖艳女人。她来别墅的次数还不多，时间也不长，还没有来得及了解清楚当地的规矩，就用她那双把黛妮萨看作吵吵嚷嚷的乡下美人的眼睛，勾搭起黛妮萨的丈夫来了。夫妻之间的关系可以是各式各样的，如果关系不好，大家也会知道，但当夫妻俩一起来到饭馆，那么，现在他们俩就是一对儿，都只属于对方，这是一条对所有人都适用的法则，只有夫妻双方中的一方可以不受惩罚地违犯它。黛妮萨的丈夫对这个妖艳女人根本不感兴趣，他们正在研究明天出场的队员名单，而当这个涂脂抹

粉的女妖精到洗手间去的时候，黛妮萨就这么着把椅子往后一踹，她的一位女友马上明白了，立刻站起来帮她。女友把那个妖艳女人的头摁在水龙头下面，黛妮萨用水冲掉了她脸上的脂粉，也没有怎么欺辱她。这个女妖精流着眼泪，蓬头垢面，浑身湿淋淋地逃离了饭馆，全饭馆的人哄堂大笑。等到明白了这里的饭馆——乡村——别墅的规矩之后，这个姑娘向黛妮萨解释说，是黛妮萨的仇敌故意向她错误地介绍了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我以为是他要甩掉你，不是你要甩掉他。”

仇敌！是的，黛妮萨真的树敌不少。有一个女人的鼻子被她打破了。那一次也是这样，他们高高兴兴地坐在饭馆里聊天，黛妮萨嗓门稍微高一点儿，大声说着自己的想法，不过，作为饭馆里的王后，她是有权这么做的。他们还唱歌，黛妮萨虽然既没有音乐的听觉，也没有一副好嗓子，但喜欢跟着哼。在这片喧闹中，在杯盘相撞的丁当声中，在沙沙的脚步声中，在劈劈啪啪的推门声中，以及吉他琴声和合唱声中，坐在邻桌的仇敌对黛妮萨的腿讲了几句不好听的话，她称黛妮萨为那个跛脚女人，或者瘸腿女人什么的，说那个瘸腿女人在我们面前张牙舞爪地说些什么呀，嘿，瞧那个跛脚女人张牙舞爪的样子。“埃娃，我的耳朵可好呢，有时候值夜班困了，就把头靠在桌子上眯一会儿，可只要护士长一走近治疗室，啊，她的脚步可轻了，我马上就坐起来，没有一次让她发现过。还有孩子们呢，他们在旁边屋里叽里咕噜说话，不好好做功课，还打开录音机大声放着音乐，还是让我听见了，给了他们几巴

掌。谁也骗不过我的耳朵，拐角后面有人说话我能听见，那个女人的话当然也听见了。”那时候黛妮萨刚做了第一次膝关节手术，她的膝关节病是因为长期为病人服务而得的。作为一名护士，她要在手术后把病人从小车里拖上床，要为他们翻身，换衣服、换床单时要把他们抱起来。要是谁不小心碰着她那个要命的疼痛处，她会立刻晕过去。在鲁津监狱里她也为此引起了一场冲突。有一个年轻的男看守，据说因为害怕自己得了白血病，会很快死去，因而把自己的恐惧发泄在失去自由的被囚禁者身上。有一次他粗暴地对黛妮萨说，既然她行动很慢，就应该坐在牢房里，不要出来放风，免得碍事。黛妮萨火了，同他嚷起来，还写信给监狱长告他。这在鲁津监狱可是闻所未闻的事件，后来黛妮萨的律师出面才把事情抹平了。但是，在饭馆里她可是个自由人，于是，就这么着把椅子一踹，椅子轰隆一响，飞出去，倒在地上，近旁的人一下子鸦雀无声，都知道椅子摔倒意味着什么。而这个娇小的洋娃娃，一条腿还疼着，一下子就扑向那个敢于嘲笑她的女人。她甚至没有用靠在桌子边上的拐仗去打她，而是从背后抓住这个仇敌的头发，把她的头往桌子上撞。“埃娃，跟您说，她根本无力反抗，鲜血直流。她被整得可惨了，鼻子从此以后再没有直起来过。”双方背后都有一帮人，都动起手来，最后公安局来了才平息。

这些可以说是鲜明反映她的完整性格的突出事件。黛妮萨用拳头的力量和震撼人心的幽默来战胜命运的捉弄。但是，因为她对生活从不畏惧，因为她经常向生活挑战，

她自己也多次被整得好惨。“ 埃娃，我年轻的那个时候，可是个标致的女孩呢。 ”她说的年轻时候，指的是生第一个孩子以前，她女儿不久前刚满十八岁，黛妮萨这时候也不过三十七八岁。“ 腰围五十五，三号乳罩，您能想像得出吗？我可以用两个乳房搅动空气。我要是穿一件开领短衫，一条窄裙子或者紧身裤子，把脚后跟往上一踮，没一个男人不回过头来看的，他们恨不得把我一口吞了。我还常把头发染成金色，长长的浅色头发配黑黑的眉毛和眼睛。那样子一定显得很不知羞耻，不是吗？ ”

“ 有点挑逗味儿。’我说。

“ 倒不如说有点蠢。 ”她说。于是她讲述了这副带挑逗味儿的美丽容貌怎么让她吃了大亏。她坐火车来布拉格上班，这是一条郊区支线，每天乘坐这趟车就好像不是为了赶路，而是来参加聚会，大家都相互认识，车里一起闲谈，相互为对方看座位，乘务员就好像是聚会的主人。但有一个乘务员却患有强奸妇女的可怕狂症，有一次他在一间空的包房里同黛妮萨闲谈，到终点站后还不让她下车，一直把她拖到停车轨道上。“ 对这种男人，反抗没什么用，我们医院有时送来一些被整得好惨的女人。看看我的裙子被糟塌成什么样就知道了！幸好我还带了件风衣。 ”她到铁路公安局去报案，但他们都不相信她被强奸，劝她别告。“ 他们瞧着我那副样子，您怎么说的？带挑逗味儿？就是说我显得好像是要挑逗别人，他们自己也未必不想，他们以为是我引得那个男人发狂了。 ”那个乘务员以后再也不跑这条线了。后来黛妮萨找到了另外一个也被他强奸

过的女人，并且同她约好了一同告那个乘务员。一次，黛妮萨在站台上走着，一下子碰上了那个乘务员，当时她丈夫也在身边。她说：“就是他！”丈夫就把乘务员抓住了。以后进行了审判，除黛妮萨外其他受害人——铁路公安局不知为什么又突然想起了她们——也都出庭作证。“许多年后我又碰见了他，这时他成了煤炭搬运工，背上背了满满一桶煤，满脸煤灰，穿得破破烂烂的。他对我说，总有一天上帝会惩罚你的。您瞧，现在我不是也到这儿来啦。”

一个人如果向生活挑衅，确实会被赶上法庭。黛妮萨已经有一次受到法庭制裁。那天她下班早，很高兴能赶上下午的火车，早点回家。她给孩子们的晚饭买了新土豆、干酪和乳酪，但此时却碰见了一个男朋友，要请她去喝一杯。天气可真好！你总不至于急着去上锅台或者去洗脏衬衣吧！于是，他们在小城广场咖啡馆前的小花园里坐了下来。下午的火车能赶上，男朋友答应用他开的救护车送她。两个人各喝了一杯，一杯酒下肚后，她觉得天地更加亮堂了。干吗非要下午就赶回家呢，家中反正已经习惯了她傍晚时才回去。于是又各喝了一杯。然后又各喝了第三杯。生活远不是那么循规蹈矩的，它不管什么应该，什么不应该。救护车司机老老实实地陪着她喝，可是，一下子天色就晚了，孩子们回家没有晚饭吃，天气也远不是那么好了，火车早就开走了。男朋友主动提出开快车送她回家，他有一副好嗓子，会唱黛妮萨喜欢的那首名叫《墓碑》的歌，他鸣着笛飞快开出布拉格，就在关于墓碑的歌声中把车子翻到了公路下面。救护车顺着河边的斜坡翻了

两个跟头，什么可怕的事也没有发生，玻璃碎了，前门撞弯了，可车子又站在轮胎上了。黛妮萨在车子翻跟头时被甩了出去，土豆、干酪、乳酪撒了一地，土豆还可以捡回来，只要叫住一辆运货车把救护车拉上来就行了。要是附近草地上没有那个女人在那儿割草，本来会什么事都没有的。可是她叫喊："血！血！"黛妮萨用围裙擦了擦脸。"埃娃，真倒霉透了，您想想看，公安局已经来人了，可这时候上夜班的巴尔季克也骑着摩托路过这里。"黛妮萨总是叫丈夫的姓，不叫他的名字。"那个警官是我们一个熟人，他招呼我男人说，卡莱尔，你这个家伙，你真有个好老婆，她这么急着赶回家，差点儿没摔死。卡莱尔从公路上把我打量了一番，又看了看我的男朋友，气呼呼地说了一句：不用急了，孩子们都吃饱了。"法官对黛妮萨嚷嚷了一通，说救护车又不是出租车，判了她两个月缓期徒刑。黛妮萨表现得够朋友，她的肾撞伤了，尿血，但她忍着疼痛只偷偷地吃点药，免得让开救护车的男朋友付医疗费和她的伤病保险金。男朋友答应替她付她的那份诉讼费。

"付了吗？"

"您怎么会这么想？他装做忘了。"

"他判了多久？"

"不多，半年缓期。他说从早六点一直值班，跑了不少地方，太累了。公安局也没有想到测试他的血液酒精度，他们认为救护车司机不可能当班时喝酒。"

"这个朋友可不怎么好。"

“是我的错。我应该学会跟什么人交朋友。”

黛妮萨的爸爸是她出生、成长、结婚、生孩子和上饭馆的那个小村庄的掘墓人，除了这项主要职责外还到工厂去挣点钱。黛妮萨的妈妈是驼背，怕生孩子。爸爸尊重妈妈，温情地爱着她。妈妈很会做饭，还会刺锈、针织。但爸爸是个壮男人，在邻村同别的女人有了孩子，是个儿子，可是只能隐姓埋名地偷偷关照他。妈妈一辈子也不知道这件事，要是让她知道了，非把她气死不可。但后来妈妈还是怀上了黛妮萨，在驼背的、身体不很结实的妈妈身旁却长出了一个大胆的、自己会管理自己的女儿。好像上天想要补偿妈妈的缺陷，女儿长得非常漂亮。

“您小的时候什么样？挺野的？爱发脾气的？倔头？假小子？您可能会野得像个男孩。”

“错啦，埃娃，错啦！从小就是个姑娘。野是野，但是个姑娘，一个喜欢小男孩的姑娘。哎呀姑娘，您知道我指的什么。”

“就是说您招男人，从小就招男人，男人也围着您转。”

“您说得真准。”

第一个爱上她的，是她的哥哥。爸爸原来想让黛妮萨到他干活儿的那家工厂当学徒工，这样可以照看着她，后来黛妮萨才当了护士。这以前爸爸也对自己的儿子做了同样的安排，这样兄妹俩就在工厂里相识了，而且一下子就相爱了。“米拉是远近惟一的一个可以让我喜欢上的男孩，他也这样说我。他送我回家，我们常在河边上见面。可有

一次爸爸在火车站上看到了我们。你跟那个米拉怎么啦？什么怎么啦，我喜欢他。”爸爸没有办法，只好把他们一个个找来，他们沿着河边走着，然后爸爸就把事情向他们俩一齐说了。“啊,我为此吵闹得可凶了!”

“米拉呢？他一下子有了两个爸爸，他怎么说？”

“这时候米拉的妈妈已经成了寡妇，但她很好，从来没有说爸爸的不是。米拉已经十八岁了，他对这事儿倒没有太怎么样，他更不高兴的是不得不跟我分手。”

黛妮萨妈妈死前，兄妹俩常暗中来往，有一条秘密的柔情纽带把他们俩连在一起。黛妮萨常常陷入一些困境，哥哥不得不帮她摆脱。她的第二位骑士是她的公公，如果不是他那么光彩夺目，就是黛妮萨太妩媚动人。但她也向公公谈过自己的爱情故事，他从未代表儿子表示过气愤。“老头子挺风流的。”而黛妮萨又是那么可爱，那么不可多得。

爸爸活得不很长，他有心脏病。妈妈又一辈子受肺病折磨，弯曲的脊椎压迫了肺部。妈妈被送进医院后不久，爸爸就患了心肌梗塞。他无论如何也不愿去医院，要在家里等妈妈。妈妈在医院里又总是非常关切地询问爸爸的情况。她躺在黛妮萨的那个病区，“幸好有流行性感冒，医院禁止探视，否则我真不知道跟她说什么好。有时候我觉得妈妈好像什么都知道，她可能已经猜出了爸爸的病，因而我说谎已完全多余。”黛妮萨向妈妈隐瞒了爸爸的死和他的葬礼，她想等她体力恢复一些后再把一切都告诉她，但是妈妈还是死了。

“这是在冬天，天气很冷，到处是积雪。我值下午班，赶火车时顺便给爸爸送午饭。巴尔季克也准备下午去他那儿，替他往炉子里加炭。他没有躺在床上，是坐在桌子旁死的。我只来得及把他的身子理直了，让他躺在地上，就急急忙忙赶紧跑，好及时来到班上，不让妈妈察觉出什么来。我换上工作服就立刻去妈妈的病房，我必须完全平静地走进去，护士长给我喂了几片镇静药。这以前我曾不小心说过爸爸病了，当时觉得不对，又赶紧说没什么要紧的，轻微感冒，后来我很高兴这么说了，因为这样妈妈就不能提出要爸爸来，哪怕是只到窗户跟前来，好让她瞧瞧。她对他的依恋真是到了让人难以忍受的程度。我们什么也不是，爸爸就是一切。我总是觉得奇怪，爸爸怎么受得了这些。后来她气喘得厉害时，爸爸还抱她去上厕所。她就像他的第三个孩子。妈妈每天都要问家里怎么样，爸爸午饭吃的什么，晚饭吃的什么，早饭吃的什么，我有没有为他换床单、洗衬衫。我还要把他穿的衬衫给她带来，她为他缝补。她还叫我把医院里当点心发给病人的柑橘给他送去。我说他今天吃的馒头片加酸白菜，是星期日剩的，还有瘦猪肉，我给它加了馅。别担心，我没有放太多胡椒。晚饭时巴尔季克给他送奶酪去。他只吃了两片馒头片，大概是感冒的关系。已经开始退烧了，早晨体温不高。一说到体温，我当时差点儿晕了过去。爸爸在家有时穿一件羊皮袄，就是那种齐腰的短袄，那天早晨起床时就穿了这件短袄，身子裹在皮袄里，所以还是温的，手和脸都凉了。幸好护士长来找我，她在门外听着，我坚持着走

出来，到走廊上才瘫倒在地。这样有差不多一个星期，埃娃，我简直成了个演员，妈妈一点也没看出来。每天要编他三顿饭吃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给她捎来些什么话，什么人去看过他。我不敢编得太多，怕她看出破绽。那个星期我还替他洗过衫衣，可怜的爸爸，还让他去理过发，因为妈妈总留意让他按时去理发。安葬完爸爸回来后，我忘了换丝袜，让妈妈在窗户里看见了。埃娃，为了举办葬礼，本来应放我三天假，我都没敢休，我怎么向妈妈解释呢？她站在走廊上等我，手扶着墙。你为什么穿黑丝袜？因为浅色袜子破了个洞，你好像还不了解我似的，我所有的丝袜老是破的。另外现在也流行穿黑丝袜，跟我的上衣挺配，不是吗？她没有回答，只是这样望着我。埃娃，她知道了！她早知道了，只不过想在我这儿再证实一下。而我还老是哄她。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她慢慢退着往回走的情形。埃娃，我老是看见她扶着墙慢慢悠悠地退回病房。她盯着我的眼睛，想让我说实话。她死后我见她躺在那里，不停问自己，究竟是不是该骗她，反正我也没能延长她的生命，如果告诉她，我们至少还可以在一起哭一场。”

这是在冬天，寒风刺骨，土地冻得像石头一样硬。爸爸是掘墓人，现在没有别人来为他掘墓了。有人建议实行火葬，把爸爸安放在骨灰盒里，但爸爸表示过希望土葬，他要和妈妈在地下相会。又有人建议把遗体存放在冰柜里，到春天土地解冻后再安葬。而女儿拿起了十字镐和铁铲，去征服那坚硬的土地。这个举动只有知道黛妮萨那双手的人才能够做出应有的评价。她曾为我梳头，当她握住

一把头发，把它一直梳到底的时候，我感觉到她的手是那样细嫩。我的头发在被分开、被翻转时轻微地摆动，而她的手在触及我的皮肤时又是那么小心翼翼，体贴备至。她的手既准确，又轻柔，好像母亲在触摸初生婴儿小脑袋上细细的胎毛。她在长期为病人包扎伤口的过程中，学会了这样轻柔地触摸，让这样一双手触摸肯定是一种享受。而那里却是僵硬的土地和石头。他们先要扫掉土地上的积雪，寒风不停地刮着，墓坑还必须挖得很深，哥哥、丈夫、女儿、儿子都来帮她。一个星期后，妈妈去世了，他们再一次挖开了墓穴。

她说过，她喜欢小伙子。她的案子中涉及四个男人，她偷东西是为了帮助自己的情人，这种行为更为人们所不齿。当她在女囚们当中听说，她的案子会激起强烈的谴责时，她开始装做是因为饭馆里发现亏空而被起诉的。告发她的是一个被她拒绝的男人，他本来希望她会对他的沉默给予报答。在她被捕后，她的那些情人也没有对她表示多大同情。根据那条只有现有的才是有价值的法则，不久前一个情人挤走了另一个情人，而那个被挤走、被抛弃的男人感到受了侮辱，同时也出于嫉妒，就向警察局告发了她，说她曾送他不少礼物，而且，也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挤走他的那个情场上的得意者。而案件本身已使黛妮萨在自己的家人面前，在丈夫、儿子、女儿面前丢了脸。当所有这些令人感到羞耻的爱情、偷窃、背叛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公安局的调查中逐渐浮出水面后，丈夫对她说，这回可真的要同她离婚了。这是丈夫来探监时对她说的，这次探视

还是审讯员以要他出庭作证为借口特意安排的。那个被挤走的情人，是个消防队员，要出庭作证反对她，多么丢人！是的，庭长先生，这台收音机是被告送给我的，这是台汽车上用的收音机，庭长先生，我们曾经多次开我的车到野外去，不，庭长先生，是她主动送的，我虽然挺想有一台车用收音机，但她用不着送我。庭长先生，我不知道她给我买礼物的钱是偷来的，是的，庭长先生。我不知道买收音机的钱是她偷来的，我是在她被捕后才想到的，因为，她哪儿来钱买这么贵的收音机呢。“ 埃娃，半个村子的人都会来，他们要来看我出丑。 ”要是先不拘留她也好呀！要是在外面，什么难事她都能应付，能解释，能抹平，她能让所有人都心平气和。凭着自己的吸引力，她一直使自己全部的现有生活处于平衡之中，使所有的人都感到高兴和满意。谁要有什么忧愁和担心，她会以快活、勇敢和自己惊人的精神力量帮他排解。可是现在，她从他们的生活中消逝了，不再能用自己的魅力和机智去影响他们了，于是，邪恶就在他们身上占了上风。丈夫要同她离婚，一个情人要抛弃她，另一个要诽谤她，她陷入无以名状的痛苦。“ 埃娃，您倒是说点什么呀！ ”

她结婚很早，跟丈夫一起生活了快二十年。他长得像爸爸，是个美男子，只有他自己知道为什么还一直守在黛妮萨身旁，尽管她一直对他不忠。他们有两个孩子，大女儿不是他的，要是我的推算无误，黛妮萨怀上这个女儿是在快结婚前，她的未婚夫还在当兵的时候。他是穿着军装结婚的，连长当他们的证婚人，全连都坐着卡车来参加他

们的婚礼。黛妮萨常到未婚夫服兵役的地方去看他，他们在旅馆里过夜，是一对令人羡慕的爱侣。他们到了非结婚不可的地步，而他知道孩子并不是他的。黛妮萨没有告诉我，究竟谁是这个长得很像她的活泼、美丽而又有个性的女儿的父亲。黛妮萨被捕后，女儿也被工作单位辞退了，但她没有把这放在心上，找了一份现成的粗活儿，而且亲切地给妈妈写来了好几封信。为了这个非自己亲生的孩子，丈夫一直责怪黛妮萨，女儿因此不喜欢他。女儿和妈妈一起暗中结成了只有女人之间才能有的诡秘联盟。女人为了防御，往往会另辟蹊径，创造一个不让男人进入的世界。丈夫常因嫉妒而气得发狂，变得粗暴，常打她，而且酗酒。当我从他的角度来审视这个故事时，应该说是黛妮萨毁掉了他的生活。他对她一刻钟也放心不下。尽管如此，只要她在外面，还是有办法继续控制他。她会朝他微笑，也会皱起眉头；她会对他说话，也会默不作声；她会为他做饭，也会让他挨饿；她会悄然而来，也会令他空等，总之，控制男人的方法多得很。爱与不爱，给与不给，一切转瞬即逝，但又暗含柔情。

黛妮萨犹如一块天然晶体，它的美在于其完整性。它既有许多锋利的棱角，又有许多光滑的平面，所有这一切合起来组成一道光芒。她渴望什么，就摘取什么，但她无论做什么，都心甘情愿地准备为之承担全部责任，这一点是必须为她补充说明的。她和丈夫疏远了，但她继续留在他身边并不仅仅因为他们共有一个儿子，也不是因为她对世俗的尊重，而是因为在关系发生变化的同时，她仍然爱

着自己的丈夫。儿子像他，她为此感到骄傲。而且，也许他们之间的爱情也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因为她是一块天然晶体，每一个男人都会在这块晶体的映照中发现另一种爱情。她肯定也能够从丈夫身边逃走，女儿快结婚了，儿子在技工学校学习，已经不需要她照料了，她和情人甚至商量好了逃走的计划，但是，她仍然心疼自己的丈夫。他们不富裕，生活很一般，但她喜欢他们在那座老房子里的住宅。那里过去是一座修道院，住宅里没有洗澡间，厕所在院子里。可是，她也喜欢在布拉格同情人秘密幽会的那间小房间。她能够把这一切都包容下来，因为这些都属于她自己的最原本的生活。

她承认丈夫有理由生气，这使她痛苦。尽管这是一场不平静的、不满足的婚姻，但它的破裂仍然折磨着她。而现有婚姻破裂这后，她又会开始为情人对她的爱而提心吊胆。使她感到痛苦的，不是她进了监狱，而是因为她进了监狱后可能失去自己的爱。囚禁本身倒不太使她难受，她能够像在别处那样，用各种琐碎的小事来打发日子。此外，在天井对面还关着她的一个男朋友，他是因为商店里发生亏空被关押的，他的妻子是黛妮萨最要好的朋友，常在黛妮萨家人的来信中附言，向黛妮萨通报她丈夫在外面对她的调查情况，并且让代表她丈夫利益的同一位律师做黛妮萨的法律代表，这一切都有助于黛妮萨适应监狱里的生活。因此，囚禁并没有吓住她，她不反对同囚徒生活融为一体，在监狱里安心居住下来。只要从窗户里看到男朋友在天井放风，她会一整天都感到安慰。她在看守中还认

出了自己童年时的一个同学，感到非常高兴。啊，这是斯坦达！斯坦达连看都不看她一眼，没有表示出认识她的神情，但当她去医生那儿请求允许白天卧床时，斯坦达帮她说了话。他们单独在候诊室里待了一小会儿，他请求她任何时候都不要主动跟他说话，“你不知道这里面的情况。”这个斯坦达有一次也帮了我一个大忙，黛妮萨也很高兴。她具有一种天赋，能使环境适应自己的想像，所以，她以监狱为家不是单纯使自己去适应监狱，她是既来之则安之，让“来之”为自己“安之”服务。她也从不怨天尤人，从不这么想：瞧，现在我在这儿，而我为他们干的那些人却不仅留在外面，反而还谴责我。在这一点上，她确实是太宽容了。

亚洛斯拉夫，那个最后的情人，现时也是她最倾心的爱，并没有想到她是如何为他弄来钱的。当审讯员问到他时，他很生气，要是他知道，他早禁止她这么干了！黛妮萨谁也不责怪，只责怪她自己。甚至对于在证词中极大地伤害了她的那个嫉妒心和报复心都很强的男人，她也没有对他掀起愤恨：这是我的错，谁叫我同这种没有骨气的男人相混呢。她承认自己的偷盗行为，没有抵赖，没有试图用一些谎言把审讯员引入歧途。我干的就是我干的，现在我愿意受罚，只希望还能留住他对我的爱。在家里，她对于迎面扑来的不幸很长时间都没有说。拘留她以前已经对她进行了几个月的调查，她怀着恐惧等待整个事情的败露。她羞于对孩子说，又害怕对丈夫说。等到公安局来家里拘捕她时，对他们家进行了几个小时的搜查。她受到了

极大的羞辱，在全村人面前丢尽了脸。对于审讯她的女审讯员，她不把她看做是要坑害她的仇敌，而是把当做是她认识的、同她一起共同办一件事的一位太太。由于她每隔十四天才可以写一封家信，又不能在由她丈夫开启的信封里放进一点点对情人的问候，女审讯员主动提出帮助她转递信件。她把亚洛斯拉夫给黛妮萨的信作为要回执的公函寄给她，又在审讯时收下黛妮萨的回信，由亚洛斯拉夫到检察院去取。女审讯员的这一招是很聪明的，但黛妮萨也没有为这些信付出什么。她不抵赖是因为她的性格就是这样，在她的行为中没有任何阿谀奉承的意味。但这对她可谓不幸中之万幸，因为审讯她的是一个能够理解她的爱情烦恼的女人。

她和情人在布拉格租了一间小屋，是一位鳏居的朋友腾出来让他们住的。从她的叙述中，我清楚地了解到了这所房子，这套住宅，这个房间，这个朋友，他的儿子以及那年被猛涨的河水淹了的他们那处别墅。黛妮萨还曾帮助朋友把沾满泥土的毛毯和床垫拿出来晒干。我也知道了街对面拐角处那个二楼窗前种有倒挂金钟的吉卜赛饭馆和在人行道上讨香烟的吉卜赛孩子。当我被带去潘克拉采医院做透视时，救护车正好经过这些地方。那是下午四点交通堵塞最严重的时候，救护车开得很慢，我把那些地方都辩认出来了。黛妮萨在哪儿让一个吉卜赛小家伙吸了一口烟；亚洛斯拉夫在哪儿淋着雨等她，因为他忘了带钥匙而她又记错了约会时间；她在哪儿同吉卜赛人闲谈，在饭馆里同这些吉卜赛人一起坐比跟白人好得多……回来后，我

又不得不把每一件小事都讲给她听：我在那所房子前看见谁了，大门是不是开着的，哪一路有轨电车正好从那儿路过，饭馆门前是不是有从婴儿到老婆婆的一家家吉卜赛人站在那里，我当时想了些什么，有没有想到她，有没有阳光……下午四点，太阳正好照在二楼的倒挂金钟上面。随后她哭开了，我看到了她欢度幸福时光的地方，而她却不在那里。要在自己身上重现那时的光景，那是多么困难啊！那些生性善于把过去和将来在现时中联接起来的人们，他们的遭遇会好一些，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在每一个可能接踵而过的现在时之后都会有希望接踵而来。但是，汇聚一切价值的现在则会由于地球的急速旋转而把任何一种希望都吞噬掉。在现在之后，留下的只有心中转瞬即逝的景象和嘴里酸甜苦辣的余味。一轮现在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接替它的下一轮现在会是什么样的。

在鲁津监狱的头两个月里，黛妮萨的时间完全被亚洛斯拉夫占去了，她不是谈论他，就是给他写信。由于担心失去他，黛妮萨简直都要生病了，不时因为精神过度紧张而呕吐。她讲述了他们之间的许多往事。为了找个地方做爱，他们通常都要乘车出去，有时在某处遇上了，可那里又无法做爱。她爱他所有的一切，他的身体，他的性情，他的孩子，他的汽车，他的农舍，他的职业，只是不爱他的妻子。但他们很快就要摆脱这个女人了，亚洛斯拉夫正在考虑同老婆离婚。而这又是黛妮萨最感痛心的，要是不拘留她，现在她会在什么地方啊！她会同亚洛斯拉夫一起到山里的农舍去！他会到森林里去砍柴，她则在家里等候

他。她给他的信又长又多，每次受审时都要带去几个塞得满满的信封，里面的信纸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她每次都把给他寄信和收到他的回信的日期记在本子上，要是老收不到回信，她会急得直哭。她推算情人倒班的日子，现在是早班，然后上两个夜班，然后休息一天，再推算什么时候会有时间给她写信，因为他必须背着人暗地里写，最大的可能是上夜班的时候写。又要推算他什么时候下午有空，好到检察院去把信交给那位女审讯员。要是按照她推算的时间还收不到他的信，她会呆呆地坐在那里发愣。

“埃娃,您倒是说点什么呀!”

“您性子太急。”

“可您不了解他。”

黛妮萨被捕对于可爱的亚洛斯拉夫犹如当头一棒。起初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知道她跑到哪儿去了，又不敢去她家找她，黛妮萨的丈夫已经同他打过一架。黛妮萨千方百计想由她自己第一个把事情告诉他，她被捕后不久，也许是一个星期，也许是八天，女审讯员就把她的信交给了亚洛斯拉夫。但此时在他们一起工作过的工厂里（后来她因为伤残从厂里退休），大伙儿已经在悄悄议论这件案子了。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就算她没有仇敌，实际上她有，就算谁也不在背后说她的坏话，拘捕她的理由本身不能不使亚洛斯拉夫感到震惊。“假如我是从你那儿知道的，”他在给她的信中写道，“你至少可以对我说点什么，你知道自己祸事临头已经好几个月了，可你什么都不说！”她求女审讯员不要把全部真相都告诉他，可是，后

来那个吃了败仗的情敌还是全部，几乎全部都告诉了他，这个家伙这么做的时候有多高兴啊！瞧见啦，哥儿们，女人就是这样，她不仅为你偷，也为我偷。而她是那样地无能为力，一筹莫展！她从信里猜测，他都知道了些什么，有什么想法，她必须在字里行间揣摩，因为他受男人自尊的约束，什么也不照直写出来。而她从字里行间读到的，也许比实际有的还多，但也可能还不够，因为她毕竟不了解他此时的真实情感和思想状况！就算是她猜对了，正确地给他写了回信，可谁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收到，而在此期间他的心思、他的想法又不知会发生什么变化。唉，她又有什么法子呢！惟有语言，写在纸上的语言！而且，还不能把什么都写出来。她怎么才能对他谈清楚，既然他每月都把全部工资给了家里，而她也不能损害自己家里的人，那么，她从哪里去搞钱来供他们俩花消呢？他们总要从什么地方弄点钱来付小房间的房租吧，还要偶尔去饭馆吃顿饭，还得买汽油，为了助兴，约会时她还要买瓶葡萄酒，做个冷盘，给他买他喜爱的香烟，她还买了条旧地毯铺在地上，窗户上买了窗帘，床上买了床罩了和被子。只有女人知道爱情的美好不仅仅来自于其自身，除非是十七八岁的少男少女，而且还需要一个纵情作乐的舒适环境。而有的事是根本不可能解释清楚的。如果不同时伴随着抚爱和微笑，不同时眼对眼地真诚相望的话。啊，要是他责怪她也曾为以前的情人偷过东西，她凭着自己无限细嫩的双手，会多么温柔地去安慰他呀！她会从他的身上驱赶掉那个坏家伙的阴影，她会深情地向他忏悔！亚洛斯拉夫的

心绪很乱，他的信表露了对她的一往情深，但从中也可以看出，他正处在猜疑和嫉妒的痉挛之中。所有的人都会对他的猜疑火上浇油，谁又会为一个陷入囹圄的女人说话呢？对于她这样一个性格独特、心直口快的女人，一个生活如此自由放任，以至于使人们感到惊愕，感到震怒的女人，即便她仍然同他们有直接来往，也不会有人出来为她说话。他们还会推波助澜，煽动亚洛斯拉夫的嫉妒心理，而她又不在他身边！他们之间的惟一热线联系，是那个女审讯员。在她那儿，亚洛斯拉夫多次泣不成声，多次在门外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等候。他既茫然不知所措，又怀有一线希望，但愿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只不过是他的错觉。黛妮萨写的长信，他只能拿到别处去读，怕妻子发觉，读后还要烧掉，而读着这些信，他又觉得自己受到背叛，有说不尽的凄凉之感。

“如果他对您爱得这样深，他会等您的。”

“不会等。我对您说过，您必须亲自了解他才会知道。他身高一米九〇，体重一百公斤，练过健美，停下来后全身肌肉变成了脂肪。埃娃，这是个像座山样的壮汉，浑身充满了力量，他一天都离不开女人。”她双手无力地放在怀里，那么娇小，像个洋娃娃，我几乎不相信她能满足这么个巨人。亚洛斯拉夫的妻子长得也不难看，有点傻乎乎的，但这倒没什么关系，主要是她太懒。他在黛妮萨身上找到了一个燃烧着的火苗，不是一团火，一团火会烧掉一切，而且很快就熄灭，他那善良的性格会被一团火给吓住，他所追求的正是这纯净的、明亮的，随时一点就着的

火苗。她一说起他来，马上就充满了幸福，好像一只盛满了葡萄酒的陶罐。而在盛满了这种幸福的感觉后，她要停一小会儿，由于幸福而略微休息片刻。哪一个男人不希望有这么一个女人！她说过她喜欢小伙子，这下子可以说是完完全全如愿了。“我躺在医院的时候，他天天来看我，大夫是他的熟人，他允许我坐他的车出去。他们说这是手术的心理准备。第二天就要为我开刀了，所有的检查都做完了，睡醒一觉就要推我进手术室，可他仍像往常一样来了，又把副教授给说服了。最好的手术准备，是让他和我在一起。给我动手术的那一天，他只在门口晃了一下，我家里的人在我床边。两天后他又来了，把我从床上抱到洗澡间，他对护士说要给我洗洗，却把门给反锁了。我们没有空去小房间的时候，他就把车停在布热夫诺夫修道院，就在玛尔凯塔教堂上面一点，那儿连条狗都碰不上。他连一点点时间都不放过。”

“星期天呢？”

“埃娃！您想想，干吗巴尔季克要去酗酒？”

“哎呀，黛妮萨，像您这样的女人他可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哇！”

“那您以为他在我之前都做什么啦？”

她非常痛苦。但她是伊南娜，只为现在而活。

来鲁津监狱后的第三个月，她又写起长信来了，写了几封好长好长的信。这时我们被迁到老楼，老楼三层成了专门的女牢区。我们六个人挤在一间四人小牢房里，屋顶又矮，臭味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晚上我们要把六张床都

放下来，它们一张张挨得那么紧，连根手指头都伸不进去。我们一个个对躺着，互相对着脸呼气。黛妮萨睡在我旁边，夜里常有笔在纸上划的沙沙声把我弄醒，那是她写那又细又密的小字时发出的声音。碰巧我们还留下了几卷家里寄给我的卫生纸，那纸很软，可以折叠好多层，又很密，可以在上面写字。黛妮萨每张都从上到下写得满满的，然后把它卷成小卷儿，再用橡皮筋捆上，从窗户洞里送到我们楼下的一间牢房去。这是因为天边又出现了黛妮萨的新爱情！走出鲁津监狱，她当然会立刻跑去找亚洛斯拉夫，但又老是出不去。家庭，丈夫，孩子，当然还有情人和朋友们，整个外面的世界变成了一动不动站在那里的一幅背景，好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一样：这是一幅肖像画的背景，它同画中人活生生的面孔没有任何其他联系，只不过画中人物如果没有背景会显得太裸露。她对家里人、对情人都不再有什么影响，女儿嫁给了一个同她的想像完全不同的人，儿子不顾她的反对买了辆摩托车，丈夫正在申请离婚，亚洛斯拉夫又不来信。既然这样，那就让外面的生活照它的样子走下去吧，她在这儿也必须生活下去，而且就在现在，马上，就在这个时刻，就在这个钟头里。

但她不是去跟别人轻佻地调情，你们这样想就错了。我们这间牢房正好在楼下两间男牢房的上面，一间关着三个男人，另一间四个，我们的两扇窗户一扇正对着一间牢房。我们可以同一间牢房用便池的下水道通话，同另一间则用洗脸池的下水道。在这七个男人，以及再下一层楼的

七个男人—— 他们也跟我们搭上话了 ——当中，黛妮萨挑得一点儿也不错，她选上了也许是那时候鲁津监狱里最文明、最不幸的一个小伙了。他还不满二十岁，她为他把名字、出生年月日都改了，改得年轻了，这样才好跟他接近。正是因为这样，她大概还救了他一命。

他的名字姑且叫尤拉吧。他把自己的材料送给我们看了，正等着军事法庭以当逃兵和准备外逃的罪名审判他。他的这项刑事罪，至少按他自己所说的，是为了报复一个女人才发生的。一开始他同一名军官的妻子睡觉，后来不想同她睡了，但他不该在一次告别晚会上多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那位军官夫人向丈夫告发了他，而参加那个晚会的士兵朋友们又出于害怕做了不利于他的指证。

他，一个服兵役的士兵，当着那些证人说，他很想逃离共和国，因为他是个匈牙利族人，在维也纳还有亲戚。除了准备当逃兵的罪名和准备不经允许越过国界的罪名之外，还给他加了第三条罪名：准备盗窃军用物资，也就是那身军服，因为他们合乎逻辑地假定，如果他跑，会就这样穿着军服跑。尤拉是斯洛伐克的匈牙利族人，他在监牢里觉得自己被出卖了，没有希望了。他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妈妈一个亲人，而她只会说匈牙利话，她给儿子写的信往往要过很长一段时间，等检查员把它译成捷克文进行审查后，才交给他。被捕前他曾有过一个姑娘，但她往监狱里给他写的信里说要同他分手。对于一个年轻的男人来说，他所受的冤枉和委屈也实在太多了。

私下传递的信件对于这些完全无可奈何只能任由命运

随意摆布的囚徒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它是与人沟通的活通道，比谈话还更重要，因为它可以更加隐秘。于是，黛妮萨写呀写，不停地写，她也要把自己心中的不幸都写出来。她把信卷成一小卷儿，像中世纪克尔特人的民间歌手一样，从不给我看她写了些什么，并且做出一副像要抗拒的样子。因为我知道她对亚洛斯拉夫的爱情，我当然半个字都不敢提，这样会刺伤她，她会感到羞愧，从而永远都不会原谅我。不过，根据她眼睛里闪露出的光辉，和她那微微泛红的脸颊，可以肯定写的是情书。一切为了尤拉。她充满活力地，锲而不舍地，富于创造地向牢房提出了一个无声的口号，我也被带动起来了。

一切为了尤拉。我们是在一个新牢房区里，窗户上的铁丝网要比其他牢区厚一倍，而且从四面把窗框严密地包了起来。女牢区是监狱里麻烦最多的地方，如何把女人同男人隔离开来，使他们安静点儿，为此监狱当局伤透了脑筋。他们大概颇为这个新牢区自豪，副监狱长还曾经亲临此处，检查各个窗户，发现一个小孔也要叫人堵上。为了能把马放出去（这种事我和黛妮萨从来没有干过，总是让那些年轻点儿的去干），必须在铁栏栅和铁丝网四周的墙皮上掏出一些小坑，把马从小坑里拖出去。但小坑必须掏在很不显眼的地方，不让狱警巡察时发现。有的姑娘直接把铁丝岗捅破了，他们马上派人补好，还要那间牢房的人赔偿损失。有的掏掉了一块墙皮，他就补上一块铁皮。我们用小勺一点一点地掏，手指头和骨节处都磨出血了。我们轮流干，进展很慢，只能半毫米半毫米地往前推进，因

为墙皮是混凝土的。一切为了尤拉。我们把毯子四周锁边的线拆下来，这是些新毯子，是牢房里发现疥疮后我和黛妮萨去争取来的，那些线用来放马太棒了，它又粗又光滑，还很长，可以编成细绳子。一切为了尤拉。香烟可以从铁丝网边缘和墙皮之间的窄缝中轻而易举地通过，信也容易钻过去，难一些的是妈妈给尤拉寄来的家制肉肠和我丈夫给我寄来的酒心糖。给男孩们送几滴酒去！他们高兴得欢呼起来，一个得到的是威士忌，第二个是甜酒，第三个是李子酒。一切为了尤拉。早晨黛妮萨放马时，我就紧靠着门做操，看守如果在监视孔里观察，只能看见我，而看不到黛妮萨。一个星期天，我们的马被没收了，我就直接从毯子里抽出线来，做了个新的。一切为了尤拉。我们还得把马和骑手——我们很容易就用破床的胶合板做了一个——很好地藏起来，因为他们已经抓到过一次，对我们看得很紧，而我们还是找到了一个安全的藏匿之处，不过我在这里不说，只告诉囚徒们。

一切为了尤拉。“瞧瞧埃娃！”黛妮萨欢呼起来，因为她拖不动一个厚信封，急得生气了，直拽绳子，眼看着绳子就要拽断了，马也有掉下去的危险，此时我把她从窗户边推开了，“她也放马啦！”一切为了尤拉。当她把涨红的脸伸到法国式便池里（这是为了不必喊叫，而楼下又能听得清楚）同尤拉通过排水管说话的时候，我们就轮流站在牢门旁，监听着过道上传来的每一种声响，并且装着在监视孔的镜片里梳理头发。一切为了尤拉。

在监狱里没有比开诚布公、不怀鬼胎的人间友情更珍

贵的东西了。饥饿也能忍受，寒冷也能忍受，被抛弃的感觉却可以杀人。哪怕是只能找到一个人，哪怕是只能信赖他做一件好事，说一句好话，那就成了，就能因此而不屈不挠地熬过去了。而那个小伙子，那个士兵，却想到过自杀，他陷进了深重的忧郁之中，这是后来他的同牢难友们对我们说的。他整天整天地不说话，不吃饭，也不愿为自己辩护。世界丧尽天良，人不如猪狗，活着毫无意义。正是由于黛妮萨写的情书，使他后来没有时间再去考虑自杀。纸的一面是她写的，另一面则要他写，后来他不知道在这长长的纸条上写些什么，就教她认匈牙利字。他的最大爱好是汽车，他知道有哪些名赛车手和他们的最好成绩，黛妮萨从他的信中接受了很好的赛车运动培训。有一次，当他正在厕所同黛妮闲谈时，看守抓住了他，罚他不许采购东西来改善生活，妈妈寄的包裹也不给他。但他笑着接受了，悲观情绪已经从他身上烟消云散，而且，他反而担心起黛妮萨来。当看守第二次抓住他时，他可能还挨了打，对这他也只是摆了摆手，主要是有了给黛妮萨写信的内容。他惟一担心的，是怕把他调到别的牢房去。对审判他也不多想了，倒是想妈妈的时候多了，不过已经不再是那么悲戚戚的。是黛妮萨的感情使他从绝望的世界和监狱的怪影中，重新回到了人间。

一切为了尤拉。这既是沉洒于现在，同时也是倾心于人，顺从于感情。牢房里永远都缺香烟，大牢房的人员时常变换，总是有人没有烟抽。尤拉抽的香烟是黛妮萨给的，她每次都把烟分成两分，一半给自己，一半给尤拉，

然后再从自己的一半中拿些出来请我们牢房的其他人。她一次也没有对尤拉说，要他把香烟留给自己，不要又分成三份，分送给同牢难友。因为她想，如果他不给他们，他怎么好同他们相处呢？丈夫来探监时宣布要同她离婚，其中的一条理由就是香烟问题。女儿被单位解雇了，现在干的活儿挣钱比过去少，他一个月挣两千来克郎，儿子只能领一点很少的零用钱，黛妮萨被拘留后她的退休金又停发了，家里陷人了经济困难。她不怪他一笔笔仔细计算给了她多少香烟，请律师转交过几条，托女审讯员带过几条，包裹里寄了几条，还给她寄过多少钱，谁付钱谁有权嘛。她也承认，这么多烟她一个人怎么也抽不完。“我们为你省吃俭用，你却在这儿谁知道又养着什么人。”她听了这句话，就好像腰部以下被人重重地打了一拳。谁知道什么人？尤拉呀！把香烟留给自己，让尤拉在下面受罪，这种想法她根本不可能容忍。家里在为她节衣缩食？家离得远，尤拉靠得近。她省着给尤拉，尤拉有朝一日也会同样做。“这又不能怨他！又不是他要牢房里住三个人。他也不愿意在厕所里被抓住，闹得连烟也不能买。埃娃，我们总不能让他缺香烟嘛！”说她自私？如果家就在近旁，她也会这样对待。要是家里有人，愿上帝保佑他们，像她这样被关起来呢？为了帮助他们，她会去偷，会连最后一件衬衣都拿去卖了。

后来尤拉突然被带走了。约定的时间未到他就敲了天花板，在排水管道旁哭着说他要走了，信也没有来得及写一封。黛妮萨没法弄明白，他在说些什么可怕的事。“您

等一等嘛，您别说话，我根本不明白他说些什么。”尤拉要难友代他给黛妮萨写了封信，说他从来没有像爱她那样爱过任何别的人。难友信中还说，他曾经想自杀，多亏了你，黛妮萨，他才打消了这个念头。晕头转向的黛妮萨慢慢开始明白，她再也听不到尤拉的声音了，再也读不到他写的信了。在突然显得空荡荡的夜晚里，她常常失眠，老是两眼望着天花板发愣。我有时同她说说话，但这又会吵得其他人睡不着，于是我们就写，我们每人还剩有半卷卫生纸，就用它写信来交流一天的印象。什么无聊事、琐碎事我都拿来分析一番，只要她两眼不再发直。有时候她觉得有趣儿，随后又发起愣来。后来，她突然有了主意！尤拉在监狱的迷宫里无影无踪地消失了，但是，她有办法让他读到自己的问候。每天有好多盘子要进出牢房，早晨六个，中午十二个，晚上十二个，她在所有盘子上都刻上他的名字，来得及时还刻上：黛妮萨问候尤拉！她不断催我们快点吃，好让她在收盘子以前刻好字。我们推算盘子在监狱里周转的速度，如果尤拉在判决后提出上述，从而延长在鲁津监狱的拘留时间，那么，至少有一个盘子会转到他那儿去。有好几个星期黛妮萨一直生活在一种希望之中，希望小伙子喝完茶或者吃完汤后，会在沾有残渣的、颜色发黑的、早已变形的、刻有各种字的难看的铝制餐盘中发现她的问候。一切为了尤拉。

在关于尤拉的故事里，我还要补充一个情节。黛妮萨是带着伤残来鲁津监狱的，她有一个膝关节在两年前动过手术，另一个也在被拘留前几个月开过刀。她到接收科办

公室时还拄着拐仗，靠它平衡身体的重量，以免刚开刀不久还没有长牢固长严实的关节发生变形，但是，她的拐仗被没收了。她用这双脚走路时常常感到疼痛，发生痉挛，不得不吃药。几个星期以后，虽然走路不多，不过是从牢房到天井去放风，她还是带着无可奈何的悔恨心情注意到，刚开过刀的这只膝盖的髌骨已经开始向旁边移动，说明膝关节受力过多。监禁制度的最可怕之处可能在于，它毫不容情地把病人也关了起来。对于黛妮萨的每一次因病假释申请，检察官总是答称，她已经受到很好的照料。照料得确实很好，连她吃的一种叫布卢芬的药还要自己设法从外面买来。可那个勇敢的女人却能够把每一个不幸都尽量放在一边，离自己远些，而不愿忍受任何屈辱。我就是我，瘸了腿还是我！旁边牢房的姑娘们也能听见排水管里的谈话，她们嫉妒了，同时也看出了黛妮萨在伪装自己。各个牢房虽然是间隔着被带去放风，但间隔并不很大，所以他们还是能把我们一个个辩认出来。尽管她们应该知道，这令人作呕的管道传送的是爱情，或者正因为是爱情，这些心怀恶意的姑娘竟然警告尤拉：当心点儿，当兵的小伙儿，和你通信的不是一个年轻姑娘，像你想像的那样，而是一个上了点年纪—— 她们把所有三十岁以上的女人都看成是上了点年纪——而且跛脚的太太。他赶忙把这件事向黛妮萨讲了，她对他说，她们大概是把她当成别人了。我真佩服她，她不退缩，不害怕，不发火，也不抱屈，我就是我，谁比我更好，请她报上名来，我会揍扁她的鼻子。而尤拉更爱的是她那丝绒般温柔的信，而不是可

能的真相。

自从把我们迁过来后，我们有了从监狱往外远眺的可能，而我居然发现了一个可以在远处看见我丈夫的地方，这样就开始了我的亲人们每星期六的探望。他们只能看见我从墙和铁丝网之间伸出去的一条绑在绳子上的白手帕，要让他们知道这真的是我，那就必须高声喊叫。有两件事我从来没有强迫自己去做：对着便池说话和朝着窗外喊叫。这既是由于我的文明教养，也是由于我的自尊自重，我决不愿让那些监禁我的人高兴地看到，狱中的我已经同自由的我不一样了。但同时我又真希望能够确信我的丈夫知道，那个挥动手帕的人就是我。黛妮萨观察着我难以解决的矛盾心情，她突然爬到窗户上，同我一起并排坐在三层床的最高一层，并且做了我不能做的事：大声喊叫起来。她叫得多么响亮啊！这是被囚禁者的呼喊，早晨他们用这种呼喊相互问好，晚上他们用这种呼喊临窗大叫，声音传得很远很远。我的丈夫在远处的篱笆上挂了一束花（不久就被人偷走了），黛妮萨朝着他高声喊道：“伊尔卡，我爱你，埃娃！”红色的鲜花在很远的地方看上去只有一个小红点那么大，好像是摆在坟墓上的鲜花。这时我们都哭了：不自由在此时此刻被战胜了。要是丈夫下个星期六不来，不带一个新的花束来，我们会多么失望啊！“来啦！”黛妮萨说。那鲜花也有一些是属于她的。

到新牢房后，黛妮萨每天晚上又变成了她过去的那个王后。白天不行，白天是凶狠的狱警们的天下，晚上可就热闹了！她学会了一首忧伤的歌，传说是瓦尔蒂采囚徒们

的歌，她把它改成了黛妮萨之歌，临睡前我们齐声合唱这首歌互道晚安。我们举办了自己的吉卜赛野营，把重叠在一起的一层层床搬下来，铺上睡觉用的毯子和床单，换上橘红色的上衣和裤子，把褐色的运动衣裤和灰色的衬衣折叠起来，晚上点名后女看守长要来检查，然后我们就排成一行在铺开的床上——牢房里除铺开的床外再没有别的空间了——翩翩起舞，同时高声地、淘气地唱起来：

太阳快要入睡，
苍白的月儿在乌云中显现，
只有那座小岛，人们叫它塔希提，
在晚霞中依稀可见。

岛上驶出一条小船，
苗条的身子白色的帆，
船长，那个海之骄子站在船头上，
我不会忘记，他向着岸边呼喊。
岛上一位姑娘挥手召唤：
回来吧，亲爱的，回到我身边，
若不回头，你就将失去你的爱，
我把这朵白花扔向你身后的大海。

太阳快要入睡，
苍白的月儿在乌云中显现，
只有那座小岛，人们叫它塔希提，

听见夏威夷姑娘的歌飞向海面。

黛妮萨唱的时候老是走调，但她每一次都深深地受到感动。

我在鲁津监狱的日子快要结束的时候，那时，当局显然已经决定让我们回家，又把我迁进了过去的监狱病房，那是一间宽敞明亮的牢房。也许是为了不让我猜到什么，同时也把其他一些女囚迁了过来，一共三间牢房。黛妮萨也迁来了，但我们已不在同一间牢房，我们只能在窗口上说说话，只有一次在洗澡时见过面。后来他们就来对我说："收拾您的行李，您回家啦。"我敲了敲墙，但没办法说话，女看守就等在门外。所以，我跟黛妮萨连声再见都没有说上。

维　　拉

新来的姑娘有着天使般的面孔，处女般的身段。现实多么善于把自己巧妙地伪装起来，她便是一个活的例证。维拉什么都是，惟独不是天使或者处女，她是个癫狂的女孩。莉布什卡的预言应验了：“您等着吧，您会碰上真正的癫狂女孩的。”我本来是不打算写维拉的，我不愿写那些一点儿美好的东西都找不出来的人，但她不知不觉地成了赫尔嘉报复的工具，而已经开场的戏是必须演完的。根据我的观察，所谓“癫狂症”，从根本上说，就是癫狂者既没有能力，又缺乏热忱，没有兴趣去感知除自己以外的别的世界。他以自己为尺度，想以自己去衡量别人，然而，又往往因为自己这个尺度太短浅，所以常常碰壁，从

而发生“癫狂”，直到开始使用暴力去实现自己的要求，自己的想像，去实现自我。旁边一间牢房里有个癫狂的女孩，她每天都要殴打一个老太婆，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她老。“她不该老，一见到她我就发火。让她滚一边去，我不想看见她。”另外几个癫狂的女孩竟然想扒下一个弱智姑娘身上的皮。这个姑娘不让别人去厕所，她非常喜欢同男人闲扯，大概她那愚蠢的胡言乱语也使得她们发火了，于是就用指甲去撕她的皮，抠得她手上脚上都是血，她们一定还觉得很开心。弱智姑娘又哭又喊，我们在隔壁听着，觉得监狱里的一切似乎都过于夸张了，怎么可能会有人要把一个弱者慢慢折磨死呢？值班看守肯定也听见了，但她们过了好几个钟头才去，此时那个姑娘浑身都在滴血，看守只得带她去澡堂淋浴。癫狂者也会保护一些人的利益而反另一些人，癫狂者的领袖，他们的国王，会保护“自己人”，反对外来者。

维拉是在儿童收容所长大的。关于她妈妈，只听她说是个聋哑人，父亲，她说的“老家伙”，是吉卜赛人。回到父亲身边的时候，她已经十五岁了，肤色既非雪色，也不褐黄。她受到白人环境的熏染，看到了它的好处，想多多益善地尽可能获取，但又不愿为此做任何事情。她曾在纺织工厂当织布工学徒，这是个要求不高的工种，但她什么也不会，结果学徒工考核不及格，在6月里被开除了。她很生气，他们竟敢开除她。她原来预计从7月份起就可以领到工人工资，而不仅是学徒工的一点点零用钱。一怒之下，她离开了工厂，也从家里出逃。也许是由于收容院

的环境缺乏温暖，她学会了什么都争抢，如果不是凭力量去争抢，那就靠自己无法抗拒的容貌。她不能忍受失败，集体环境的影响使她养成了疯狂的虚荣心，养成了没有人可以超过她的心理。情感发育不全的环境使她失去了吉卜赛姑娘一般都具有的温柔、忠诚和顽皮孩子般的活泼性格。她的虚荣心特别表现在对物质的贪求上，她不像莉布什卡，根本不在乎感情的表示，对人与人的关系仅仅从物质方面去理解，给还是不给。爱情对她而言也只是赤裸裸的性关系。这是个感情干枯、心硬如铁的姑娘，但又很聪明，自以为注定会得到好一些的、更有身份一些的地位。她善于察颜观色，立刻就能摸到什么地方会有什么好处。她信奉力量，她的成长经历显然向她证明了，世界属于强者，弱者只有死亡。除非遇上比她更强有力的，或者看到物质上的不利，否则她决不后退。一个十七岁的少女就染上了这么多坏习性，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她是同一帮男孩一起晃到布拉格来的。在团伙里，她是惟一的女孩，是首领的情人，因而具有至高无尚的地位，她感到很称心。从摩拉维亚来布拉格，他们一路上靠偷盗沿途的花园别墅为生。她的情人，据说是个医生的儿子，大学生，是个偷车狂，每见到一辆他喜欢的汽车，总按捺不住要撬开它，开出去兜兜风。“这全怪他家那个老家伙，从不许他开家里的车。”这些女孩对于作案的心理状况一般都很了解。情人到布拉格后，正要去撬一辆外国车时被当场抓获，当时维拉在远处看到情人被抓走，赶快躲了起来。此时团伙对她已变得无用，而且危险了，他们

老是缠住她，她悄悄摆脱了他们。当自己也被抓获后，她供出了情人的许多情况，什么关怀、忠贞、温情、理解、礼貌、善良，所有这些概念她都认为可笑。“饶了我吧，你们是哪个时代的遗民啊！”有一次黛妮萨把她叫做尿出来的小妖精，她感到特别受宠，洋洋自得地说：“是的，真被你说准了。”请别理解错了，她这可不是愚蠢。我在鲁津监狱至少认识了十个像维拉这样的女孩，她们有着相似的出身和遭遇，都是被警察在迪斯科舞厅抓获的，都在阿波里纳什皮肤病医院受过检查。她们中谁都没有正当职业，靠卖淫和小偷小摸过日子，几乎都在儿童收容所待过。她们从全国各地来到布拉格，是想在这儿寻求冒险的甜蜜生活，她们满足于这种生活，沉湎于其中的一些微不足道的享乐。这是她们的命运，她们无力与之抗争。只有维拉例外，她渴望在这种生活中出人头地。在来布拉格还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她已经混进了那些较大的鱼儿当中，开始倒卖外汇，攒了不少外币，还投靠了一个同一些德国人有来往的年轻女人，这些德国人都对布拉格的廉价姑娘感兴趣。据说那个年轻女人同一个联邦德国商人，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男人有了孩子，他在布拉格租了套房子给她住，供养着她，好像还要同她结婚。维拉一再向黛妮萨发誓，说那个女人是她的女友，不是拉皮条的。无论凭经验还是凭关系，其他那些女孩根本比不上维拉。但是，她在布拉格还是染上了疥疮和淋病。我倒不认为这是因为她蠢，而是要怪她过于自负，怪她过于愚蠢地相信这类病根本找不到她的头上。维拉在监狱里也没有闲着，她让我把

“我有自己的住处”“跟我来吧,我很棒”“四百马克就干”等句子翻译成德语，她照着读音抄写在用卫生纸做的小本子上，大声地背诵。这是她惟一不感到讨厌和烦闷的事，也许吃饭除外，连洗澡都要硬逼着她才去。维拉什么事情上都要略微过点线，线内我们可以理解，线外就至少需要对她多加小心。她只认欣赏她的人，而她身上又有什么东西值得欣赏呢？

说她缺乏教养，这个词未免太弱了。她深信自己不可抗拒，常常毫不犹豫地说一些粗俗的大话。她大声打嗝，打得特别响时还自个儿哈哈大笑。她放响屁，每次都要站起来放，放一个屁撅一下屁股。她自以为这样很有风趣，很迷人。其实，这是引起别人的注意和兴趣的一种方式。黛妮萨请她抽烟，她表示感谢的方式是把烟雾喷到黛妮萨脸上，以为这样同黛妮萨的关系就会靠近一些，亲密一些。见到任何好点儿的东西，她都会馋得发慌。吃饭老是望着别人的，一日三餐都要看看别人盘子里盛的是什么，而实际上，由于我们两个都是成年人，都把她当孩子看待，她每次得到的当然都是最大、最好的一份。什么我们都分给她一份，家里寄来包裹时，总是先分一些给她，然后我们自己才吃。她却常常因为别人有而她没有这个事实本身而生气，所以，她就随心所欲地偷，偷窃对于她简直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事，就像走路和说话一样，又好像是要用这种方式来消除人间的不公平。要不是黛妮萨坚决制止，她在牢房里也会偷。她不爱干净，这对于一个姑娘来说简直令人无法相信。她不刷牙，说她的牙好，监狱发的

运动服本来就够丢人的，每次换洗后她很快就弄得很脏，沾满了食物残渣，圆珠笔油，甚至鼻涕。牢房里的暖气本来就很可怜，一共就那么薄薄、矮矮的五片，一天开三次，靠这么点微弱热气来驱赶这地窖似的牢房里的寒冷，当然是驱赶不了的。监狱当局在冬天刚来时还采取了一项“卫生措施”，说是因为牢房通风不足——有的牢房确实因为香烟的烟雾闹到了伸手不见五指的程度——而在窗户框上钉了一块两厘米厚的木条，于是窗户就有了两厘米的缝隙，再也无法扣紧关严，牢房里也就白天黑夜都有风。而暖气片刚刚开始有点热，维拉就跑到它前面，往地上一坐，全部热量都吸进了她的运动服，进入了她的身体。

“维拉，坐到暖气片旁边去，让热气也能流到屋子里来。”

“我冷。”

“我们也冷。”黛妮萨像母亲一样坚定地说。

“你们该先坐到这儿来，那不就不冷啦。”

“这种无礼的事我们想都想不出来，你这个滑头。”

她笑了：“那是你们的错。”

直到黛妮萨威协说不再给她香烟，她才站了起来。

出于把自己说得好一点的愿望，她还企图在我们面前冒充意大利人，后来羞答答地退回去了，因为我们把她看得太清楚了。在其他一些牢房里，特别是男牢房里，倒都真的叫她意大利人。她是从两种事情上引申出她的意大利人身份的：一方面她长得有点儿像吉娜·劳洛勃丽吉达，相似的颧骨高高地向两边突出，两只大大的黑眼睛也长在

相似的地方。但是，她的眉毛太粗了，完全是一对贫民的眉毛，黛妮萨还经常替她拔。而她的头发散发出的更是不掺假的吉卜赛人的气味儿。听起来这好像有点种族主义的味道，但事实就是如此。我记得伊琳娜·杜布斯卡曾经在什么地方带着一种发自肺腑的羞愧心情写过，在一次黑人家庭盛宴上她差点儿没有晕倒，因为黑人身上散发出的气味也跟我们的不一样。后来维拉长胖了，胖了好多，因为她无所事事，穷极无聊，就整天不停地掰面包拌果酱吃，结果她脸上就显出了那并不高贵的吉卜赛女人特征，而天使和劳洛勃丽吉达也都无影无踪了。另一个使她和意大利接近的，是她有个未婚夫在那边。如果不是她说的第一句话，那么肯定第二句话就是吹嘘她要嫁到意大利去。一个年轻的意大利人在迪斯科舞厅里看上了她，他是个古董商，美男子，阔佬，常领她到他在布拉格的住宅去，还给了她一枚定婚戒指。但到住宅去的时候，他们乘坐的是18路有轨电车。

“他就没辆汽车，既然是阔佬？”黛妮萨问。

他坐18路是不想让警察注意他。如果那位未婚夫是这样的一种美男子和阔佬，就像维拉是意大利人一样，那么，他们俩在一起可真是美妙的一对。

“他叫什么名字？”黛妮萨像妈妈一样问道。

“马里奥。”

“姓呢？”

不知道，充满自信的她并没有因此而不知所措。今天不知道，明天就会知道。马里奥回意大利看妈妈去了，要

让妈妈做好迎娶新嫁娘的准备，因为有钱的意大利人是喜欢举行家族婚礼的。

“可你现在在鲁津监狱，他回来后怎么找到你？”黛妮萨故作关切地问。

对于这个问题，自信的维拉也不多加考虑，他能找到她。

“跳迪斯科的女孩可多得是，”黛妮萨说，“他会找别人的。”黛妮萨向我使了个眼色，您注意，现在让我来观赏一下我们的这位意大利女郎。不过，她是善意地取笑维拉，我们两个人都被她那天使加处女的外貌迷惑住了。我们把她当做是一个陷入不幸的正常女孩，不想以冷漠的态度对待她，看着她越陷越深。

“可他恰巧只爱我一个，”维拉说，“有一次他来舞厅，我正好同我们那帮人在一起，当时我还没有同他们分手，马里奥看见了，就一个人喝酒，醉了后一个人独自走了，瞧他那副醋劲儿。第二天，我想把戒指还给他……”

“你还想还人家什么，你这个白眼儿狼！你那个戒指又在哪儿呢？”

“他们替我保管起来了。”

“十三块半一个的染金首饰，是吧？”

“正相反！它是真金的，还镶有一颗蓝宝石。随便就可卖几千块。而马里奥没有拿，证明他爱我。”

“他爱你主要是因为被你传染了淋病。”

“他不可能从我这儿染上淋病。”

“别撒谎！你说什么来着，在阿波里纳什给你治的是

什么病？梅毒还是淋病？”

“淋病。”

“就是嘛。听我说，维拉，你有没有想过，检举你的说不定就是他。”

“不可能，他已经回国看妈妈去了。”

“你还是未婚妻呢！埃娃，您听见了吗？未婚未前脚刚离开布拉格，她后脚就染上了淋病。你到底知道不知道是谁传染给你的？”

“这不都一样吗？反正我已经治好啦。”

“听我说，维拉，”黛妮萨朝我眨了眨眼，“是不是正好相反？你是从他那儿得的淋病，然后他就回国看他那位有钱的妈妈去了。”

从马里奥——或者别的什么人——那儿，维拉倒是得到了三个意大利字眼儿，这也就是她的全部意大利嫁妆：pronto，cento，amigo（意为立刻，一百，朋友）。“马里奥！”她双手伸向窗户，可那窗户是朝北开的，“amigo！你什么时候回来接我呀！”

“Pronto 就回来，pronto，等 cento 年以后吧。”黛妮萨这样安慰她。

维拉的淋病倒是治好了，可我们却从她那儿染上了疥疮。她的背上、腿上都起了好些脓包，她坐在地上，把两条细腿伸到自己面前，不停地搔痒。

“维拉，别抠出血了，要不会感染的。”

“我痒痒。”

“你是长疥疮了吧。”黛妮萨说。

她生气了，“我从哪儿来的疥疮！”

“在你得淋病的地方。”

“恰巧这是湿疹，我皮肤细，从小就害湿疹。”

她拒绝去看医生。她，像劳洛勃丽吉达的意大利女人，是不可能长疥疮的。她用她那沾满黑色污垢的又长又硬的指甲，不断地在腿肚子和胫骨上搔痒。我想起了安蒂，她的指甲刷得多白啊！后来黛妮萨的胸部也出现了脓包，我们赶紧去请医生。维拉在远处嫌恶地望着黛妮萨的脓包说，“说不定就是您那儿得的，我们的床靠在一起，我还从您那儿拿香烟。”

训导员给黛妮萨和我每人拿来一小瓶白色药水，要我们预防性地往全身上抹。这以前医生已经给维拉开了臭味儿挺大的氧化锌药膏。她嫉妒地看着我们用没有臭气的药水，而当黛妮萨替她往背上的脓包抹药膏时，药膏又太浓，老是沾不上去，她冷笑着说：“给了你们好药水，可你们还得闻我的臭味儿。”

维拉的爸爸此时也在监狱里，他已经是第三次因为同样的原因坐牢了，三次都是打人致伤。对于爸爸的残暴，维拉反而引以为荣，现在父女俩都在监狱里，维拉倒觉得跟爸爸更亲近了。关于爸爸进监狱的消息，是继母写信告诉维拉的。信里说她没有把维拉被拘留的事告诉爸爸，希望维拉比爸爸早获释，这样就可以掩盖维拉的丑事，不让爸爸难过。信的内容很宽宏大量，我不觉得它是一篇官样文章。维拉的继母是个白人妇女，年纪比维拉的爸爸大，大概是很难找对象，所以嫁给了吉卜赛人。在一个大家都

认识的小地方，下决心嫁给一个吉卜赛人是需要勇气的，也可能是由于绝望的孤独。维拉的爸爸同她结婚，是因为她拥有一所私房，结婚后他就成了主人。他们住在北摩拉维亚一座小城城郊，继母在卫生站工作，经常开着车到全县各地去灭鼠和清除其他传染病菌的害虫。开始时她可能同这个吉卜赛人生活得还很幸福，她替他把啤酒买回家，免得他去泡酒馆，同别人打架，她自己也开始注意梳妆打扮，维拉没少嘲笑她那副老来俏的模样。看来这个吉卜赛人并不是唐璜，他更看重有一个好的住处，使他能当上主人，所以他经常和妻子一起安静地待在家里。他也经常洗澡了，还在花园里为自己做了一张摇椅，让妻子在一旁伺候他，活像个吉卜赛伯爵。

后来家里突然来了个十六岁的维拉。继母毫不犹豫地、非常自然地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为她在阁楼上布置了一间小房间，给她买了不少衣服，替她在纺织厂争取到学徒工的位子。吉卜赛人以前几乎不认得自己的女儿，总共他才去收养所看过她几回啊！现在女儿已经是个漂亮姑娘，还挺崇拜他这个“老家伙”，他在她身旁更多地觉得是个受宠的男人，而不是父亲。维拉终于走出收容所，成了自由人，她渴望发泄自己的野性，满足自己不受任何限制的好奇心，所以，她需要获得不受拘束的绝对的行动自由。而“老家伙”又不像继母那样老是禁止她干这干那，他什么都答应，允许她涂脂抹粉，抽烟，喝酒，天天晚上在外面游晃。她一想起继母就恨，虽然在监狱里她只收到过继母给她写的惟一的一封信，而且，除了坐牢的爸爸外

她再没有别的亲人。当她读这封信的时候，把脸拉得长长的，冷笑说，“这头老母牛，她还要我怎么样！”她把信撕成碎片，扔进了便池。她自己不给家里写信，只是寄去了准许邮寄包裹的证明。那头老母牛在圣诞节前给她寄来了包裹，里面还有她过去不许维拉抽的香烟。

那个很可能不漂亮、不机灵，但却是守规矩的灭鼠员发现了“老家伙”和维拉一起躺在床上。这倒不是她有意监视他们，跟踪他们，而是他们对自己的行为太无所顾忌了，某一天不可避免地要被她撞见。这以前她已经要求过维拉不要在父亲面前换衣服，不要在他面前赤身露体，要她到自己阁楼上的小房间去，但维拉却故意要刺激她爸爸，这个离她手头最近的男人。这些都是维拉洋洋自得地对黛妮萨讲的，她甚至还说，看那头老母牛敢干涉他们之间的事。继母想在自己的屋檐下上吊自杀，爸爸听见她踢开凳子时弄出的声响，赶在最后一刻割断了绳索。维拉反而把继母的未遂自杀描绘成自己的痛苦经历，说：“老家伙发火了，既对我发火，也对她发火，我不得不当天晚上就逃走，到一个女朋友家去住。她住在邻村，天下着雨，我冷极了。我没有来得及把一双长筒皮靴塞进包里，留在那儿了，但那头老母牛必须还给我，等我一出去，马上写信向她要。”

“姑娘，你简直就是颗炸弹，你掉到哪儿，那儿就被你炸得一塌糊涂。”黛妮萨说。

很可能就是这次事件使维拉又离家出走了。爸爸也开始去泡酒馆，在那儿和别人打架，再一次被关进监狱。

所有这些女孩都沉迷于性关系，跳舞，醉酒，性，她们靠这些去摆脱生活的空虚。但我觉得就是在这方面维拉也略微越过了适度的界限，这里的适度界限，是从她好奇的年龄，以及，说到底吧，从她将来的职业角度说的适度界限。她去做妇科检查，回来后兴奋地说，“那是个男大夫。”

“怎么啦？”

“他还没碰到我，我已经那个啦。”

我和黛妮萨相视而笑，显然她是从哪儿听说的。

后来，有一个星期六，牢房里冷得要命。星期六、星期日办公室里没人工作，监狱里几乎就没有暖气。在屋顶矮一些的牢房里，由于呼吸、抽烟和人的体温，空气还略微温和一点，而在我们这五米高的屋顶下，那个冷劲儿真可怕极了。我请求看守允许我们从澡堂里打点开水来，冲杯柠檬茶喝，稍微暖和暖和。值班的是海伦娜太太在波赫尼采时的熟人托尼契克，他在我到澡堂去打水时到我们牢房待了一会小儿，那时维拉还没怎么发胖，看守被她的美丽所打动。“你为啥到这儿，这么可爱的一个姑娘。”他惋惜地说，“你一定是很调皮捣蛋吧。”

维拉在靠门边的凳子上坐着，看守进来时也没有站起来，像监狱章程规定的那样。看守也没有大声嚷嚷，这是怎么回事儿，看守跟她说话还不站起来，相反，他俯下身来，摸了摸她的头。但他马上就把手缩了回去，赶紧从那个像劳洛勃丽吉达的安琪儿身旁后退了一步，免得闻到她身上的气味儿。“可你得洗洗头发了。”他略带责备地说。

他刚一关上门，维拉就大声说，好让他听见：“这样的我愿意给他！”

“看守？”黛妮萨生气地反驳道，“而且是这么老的一个看守？这儿只有那些最不要脸的女人才干。”

“这儿只有他朝我微笑。”

“这算什么!”

“还摸了我。”

“可他马上就跑去洗手，”黛妮萨说，“而且做得对，我老是给你说该洗洗头啦。”然后她警告维拉：“好好听着，维拉，要是你哪天敢在这间牢房里跟看守那个，那就对你不客气了。”

到了后来，在维拉被关到地窖，我们可以判评自己的先见之明和错误判断的时候，我们都庆幸没有允许她到便池去找人说话。爱情和性搅动着囚禁生活，这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最自然不过的方式，也是值得同情的，但很少有人做出那种赤裸裸的淫秽污浊行为。旁边一间牢房里有一个年轻的街头妓女，是个长得挺好看的姑娘，而且，更主要的是个善良的姑娘，属于逆来顺受的那种类型。她总是一贫如洗，尽管她很肯干，挣的钱不少，但她连自己的孩子都养不起，只得交给妈妈抚养。她沉重的生活负担来自那些没有良心的男性同伙，为了他们，她常常弄得自己身上一文不名。她从街上来到葡萄酒店，团伙里的一帮人就会告诉她，说他们身无分文，正等她来替他们付账。她要么拿出刚挣来的几百块，要么再回到街上去挣，而此时团伙里的人却心安理得地用她的钱来寻欢作乐。她在监狱里也

非常友善而乐于助人，常常举办集体性关系听讲会。当她在便池排水管里讲起性爱的快感时，我们楼上三层楼共六间牢房的男人们马上鸦雀无声，入迷地听她说。维拉后来在别的牢房里争得了在便池旁说话的自由，但是，她的讲述是那么下流低级，简直不堪入耳，所以，只要她一开口，那三层楼的男人们就吓得赶忙拉水箱，谁也没有给过她半根香烟。据娜金卡说，关于娜金卡我后面再讲，维拉再次被关进地下室后，大家都松了口气。

后来我们才明白，她和我们在一起时一定闷得要死。她不会玩牌，只能瞪着眼看黛妮萨横来竖去地摆弄，又不喜欢阅读，一篇连贯的文字都看不下来，特别是她对什么都没有兴趣。她常常独自一人呆呆地回想那些倒卖外汇的经纪人，在地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用圆珠笔在看过的报纸上胡乱画来画去。她听见隔壁牢房的姑娘们透过窗户同别人闲谈，听见她们大声叫喊着拖“马”，如饥似渴地侧耳倾听她们打架、尖叫，有时晚上她也试着朝过道呼叫，但谁也不答应，都不认识她。在夜晚的音乐会上，她也曾自信地从窗口对着天井唱歌，但没人为她鼓掌，她曲调唱不准，词又记不住，常常唱到一半就用啦啦啦啦来代替歌词，嗓子又绷得过紧，喊得太凶。就是在监狱里你也必须会点什么，才会得到人们的赞赏。她感到孤单，而对于被监禁，她本来应该是如鱼得水的。慢慢地她对我们产生了厌恶，因为我们不赞赏她。我们的错误在于把她当成了一个遭遇不幸的小东西。

女牢区去医务室，是每星期五晚上报名，星期一看

病，训导员带着登记本到每个牢房来之前，就会听见喊叫“看病的来登记！”医生的候诊室是监狱的交际中心，秘密信件都带到这儿来，有的女孩内衣里塞满了信，口信也在这儿传递，情人们在这儿会面，情敌们也到候诊室来打架。许多女孩为了同别的女孩会面，或者为了交一封信，甚至宁肯让人把牙拔掉，如果实在找不到其他理由来医务室的话。莉布什卡，这个很有个性的女孩，就在这儿失去了两颗牙，两颗牙是同时失去的，因为她在这儿同对手打了一架。另一个女孩，她的名字叫米莲娜，则在监狱里建立起了广泛的联系。当她去牙科看病的时候，她的男朋友正好被关在地窖里，而且是可以通过候诊室的水管子谈话的那一间牢房。医务室在五楼，惩罚被监禁者的牢房在地下室。米莲娜不仅在那儿同男朋友谈话，还曾经从候诊室给他送下去一匹“马”。

赫尔嘉原来不去医务室，她很注意健康，什么药都不吃，怕养成一种危险的坏习惯，连我的维他命片都不要。“谢谢，我不需要补。”每次还都要朝我笑一笑，她对我服用这种“兴奋剂”持批评的态度。可是，刚把她迁走，她就开始每个星期一都往医务室跑了。她先是遇见了黛妮萨。“听我说，埃娃，那个赫尔嘉是不是胸脯高高的，腹部圆圆的，肚皮都快塌到大腿上了？她穿一身束腰的运动服，从背后看像个男人。”

“是那么个样子。”

“这个人在候诊室里逢人就问，你是那个牢房的。我告诉她牢房号后，她就同我闲扯起来，主要是问您的

情况。”

“ 她问什么 ?”

“ 也问到您是不是还在当眼线。 ”

“ 您怎么说的 ?”

“ 我说，我在您这儿从没见到过任何这类事。 ”

“ 您真好。”

“ 好好听我说，埃娃，我可不这么小看这件事。您必须做点什么！这是非常危险的，我想大概不必向您多解释。”

“ 我怎么做？每个星期一去医务室，告诉所有的人我没有当眼线？或者对着过道喊叫？要是她这么肯定，她为什么不大声喊一喊？这儿一般是这么做的：要想捅死谁，先把他叫出来。或者我该去同她决斗？把她叫到候诊室去打一架 ?”

“喏，我知道这是愚蠢的。 ”

“ 黛妮萨，这种事根本没有任何办法，没有任何积极的办法。她应该知道。她也应该知道我都知道些什么。这还真是个设想得很巧妙的报复。 ”

“ 要是你们在劳改营相遇，她会在您前面去那儿，这种诽谤也会在您之前先到。 ”

“ 该来的，会来。在劳改营里也会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不会只听一个什么赫尔嘉说了些什么。 ”

“ 您幸运的是，她看上去根本不像个可信的人，而是一副下流无耻的样子。 ”

后来维拉在医务室遇见了赫尔嘉。她没有马上说，而

是先把我打量了一番，然后，更多地朝着黛妮萨，而不是朝着我说：“那儿有那么一个胸脯挺高的太太问起您，我一开始还不知道问的是您，说您是个作家，真的吗？”

“是呀，是真的。”黛妮萨代我回答。

“那个高胸脯太太对我说，要我对您提防着点儿，说您是个眼线。”

“那你就对我多加小心吧。”

“埃娃！”黛妮萨喝住我，“您还要为她帮腔。而你，维拉，以后再也不要理那个女人了。”

“她说，训导员把您带出牢房，您后来却说是去受审讯。”

“小维拉，你听着，这话你留着悄悄对自己说吧，我可不要听。”

维拉是第一次被监禁，她本能地感到，以后这将是她的家常便饭，所以她处处留心学习。她特别留意把自己跟我作比较，她那嫉妒的小心眼不会不注意到，总检察院给我们这些政治犯提供了一些好处，而主要归监狱当局管的刑事犯是享受不到的。维拉很自然地，像我们的立法机构一样，不区分政治犯和刑事犯。所以，当总检察长的代表来问我对监狱有没有什么意见时，她说：“我也想有人来问问我有什么意见。”我们还可以每个星期给家里写一次信，而且是副监狱长到牢房来当着维拉的面通知我的。我们在拘留期间还接受过几次探视，这可是破天荒的事。如果不是审讯员在审讯过程中安排探视，鲁津监狱的被囚禁者只有等到判决以后，经法院同意才能接受探视。而且，

实际上来探视的很少，因为探视会给看守们增加很多麻烦，他们虽不能拒绝，但可以往后推，推到犯人被押去服刑以后。所以，家属只有到劳改营去同犯人见面。我们自己并没有为争取这些好处出过力，谁也没有提出过这些要求，是我们的家属奋斗来的。圣诞节前检察官又一次批准我们接受探视，所以，我们在还在牢房里过了圣诞节。

“您知道，埃娃，我有多么爱吃鱼吗？”黛妮萨兴高采烈地说。

鲤鱼，猪排，生菜，糖果，烤甜点，芝麻糖，花生，柑橘，香蕉。香蕉市场上买不到，我丈夫路过一家糕点铺，那里用布丁和巧克力酱装点南方水果，橱窗里还摆着一盘巧克力酱裹香蕉，丈夫就跑到制作间里对他们说：“我妻子在做牢，是因为文学，是无辜被监禁的，求求你们，为了她卖给我一根香蕉。”结果卖给了他三根，我们每人一根。

后来黛妮萨对维拉说：“埃娃和我，我们一直对你很好，什么都分给你，而我们本来是可以不理你的。”维拉回答说：“有人给，我干吗不要。可以不给嘛。我什么都不希罕。”

“维拉，你别让我发火！你什么都不希罕？你不想要我的香烟？你说呀，从今往后你甭想抽烟。”

“您甭数落我。您要是想数落我，就不该给我。”

“谁也没有数落你什么，小傻瓜。喜欢数落别人的人是什么也不会给的，恐怕你还不知道哩。我只是给你解释，如果一个人对你好，那么，他希望你也对他好。如果

别人从你那儿得到的尽是粗野无理，那谁都不会再理你啦。”

“那样的话我也未免太愚蠢了。”圣诞那一天还是在游戏和互赠礼物中度过的。黛妮萨做了一株小圣诞树，维拉给我们两人在树下各放了一小块巧克力。圣诞那一天来给我们更换衣物，过道勤杂工把洗好的一包包床单、睡衣、被套、毛巾放在门外，一人一包，黛妮萨负责交脏的衣物，我负责领洗干净的，而维拉却说：“您又领到一条比我好的单床。”

有时候送来的床单真叫人害怕，洗得很旧了，还带着血污，皱巴巴的，还有撕破了的。因为给过她们水果或者香烟，勤杂工这次给我们挑了些好一点儿的。我们大家都领到了好一些的床单，黛妮萨给了她们十支斯巴达香烟。

维拉站在自己的床边，没有铺床，衣物抱在怀里，她还没有打开看，不知道自己的床单是什么样的，只是重复说：“你们的床单都比我的好，我要好点儿的。”

我已经把床单套在床垫上了，我说：“维拉，我们何必为这点小事争吵。我看过你的那条，是干净的，没破，要是不好，我会还回去的。你打开看看吧。”

她仍然把衣物抱在怀里，轻声地、非常憎恨地说：“你这个畜生!”

一开始我还没弄明白，她是冲着我说的。我差点儿就要开口为勤杂女工们辩护了，因为在一种不敢相信自己耳朵的惊愕中，我还以为是在骂她们，后来我才注意到句子的主词。粗野无理对于我是比寒冷和饥饿更坏的惩罚。只

有扣压我的家信比这更令我难受。我一直在想，什么时候能不再听到那些不断传到我耳朵里来的粗话，可是现在令我惊愕的是，这个下流的粗野的女孩居然直接对我说出这种话！“你已经说了，但不要再说。我也会很强硬的。我警告你。”她轻蔑地微笑着。“维拉，一个人善良，但这决不意味他软弱或者害怕。”

她放大了嗓门重说了一遍骂我的话：“你这个眼线畜生。”

于是，事情就发生了。请你们放心，我没有来得及打她。她有第一个说话的优势，也有第一个出拳的优势，这就是进攻者的好处。她把我推倒了。这一切来得那么快，我甚至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从我头上揪下了一把头发，什么时候想用她那肮脏的长指甲挖我的眼睛。我也不知道，黛妮萨是什么时候朝她扑过去的。我清醒过来的时候，我已经倒在自己的床上，黛妮萨正用整个身体和全部力量把维拉按在她的床上。维拉四脚乱蹬，想踢我，奋力想从黛妮萨身下挣脱出来。黛妮萨竭力喊道：“维拉，住手，住手！”这也许是最有震撼力的一声喊叫。

后来我们在一起说笑，她还没来得及这么着把凳子往后一踹，就朝那个粗野的、肥胖的、憋了一肚子火的丫头扑了过去。她一条腿还没有治好，就挺身出来保护我，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又是对我多么大的情意啊！要是没有她的保护，我肯定要遭受可怕的伤害。维拉一直要挣脱出来打我，直到她踢着黛妮萨那只病腿，黛妮萨疼得大叫起来时，她才住手。后来她背朝我们坐在桌旁，把脸埋在手

掌里，可以看见她背上的肌肉像马背一样一阵一阵地颤抖。黛妮萨还看了看她的眼睛，她说她两眼充血，一片血红，她从来未在任何人那儿看到过这样可怕的眼睛。听说马在发狂时，眼睛也是血红血红的。

维拉还在我们牢房里待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夜里她故意不睡，想让我害怕。“您睡不着，是不是？您怕了。您被我吓坏了。”很奇怪，我不感到害怕。经过那一场以后我倒轻松了，维拉自己使我解脱了处处关心她、尽量理解她的义务。我再也没有对她说过话，好像牢房里没有她一样。我从门口走到窗户去，她不得不赶忙跳到一旁。我梳理了被揪下来的几撮头发，头发很长，捏起来满满一把。我还故意幽默地对黛妮萨说；“现在至少梳头方便些了，我的头发也太多了，这会儿刚好。”维拉殷切地想同我就揪下的头发开个玩笑，从而冲刷掉我们之间的冲突，所以就嘿嘿嘿嘿地笑了起来。可是她愣住了，我们根本不理她。她不能想像，居然会有人完全不理会她的存在。“我们从一开始就该这样对待她。”黛妮萨说。

那一次的凶残场面深深伤害了黛妮萨。她注视着维拉的一举一动，留意她的每一句话、每一声咳嗽、每一个粗俗的动作。一闻着她的气味儿就恶心，连饭都吃不下。在维拉还在的这一个星期里，她可受够罪了。她不想发作，但她知道这早晚是避免不了的。她感到特别难受的是，由于她的热心肠，居然对维拉这种人也那么好。但是，因为黛妮萨没有站到她一边，维拉就故意做了一件十分可恶的事来报复她。黛妮萨在小柜子里藏有一份剪报，大扫除时

她都把它保下来了，当时剪报已被没收，扔在过道地上，她硬是给要了回来，因为那上面登有一张她女儿在商亭卖鲤鱼的照片。维拉常拿报纸去乱画，她偷偷地把那张剪报也拿去胡乱涂抹，然后扔了。

我们商量好了，由我出面告维拉。打架的时候，黛妮萨注意到监视镜动了几下，看守正和过道勤杂女工在不远处为其他牢房更换衣物，她肯定听见了黛妮萨的叫声，但是没有干预。我想等到训导长来的时候再对她说。除夕那天，她亲自来问我，是谁打伤了我的眼睛。我们把揪下来的头发给她看了，她立刻带走了维拉，罚她三天单独禁闭。我真不愿看见她受此惩罚，但我们很幸运，终于只有我们俩了。维拉还准备在除夕之夜对着窗外和过道大闹一番，而黛妮萨在圣诞节的几天中心情一直很忧伤，只渴望安静地好好睡一觉。后来我们听见维拉在唱歌，黛妮萨在所受伤害的影响下，一直还在警觉地留意着她。娜金卡对我们讲，维拉的淫秽言词闹得她后来去的那间牢房苦不堪言，训导员又把她押进了地窖。她是在便池旁打电话时被当场抓住的，训导员就在门外听着，她还在不断重复自己的独白，训导员都站在门口了，她还在土耳其式便池的踏脚板旁跪着，而且还瞪着眼矢口否认自己的错误。她又吵又闹，说她不应该受罚，因为她没有过错。这个训导员为人挺不错，只要她认个错也就算了，结果也被她惹火了，决定罚她单独禁闭。维拉拒绝离开牢房，一开始躲到桌子底下，以后又躲到床背后，看守们走近时她还乱踢，后来，训导员朝她眼里喷了催泪瓦斯，牢房里所有的人都泪

流不止。最后，训导员叫来了两个男看守，把维拉铐上带走了。他们经过我们的牢房顺着过道走过去，维拉边走边哭喊。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听到过关于这个女孩的消息了。

赫尔嘉（最后一回）

赫尔嘉——还有其他的所有仇敌——可以感到高兴了，因为我在监狱里挨了打，我和赫尔嘉话别的时候也到了。

1月中旬，女牢区迁到了老楼三层，看守们利用搬迁进行了一次大清查。我们把自己的东西小心包好，免得路上撒了，再放到毯子里，捆成行李卷。我们刚拿着行李卷走出牢门，就又命令我们："行李卷放在地上，打开。"过道上站着十来个看守，地上到处是信、衣物、各式各样的纸片、塑料袋、食物、小勺、药，更主要的是地上很脏，撒了不少早饭时喝的稀咖啡汤，而且被踩得到处都是。

"可我们用它盖呀。"我说。根本找

不到一块没有稀泥的干净地方。

“快点儿，女人们，动作快点，还有其他人要检查呢。”

两个看守查一间牢房，她们一起扑向我的行李。她们的手真快，我看都来不及看。有各式各样的巧手，比方说织毛衣的巧手，柜台上包商品的巧手，打字员的巧手，而她们可以说是有一双偷东西的巧手。她们把我的白糖从袋子里倒出来（这里禁止用塑料袋，说是怕堵塞便池），弄得毯子上、信封里到处是糖粉，我只得都抖落在地上。她们把卫生棉也从袋里倒出来，可是卫生棉不带包装放在小柜子里还有什么卫生可言？到了新地方后我才发现，就在我只顾注意卫生的时候，另一个看守，就是那个叫翘翘板的，从我的东西里翻出了丈夫送我的那束银苞菊，连同有机玻璃做的小花瓶一起扔掉了。她肯定是被我摆在牢房里的花儿给气坏了。

随后我们把行李卷扛在肩上，东歪西倒地走了。到了铁栅栏门前，看守长把其他牢房的女人和我们编在一组，其中也有赫尔嘉。她已经被判刑，正等着去劳改营，最后跟我们凑到一起了。走到训导员办公室门前，地上还放着一个行李卷，因为那个犯人上法庭受审去了。 训导员对赫尔嘉说：“你力气最大，你把它拿上。”赫尔嘉装着没听见，而此时看守们已经把我们推到铁栅栏门口，行李还躺在那儿。结果还是我们当中最没有力气的黛妮萨把它扛了起来

“您疯啦?您扛自己的都够呛。”

“总得有人拿嘛。”她气愤地说。她拿这包行李倒不是出于善心，而是要以一种洒脱的方式表示自己的愤怒。她这样做既是明显地向赫尔嘉表示蔑视，也是对看守们的无声抗议，因为她们也倒掉了她的白糖，弄乱了她的信。她扛着两包行李，拖着两条膝关节刚动过手术的病腿，吃力地爬楼梯，直到走过一条长长的过道，来到另一个楼梯跟前时，才被我把那一包行李夺了过来。赫尔嘉带着冷笑在一旁看着我们，还傲慢地说：“我原则上不替他人做事。”黛妮萨只是摆了摆手，扛行李累得她气也消了。

真是有意思，受看守们的欺负而憋在心里的闷气，很快就咽下去了。在事情发生的最初那一刹那，你气得简直喘不过气来，因为你遇到了一种根本不可能想到的事情。比方说把糖粉撒在堆满东西的毯子上，难道那个可恶的婆娘会认为，我们买糖是用来做甜毯子的不成？她可以把糖干脆扔掉，但是不，她要给你撒在你的用品上，而且还显得那么兴致勃勃，有滋有味。人碰到这种情形，自然会憋一肚子火，但随后也只好把她们的无理行为和自己蒙受的损失一笔勾消，嘲笑她们一顿了之。相比之下，拒绝帮助拿行李的赫尔嘉倒比扛着行李爬楼梯的我们，同她们靠得更近些。对难友们宽厚，对看守们嘲弄，这是一个被囚禁者跄跄踉踉、磕磕碰碰朝前走的两根拐仗。被囚禁者可以给看守们想出各种各样最精确的侮辱性绰号，什么死鬼玛仁娜、土豆儿、摩拉维亚崽子、马脑袋瓜、女盖世太保、香水儿瓶、翘翘板、乔治等等。摩拉维亚崽子部分是表达对他的敬意，部分是警告大家提防他的阴险狡诈。这个男

人表面看上去文质彬彬，据说当过老师，但是，只有他能够在有经验的囚犯放马时把他们当场抓住，也就是他没收了我们牢房的扑克牌和马。马脑袋瓜是个凶狠的笨蛋，土豆儿就纯粹是个笨蛋，女盖世太保是说她残暴，香水儿瓶则是个趾高气扬的蠢货，乔治是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儿。对付看守们粗野喊叫的武器，一种自我解嘲的武器，是酒心巧克力安蒂想出来的，它深深印在我们的脑海中。有一个男看守早晨一来就大吼大叫，安蒂不做声地看了他一会儿，然后说："可怜的家伙，夜里老婆没要他。"这可有效啦，要是有哪个看守对我们大声嚷嚷，我们就会相视而笑："很明显，夜里没讨到好处。由他去罢。"

到新牢房后，我才发现赫尔嘉变多了。我们还没有铺好床，还没有往小柜子里放好各种用品，甚至还没来来得及在新牢房里四处看看，商量好谁挨着谁睡，赫尔嘉已经用抹布吸干了便池弯管处的水，开始喊叫："哈罗，我是埃米尔卡，"她装出一副娇嫩悦耳的少女嗓音，"谁在那儿呀？"这个向往白马王子的少女问道。新牢房里用的已不再是土耳其式蹲坑，而是法国式坐池，赫尔嘉把胸脯跨在上面，冒充是谋杀自己姨妈的一个十七岁凶手。她觉得自己的玩笑很有趣，忍不住嘻嘻嘻嘻笑个不停。"但是，我在别的方面可还是个天真无邪的姑娘，还没有人碰过我。"她编了一个充满令人望而生畏的幼稚情节和庸俗内容的蹩脚故事，但却获得了成功。在她走后第三天，还有不少男人往我们牢房喊话，主要是想找埃米尔卡谈话。

埃米尔卡是她在以前那间大牢房里编造出来的，当时

赫尔嘉同一帮女同性恋关在一起。她一面同她们进行性接触，同时又痛打了她们一顿，并要求把她们调走。她对我描述了这场同性恋的情景，以为她对这种行为表示出的愤恨和反感一定会打动我。她揍了她们，但她自己却不会因此而变得正经一些。后来她的牢房里去了几个吉卜赛女人，为了给她们一个下马威，打掉她们人数上的优势，她在对手毫不提防的情况下首先动手打了她们。“那个黑种饶舌婆挡了我的路，我提腿就踢了她一脚，这一脚可不轻，别以为我不会，我的劲儿可大了。还有一个刚走近我的身旁，我起手就给了她一巴掌，这一巴掌也不轻，以后她们再也不敢靠近我。”她给她们香烟，她们为她铺床，扫地，清洗便池，放风回来时还用抹布为她擦鞋后跟。牢房里有两张桌子，她在其中一张上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白人专用”。在圣诞节前后的几天中，她一个人用一张桌子，七个吉卜赛女人挤在另一张桌子旁，这就是当时的力量对比。

“训导员们怎么说？”赫尔嘉的牢房正对着训导员的办公室，每一次打架她们都能听见。

“第一次打她们，训导员们跑了过来。后来我保证牢房里会安静下来，她们就随我怎么干都不管了。”

她装做埃米尔卡，主要还是闹着玩儿。我们上次在一起的时候，如果让她对着便池说话，她一定立刻就会恶心得呕吐起来。现在看到这个以前充满复仇之心的女法官和满怀爱国之情的女英雄跪在那里，身体紧贴便池，脑袋伸进池中，不能不使人感到震惊。再听听她那个埃米尔卡！

你会情不自禁地感叹，有些人真是具有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糟踏得一塌糊涂的天才！

下午，我们替她拿行李的那个女人出庭受审后来到牢房，听到赫尔嘉装做埃米尔卡说话后不禁大吃一惊，“这就是那个埃米尔卡？”她以前曾关在赫尔嘉旁边的一间牢房里，她悄悄对我说，埃米尔卡讲的事情太下流了，听起来简直令人无法忍受。埃米尔卡的厚颜无耻已是臭名远扬，但男人们并不责怪，他们以为她是个傻乎乎的、智力低下的十七岁小姑娘，拿她开玩笑。

来新牢房后，赫尔嘉当着我的面倒是更多地把精力集中于编造姨妈之死等情节上，但她的样子真可怕。上帝知道，一个人性格中粗野下流的东西一旦获得释放，马上就会在面部表情、音色声调、语言方式和身体动作各个方面都显露出来。她以前和我在一起时，谈话中已经带有咄咄逼人和坚决果断的语气，不管说什么都要加上一句她最喜爱的短语：“我说的不错吧？”对于她的这种坚定语气，我根本不予理睬，不作任何反应，赫尔嘉只好马上就想法缩回去。而来这儿后的赫尔嘉可不同了，她一会儿冲着这个，一会儿冲着那个，像一辆既没有操纵杆又没有制动闸的坦克，没头没脑地横冲直闯。在我面前她没有踢人，尽管还有一个吉卜赛人和我们同住一间牢房。赫尔嘉选了最边上的一张床，打扫卫生她排在第一个，谁也不愿帮她做任何事。但是，牢房里随处都有她在，一切事情都要由她吵吵嚷嚷地起音定调。她自以为：无论到哪儿，我都是老大。我的上帝，凭什么呀！

再说说她的头发吧，她以前多么在乎自己的头发啊！那一头柔软的、浓密的、难伺侯的头发，连我都没少为它们操劳。最初来牢房的时候，她的头发染成浅金色，修剪成非常时髦的样式，看上去就像一顶凤冠。有一次她气冲冲地从审讯室回来，审讯员对她说：“您会被关到等您变黑了为止。”他说变黑，倒不是比喻时间长的意思，而是指她的头发。菠芝奇卡曾在电视里的公安通告中见到过赫尔嘉的相片，她说那上面的赫尔嘉是一头黑发。她染发也许就是为了销声匿迹。但是，她的黑头发又慢慢长出来了，穿透了前额的一绺金发。由于头发长长了，她把它们箍起来，在后脑勺打了一个发髻。这样子并不太难看，倒像是个没有时间梳妆打扮的妇女。但是，就是这样的头发也没有了。她调皮地讲述了当时的情形。

在最后一次庭审的前一天晚上，她按照在我们牢房里养成的习惯，用纸做的卷子卷了头发。因为姑娘们曾警告过她，夜班看守禁止卷发，她还向值白天班的看守要了一份书面证明，说她要出庭受审，允许她卷发。夜里那个叫西班牙人的看守叫醒了她，她曾经用自己的胸脯同这个看守调过情，也许是为了调情，也许是出于孤僻男人对女人的敌意，他命令她摘去发卷。她把那份证明拿给他看，还把这当做是调情。

“现在这儿我说了算，”西班牙人说，“您得把发卷摘下来。”

西班牙人在监狱里显得很特别，他不仅言谈举止高出于其他看守，外表也同他们大不一样。他留着短须，显得

很浪漫，夜里还戴着一副镶着金色镜框的墨镜。我倒觉得，与其说他像西班牙人，倒不如说更像北美电影里的南美洲人。他的嗓音微微发颤，有时莫明其妙地微笑。他开玩笑的时候往往使用一种文绉绉的瞧不起人的口气。有一次，他和过道勤杂女工一起推来了星期六的晚饭，那是饥饿的囚犯们最怕吃的俄式大菜汤。在我到过道里去端汤的时候，他说：“我亲自尝过，经我批准的。”

“可以请您一块儿吃吗？”我说，“很高兴同您共享。”

“谢谢，不用了。”

“尽管是您批准的，您也不吃吗？”

“饿死我也不吃。”他微笑着说，觉得自己很会应酬。

姑娘们说他没有结婚，是个对女人非常失望并且怀恨在心的孤僻男人。他养了几只俄罗斯猎犬，平时在家也想着抓罪犯。他有一次对我和黛妮萨表示了很大的善意，但效果却适得其反，因为在囚禁中一切都是颠倒着的。他在圣诞日那天当班，晚上点名后他打开牢门——很少有人像他一样打开牢门，多数情况下只是打开小窗口上的门，或者在监视镜里看看——说：“你们在这儿乖吗？”什么叫乖？圣诞日待在牢房里怎么个乖法？是说我们不想上吊？还是说我们没有割自己的血管？我们没有吭声。随后，西班牙人不是把电灯的亮度调小一些，而是把它全关了。牢房陷入一片黑暗，这是他的圣诞礼物。可我们却因为不习惯而睡不着了。

“可这不公平，”赫尔嘉说，“男人有权理发，女人就不可以卷发？你们还不让没有理发刮脸的男人出庭呢！”

“您想理发？”西班牙人问，“可以给您叫个理发师来。”

“想！”赫尔嘉说，她还在玩那种相互间的调情把戏，在这场游戏中，她既不可能得到他，也不可能打败他，因为她是囚犯，而他是狱吏。

这场玩笑符合西班牙人的口味，他叫醒了理发师，把他带到这儿来。这是个为囚犯理发刮脸的男犯人，他根本不是专业理发师，就像在监狱里烧饭的很少是专业厨师一样。赫尔嘉赌气地坐在凳子上，当着西班牙人的面，并在悄悄走过来看热闹的吉卜赛女人们的赞赏目光注视下，让他把头发给剪了。

“您看自己成什么样啦？”

“没有！”她用娇里娇气的傲慢语气说，“管它什么样，我不在乎。在监狱里就这样凑合了，反正到了劳改营也得剪。至少算是剪过了吧。”

她的头发被剪得乱七八糟，留下的头发有的地方还有两指厚，有的地方三指，有的地方五指，有的地方全是黑发，有的地方则是染过的头发占多数的杂毛。那样子真可怕，完全是一副刑事犯的模样。她还怪里怪气地装做少女，用细嫩的嗓音说：“哈罗！谁在那儿？我是埃米尔卡！听见我的话了吗？姨妈老是要把我锁在家里，我就捅了她一刀。你们想不想也让我捅捅？”

然而她是负有使命的。我立刻就想到，在她去劳改营之前还让我们在牢房里相聚，决不会是偶然的。她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讲了不少拉茜奇卡和乔金那——女囚犯这么称

呼伊琳娜·希克洛娃①以及弗拉斯塔·特舍士尼亚科夫②的事情，并问我是怎么想的。三天后把她带走了，她以为是带她去办公室，既然她写得一手好字，而且有控制别人的本事。她被押到一级劳改监狱去服五年徒刑，在预审期间已经拘留了半年多之后，她在那儿再待不到两年就可以回家。让上帝和智慧保佑那些由于命运的安排可能同她狭路相逢的人们吧。

① 伊琳娜·希克洛娃（1935～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学家、政论家，现为查理大学社会学教研室主任。——译者

② 弗拉斯塔·特舍士尼亚科夫（1950～ ），捷克斯洛伐克作家，80年代受迫害流亡瑞典，1989年后返捷。——译者

娜　金　卡

“娜金卡！”至今我心中还回响着安卡那小喇叭似的嗓音，“我的爱！”安卡是个女同性恋，是从科希采来的一个很独特的年轻女人，年龄约二十五岁。她刚开始生活就不顺心，所以来布拉格闯世界。而娜金卡已经过了三十六岁了。“娜金卡！我打你！”安卡张开大嘴喊叫，戏谑地威胁说。

一到晚上，刚刚理好床铺，安卡的情欲就上来了。娜金卡的床在牢房一头的墙边，安卡在另一头的墙边，中间床帮贴着床帮放着我们睡的四张床，白天它们在两头的床上整齐地垒着，晚上一放下来就把所有的空间都占据了。所以，安卡要到娜金卡那儿去，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踩着床过去。床上铺着床

垫，床垫下面的胶合板早已腐朽，有的板子已经折断了。安卡笨拙地踩在垫子上，我们都赶她，不让她再把木板上的窟窿踩大，那样一来我们的屁股就要掉到地上了。娜金卡吓得直叫：“不！安卡，我不！”她缩在角落里，赶紧把麻布衬衣换成了橘红色的棉布睡衣，快，快，要不安卡就踩着我们的床过来了。她灵巧地脱下一件，穿上另一件，让安卡——她的脚陷进了被她踩破的胶合板，两眼直瞪瞪地望着娜金卡——尽量少看到她裸露的身子。然后娜金卡钻进毯子里，把它一直拉到自己的下巴边，整个裹在里面，成了埋在肮脏昏暗的牢房里的一具木乃伊。

此时，随着安卡踩着我们床上的窟窿，一步步逼近娜金卡，她的勇气也渐渐泄掉，等到她在铁床帮上磕磕碰碰地终于来到娜金卡身旁时，她的欲望已悄然退去。她半个身子跌倒在娜金卡的床头，半个身子悬在旁边的便池上，连娜金卡的脚指头都不敢碰一下，只是用崇拜的眼光上下左右打量着自己的爱，希望在囚禁中找到某种解脱，求得某种腾飞。她蔫了，不是因为她知道，如果真的做出性爱的表示，剩下的我们四个人中至少有一个会揍她一顿，而是因为安卡根本就只是口头上的勇士，嘴巴里的女性肉体征服者。但是，她准确无误地察觉到，娜金卡是个容易到手的猎物，是个无法抗拒任何性爱追求和诱惑的女人，让我们姑且称之为纯女性女人吧。假如她们两个单独在一起，假如安卡坚持，假如夜里走近她，假如去求她，安卡很可能会得到自己渴望得到的。娜金卡也了解自己，所以她真的害怕，躲在灰色毯子下面发抖：“安卡！不！

安卡！”

她虽然叫喊，但同时脸上又露出软绵绵的微笑，纯女性女人的软绵绵的微笑，软弱无力的、魂不附体的、富于诱惑的微笑。有时安卡大着胆子从便池往这边移动，整个屁股都坐在了娜金卡的床上，仅仅这种接近已经使她感到幸福，有时候还夺得一个吻，而娜金卡并不坚决拒绝，她只是抗拒到不使安卡生气的程度。我们每隔十天去一次澡堂，在那里娜金卡不得不脱光衣服，裸露出自己少女般的身躯，谁见了这样苗条的身躯，都不会相信她生过三个孩子。在这种时候，娜金卡完全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幸好黛妮萨找到了一个很有礼貌的借口：喷头只有四个，而我们一共六人，所以，她硬把安卡留在我们这边，让娜金卡在另一边安全地洗个澡。澡堂里的空气常常是冰凉冰凉的，水不很热，水蒸汽很快就会凝聚，变得很稠密，还有其他女人挡住视线，因而安卡只能猎取到娜金卡裸体的一小部分。“你们干吗老是护着她，”安卡抱怨我们，“她尝到后，就再也不想要别样的了。”

娜金卡已经三十六岁，习惯和生活赋予女人的所有神圣使命她都完成了。她当过女儿、妻子，也当过母亲，这些不过是她怀着女性的消极态度走过的三个人生弯道，但并没有让她充分地尝到生活的滋味。世界就是这样安排的，首先一个人被某个人生下来，后来自己又让下一个人成胎或者把他生下。除了服从这世界的运行规律外，别无其他办法。她没有过多地反抗妈妈，不让人说她忘恩负义；她温柔地爱着自己的三个孩子，但觉得自己更像他们

的姊妹；她仇视婚姻，因为她讨厌自己的丈夫，并且怕他。但是，她只敢用出逃这种外在的方式来表示对他的反抗。从内在的本质来说，娜金卡倒是喜欢温柔的、快活的爱情，她随时准备着让自己那透明的、微带肉欲的、非常纯净的女人气质尽情流露。但是，他丈夫是个笨蛋，所以她冲了出来，步入世界，想要尝尝是不是某个地方可以让她开怀畅饮清凉的生活甘泉。也许她并没有夸张，也许她真的必须挣脱锁链，否则就会发疯。“我只想惩罚他一下！你们懂我的若心吗？我只想惩罚他一下，可他却顺手就把我弄进了监狱。”当娜金卡试着出来闯世界的时候，丈夫控告了她，说她逃避交纳赡养费。逃离丈夫的结果竟然是坐牢，但她也没因此而垂头丧气。监狱也是世界，而且，这里有这么多有趣的人进进出出，决不像她的婚姻蜕变成的那种既没有爱情也没有光明的家庭冷宫。在鲁津监狱里她可以避开自己的丈夫，只要还在这里就好，这里他来不了，她因此而受到保护。这里她作为女性也没有受到冷遇，而这不仅是女同性恋者安卡的功劳。

有一次，她被带去出庭受审，是去复议庭。预审拘留的犯人出庭受审时，都坐同一辆大轿车，手上戴着手铐，每人都有一名狱警看着，危险的犯人由两名狱警看管。一大早就开车，尽管开庭时间各不相同，地点也不一样，都得一起上车，跟着在布拉格各处转。娜金卡的案子快到中午才开庭，所以，她在法院的牢房里等了整整一个上午，快到傍晚时车才去接她，所以又等了整整一个下午。回来后她没有多谈法官最终还是判她三个月徒刑的事，却唠唠

叨叨说了一大堆别的事情。她说按居住地划分，鲁津监狱只有她一个人去那个法院，看管她的看守在早晨接管的时候就显出一副想打她的坏主意的神情。“这真可怕！想打坏主意的男人我老远就可以感觉出来。不过我也知道怎么办。法官那儿一会儿就完事了，可我一个人同他一起待了好几个钟头。他把关我的牢房和他的看守室中间的铁栅栏打开，让它敞着，大概他怕一会儿开一会儿关会让人听见。他请我抽烟，喝茶，喝咖啡，老跟我聊我的案子，劝我拆回上诉，说什么三个月都快混过去了，上诉还可能追加刑期。我心里很紧张，你们知道男人们那种露骨的眼神，我真担心我又抗拒不了啦。他大概也看出来了，以为我也有意。他一出现在敞开的铁栅栏门口，要问我什么的时候，我就像个傻姑娘似的大声回答，声音大得差不多像喊叫，我希望他的看守室后面还有别的房间，那里会有人听见我的声音。每次我大声回答，他都会吓一跳，轻点儿，他提醒我说，别这么大声嚷嚷，然后就退回到自己那半间屋。他这样做了大概有二十次，看得出来他也害怕。他要去上厕所，说我把您留在这儿，您可别胡来，而我这个笨蛋还求他把铁栅栏门锁上，不让别人进来。我简直像个傻子，自己要求把我锁起来。当他靠近我的时候，我还一边说话一边退到铁栅栏前，好像要逃跑，可是往哪儿逃呀？躲进他那个看守室？我还老是大声地、客气地喊着“是，长官先生。”不，长官先生。”真傻。姑娘们，怎么跟你们说呢，我吓得都不敢对他说我要尿尿，这种事根本不可以对他说。啊，等一等，等一等，别挡住我，要不可

真要憋出病了。”

她可爱、温顺、亲切、风趣、妩媚、体贴、娇柔，真是一副高贵的气质。可是，同住一间牢房两天以后，她就变得叫人受不了啦。一般犯人到一间新牢房，两天时间里足可以把自己的案情讲完，然后他就会觉得自己已经报过到了，可以放松了，以后他只跟自己亲近的人说点心里话。黛妮萨默不作声地担当起了保护娜金卡的义务，她在三个星期后还愤怒地对娜金卡喊道：“看在上帝的份上，别说了！别再说了！闭上你的嘴，娜金卡！你吵得我脑袋像个蜂窝，老是嗡嗡嗡嗡地响。你试着稍微安静一小会儿好吗？你不想玩牌吗？不想看本好书？埃娃，把那本海明威的书借给她，让她别吵了。要不要香肠？哦，有饼干！我们还有那种挺好吃的巧克力饼干吗？看在上帝的份上，快给她，让她给嘴巴安排点儿别的用场。这样神经会轻松一点！吃吧，别废话了。我说埃娃！您也说说她吧！”

娜金卡朝着黛妮萨软绵绵地笑着，她接受黛妮萨的责备，觉得自己错了，也试着不再说了，但又忍不住。她玩了一局牌，赢了，很高兴。我和黛妮萨相互看了一眼，多好啊，多安静啊。可是，娜金卡脑子里又闪出了那些凶狠的话，她从凳子上一跃而起，又开始在牢房里大步走起来，右手伸在身前，做出很着急的姿势。晚上她睡得很香，很快就入睡，呼吸也很轻，只有安蒂睡觉时这么轻，她把身子蜷成一团，像只动物那样，一动不动，一点声响都没有。天刚刚亮，娜金卡睁开她那熟睡后浮肿的眼睛，坐在铁床上或者被她坐暖和了的便池木板上四处张望，看

看自己身在何处。一想到自己可能的未来，马上就开始神经质地诉说她的担心和无奈，她的无所适从和百般痛若，那话好像冲出闸门的洪水，整日不绝。她的女性大逃亡已经面临绝境，纯女性的被动态势使她永远也冲不出包围圈，永远也下不了决心去追求称心如意的生活。女性气质既是她内心的驱动，也是她命运的诅咒。她从丈夫那儿逃出来，而现在面临着这样的威胁：又只有他一个人在监狱门口等她。她将是被往服者，而他将耀武扬威，因为判她有罪的国家支持他，女人的一切神圣使命支持他，具体说，娜金卡的妈妈和孩子也站在他一边。给她判的徒刑是很可笑的，徒刑以及由之而来的耻辱并没有使她不安。区区三个月，照囚犯们的说法就是坐在刀尖上也没什么了不起。而且，予审拘留时间一扣除就几乎不剩几天了。问题是，她失去监狱围墙保护的日子快到了，她为此而日益不安。她不断地翻来复去讲她的往事，一会儿从一开头讲起，一会儿从中间讲起，一会儿从尾巴上讲起，似乎她在绝望之中还抱有一线希望，好像只要她讲出来了，事情也就不存在了，她就会奇迹般地来到另外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孩子们将同她在一起，妈妈要去也可以忍受，但是，那个出于报复而把孩子们的母亲投入监狱的男人将禁止入内。那将是一个只有快乐、幸福和友谊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她也许远远得不到这么多爱情，但是会有人亲近她，保护她。不过，她很聪明，知道自己有些疯疯癫癫，所以在令人无法忍受的瞎胡扯和火山喷发似的连珠炮中，不时插上一些自我取笑、自我解嘲的话，从而又使人觉得

她挺可爱，一切都可以原谅。“喏，好吧。”黛妮萨总是无可奈何地摆摆手，“你就都侃完它吧。后来怎么样了？”

“你们说这正常吗？”我们吃完早饭，一张桌子留在屋子当中，在那儿玩“好人，别生气”，因为这地方外面可以看见，另一张桌子挪到门边靠墙处，这里监视镜看不到，可以玩被禁止的扑克牌。娜金卡开始大步走来走去，身子微微前倾，右手放在前面，摆出黛妮萨常笑着模仿的戏剧性姿势。

“这正常吗？一个大男人脱光了衣服在电视机前挠痒痒？埃娃太太！黛妮萨！这难道正常吗？”我们说好了都不搭腔，以免强化她心里的偏执印象。“主要的是不管她说什么都不吭声，”黛妮萨这样命令我们，“这可能是她解脱不开的一个幻觉。”

娜金卡把自己的丈夫说成是一个令人憎恨的、使人害怕和反感的怪物。她原则上只呼他的姓，而且还不总是这样，更多的时候是叫他的绰号：傲气鬼。她从不用骂人的字眼儿，从不说下流话，对于监狱里像黑蛾子一样到处飞来飞去的粗话，她只是自卫地闭上眼睛，在粗野言行面前她毫无抵抗能力。但是，按照她的解释，傲气鬼这个字意味着他是个笨蛋、下流坯、变态者、自私自利的滑头、胆小鬼，她认为这种人是毫无希望的。这个美丽而温柔的女人（她的温柔是难能可贵的，因为无论是在臭水沟里，还是在油头粉面的无耻之徒中间，她都保持着这种温柔），在我们的牢笼里急匆匆地走来走去，有时候说完一句话（是对这个冷酷世界的一声呐喊），在开始说第二句话之

前，还把十个手指头都伸进她那柔软的、斑白的、不很浓密的头发，微微把它们弄篷松一些，这是她的第二个典型姿势。头发围在她高贵的脸庞四周，犹如一副漂亮的画框，据说它们曾经乌黑发亮，像煤炭一样，她说是最近几个月才变灰白的，而且白的挺多，灰白色已经成了基本的色调，而不再是黑色了。不过，我和黛妮萨，我们两个也是在鲁津监狱才开始有白头发的。“他光着身子坐在那儿，孩子们不在家，但随时都可能跑回来，对这他根本不考虑，他不考虑我的存在，坐在那儿瞪着眼睛看足球，而且挠呀挠呀，一挠就是几个钟头！埃娃太太！黛妮萨！我向你们发誓！真是好几个钟头。有一次他修理电视机上的某个部件，突然想起用螺丝刀挠痒，以后看电视总要带上那把螺丝刀。光着身子看足球，我在厨房里都能听见他用螺丝刀挠痒。”

中学毕业后，有一两年她很幸福。她是以秀优成绩获得高中毕业文凭的，然后担任奶站的独立会计员。她在奶厂院子里有一间办公室，装满鲜牛奶的罐子车不断开来，她把奶从什么地方来的、属于那一个质量等级，都一一登记下来，再算出奶厂该付给牛奶生产者多少钱。她自食其力，不在家住，逃脱了妈妈的影响。这是一段天堂般的美好时光，当时她还看不出自己是个纯女性的女人。为什么要出嫁，她没有解释。有一次，在一串模糊不清的话语中，她吐露了实情：她怀孕了，不能不嫁。但在另外一次谈话中她又说自己的丈夫是个不中用的男人，结婚四个月后她还是处女。按孩子们的年龄推算，倒符合第二种说

法。她结婚肯定是为了逃离母亲，母亲不爱她，她又不能总是同母亲争吵。

她没有见过父亲，甚至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当然，如果俄罗斯人，或者再广一点 —— 士兵，不算他的名字的话。母亲是在 45 年春天，当这位俄国解放者来到斯洛伐克时，同他怀孕的。也许这个士兵已经阵亡了，或者还活着，不管怎样，反正从来没有他的音讯，母亲也没有去寻找他。他大概也知道自己留下了个孩子。后来母亲嫁给了一个小俄罗斯人①，同他一起到了捷克边境地区，她想尽可能远离自己受辱的地方。娜金卡有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她爱他们，继父倒是不认为她和自己的孩子有什么区别，只是母亲的怀抱里没有她的地方，大概是因为自己蒙受的耻辱，母亲总是有点嫌弃她。娜金卡也常常使母亲想起那个俄罗斯人，她长得不像母亲，由此她推断自己可能像父亲。她的脸庞真有点像俄罗斯人，尽管不十分明显，眼睛发黄，厚厚的眼皮略微下垂，睫毛粗短，那双眼睛更使人想起西伯利亚，想起西伯利亚那些远古的氏族，她的颧骨也比欧洲人要宽些，健康的大牙齿外面紧紧包着线条清晰的嘴唇，鼻子既不是那种往上翘的小鼻子，也不是法国式的大鹰钩鼻，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结婚后，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出世，她有一个男孩，两个女孩。孩子们爱自己的妈妈，一个快活、美丽、热情奔放的妈妈。男孩已经开始懂事了，也只有他给她写过一封信。“我亲爱的妈妈，

①乌克兰人的一支，居住在喀尔巴阡乌克兰地区。 —— 译者

回来吧，没有你我们都很悲伤。”他是个十三岁的男孩，信写得很孩子气，信纸都打格子，字写得很工整，并且说是偷偷写的，也就是说是分几次写的，因此，请妈妈原谅他写得大小不一样。信也是他偷偷拿到邮局去发的，“我要到明天才能去邮局，那时候我们上体育课，外婆不会到体育场来接我，平常放学回家时她总是故意到学校附近来买东西，所以，我亲爱的妈妈，我就写到这儿了。”

男孩不仅在家里翻出了妈妈的地址，而且还懂得要在信封上妈妈的名字后面写上她的出生年月日，否则收不到。“这对于他的小脑袋瓜来说未免太过分了！给妈妈写信，还要在名字旁边写上出身年月日！多么可耻！多么缺德的要求！我倒宁愿他不写！这在孩子的小心灵中会留下什么印象？他对母亲会有什么想法？在这么一个敏感的年龄段里！这些他一辈子都会记得！要是写我的名字必须加上出身年月日，他肯定会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他们可能会告诉他说我在医院里，外婆肯定会对他说我在医院里，她在这些方面挺会装好人的。但他会相信她吗？要不然就是傲气鬼说出来的！他一定是痛哭流涕，对孩子们说：可爱的孩子们，我把你们的妈妈弄到监狱里去了。让傲气鬼见鬼去吧。可是，我回去后怎么对孩子们说呢？”

她为对孩子犯下的罪过而揪心，这种给囚犯写地址的方式肯定破坏了儿子心目中纯洁善良的母亲形象。一时间，这种罪过感使她觉得太痛苦了，于是，她又把进攻的矛头指向了傲气鬼。“哦，不是这样的！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是傲气鬼叫斯坦尼亚写的。他能干得出来。要是大

人不叫他写，小孩子哪来的地址？”她迈着大步在这六米长的空间里走来走去，右手举着，做出着急的姿势，就像罗丁画的圣徒扬·施洗礼者画像上的姿势一样。“他可以昧着良心利用我的孩子们，只要能逼我回去就行！他知道如果他写，是动摇不了我的。但如果让孩子写，我就会感到羞愧，赶紧跑回去。是这样的。他是个令人恶心的敲诈勒索者。他会说，斯坦尼亚，来给妈妈写封信，瞧，这儿是地址，好好地在纸上打上格子，这样才写得整齐。他从来都把打好格子写得整齐当做最主要的，他自己也是这样，写些什么倒不要紧，要紧的是照着格子写。斯坦尼亚也可能真是偷偷写的，这孩子不说慌，但他是背着外婆偷偷写的，他住在外婆那儿，上邮局也是自己一个人去的，这我也相信，但这些都是傲气鬼指挥的。傲气鬼还要孩子在我的名字后面写上出生年月日，孩子会害羞，你们能感觉出孩子是多么害羞吗？所以他不提爸爸，他爸爸一定看过这封信！傲气鬼才不管孩子有什么感受呢，这对他无所谓，主要的是要对我施加压力。我男人是条鼻子挺尖的狗，是条要把我赶回圈里的狼。他根本不顾忌这会毁掉孩子们的心灵。可我怎么对孩子们说？爸爸是条尖鼻子狗的孩子叫什么？”

一开始她很年轻，很幼稚，不知道怎么反抗。接连生三个孩子也占去了她的全部精力和时间。“他有一次碰了我一下，我就有了。”一共三个孩子，第一个是结婚两年后生的，照这个情况推断，她跟她男人也没有做过多少回爱。男人曾经是个职业军官。他们老是从一座兵营迁到另

一座兵营，因为她男人常被调来调去，而她每到另一座兵营，都会觉得更加孤单，更加没有希望，更加被他紧紧地绑在他的身旁。她不愿同其他军官的妻子来往，说她们是些枯躁无味的、目光短浅的、好闹别扭的女人，尽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而且，他们在每一个地方待的时间都不长，她也来不及同别人接近。当孩子们还小的时候，家里的这块小天地把她全部吸进去了。等到孩子们慢慢长大了，开始上学了，还要上各种辅导课，也会自己去玩了，这时候她也感到需要到丈夫的羊圈栅栏外面去看看。她一看就发现，她丈夫令她失望，别的男人更具有男人的正直性格，为人更好。而孩子们已不能填满她的生活，于是，她心里逐渐出现了一个无人地带。她对这种感觉进行过斗争，认为这是不道德的，她不想成为一个不道德的人，不愿对丈夫不忠，这太低级了，她害怕自己会变得像其他那些军官太太一样。“我经常去看电影，读了好多书，甚至绣起花来，好消磨时间。”正是由于这一切，由于这些新的经验，特别是由于孤独感、不满足感和被征服感，一个纯女性的女人在她心里慢慢苏醒过来。女人，一头食肉猛兽般的女人，在她心里待机而动。

后来丈夫退役了，至今惟一使娜金卡感到兴奋的事——搬家和改变环境，也没有了。他们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娜金卡环顾四周，只有一片毫无遮掩的生活空虚呆呆地望着她。“一天到晚不是窗帘、地毯、衬衣、袜子、盘子、杯子，就是杯子、盘子、袜子、衬衣、地毯、窗帘。我真成了个怪物，居然希望孩子们生病，他们病了我

倒觉得高兴，因为我有需要操心的事了，有可以尽力之处了。孩子们不怎么需要我，他们聪明，会自己做功课，他们三个人一起玩就行了，最后留给我的还是那些杯子、盘子、地毯和衬衣。”而她又是那么年轻、美丽，那么渴望爱情！男人把全部业务时间用来准备考试，他在上函授大学，学工程。他不愿让自己的社会地位跌到工人的底层，因为此前他至少是个半拉子主人。可娜金卡却把他埋头学习看做是对自己的背叛，看做是男人自私的表现。“干吗就不能当个工人？钱还挣得更多，也有更多时间照顾孩子。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他却坐在屋里看讲义。我们总给他让路，总是迁就他，把他调走了，我们跟着走，把他辞退了，我们也跟着走。整个星期六、星期天他都要学习，孩子们在家里连悄悄话都不敢说。”

她找了个情人。也许根本不是爱情，只不过找了一个她看得上的男人。从职业上说，他是巴朗多夫电影制片厂众多的剧务之一，他们围着片子转，闲谈中常常插进几个明星的名字，给人印象似乎昨天刚好还同他们一起痛饮过。但她看中的不是这些，她确实是个文雅而又温柔的女人，令她感到幸福的是她能够爱一个爱她的人。“洪扎有辆速度挺快的车，男人们挺看重这么一些愚蠢的玩意儿，像什么开一辆外国牌号的车呀，喝真正的法国白兰地呀。我们常一起去我们的别墅，我是在孩子们去上学后，在他们不需要我的时候偷偷去的。别墅在居民区的另一头，车子要很快地开过小区，不让任何人看见我，免得传出去。别墅在公路尽头的一个空旷的地方，山下是一座采石场，

我们待在里面谁也看不见我们。我没有损害过谁，家务活儿比以前搞得还好，孩子们也更快活，更满意，因为他们看见我很快活，很满意。由于良心上过不去，我对他们的关怀更多，更经常陪他们去散步，游泳，跟他们一起玩。因为洪扎，孩子们倒得利了。而傲气鬼什么都不知道，他有一台计算机，很晚才回家，一回家就盯着电视机，要不然就看报。这本来是可以长期保持下去的，因为这对大家都最好不过。”

可丈夫并不像她想的那样漫不经心。他在观察她，把一些细小的举动和不对劲儿的地方慢慢拼成一幅镶嵌画。经过推断和联想，一个星期六，他装着要去上计算机课，等娜金卡把孩子们送到外婆那儿去后，他就去别墅捉奸了，就是说要把她和情人一起当场抓住。当他看见别墅门前停着一辆萨布轿车时，他躲进了树丛，看见情人们乘车去村里买葡萄酒，他溜进了别墅，藏在卧室里。“我进屋去换衣服，打开柜子，伸手去拿睡袍，看见傲气鬼蜷着腿坐在一堆衣服当中。可我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他怎么会坐在衣柜里呢？他不是上课去了吗？我是多么盼望这个星期六呀！我不能想像他会来捣乱。我又把柜子关上，跑去找洪扎。洪扎，这可能吗？傲气鬼会坐在衣柜里吗？告诉我，求你啦，请让我相信这只不过是神经过度受刺激产生的幻觉。要是傲气鬼真的在衣柜里，我马上就跳崖，跳到采石场下面去。洪扎说，可是你知道，你只不过产生了幻觉，你满脑袋里都是他。别想他了，别让他毁了自己的生活。随后我们就一起喝葡萄酒了。”只不过衣柜里确实

是她丈夫，到相应的时候他爬了出来，辱骂娜金卡，自己却被打了一顿。

“洪扎把傲气鬼痛打了一顿，我没有阻止他。我在一旁看着，心里想傲气鬼终于也挨打了。后来洪扎举着他走到门口，把他像只小狗样的扔了出去。啊，这太棒了，听我说，这真是太棒了，洪扎回来时，把两只手合在一起搓了搓，像是干完了一件又脏又累的重活儿。他斟上葡萄酒，坐了下来，对我说，娜金卡，现在你可以把他抛在脑后，不理他了。可是我知道，我全身都感觉到傲气鬼还在外面等着，坐在树丛里嗅着。葡萄酒我也不想喝了，什么都没味儿了，我老是跑到窗前去，看能不能看见他，眼睛老是盯着门，看他是不是会进来。星期六算是被搅了，洪扎说这没意思，回家去算了。当我们锁别墅门时，到处还都见不到他，可洪扎刚一打开汽车门，傲气鬼就突然从荆棘丛里冲了出来，双脚跪在汽车面前。那儿的路很窄，一边是高高的峭壁，另一边是采石场的斜坡，汽车只能在别墅门前调头，不太熟练的司机都是倒退着进来。洪扎的车开不出去，傲气鬼就跪在那儿，一边哭一边求我不要抛弃他，要是我不答应，他就不起来，我要是想同那个男人一起离开别墅，除非从他的尸体上过去，要不然就让我们辗死他，或者让我们把他扔下采石场，没有我他不能活，我不答应忠实于他，他就不起来。你们笑，我现在也觉得好笑，可是，对于这个跪在地上又是啼哭又是哀求的傲气鬼，你们又会怎么做呢？”

她走近男人，扶他站起来，掸去他膝盖上的尘土，把

他带到一边，而让那个生气的情人一个人开车走了。

既然不可以有情人，因为以后傲气鬼就老是留意着她，任何谈情说爱都会被他搅了，于是她便开始出去晃悠。白天，孩子们上学，傲气鬼上班，她装着出去采购，实际上把这个落后的、破旧的老工人区里所有的饭馆和快餐厅都跑遍了。有时候晚上，傲气鬼看电视，她也一个人出去，手里提着个啤酒罐，免得惹傲气鬼哭。她如饥似渴地同人们互相结识，跟他们闲聊。在饭馆里容易很快地交上朋友，喝足了甜酒和啤酒后，你可以随便向任何人敞开心扉。当她闻到那廉价的菇拉司汤味儿和跑了气的啤酒味儿，以及呕吐出来的脏物和不常打扫的厕所散发出的臭味时，她觉得这是一种反抗。只是她必须更多节省开销，从傲气鬼给她维持家庭开支的钱中抠些出来，给自己买几杯甜酒和啤酒。

“您不害怕一个人去那些地方？”我问。

“有人保护我。”

“谁？”

“好久我都不知道他们是帮派里的，他们叫我小仙女儿，几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儿。他们从不对我无理，所以我主要跟他们坐一桌。要是来个陌生人，想要对我无理，他们就把他轰出饭馆。”

我相信她，她能够靠别人的信任和自己的脆弱来避免危险。纯女性的女人能够激发男人们保护异性的本能。她还善于倾听，别人说笑取闹时从不让人扫兴。她不威胁任何人的利益，不损害任何人的权利，连女人也一样。她不

教训任何人，更不谴责任何人。她很会微笑，很会用手势说话，你们别赶我走，我是你们当中的一员呀！她在牢房里的表现也是如此，友好，不惹是非，会体贴人。在那些满地是痰的小饭馆里，她丝毫也不显得与众不同，无论容貌、衣着，还是言谈举止，但又丝毫也不和他们同流合污，既不谈话粗野，又不贪杯狂饮，更不挑逗寻衅。她就是人们在各种场合都称道的那种好姑娘。

但是她很高兴，终于可以痛痛快快地同人们闲聊了！在那被菇拉司汤和啤酒弄脏的桌子旁，每一个小典型人物都有不同寻常之处，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个个都不乏味。有个男人丑得像夜叉，又高又瘦，全身就剩下一副骨头架了，头发像一堆杂草，嘴唇像兔子一样合不上，她却喜欢他。他向她聊起自己的母亲，说她死了，躺在棺材里还非常美丽，他每天要去她坟上点燃一盏灯，因为她生前怕黑暗。那儿有全身哆哆嗦嗦、命运十分辛酸的女人，她们只要五克郎就愿意跟当兵的去，五克郎也可以买杯啤酒喝了，可当兵的连五克郎都不给。也有少于两千不干的美人儿，却谁都愿意为她们掏钱。这儿可比去电影院或者看小说要好一百倍！

预制构件楼里三间一套的住房，是所有半拉子主人的美梦。在那里大家都可以相互听见各自的排泄活动，所有家庭都在设计师想出的惟一一个地方放餐桌，大家在同一时间坐下来看电视，早晨又在同一时间送还没睡醒的孩子上托儿所或者幼儿园。整个这幅生命遭到阉割而秩序井然的图画，是她丈夫竭力推崇的，现在她终于看透了，并且

觉得它十分可笑。当然，从到处流浪、无拘无束的人们那里得到的友情，是一口浑水井，但是，它是一口深井，是一口开放的井。嘿，娜金卡！跟我喝杯啤酒！他们喝着啤酒，都不说话，或者，如果你带着不顺心的事来饭馆，他们会听你说。他们对公共生活的兴趣最远不超过足球比赛。他们不做升官发财的梦，跟自己的上司相处没有困难，也不操心到哪儿去搞吊灯或者地毯。总之，她发现跟他们在一起完全可以放心。不久后，她在帮派里雇了两个人，准备揍傲气鬼一顿。

“一切都仔细商量好了。孩子们在外婆那儿，我把钥匙给了他们俩，傲气鬼会以为是我回来了，他们俩要等他看电视的时候突然闯进去。为了狠狠吓他一跳，也为了不让他认出来，他们俩都用丝袜蒙住脸。但他还是骗过了他们，傲气鬼谁都能骗过，因为他不仅是个胆小鬼，还是个大滑头。我给了他们一千块，他们以握手向我保证决不打死傲气鬼，但要狠狠地教训他一顿，让他永远都忘不了。一切都像我对他们说的那样，他们在起居室的电视机前找到了傲气鬼。他们想立刻干起来，这两人都有一双铁铲似的大手，可傲气鬼却机敏地退进了卧室，跑到了床的那一边。等到能够挥动巴掌打第一下的时候，他已经脱掉睡袍，全身精光，躺倒在床上。据说他当时两只手臂贴在身旁，脚尖伸得笔直，像跳芭蕾舞那样。娜金卡，你是我们的朋友，他们后来对我说，不过，光着身子躺在床上的男人我们不打。我们想帮你，但这活儿我们不能干。他们把一千块退给了我。”

“你打他一顿想达到什么目的？”黛妮萨问。

“让他害怕。他要是感到害怕，很可能扔下我逃走。我当时想，他们有我的钥匙，他一定会想到是我给的，他就会怕我再干。”

但是，丈夫没有逃，他每天回家，决心不放弃家庭共同体，尽管这已经不是什么共同体了。于是，娜金卡决定要放纵自己了。“我决心要堕落，可他还很高兴让我这么做。”

“哦，他这个做法可真够滑头的，”黛妮萨说，同时又悄悄告诉我，“埃娃，我想她的话您不会全相信吧！娜金卡是个好姑娘，可您有个很愚蠢的习惯，什么话都当真。”

娜金卡在饭馆里交上了一个经常到斯伐克出差的男人，他给她讲了不少斯洛伐克的情况，讲得非常生动。他已结婚，同样也不喜欢以前那种样子的生活，他同娜金卡谈得来，他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到了这种程度，当娜金卡心血来潮，突然提出想去领略一下盗窃是什么滋味时，他居然陪着她去了。

“您想去当小偷？”

“倒不是真想偷别人的东西，干吗要偷呢？我什么都不需要。我是想体验一下行窃时的感觉，我觉得那应当是很令人激动的。”

他们选中了当地的一处野营别墅区，夜里悄悄溜到最大的一间别墅附近，他们觉得别墅越大越难偷。那天明月当空，在月光照射下，他们在自己前面投下了又长又深的阴影。处在阴影深处，他们连路都看不见，然而，这些困

难反而给他们带来快乐。行进中，每当树枝折断时劈啪一响，或者石子相撞时哗啦一声，都会让他们吓一跳。他们酒后醉意正浓，但玩笑慢慢变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惧，而恐惧又慢慢消失在调皮捣蛋的快乐之中。“你们不可能想像，就是从那么一个矮矮的铁丝篱笆上翻过去都要多长的时间，如果你不想弄出大的响声来的话。就是把一条腿迈过去都好难啊！然后还有第二条腿！你不是裤子挂住了，就是夹克衫挂住了，根本不知道脚往哪儿放。周围一片寂静，此时你去砸门锁，那响声简直吓死人了，每砸一下我都觉得是放了一枪似的。我躬身躲在阴影里，像只兔子似的监视着四周。一个人怕得厉害的时候，会觉得时间怎么奇怪地不走了，干什么都那么慢。可当时我的心情很反常，暗中希望有人来抓住我们，如果这样，傲气鬼可要丢丑了。好家伙，他老婆偷别墅！”

别墅的窗户是关着的，他们轻轻打开灯，吃了这家人一个罐头。他们用手指头掏罐头肉，不想再弄脏人家的勺子，给主人造成更多的损失。然后他们躺下来，但什么事也未发生。这个男人因为受了惊吓，浑身发冷。等他们暖和过来后，丢下开着门的别墅，就跑回城了。后来这个男朋友带着娜金卡去了葫门奈县。

“干吗去葫门奈？”黛妮萨问。

“如果他说去科希采，我也会去。主要是离傲气鬼越远越好。还有可能是葫门奈这个名字听起来让我觉得好像靠近俄罗斯。”

“俄罗斯？”

“我在母亲的纪念物中找到一张俄国士兵的照片，不是六八年的，是四五年的①。他们穿着汗水湿透的俄式衬衫，船形帽低低地盖住眉头，胸前挂了好多奖章。母亲不告诉我是他们中的哪一个，也许她怕我去寻找他。”

“你大概不会想在葫门奈找到他吧？”

“我什么也没想。一个人不一定要想什么才做什么。去葫门奈是偶然的。我到站台上去送朋友上火车，我问他去哪儿，他说去葫门奈。这个名字我觉得挺有趣，我就说，带我去吧。他说，来吧。我和他一起上了火车，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想清楚是当真去，还是闹着玩，可火车已经开了。我什么也没带，钱也不多，把车票钱给了乘务员就剩下四十克郎。不过我带得有肉，我是从商店买完东西后来车站送他的，那是个星期二，我总是这一天去买肉，星期二是屠宰场送货的日子，肉新鲜。”

“你没有想过孩子？他们放学回家，你却不在了？”

“我不敢想孩子。我不是说嘛，人要是想行动，就不能多想。”

“您有一种逃向自由的感觉？”我问。

“我是感觉这是逃向自由。好像有什么东西劈啪一声，什么东西嘎吱一响，我就坐上火车出远门了。这就像您痛快地喝了一顿酒似的，不多不少，只是头轻微有点晕，心里很快活。”

“您一个人也会走吗？我是说，假如您的男朋友不去

①六八年指苏军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四五年指苏军解放该国。——译者

葫门奈，不带您去的话？”

“这我可能做不到，至少当时还不行。你们很难相信，是买东西减轻了我的压力。我心里一次次对自己说，你是出来买东西的，你只是出来买东西的。火车都开了，我心里还在说，其实你是出来买东西的，你会带着买的东西回家去，只不过路绕得远了点儿。我觉得绕这么远的路挺好玩。

男朋友一到葫门奈车站就同她分手了，娜金卡迈出了靠自己独立生活的第一步。但是，她对付不了葫门奈那坚硬的土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她都对付不了。“你们可决不要去葫门奈。这是个穷得可怕的地方，荒凉透了，这里只有一片居民楼，一个咖啡馆，一座兵营，几幢好点儿的老房子。坏蛋也不少。”

她在一对老年夫妇的乡村小屋里找到了住处，他们把她当做自己的半个女儿，不时让她一起吃饭，也不催她交房租。她到城外去摘刺梨，好有点正式收入。“那儿的刺梨可多了，蓝蓝的一大片。幸好我留着收购时开的回执，以后可以交给法庭。收入不多，但他们不能定我的寄生罪。”老年夫妇还在农村亲戚家宰猪的时候，派她去帮忙。宰猪是全村的狂欢节，要持续三天，二十户人家差不多家家都宰。屠夫直接对着瓶子嘴大口大口喝李子酒，脚都站不稳了，手却还很准。主人喝得也不少，捆猪的绳子抓不住了，猪跑了，大家赶忙去追。他们还让娜金卡喝了点李子酒，什么好东西都要她尝尝，其他女人只喝点甜酒。全村人都对她着迷，尤其是女主人。她形容说：“我什么都

不怕，还温和着的血也敢用手去搅，胳膊肘以下沾了黑黑的一层，味儿可难闻啦。村里没有自来水管，要从很远的水井里打水，用了不知多少桶水，全是我去提来的，天又冷，地又滑，鞋里都是水，丝袜都冻上了。”村里人给了她不少好吃的东西，够她吃一个月。“我真想留在那儿，要是有个年轻的单身汉，那个村子就可能把我留住。那儿一切都摆在明处，没什么曲里拐弯的事。”

在城里她常去咖啡馆，那儿暖和，一个上午就喝一杯咖啡，多的钱没有。她在葫门奈的环境里显得很奇特，要跟男人们结交是很容易的，但那儿的男人们很乏味。只有到了饭馆里，她才会又感到快乐，但在那儿又引起了当地警察的注意。那个警察第一次逮捕她的时候，把她带到火车站，让她买了一张去布拉格的车票。她当时吓坏了，这是她第一次同警察接触，而警察也相信了她的保证，没有等到火车开就走了。后来她到售票处退了票，她一共就那么点钱，又从后门溜回城里。她拼命去摘刺梨，不让人给她扣上寄生的罪名。但是，第二次警察就比较有预见了，他没收了她的身份证，把她带到办公室，并威胁要把她当做犯人押送回布拉格。逮捕她的时候天色已晚，办公室里就他们俩。这是一间像其他单位一样的普通办公室，有公办桌，椅子，电话和肮脏的窗帘，只不过他穿着一身警察制服。他很年轻，很粗暴。“我顺从了他，这才好不容易逃脱。我经历了一场可怕的斗争，良知和迫不得已之间的斗争，一场拼死拼活的斗争。他吼叫着，说要下令把我关起来，然后通知布拉格，而我不想回布拉格，那个时刻更

是非常不愿回布拉格，也不愿去坐牢。他把我的身份证拿在手里玩来玩去，很明显是轻易不会还给我的。要是我不把身份证带在身边就好了！平常我是把卖刺梨的单据带在身上，身份证留在家里，这一次因为要到邮局取钱，才把它带出来。要是真的没收我的身份证，那可怎么办？如果那样，街上任何一个警察见到我都可以抓我。一切都对我不利。天已经黑了，又只有我们两个人，他还可以指控我。给还是不给，这是女人们永恒的问题。他看上去倒也不是最差的，稍微矮点儿，但很有劲儿。他对我大声吼叫，但这并不重要，我认识一个男人，他为了讨女人欢心，还故意躺在地上装死，男人们都是这样，总是不愿直来直去地表示。但是，他可是个警察呀！你们明白那抉择的难处吗？跟警察胡搞，多丢人！可另一方面我又对自己说，你要是拒绝，那还算个什么女人？我们的命运就是顺从，我们就是为此而造就的。我明白，跟一个警察搞实在丢人，可是，女人能逃出命运的安排吗？”

在这个时候她不能被人从城里轰走，因为她在这里有了个情人。他在某单位搞建筑工程，是个讨人喜欢的男子汉，所谓“俏皮的斯洛伐克人”。他已经结婚，同妻子一起住在一座预制构件楼房的高层楼上，三间半一套的住房，在预制板楼房中还算是很舒适的了，有镶在墙里的衣柜，最便宜的整装厨房，用胶合板在房子里隔出的洗澡间，和一间只能望到对面楼房窗户的狭窄厅堂。娜金卡在这里能够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随便，情人的妻子每天去上班，这时情人便把她领进卧室，他只要一有可能就从单位

跑回来，有时候早晨妻子刚走不久就来，双人床上还留有他们夫妻的体温。他让娜金卡在家里吃饭，洗澡，洗头，洗丝袜和内衣裤，还不断变换花样送她各种小礼品。他倒不一定那么爱她，更多是欣赏她，她是他的女神，咖啡馆里的贵妇人。

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邻居们才向妻子透露了消息。她急忙赶回来，回到被入侵者玷污了的家里来。她猛然一推卧室门，看见娜金卡只穿一件衬裙，站在她的床旁，她的地毯上，对着她的镜子照，于是就朝她扑了过去。娜金卡在屋里兜着圈子逃跑，从厨房跑到前厅，从前厅跑到起居室，再从厨房到前厅到起居室。卧室在旁边，娜金卡使劲拉上了卧室的门，门上有一扇玻璃碎了。妻子决心进行血腥的报复，她打开一扇窗户，把娜金卡朝窗户赶。“她两只眼睛鼓得大大的，像头公牛，盘在头顶上的发髻掉到耳朵上，声嘶力竭地尖叫着，根本听不清她在说什么。这一切其实都非常可笑，我根本没想到自卫，我主要是不想让她看见我几乎赤裸的身子，我既没有戴乳罩，又没有穿裤衩，只穿了她男人送给我的那件愚蠢的透明衬裙，她闯进来的时候我正在试，看看合不合身。真是可笑，我一面跑一面还用双手护住乳房，把背朝着她，不好意思面对着她，结果被她抓住了。”丈夫米洛来了，才避免了历史上的窗户杀人事件①在葫门奈重演。米洛把娜金

① 指 1618年起义的捷克贵族把德意志皇帝派驻捷克的总督从布拉格宫窗户里扔出去摔死的事件。——译者

卡拖到自己身边，然后把她反锁在卧室里。妻子把她告了，娜金卡只是因为被捕，才得以从这套房子里逃脱。

就这样，离开的时候终于到了。“我在葫门奈已是名声扫地。”她认识的那个警察带她上了火车，等到车开了才离去。身份证没有还给她，给了她一个布拉格的地址，要她到那儿去领。他要她放心，他是把她的身份证作为遗失的证件送去的，关于她的事他没有向布拉格报告，但她不相信。丈夫曾两次给她寄路费来，不知道他是怎么弄到地址的，也许是因为她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给母亲写过一封信。她用第一次寄来的钱买了些食物，付了欠房主夫妇的房租，第二次寄的钱就用来买了这张火车票。但她并没有回家，从总车站下车后，她朝瓦茨拉夫广场走去，既不知到哪儿去吃饭，也不知到哪儿去睡觉。母亲那儿她不能去，她是向着丈夫的，她会让她回到他那儿去，她不愿为她照看孩子，就凭这一点也会让她回丈夫那儿去。她甚至还不愿去见孩子们，她想念他们，但这种思念还不够强烈，更强烈的还是作为女人的饥渴。同时，她已经不习惯在家里尽职责了，而且还有点怕回家，那些争吵的场面和无休止的责备使她感到恐惧，怕重新陷入那无法解脱的矛盾。我想她对自己心情的描述，总的说是可信的。她显然总是更愿意接受现成的生活，缺乏独立自主地转到另一种生活中去的勇气和能力。要是当时丈夫在车站上等她，她也许也会跟他回去。她也没有去公安局领身份证，很久以后她才知道，人家确实一直在等她去领。有了葫门奈的教训，咖啡馆她也不去了，饭馆也不去了，而是到了瓦茨拉

夫广场上的一家点心店，她认为在点心店里大概会结识一些正派的男人。

她慢慢喝着咖啡，口袋里只剩下最后的十克郎。但是，不需要她费什么劲，很快就有三位男士，三个年纪稍大的花花公子，邀请她坐到他们那张桌子旁去。她又可以同男人们应酬了，又可以引起他们的兴趣了，又可以展示她的女性气质了。她很高兴又在男人们中间，不过，她在这里试着施展自己的魅力，更多地是为了使自己重新获得良好的感觉，而不是为了那三个老头儿。她需要尽快摆脱葫门奈。果然，就在这个充满咖啡和蛋糕香味的点心店里，葫门奈那个警察对她的侮辱性统治的阴影不见了，整个葫门奈都离她远去了。怎么说还是布拉格更好，比那个草原上的冷酷而又偏僻的小城好，至少这里人多，一只迷途的羔羊很容易消失在人群之中。三个男人邀请娜金卡去参加家庭晚会，我们聊得多好啊，到家里去不是更舒适些吗？已经是傍晚时分了，她总要找个地方过夜，总不能头一天晚上就到火车站去冒被抓走的风险吧。他们开着汽车送她去，尽管这地方离瓦茨拉夫广场并不远，是一座过去的富有市民的宫殿。一进门，墙上就装饰着高高的镜子，真奇怪，还都没被打碎，楼梯一直到四层都铺着大理石，老式的走得很慢的电梯，雪亮的笼子可以容纳六个人，他们高贵地乘坐它一直到了五楼。这是一套大点儿的单身住房，有一间小厨房，浴室，宽大的窗户对着花园。娜金卡既然被当做一位夫人，自然不好提出可不可以在旅途之后洗个澡，但房子她倒仔细看过了，厨房里有一张挺不错的

沙发，正适合她那疲乏的身子用，至于铺着枕头、蒙着柔软的驼绒毯子的床还是留给主人用吧。

花花公子们为她的光临而兴奋不已。她讲了旅途的见闻，给他们看了她去买东西的那个皮包，她的纪念品，但她吸取了葫门奈的教训，用了一个别的名字，也把她的冒险之旅中的所有地名都更改了。他们允许她住下来，当女主人。她为他们斟白兰地时瞟了一眼橱柜，那里至少有五瓶格鲁吉亚名牌白兰地，冰箱里放满了火腿、奶酪、匈牙利香肠，冷藏箱里有粉红色的猪肘子、深红色的牛排。这套小房子以及里面的一切她都很喜欢，而且打扫得也很干净，只是主人过于自负，嗓门也太尖，不过，房子好不一定所有陈设都好呀！吃完冷盘后他们请她为大家煮杯咖啡。

有了葫门奈的经验，她先咣当一声把厨房门关上，然后又轻轻地打开一点。花花公子们开始商量按什么顺序同她行事。“在你后面我不干。”——“你想让我在你后面？”——“要我等一个钟头，在一边看？”——“是我请她来的，我有优先权。”——“可她喝了我的白兰地，吃了我的火腿！”——“听我说，先生们，”第三个说，“这个女人看来挺棒，可以同时伺侯你们两位，只须商量好技巧。”这所房子对她可也没有这么大的价值，她悄悄溜到前厅，根据在葫门奈取得的经验，她先在门里面把钥匙拔出来，再从门外面把三个老头儿反锁在里面。

这一串钥匙沉甸甸的，里面还有汽车的钥匙。外面下起雨来了，她只穿了一套连衣裙和一件毛衣，大衣已经在

葫门奈卖了。出门后，她觉得最重要的是找个安全的地方，先把钥匙扔了，也想到要先擦去上面的指纹。她穿过好几条街，想尽量离这座市民宫殿远些，来到一个宽敞的门洞，看见那儿放着一排排烟灰缸，有的烟头还在冒烟，她觉得这地方挺合适。门洞里的灯过一会儿就灭了，她找到了开关，当她第三次打开电灯时，才发现有一个漂亮的年轻男子在注视着她。上帝知道，总会有一个漂亮男子来为纯女性女人解决她所面临的尴尬处境。他醉眼醺醺地看着她用裙摆擦钥匙，她一把一把地擦，右手擦着，左手又留下了新的指纹。“你知道这些钥匙是开哪些锁的吗？”他问。

“知道，”她回答说，“不过，我可不想再开那些锁了。”

漂亮的年轻男子穿了一条皱巴巴的牛仔裤，裤裆里补了一块皮革，一件拉松了的毛衣，一双凉鞋，这身打扮同四月的天气很不合拍。他看来三天没刮脸了，可眼睛里却闪烁着快乐的光芒，而她每次都是根据这种眼神找到了跟自己有缘的心灵。而且，他也有一个快活地往上翘的鼻尖，毫无疑问，这正是她的患难之交。于是，娜金卡就把她怎么拿到这串钥匙的故事诚实地向他讲了一遍。

“嘿嘿，你叫娜金卡，是吧，是你说的你叫娜金卡，那好，娜金卡，要是我从你那儿把钥匙偷走呢？一瓶白兰地不正合适吧？你说呢，一瓶好牌子的格鲁吉亚白兰地不正合适吗？”

“可是，上帝保佑，我可不敢。你要明白，他们是三

个，而且肯定记得我。我需要的是赶快躲起来，而不是再惹人注意。我的身份证还在警察那儿呢。”

漂亮的年轻男子叫伊日，他表现得真像个骑士，放弃了白兰地，随后把钥匙扔进下水道。她想不到会有这么简便的解决办法！想到老头儿们还在敲打被反锁着的门，他们哈哈大笑起来。伊日搂住她的肩膀，她全身都湿透了，他把她带回了自己的家。

伊日跟妈妈住在一起，最后一个老婆在得知法庭还没有释放他后，就弃他而去了。妈妈虽穷，但很本分，靠做清洁工为生。她一句话不说，拿出裙子和上衣让娜金卡穿上，在炉子上为她烧了热水。他们住的是筒子楼，一间房间带一个厨房，厕所是全层楼公用的，但三个人挤在一起还满不错：妈妈住在厨房里，她在这儿洗衣服，缝衣服，做饭；伊日和娜金卡在后面房间里做爱。伊日充满着温柔的、快乐的爱意，他像孩子一个抚弄她的身体，这种爱就是当着妈妈的面也没有关系。他属于那种整天乐呵呵的类型，但是，如果他一犯病，可就一切都变了。他刚从劳改营回来，因为盗窃，他在那儿待了两年，法院还规定他每周必须到警察局去汇报一次。他是个钳工，在火车站找到了一份工作。娜金卡细心地照料着他，除了有时帮妈妈洗衣服外，她整天待在火车站附近，如果伊日需要她，可以很快找着她。只要她在，他喝酒也比较适度，要是有个到处闲荡的人要请他喝酒，她就会在桌子底下扯他的衣服。她也留意着让他每星期二到警察局去一趟，这是免得他们找麻烦的惟一方式。他们之间谈不上什么伟大的爱情，更

多的是一种温柔的友情。跟伊日在一起，她享受到快乐，也体会到一种关心和体贴别人的乐趣。她谈他的时候不多，但每次说到他时总是夸他。她感到自豪的是，在这几个月里她天天陪着他回家，没让他醉得起不了床，第二天一早都能按时到火车站去上班。

可后来这一切突然被破坏了。

娜金卡很想念孩子，有一天她到母亲那儿去看他们。这次会见弄得糟透了，母亲一见面就劈头盖脸数落起女儿来：你算个什么妈妈，你一点儿也不像我，我没有男人，但从没有丢下你不管，你什么都有，男人、陈设得挺好的住房、汽车、别墅，可你什么都不爱惜。我是为了他才同意照看孩子的，从来都是这样，可是你记住，我照看孩子不是让你可以到处鬼混，跟别人胡搞。她不小心把自己的地址告诉了母亲，她当时说，妈妈，求求你啦，要是孩子们有什么事，要是他们生病了，或者想我了，给我来信，答应我给我来信，而母亲却把地址给了傲气鬼。他来到筒子楼，是个星期六，全楼的人下班后都在家里休息。伊日的妈妈到公墓去了，幸好房门是锁住的。她和伊日还在睡觉，敲打厨房门的声音把他们吵醒了。开门！我知道你在那儿！你要是不出来，我就提出离婚，你再也甭想见到孩子们了。马上开门，不然我就去叫公安局的人来。她浑身颤抖，挤在伊日怀里。伊日酒醒了，他要起来揍死傲气鬼，因为把他给弄醒了。傲气鬼过了好一阵才走，但他一闹吵得满楼的人都知道了。后来楼里的人对妈妈说，他们看见他一路走一路哭，下楼梯时还淌着泪水。律师劝傲气

鬼，提出离婚还不如告她不抚养孩子、不支付孩子生活费更有效。娜金卡的妈妈也同意一起告她，傲气鬼在给当局的控告信中一个克郎不少的算了一笔账，连两次寄到葫门奈的钱也包括在内，还附上邮局的回执。

傲气鬼对她进行报复了，她不断收到他的律师寄来的威胁信。伊日又陷入了往日的烦躁和不安，他的眼睛竖起来了，失去了快乐的光芒，开始打她，骂她。妈妈借来一张折叠床，两个女人睡在厨房里。伊日晚上不回家了，一天，两天，有时接连几天不回来。有一天喝醉了，又挨了打，让几个妓女给送了回来。在这以前的几个月好日子里，他们约好了每天五点在布拉格市中心车站会面。布拉格市中心车站是那些游手好闲的人们、低层次的小偷们、逢人就献媚的女孩子们，以及寻找伙伴的同性恋者们的中心活动场所。一般的旅客什么也发现不了，他们穿过一间间大厅，喝杯啤酒，或者吃根香肠，然后向各个站台走去。但熟悉这个地方的人很容易就会在这儿卷入斗殴，或者碰到男孩们来跟你调情，再不就会发现饭馆角落里一张桌子旁有个糟老头子在肮脏的桌布下面手淫。所有在布拉格没有固定居所的女孩都会给你谈起市中心车站，说那是一个既可以交好运，也可以逢厄运的地方。娜金卡去那儿的时候，既不心怀邪念，也不心存恐惧，还是那副既不超凡脱俗又不同流合污的模样。她每天去找伊日，在他生病时也去。又到了星期二，该他去警察局汇报的时候，要不去警察就会到家里来找他，可是，已经是下午了，谁也没有看见过他。说不定已经被带走了，一个他们认识的扳道

工说，为了不让她去喝酒馆里的劣质啤酒，他请她到道岔房里喝咖啡。道岔房是一节废弃的车厢，车站工人们在那儿玩牌，也领姑娘们到那儿去。在道岔房前娜金卡被捕了，她既没有身份证，还受到不交赡养费的控告，所以把她关进了鲁津监狱，算是预审拘留。后来伊日的妈妈给她来信，告诉她伊日也在鲁津监狱里，但娜金卡既没有力气，也没有兴趣到处喊叫，或者私下传递信件找他。

有一天夜里，天快亮的时候，我觉得脖子上有个什么奇怪的东西在爬动。醒来一看，两个指头中间夹住了一个小东西，我叫醒黛妮萨，她肯定是只虱子。我只找到一个，是黛妮萨救了我，她不顾严格禁令为我染了头发，而我却在黛妮萨头上找到了一大堆。我们把其他人都叫醒了，安卡、黛妮萨、我、瓦茨科娃太太、阿莉采、娜金卡，我们都坐起来，披着灰色的毯子，沉重的空气压抑着我们，这个新的不幸更令我们垂头丧气。娜金卡长的虱子最多，这小东西钻进她的皮肤，她的头上和头发遮着的脖子上全是蠕动着的小脓疮。虱子从何而来，探索这个问题毫无意义。起床铃响后，我们向训导员作了汇报，她毫不在意。突然我们大家都明白了，为什么娜金卡总是用手指头尖去弄松她的头发。她的头痒得要命，但她没有想到会有什么不祥的事情，以为是头发沾上了毯子里的灰尘，即便她想到了，同样什么也不会说，她会害臊，宁肯让事情自然暴露。这也许就是文明人在不文明的环境里交纳的文明税吧。

我们都要急死了。第二天娜金卡就要被送到劳改营

去，有经验的妇女告诉我们，到了劳改营后，长虱子的女人一律剃光头，不像别人那样只是把头发剪短。训导员也证实，拘留所还给点药膏，换套干净内衣，劳改营可对谁都不客气。我们请求缓几天再押娜金卡去，再不然当天晚上仍让她留在我们牢房里，押送车反正第二天早上才开，我们给她头上抹上药膏，到起床铃响以前我们轮流给她抹，直到把头弄干净为止。“训导员太太，她十四天后就回家，别让她光着头去见自己的孩子。”

“您就好好收拾东西吧。”训导员说，“我们对这些事都习以为常了，劳改营的人反正要骂我们尽给他们送些长虱子的女人去。”

娜金卡的手颤抖得很厉害，连在床单做的包裹上打个结都做不到。我们替她捆好了行李，除了公家给的东西外她一无所有，谁也没有往监狱里给她寄过任何东西来。我们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塞给她，也许一块香皂、一筒面油、一块巧克力会帮助她贿赂劳改营里的那些人，但她什么都不要，只拿了点香烟。“你们还要在这儿待很长时间，而我两个星期后就出来了。”

“上帝保佑你，娜金卡，我的爱。”安卡说完就把脸转过去，怕我们看见她哭。她久久地亲吻着娜金卡的嘴，娜金卡软绵绵地笑着。黛妮萨和娜金卡头对头抱在一起，不是你有虱子吗？有就有吧！我也想有。然后我们坐在那里，垂头丧气，无精打采，因为我们能为她做的事是那么少。

我们正在捉虱子，突然黛妮萨果断地要我把从她的头

发里找出的最大个儿的虱子放到训导员忘了从我们牢房拿走的小玻璃药瓶里。那些虱子一个个养得肥肥胖胖的，在玻璃瓶里爬来爬去。等到快装满半瓶的时候，看守来找黛妮萨，因为她预约好要去医务室。但她不可能把小瓶握在手心里带走，那样看守会发现，于是，她就把这些肚子里满是卵的肥虱子小心地捏在大拇指和食指中间，既不让他们跑掉，又不把他们捏死。一路上，遇见穿制服的就给放上几个，因为大家都讨厌那个女护士，最后一个虱子就放进了她的裙子。这是为了娜金卡那可怜的斑白头发而进行的一次小小的报复。

安卡和阿莉奇卡

“来——吧！”姑娘们跪在桌子四周的凳子上，桌子上摆着色子，正在玩“好人，别生气”。安卡掷出一个六点，赶紧抓起色子再掷。“来—— 吧！”她兴高采烈地尖叫着，又掷出一个六点，她已经追上来了，超过了别人，还该她掷。她不注意谁输谁赢，不讲战术，只管掷，不断尖叫“来——吧！”自己掷的时候叫，别人掷出六点时也叫。这叫声可以减轻心理上的压力，也可以使无聊的“好人，别生气”游戏增加一点戏剧性，从而让自己的精力得到宣泄。安卡的叫声使游戏越来越白热化，好像是在用生命作赌注，靠色子决定谁死谁活似的。“来—— 吧！”彩色的色子气喘吁吁地翻滚着在碗底停了下来。姑娘们玩

得这么起劲，她们那副聚精会神的样子跟游戏本身的简单原始完全不相协调。她们都渴求着某种感受，某种激情，而这又只能靠她们自己从一片空白中去创造。游戏玩腻了，她们还剩下一种办法，那就是打一架，或者至少吵一架，然后她们才会安静一会儿。囚禁中的妇女会不停地产生某种隐蔽的内心颤抖，这是一种实在的颤抖，生理上的颤抖，如果注意观察，是完全可以看出来的。这种颤抖，肌肉的颤抖、内脏的颤抖、神经的颤抖，在熟睡中也不停顿。所有被囚禁的妇女都有些神经质，她们暴躁，好哭，好斗，在男人们放风的时候，除了偶尔几声喊叫以外，我们在牢房里只听见低沉的谈话声和沙沙的脚步声，一种单调的、催人欲睡的簌簌声，喊叫的主要是些未成年的小男孩。而女人们一到天井里，就好像放出了一群受到侵扰的黄蜂，立刻喧闹起来。正是在这种喧闹中，不知向何处发泄的感情能量获得释放。安卡使游戏白热化，唤起其他人的激动情绪，自己却很少赢。她不是为赢而玩，甚至不是为玩而玩，她是为这一阵喊叫而玩，然后她会舒舒服服地感觉到一种麻木。“来——吧！”她还在叫，但是，她的激情已在一种甜蜜的感觉中慢慢消失，她毫无兴趣地望着那些木制的色子，偃旗息鼓了。谁输了，往往不肯罢休，还要继续玩下去，而安卡的身体已经趋于平静，所以，一般都是她宣布不玩了。

她来自科希采，是来布拉格找工作的，不过这已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到底几年我们也推算不出来。安卡不愿意谈自己的事，只是偶尔在闲谈中漏出过一些情况。她很喜

欢聊天，但很少谈自己的生活经历，只是描述她遇到的各种情况和所处的各种环境，这样就可以掩盖她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事情。她做得这样巧妙，以至于当接替安卡来到我们牢房的一个年轻女人说曾在劳改营见过她时，我和黛妮萨都感到很惊讶。难道安卡已经坐过一回牢了？从时间上说有这个可能，但从安卡讲的情况中却一点也看不出来，她很注意装出一副初次受刑事处罚的样子。她到一家糖果厂当女工，是和自己的一个朋友，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女人一同从科希采来布拉格的，这个女人对首都的情况比较熟悉。这是个很不错的机会，工厂除工资外还发给她们特别奖金，并且安排她们住在工厂集体宿舍里。要不是安卡还不满足，她完全可以在这个工厂干好多年。集体宿舍就在这座现代化工厂的厂区内，里面有厨房、食堂、电影院，当然，每层楼还都有电视。安卡后悔自己糟踏了这么好的一次机会。她喜欢闻那股在车间、走廊、楼梯、仓库里到处弥漫的糖果香味，夸奖工厂食堂的饭菜好吃，在集体宿舍里她自己住一间屋，而且，巧克力可没有少吃！在工厂大门里，每一个人都可以随便拿糖果吃，只要肠胃受得了。她惟一不满意的，是分配她为自动生产线运送糖浆。其实，她挺欣赏这条自动生产线，还向我们作讨详细描述，但不喜欢老是推那辆推车，而更喜欢到生产夹心糖的德国新机器旁去工作，但是，要得到更好的工作，必须先干好差一些的工作，而安卡缺乏这种耐心。于是，她开始从别的方面来征服布拉格，而不只是停留在糖果厂里了。她告诉我们，一个女朋友引诱她离开糖果厂，一起到

巴尔杜比采去参加糖厂秋季榨甜菜的工作，不过，更可能是她同女朋友一起从劳改营被押到巴尔杜比采制糖厂干活。总之，她从糖堆里一下子掉进了监狱。

现在她蹲在鲁津监狱里，占据了角落里的一块地方，在那儿她的背后很安全，并且可以仔细观察我们。她不露声色，低着个脑袋，只是偶尔用眼睛瞟一下正在说话的人。她从不谈她对某个人有什么看法，眼睛里总是透出一种特别深沉的目光，好像那些对生活看得比其他人都透彻的饱经风霜、老于世故的人们，他们心里什么都明白，并因此而自外于人。她不讨好任何人，阿莉奇卡除外，也不对任何人特别抱好感，她不喜欢姑娘们之间容易产生的那种廉价的友情。除了公家给的一点东西外，她一无所有，也不追求什么。桌上端来什么，她吃什么，不管好吃还是不好吃，要是什么也没有，她会默不作声地忍饥挨饿。外面没有任何人会给她寄点什么东西来改善一下狱中的生活，她也不给任何人写信。钱她也没有，所以也不能在监狱里买烟抽。训导员安排她去清洁班当清洁工，她犹豫了好久，后来他们厉声告诉她，她必须支付孩子的抚育费，因此她必须在监狱里挣点钱，这样她才同意了。我们有时请她抽烟，或者给她一块肉、一些糖果，她乐于接受，假如不给她，她会用她那双处处留意的眼睛默默记下，但决不会用任何方式表示自己的意见。她对一切似乎都很淡漠，但并非无动于衷的淡漠，而是襟怀宽阔的淡漠。总之，安卡是一个很少见的、很独特的人。她曾问我：

“你干吗老是看书,说真的,这会让人发疯的。”

“你是说,你会因为我发疯?”

“不！您会因为这些书发疯。我们村里也有那么一个，是个老师，他看呀看呀，结果疯了。这是真的，您可以相信我。”

“我相信。也有别的人看书看疯了。”

“干吗他们要给您在这儿写上个博士？您是律师？”

“不。我念过哲学系。”

“哲学?那是个什么东西?”

“安卡，”黛妮萨说，“你别装傻了，其实你并不傻。”

“怎么啦！问问总可以嘛，不能问？”

“人们想弄明白世界是什么，为这想出了各种理论。”

“瞧,我说过吧,您会疯的。”

“知道吗，安卡，要跟你说清楚什么是哲学，那是很困难的。”

“您都到这儿来了，还不够吗？还想弄到波赫尼采去？来吧，跑我们一起玩吧，别老说废话啦。”

有一次，我们牢房借到了一本《丧钟为谁而鸣》，一个年轻的吉卜赛女孩拿去翻看。她也是儿童收容所教育出来的，可她倒学了不少文化，会看书。她在书里翻出了一句下流话，就哧哧地笑着拿去给安卡看，安卡说，“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您一天到晚钻到书里去。”她也开始在书里找下流话，并且把一本书都看完了。她把这本厚厚的小说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只记住了其中的主要情节，却讲得头头是道。

“瞧，你不是也看书啦。”黛妮萨说。

“可不是吗,我并不笨。”

“你别说你以前从来没有看过书。”

“那我不也成了傻瓜蛋啦？看什么书啊！只有在这儿，这儿太闷了。”

“你在学校里也不读书？”

“学校里也不！学校里有什么？就跟什么也没有一样。”

“别说谎,安卡。”

“我知道一本书，”安卡说，我知道一本你们做梦都想不到的书。”

“好吧 那你快说吧！”

“不过，您可别说您也见过这本书，”她警告我，然后充满神秘地说“《爱经》,”并且带着一种默默的、几乎看不出来的、略微有点蔑视人的胜利者的神情说，“您知道吗？”

“你怎么搞到《爱经》的？这可是一本非常珍贵的书，一出来就卖完了。”

“我有，”她骄傲地说，“我买的，我把它锁在箱子里了。”

“你干吗要把它锁起来？”

“您要是读过，”她振振有词地说，“您就知道为什么啦。”

“安卡，这是一个修道士写的书。”

“修道士！”她哈哈笑了起来。

“是个很有学问的修道士。它是古印度的一部性爱教

科书。”

“它写的可是……”她给我上了一课，并向其他人讲述了书的内容。

娜金卡说，“我见过一座印度寺庙的照片，整个寺庙外墙上尽是性交姿势的浮雕。”

“教堂？”安卡觉得很奇怪，“那些印度人就那么风流？”

“这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

“所有姿势都有？”

“反正够多的，”娜金卡说，“可以说都有。”

“也有两个女人的？”

“哎呀，安卡！”娜金卡生气地说。

她和女朋友一起在糖果厂的集体宿舍里偷偷地读了《爱经》，这对于从科希采来的姑娘们来说可真是伟大的发现。好一个布拉格啊！可有我们好看的呢！可是这个修道士写的《性爱指南》同安卡自己的体验安全不一样。安卡是一下子，一个动作就失去了自己的处女身，并且做了母亲。她是在参加完舞会回家的路上同勾引自己的人怀上孩子的，其实也不叫勾引，安卡爱那个小伙子，反倒是小伙子不怎么看得上她。“他喝醉了，”安卡说，“弄出了个傻孩子。”

她不想要这个呆傻女儿，生产也很不顺利，差点儿没要了她的命，所以，她把孩子交给了收容所。但是，要摆脱那不幸的爱情和不良的性体验，就不那么容易了。她怀孕后，小伙子倒是娶了她，但到后来一切都弄糟了。孩子

是个残废，爱情又谈不上，他怎么瞧她都不顺眼，而婆婆又说她的坏话，把她赶出了家门。结果小伙子跟她离了婚。以后在舞会上他们相互粗野地对骂，他再也不喝醉后送她回家了，她却看见他送别的女孩。她很伤心，感到自己被抛弃，同时也出于愤怒，她把婆婆家房子上所有的玻璃窗都砸了。她事前捡好石头，一大堆石头，大白天就去了，村里人在一旁看着，她一面高声叫骂，一面很有系统地、毫不留情地，也可以说是按捺不住地，把窗户一个接一个砸碎。这样当然要不回丈夫，他又和别人结婚了，而她只能为自己的痴情捶胸顿足，撞墙痛哭。到了布拉格后，是《爱经》给了她安慰，使她知道她所爱的小伙子不过是个粗野的笨蛋。她感激这个发现，但爱情并未因此而消失。她被诱骗了，又被抛弃了，一谈起那个小伙她就恨得咬牙切齿，可是，有仇恨的地方往往曾经有过爱情。有了和那个男人以及生孩子的血腥教训，现在又有了《爱经》的理论指导，加上从妇女劳改营生活中吸收的经验，安卡开始崇尚女性同性恋。它虽然不像两性之爱那样随处可得——指的是在自由人之间很难得到，在监狱里则居于绝对优势—— 但它是一种温柔的爱情。“ 无论哪个女人尝到，都不会再要别的。 ”这是安卡讲的一句她认为是无须求证的公理。

安卡来布拉格后认识发展的第二个高潮，是所谓的“ 大世界 ”。什么是大世界？什么不是大世界？安卡又给我上了一堂关于相对价值的课。安卡认为她经常去的咖啡馆、迪斯科舞厅、大众舞厅，都是和她的身份相称的，也

就是说是些普通的地方，那些地方也挺有意思，但够不上“大”。布拉格市中心车站——她对布拉格的车站分得很清楚——也是她常去的地方，那里是她以及和她相类似的人视为以家的地方，也有一些她也瞧不起的人类渣滓在那里栖身。谈起市中心车站，她就像村里老太婆谈家常那样自然，她经常坐在那里喝啤酒，在那里同别人打架，看别人拉皮条，结识了入室行窃的和其他各式各样的小偷，观察那个不害臊的手淫者。市中心车站是交换情报的中心，结识朋友的中心，也是出行和归来的集散地。但是，这能算“大世界”吗？

安卡在布拉格认识的人，最高贵的莫过于伯爵夫人了，她着迷地、充满爱意地讲述这位夫人的故事，实际上她是偷偷地、高不可攀地爱慕着她。伯爵夫人是布拉格一个有名的人物，她已经是七十多岁，可能是七十好几的人了，过去是个舞蹈演员，丈夫是现今布拉格老城名声最不好的一家葡萄酒馆的主人。葡萄酒馆所在的那条街是妓女云集的地方，街的拐角处整夜都有一辆警车停在那儿，葡萄酒馆里非常热闹，但从别处来的过往客人不受欢迎，专门雇了人驱赶他们。酒馆在很深的地下室里，要沿着一条长长的阶梯往下走，阶梯常有尿味。在精选的客人们酒酣耳热之际，据说还可以在灯光昏暗、人头攒动的小舞台上看到性交表演。伯爵夫人在葡萄酒馆里有自己的账号，自己的桌子，她每天都去，但总要到八点半左右才到，她常常邀请她喜欢的人与她同桌共饮，有时候还带一位女伴来，她的身材苗条，显然经过训练，纤柔而富有弹性，舞

跳得好极了，尽管已这么大年纪，还可以轻松自如地跳摇滚舞。衣着非常时髦，常交替使用一些式样年轻的假发，最出名的是那一头金色的长发，不卸妆根本看不出她的年纪。她浑身香气袭人，每每在半夜里带着一个年轻男人回家，一天换一个。她有自己的包车，司机来回接送，尽管她住的地方离这个葡萄酒馆不过几条街。她喝酒从不醉，只舒舒服服地喝到欢畅的地步，而且只喝葡萄酒，从不喝啤酒和烈酒。她举止高贵，善于保持距离，不过，谁要纠缠她或者不尊重她，马上会有强壮的酒店保安人员把他架出去。安卡暗示她知道伯爵夫人的住处，有一次也曾被请到夫人的桌旁，她正吃着淡水鲑鱼。伯爵夫人用餐具在盘子里轻轻拨弄着，手上戴满了戒指，耳朵下面一对沉甸甸的金耳坠来回晃动，脖子都快被金项链压弯了。安卡想入非非，竟然渴望着伯爵夫人不挑选那些小白脸，而把她带回去。哪个女人只要尝到……

她讲述这些一知半解的情况时，脸上的神色显得那么自信，真叫人感叹。她确实需要见过一些世面才能够发现伯爵夫人的伟大！不过，看来她在这位夫人那儿未获得成功，否则一定会吹嘘一番，要当伯爵失人的玩物，安卡很难有什么希望，她长得不好看，惟一好看点的是她的头，乌黑浓密的头发，大大的黑眼睛，长长的睫毛，弯弯的细眉毛，秀气的小鹰钩鼻，结实的下巴。要是只看头部，安卡可算个美女，可是她的身子却欠发育，不是像长不大的孩子，就像是个早衰的老人。她的肩膀向下蹋陷，肚子像个水桶，肚子是她身上最难看地方，从她那对孩子般的乳

房处就开始隆起，中间奇怪地胀胀缩缩，一直下垂到阴部以下，像一滴滴不下、甩不掉的大水珠吊在大腿上。这不是肥胖症，而是大自然对安卡开的一个奇怪的玩笑。“我奶奶也是这个样子。”安卡说。安卡的奶奶在家里很有地位，她是公认的草药医师，也有点像巫婆，但安卡的奶奶没有像她一样要来征服布拉格的“大世界”。除了不匀称的身子外，安卡的手和腿都短，手掌很小，长着孩子般的细小指头。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察看掌纹，给每个人算命，安卡也把手掌伸出来，可她的掌纹不可测。她的手掌由两块表皮光滑的没有纹路的肉团组成，中间有一道很深的横沟，好像人工割开的一样，把手掌从中斜切成两半，一半连着四个指头，另一半则只连着大拇指。是不是猴子才有这么分成两半的手掌？我们不知道，但安卡为自己的特殊而感到自豪。

她对什么事都有自己的看法，而且很快做出判断，不过根据一般世俗之见，她的看法可能很愚蠢，无论如何肯定不是正经的意见。她孤芳自赏，性情乖戾，因为自己的怪脾气吃了不少苦头，还会吃更多的苦头。在学校里她的成绩不很好，但确实有天赋，只需要从她绘声绘色、神形兼备地讲的故事中就可以看出来。几句话她就把从舞会出来被人诱骗的情形讲得清清楚楚，至今我仿佛还看见他们躺在那儿的那株树，看见地上弄脏了的草和远处漆黑的天空。而且，这决非是我添油加醋，安卡当时还听见并且记住了那只叫个不停的、令人讨厌的蝈蝈。她只看人一眼，便有了对他的看法，这很可能是她那个巫婆奶奶传给她

的，而这对她的生活更多起的是一些负面作用。对于人世间的是与非，安卡都有自己的看法，她不惧怕有自己的独特看法。对于自己性格和心灵的独特，就像对于自己奇特的体形一样，她都泰然处之。她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子，但不怨恨自己，也不怨天尤人，尽管为此她吃了不少苦头。她所具有的一切美好的、出众的东西，都不利于她的生活，因而她一事无成，累遭失败，渴望获得的东西一样也没有得到。周围的人只知道惩罚她。村里的人把她看做是到处惹麻烦的不祥之物。这大概也怪她，她不该大声地说出自己的向往。她说要有个她爱的男人，可他却瞧不起她；她说要有个美丽的、健康的孩子，因为她差点为孩子送了命，可孩子却是个呆傻的废物；她还说过要把她出生的地方作为自己的家，可结果却被扫地出门。当父母还在的时候，特别是奶奶还在的时候，安卡受到保护，可是奶奶死了，以后父母也死了，而哥哥虽然已经盖起了自己的房子，却把父母留下来的、安卡被丈夫和婆婆赶出来后惟一可以栖身的家园给卖了。他做得很周全，也很狠毒，刚卖掉了安卡惟一可以遮风避雨的家园，就在人民委员会①的帮助下，把自己惟一的妹妹逐出了村庄。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我不知道，安卡自己也闹不明白。人们只是对她说，你走吧，既然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她能不走吗？安卡没有说，为什么哥哥和村里人一定赶走她。是为那打碎

① 当时捷克斯洛伐克除中央政府以外，各级政府均称人民委员会，此处指当地的村政府。——译者

的玻璃窗？是为了舞会上的吵闹？还是为了她总是要闹出点不光彩的事来？她先到了科希采，然后来到布拉格，从那以后只回过一次家，给哥哥的孩子们买了一些礼物带去，但根本没有让她进屋，礼品也不收。这是在她头一次蹲监狱之后发生的。

她成了女流氓，是在绝望之中变成流氓的。她经历了太多的辛酸和暴虐。难道崩溃的婚姻和不幸的女儿还不够吗？还要把她扫地出门，这多么令人伤心啊！可是，为什么在布拉格还要把她投进监狱？有了这些残酷的经历之后，她那个机敏的小脑袋瓜想出了给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的办法：给软弱无力的身体裹上一层剽悍凶狠的外衣。就是到牢房来后，她最初说的话也是带有威胁性的：你们都小心点儿，谁要惹了我，谁就要挨打。她还形象地描述了在布拉格市中心车站和一个向她挑衅的男孩子打架的情形，男孩子比她强壮，但还是被她痛打了一顿，还流了血，她正是在这场斗殴中被抓走了。“让他们抓吧！”她说，活像个农村砸酒馆的二流子。于是，我们心里面说，好吧，安卡是个好打架的野姑娘，我们不要刺激她。她脾气暴躁，很容易就跟别人吵起来，每次我们都是迅速把争吵平息下去，不让她轻易找到打架的借口。每天早晨她醒来时都特别凶，眼睛往下耷拉，一副要杀人的样子。牢房里早晨特别紧张，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一下子有六个女人要撒尿，要洗脸漱口，要穿衣服，要把六张床重叠起来，要擦地，要摆桌子凳子准备吃早饭，而这期间还老是有人打开门上监视镜的盖子往里看，同时，又要赶在早饭前把

密信传走，还要跑到便池旁去说话，而安卡却总是拒绝遵守早晨的生活节奏。“让我安静会儿，让我再睡会儿。”我们总是想法逗她高兴，慢慢地、细心地拉她起来，这倒不是因为我们怕她的拳头（孩子般的小拳头），但每发生一次公开冲突，大家都会好长时间心情沉闷，情绪低落，很久才会慢慢恢复。而且，只要安卡度过了这早晨的困难，整个白天她都会是一个快活的、可亲的姑娘，同她交朋友既很容易，也很愉快。此外，监狱里每一个有头脑的人都知道，一觉醒来后想杀人的情绪是从何而来的。一看有爆发冲突的危险，娜金卡就会说：“安卡，别制造紧张空气。”这是我们最严厉的措施，而安卡也总会乖乖地听娜金卡的话。

有一天，我做早操时发生了一件事。因为腰背有病，我每天早晨都要做操。黛妮萨不仅维护我的这个权利，还帮我整理床铺，让我有充足的时间。我像往常一样把胳膊向身后一甩，后面我看不见，按常规后面也不会有人，但那天早晨安卡却刚好站在那儿，我的胳膊比较重地落在了她的肩头，安卡早就对我做操不满意，其实其他人也不满意，只有一两个很文明的女人在我做操的十分钟里强忍着瘾头不抽烟，其他多数人都故意大口大口地抽，而且还大声喊叫，因为我们把窗户打开了。那天安卡也是故意在我身后转悠，想在早晨找个借口发发火。我并不是打她，胳膊转了半圈后力量也已经不大了，只是稍微撞了她一下，可她却站不稳了，一头栽倒在地，像一只熟透的梨。她突然躺倒了，我们都不知道怎么会这样，这么一撞并不可能

把任何人打倒。她慢慢在地上坐了起来，我们在她身上到处摸了摸，看看有没有伤着，然后把她抱了起来，她的眼里露出一种慌乱的、不好意思的神情。我们也一下子很不好意思起来，因为我们看出来了，她不仅毫不凶悍，根本不是她所宣传的那种打架的好手，相反，她很软弱，她那欠发育的整个小身子都是软弱无力的，安卡不过是穿了一件凶悍的外衣，好把她的软弱掩盖起来。原来，安卡眼睛里透出的深沉目光正是在说：她在强者面前是软弱无力的。然而，除了用力量对付力量以外，她又看不到别的自卫方式，所以就用言词来冒充力量。我们感到特别奇怪的是，安卡在露出真情之后，在我们把她全身各处都摸了一遍之后，并没有和我们更亲近，像一般情况下可以预计的那样，相反，因为我们看穿了她的假象，她似乎同我们更疏远了。

从劳改营里被放出来后，她到一家洗衣房去工作。这是个现代化的洗衣房，不久前刚建成的，是布拉格最大的一家公共洗衣房。但是，从安卡讲的情况看，那儿的工人们简直像奴隶一样干着笨重的体力活儿。不是有机器吗？是的，是自动化洗衣机。但是，机器与机器之间还缺少一些环节，这些地方就全靠人力了。像山一样的一堆堆衣服从洗衣机、烘干机里源源不断地涌出，安卡负责整理烘干后的衣物，她要注意分清不同客户的衣物，不能混淆了，又要跟上机器的节奏，因此，动作必须快速、敏捷，还要非常细心。床单、被套，被套、床单，所有那些雪白的未经熨烫的干净衣物都要从她那双小手里过一遍。八小时下

来，手心烧得难以忍受，整个双手都麻木了，注意力也不能集中，车间里很热，女工们几乎都是光着身子干活。如果有杰克·伦敦的才能，她完全可以成为一名作家。而她却只知道逃，抓到她的时候一查询，她无故旷工已有很多次，再送她到阿波里纳什一检查，又患有淋病，于是把她扔进了鲁津监狱。她已不是初犯，而是屡教不改，还可能追究她不向儿童收容所支付呆傻女儿养育费的责任。

但是，在身体相触、呼吸与共的环境里，你很快就将学会抛掉一切浪漫主义的玄想。牢房里又送进来一个来自南斯洛伐克的丑小鸭，她一半是吉卜赛人，一半是匈牙利人。于是安卡，那个怕我们并因而使我们觉得不好意思的安卡，现在有了可以欺负的对象。弱者找到了一个更加软弱的小生物，可以在她身上发泄对世界的憎恨。丑小鸭只会结结巴巴讲几句最普通的斯洛伐克话，比方说睡觉、洗脸、吃饭等，看上去还有点痴呆，老是傻乎乎地笑，长得也很丑，她饿坏了，一见到食物就扑了上去，拿起我们盘子里剩下的东西就吃，我们不想吃的她都吃了，看来是好长时间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了。我们也主动让她吃，不笑她那副狼吞虎咽的样子，也许这也促使她不为自己的饥饿害羞。所以，这个姑娘很快就长胖了，样子也更加愚蠢，至于她的名字——就叫她阿莉奇卡吧。

她对我们有点隔膜，一来是由于语言不通，二来是由于这个小东西突然被扔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总有点怯生。一开始她老坐在自己的凳子上，后来很快发现没有人会偷走她的凳子，于是，就把凳子搬到门边最不碍事的地方，

她坐在上面，身子左右摇晃，轻轻地哼起歌来。她也渴望得到理解，渴望听到一句亲切的话，所以，她总是用她那张难看的、满是污垢的小脸蛋朝我们善意地微笑。在一个懂点匈牙利话和吉卜赛话的姑娘帮助下，我们一点一点地弄清楚了她的身世。她是在儿童养育院里长大的，因为家里孩子太多，父母就把她送到那里去了，到了可以干活的年龄，也就是说到十五岁的时候才回到家里。他们家住在农村，在一个土地肥沃的、比较富裕的合作社里，阿莉奇卡在养猪场工作。不久前刚生了个男孩，男人在服兵役，她自己刚刚十八岁出头。

她是被村里的一个女友，一个已经在布拉格混熟了的吉卜赛女人给骗到布拉格来的。这个吉卜赛女人见她既轻信又愚蠢，就把她骗来当妓女，吉卜赛女人每次收七十克郎，却一个子儿也不给她，说是她已经供她吃，供她住，还给她介绍了这么好的机会，就不给她钱了。在一次清查行动中，阿莉奇卡被抓获了，送她去阿波里纳什医院一查，发现她有淋病。但是，他们没有指控她的理由，她已经出嫁，还有个小小孩，照理她无须承担劳动义务①，而且，她还说是来布拉格游玩的，她去探望丈夫，顺路在女朋友家住几天，他们只好要她治好病后立即离开布拉格。她本来也是准备这么做的，但不幸的是，那个吉卜赛女人

①捷克斯洛伐克法律曾根据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规定每个适龄公民必须履行工作义务，没有正当工作、正当收入者被视为寄生，依法受制裁，但丧失劳动能力者、孕妇、抚育幼儿的母亲等例外。 ——译者

在火车站上找到了她，并且威胁说，如果她走就派人杀了她。阿莉奇卡大概对那种环境有所了解，或者是她过于担心了，总之，她跟吉卜赛女人回去了。第二次抓到她时，就把她直接送进了鲁津监狱。她害怕极了，觉得自己没有希望了，她根本没有想过会在布拉格坐牢。而她在布拉格待的时间越长，回家的障碍就越多，在布拉格和斯洛伐克南部的那个村庄之间积累的指责和担心已经堆成山了。几天后我们发现，她正患着严重的淋病，她知道自己有病，但不敢说。那几天在我旁边睡的是一个来自南捷克的女人，快六十岁了，是个健壮的、善良的、细心谨慎的管家婆。家里正在盖一座挺大的新楼房，为了帮助家里盖房，她冒领了一批工资款。其实她是个本分的乡下人，根本不是刁钻狡猾之辈。她是出于对家庭的爱才行骗的，而且，她偷的是合作社的钱，一来她有机会这么干，二来根据现在的普遍倾向，国家的钱能偷就偷，反正周围所有的人都在偷。她来鲁津监狱时已经被判了十年监禁，现在只等着决定让她去什么地方服刑。直到发现了阿莉奇卡的淋病，她才在内心深处意识到，自己堕落到了何种地步。阿莉奇卡就睡在她身旁，出于本能，她甚至在熟睡中都往我的床边挤，整夜害怕得直哭。她们没有带走阿莉奇卡，说淋病一般接触不传染，只需要注意不混用毛巾。训导员告诫我们，不要让眼粘膜受到传染，而此时阿莉奇卡已经染病一个多星期了。这期间我们的毛巾一直按规定并排挂在柜子里。我们监督阿莉奇卡按时服用抗生素，要她常洗澡，常洗自己的毛巾，把毛巾同我们的分开挂，也要她常洗裤

衩。如果说这以前她已经老是低头羞于见人，发现淋病后她更是恨不得化为一道烟雾，消失得无影无踪。

安卡自己软弱无能，却把因而产生的怨恨指向了阿莉奇卡，要在她身上出气。她注视着在门旁的凳子上摇来晃去的阿莉奇卡。弱者对弱者的憎恨是很凶狠的。囚徒的法则之一是：欺软怕硬，拣弱的打，这是使自己成为强者的简便办法。而阿莉奇卡惹人讨厌的不仅是她的长相、她的愚蠢，现在又加上了她的淋病。除此以外，她还老打呼噜，她的鼻子里长了息肉，呼噜声特别吓人。谁要是不在她之前赶紧睡着，就甭想再睡了，除非吃安眠药，要不然就得靠自己的意志力把她的呼噜声变成催眠曲。我们力求赶在她之前睡着，不然整个晚上都完了。阿莉奇卡倒睡得很沉，那是一种健康的、年轻人的睡眠。晚上她吃得也很多，睡觉前还要蘸着果酱把剩下的面包都吃完。她喜欢睡觉，倒头就着，好像愉快地离开了这个不顺心的世界。当她呼噜开来时，我们想方设法弄醒她，摇晃她的身子，捏她的鼻子，但怎么也弄不醒。我把她翻过来侧身睡，肚子朝下睡，但这一切都徒劳无功，她俯卧着睡、侧着身睡也打呼噜，跟仰躺着睡一样。聪明点的就此罢手了，谁要是能睡着，算她有福，谁要是睡不着，算她倒霉。阿莉奇卡面对我们的责备，只是不知所措地微笑，她帮不了我们。安卡恨透了阿莉奇卡的呼噜声，这样可就更没法睡了，她每天早晨眼里都透着凶光，想要杀了这个丑小鸭。“我宰了她！让我过去宰了她。”也许她夜里还是睡着了，不然为什么不在夜里丑小鸭打呼噜时把她宰了呢？她不过是要

发泄一下那股杀人的火气。

“别制造紧张空气,安卡。”

“这不怪她,她长了息肉。”

“害淋病也不怪她?”

“记住,安卡,你也害过。”

“可不是在这儿，我那是在阿波里纳什医院，如果在这儿我也会治疗，而且，我不跟那帮黑鬼们混。”

阿莉奇卡做好了挨一顿揍的准备，她已经习惯挨打了。我真很难弄明白，为什么她还老是那样善良地朝人们微笑。安卡的话她不完全懂，但意思明白，肯定也害怕，但她不悲伤，也不苦恼。她的微笑似乎在说：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我拿它有什么办法？她的性格里有某种非常好的东西，一颗根深蒂固的、近乎有点傻的善良之心。

娜金卡被带走后，丑小鸭归黛妮萨保护。她倒不是出于同情，而是出于原则：要是这儿有谁要挨打的话，那得由我来执法！后来有一次黛妮萨突然到医生那儿去了，丑小鸭耷拉着脑袋坐在自己的凳子上，要发生的事总会发生，不可能任何时候都有人保护她不挨打。另外两个姑娘，都是吉卜赛女孩，坐到了我的床上，她们好像坐在包厢里看格斗一样，怀着急不可待又有点紧张的神情。她们不鼓励安卡，但是，她们的观望态度和沉默不语却刺激了她。揍她！屋里空气如此紧张，连我的鼻子都闻到了一股热辣辣的气味。

“阿莉奇卡，你不想来玩玩牌吗？”

“您从什么时候玩起牌来了？”安卡脱口而出。

“就在现在。你不想也来玩玩，安卡？”

“跟她？跟这个肮脏的呼噜虫？”

“那我们就自己玩了”。

“您干吗要掺和进来？她跟您有什么关系？”

“要是她强壮，我是不会干涉的。”

“这怎么说？”

“她弱，而且害怕。你看她怕得多厉害。所以我要站在她一边跟人打。”

“您？”她哈哈大笑，“会把您关进地窖的。”

“安卡，强不欺弱，不能打弱者，这样做不光彩。”

“什么？”

“不能打弱者。”

“哦，那照您说该打谁呢？打强的？”

“要是你敢的话。”

“可跟强的打要吃亏，您连这都不懂？”

“打弱者可耻。你要打她，就先来打我吧。”

她用那双黑黑的大眼睛对我瞧过来，看过去，眼睛里透出一种深沉的不幸。看着她那副凶狠劲儿一遇到障碍就土崩瓦解，我心里也很不好受。“我不是对您说过，”她说，“您的那些书真会让您变成疯子的。”

我们发现长了虱子后，丑小鸭有了充分展示自己那颗善心的好机会。阿莉奇卡坐在黛妮萨那张垫高了的床上，把我们的头一个一个地摁在她的怀里，替我们捉虱子。我们轮流坐在她面前的凳子上，恭顺地低下头，把脸放在她的膝盖上。她捉得那么有专业水平，使我们很快就消除了

最初的惊慌：如果谁也不管我们，阿莉奇卡会来帮助我们。她不责怪我们为了她的淋病曾经对她大声嚷嚷，运用在养育院取得的有益经验，一缕一缕地寻找我们头发里的虱子。啊，每一种经验都有它的用处！是她教会了我，虱子要从耳朵旁边开始找。只有在非常屈辱的环境里，当一个人完全无依无靠的时候，他才会认识到人的外表的作用原来是多么渺小。至今我还能感觉到那些灵巧的手指在我的头发里动来动去，感觉到它们又稳又准地从根上握起一缕缕头发，仔细地搜寻里面的虱子。我和丑小鸭，我们身上都散发着监狱的气味，而当她认可我的头已经干净了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幸福地相视而笑。人们在不幸之中是没有差别的，他们彼此都感到亲近。安卡也不得不让丑小鸭帮她捉头上的虱子。

在接受审讯时，阿莉奇卡对每一个问题都点头说“是，是”，因为她以为这是礼貌，其实她一句话也听不懂，只知道自己大祸临头。出于好意，她愿意一切都听审讯员的，在捷克文的审讯记录上她也签了字，尽管一个字也看不懂。她被指控犯有寄生罪，传布性病罪，以及某种商品的投机倒把罪。她是在女友的住处被逮捕的，女友显然供出了她的一些事，尽管她只字未提女友的顾客们，一来她不会说捷克话，二来她很怕这个拉皮条的女友，相信她真有本事找人来杀她。阿莉奇卡收到法院批准对她实行拘留和拘留理由的文件后，我们在那个懂点匈牙利语的姑娘帮助下给法院写了一封信，把法院的决定退回去，请求法院为她译成匈牙利文。阿莉奇卡胆战心惊地按格式把这

几句匈牙利话抄在信纸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说起来也实在丢人，尽管这些姑娘经常跟监狱打交道，却根本不了解预审和审判的程序，而且，也没有人给她们解释。她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对预审员和法官的作用还多少有点明白，但根本不了解自己的权利，还经常把辩护律师和检察官这两个角色颠倒了。被拘留者任何时候都可以向训导员借刑法汇编，但有多少人懂得那些专业用语呢！年轻的、没钱的女孩都是由法院为她们指派律师，但他们中大部分人连庭审都不出场，更不用说到监狱里来探视了。设置训导员的本意也许就是为了向无助的被拘留者提供帮助，可是，这些本意现在又到哪儿去了呢？法律规定被告有权要求用自己的母语接受审讯和审判，当我对阿莉奇卡说，她有权要求派翻译时，她不相信地笑了笑。显然她比我更接近真理，谁又会关心一个不会维护自己，对一切都点头说“是，是”的丑小鸭的权利呢？

训导员对这封信有怀疑，又把信拿到牢房来。不过，她还是一个比较公道的训导员，否则她也可以干脆把信扔掉。我向她保证，这个姑娘确实不会捷克话，她才把信寄出了。这一下可好啦！丑小鸭被传去重新接受审讯，还有一个讲匈牙利话的律师在场。阿莉奇卡回来时，简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那不还是丑小鸭吗？你们可弄错了！她也不再是砍头都要自己把脑袋伸过去的那种逆来顺受的化身了。突然间，她如梦初醒，成了一个亲切、快活的姑娘，当然，还不是睡美人，但已经不那么难看了。她兴奋地向我们描绘谈话的情况，我们听不懂她的匈牙利话，她还着

急地不断向我们摆手，不要我们打断。由于能用自己的母语，她重新变成了人，在这种欢乐情绪支配下，晚饭后她在牢房里举行了一次舞会。

这是在3月8日，就是看守们把大扫除作为献给妇女节的礼物送给我们的那一天，阿莉奇卡一个人默默做准备，什么都由她负责，音乐，舞蹈，还有应付那个不许我们大声喧哗的训导员等等，统统由她来管。她已经不跟我们讲匈牙利话了，因为我们耳朵太背，居然听不懂她的话，而改用转动下巴和打手势来发布命令，谁不同意她就朝谁摆手。我们把桌子从屋子中间挪开，在腾出的地方四面摆上凳子，大家都坐下来，像是乡村酒店里等侯小伙子们来邀请去跳舞的一群姑娘。安卡有着同阿莉奇卡相似的民间文化传统，丑小鸭严格地指示她代替管乐队敲节拍，自己则大声唱起了恰尔达什舞曲，两个吉卜赛姑娘欢快地跳起舞来。阿莉奇卡发现我和黛妮萨不会跳恰尔达什舞，马上提示我们学会，所以我现在会恰尔达什了。经过一阵狂热的开场舞曲后，她又把舞会的节奏放慢，要我们都坐下来，然后邀请我和她跳一曲节日华尔兹舞，这是对我出主意写信的奖赏和回报。后来，我们就唱了起来，跳了起来，叫了起来，我们一边跳一边转圈，跳探戈舞，波尔卡舞，喧闹声大得吓人。训导员来看了两回，但既没有叫看守来制止我们，也没有宣布把我们关到地下室去，因为我们有模范牢房的名声，她的容忍也许就是对此的回报。也可能她以为我们在庆祝妇女节，而实际上我们是在庆祝阿莉奇卡的胜利，庆祝在反对不文明方面取得的胜利。在安

蒂之后，阿莉奇卡是第二个使我忘记悲伤、感到欢乐的人。对她的审判结果如何，我不得而知，我最后一次是在天井里见到她的，那是在舞会后大约五天的时候，她已经到了另外一间牢房，同她们牢房的人一起出来放风。从她的样子看，好像还满意。

亡　　灵

3月初，训导员突然决定把我们这间牢房和另外两间牢房的人一起从五楼迁到七楼，迁到过去的病房区去。我们来以前，只是偶尔有等待押往别处去的犯人在这儿住一个晚上。事情发生在星期五下午，这个时候是最不可能安排这类搬迁的，肯定是监狱当局接到了他们也不曾料到的突如其来的指令。在星期五下午，犯人中该走的早就走了，临时拘留室的新犯人要到星期一才来。训导员说是因为地方不够才叫我们搬上去的，可是当天晚上带我们经过牢区过道去澡堂时，我们根据牢门上的数字看到，有些牢房并没有住满。哪怕是等到星期一上午再搬也好嘛！因为星期六我要接受探访，这次探访对我非常重要，

因为那天是我丈夫的五十岁生日。

七楼的牢房通风很好，窗户上没有铁丝网，只有栅栏，房间朝南，九个多月来我第一次见到太阳，脸上还感受到它的温暖。外面在下雪。从窗户往外望去，可以看到监狱外面的世界。当我把脸贴在铁栅栏上时，还可以看见白山林场的一角，以及远处的小洋楼。山坡上古老的鲁津镇显得那样安宁。牢房里很暖和，整个一面外墙都有暖气。这间牢房就住四个人，他们从不同的牢房里挑了三个女人，让她们和我住在一起。她们都是因为盗窃“社会主义所有制财产”而被拘留的，也就是触犯了刑法第132条。这些女人都是比较文明的、谦和的、有教养的。一个是同丈夫一起偷电话亭被抓的。丈夫把所有罪过都推给她，自己只被判了很轻的刑罚，而且同她离婚了。第二个卷进了一帮盗窃团伙，他们想出了偷地铁检票装置的主意。第三个是一家乡村小商店的经理，她从布拉格一些货源比较充足的商店里买一些适销对路的商品，按原价供应给她的常年主顾，这本来是做的一件好事，她自己并不赚钱，却触犯了一条关于截留利润的法律。在新牢房里我的同伴常常一个画画，一个写信，一个看书，因而在九个月之后，我终于能享受到连续几个小时的清静和安宁，而不再像以前那样每次顶多几分钟。她们从不抢着齐声说话，不争吵，不叫骂，相互尊重，也能体谅别人的习惯。平时我们习以为常的文明教养，在监狱里却是上帝的特殊恩赐。我身边不再有那些粗野的、好闹事的年轻姑娘，这大概也是他们让我搬迁的意图之一，但同时我也失去了黛妮

萨。我们虽然再三请求，希望准许我们待在一起，结果是白费力气。

七楼三间牢房的伙食由助理厨师用专门的小车乘电梯送到牢房门前，食物同其他犯人没有什么两样，但—— 至少对我们牢房—— 在添加面包方面不抠门儿。其他牢房不总是都有多余的面包，有也不一定新鲜，给不给要看过道勤杂女工高兴不高兴。我们也不必早晨六点就起床，七楼根本没有安装电铃，有时，主要是星期六、星期天，值班看守推着早餐来叫我们，也就是说都八点了，她也不大声嚷嚷，只是开玩笑地说我们还赖在床上不起。训导员们，甚至一些女看守，一个个都来问我们喜欢不喜欢新牢房。“ 您这儿空气又好，光线又充足。 ”连“ 翘翘板 ”都这样对我说，这可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

我的新同伴中有一个在狱中当过几个月的清洁工，清洁工们一边打扫，一边在监狱各处走动，她们在许多方面都享受很大的好处，然而，远比不上我们这儿的优裕生活。面对着这些从未见过的新鲜事，同伴们在惊愕之余纷纷猜测，大概是要发生什么事了，而且不会是什么小事，很可能是要宣布“ 大赦 ”。她们热切地打听一同迁来的其他两间牢房的女犯人们的情况，对比各个案子的相似之处，根本不理会大赦不可能只涉及我们这三间牢房的不同意见。大赦是上面的恩典，是一种神秘莫测的事情，和囚禁我们的原因一样神秘莫测，不可能对其作出什么符合逻辑的解释。大赦也是被囚禁者最后的希望所在，只要有什么特殊重大的事情发生，首先就会想到它。已经有几个月

了，监狱里一直流传着这个时候或者那个时候要宣布大赦的可靠消息。被囚禁者不太关心政治，但是，对于宣布大赦的时机——当前的或者记忆中的——他可能比有权决定宣布大赦的人知道得还要清楚。囚徒们知道赦免将会涉及触犯哪些刑法条款的犯人，而这些可靠消息往往是根据谁到哪儿去了，比方说去医院做检查去了，在走廊上听某某人说，某某人告诉他……被囚禁者的心理特征往往是，任何官方的解释都不相信，正像我们不相信我们牢区的牢房都住满了的说法一样，同时，在各种可能性中，他很少想到那最坏的一种，被囚禁者首先想到的总是获得自由。我不相信大赦，但我没有想到搬迁这三间牢房的事居然会跟我有关。显然当局已经决定不经审判就释放我们，这时，3 月初，我丈夫来探监，看见我的那副模样后不禁吓了一大跳。当时我们正在给阿莉奇卡治淋病，身上又长了虱子，牢房被四个野姑娘——其中三个吉卜赛姑娘——闹翻了天，她们不停地嚷嚷，打架，尖叫，使人整天不得安宁。我们已经不是在为文明而奋斗，而是为避免自己的神经崩溃而斗争，因此，我的样子一定很惨。于是，我的丈夫展开了坚决的拯救行动，而搬迁很可能就是这些行动的结果。看来是有人干预了，不要让我从鲁津监狱出来的时候变成了一堆哆哆嗦嗦、颤抖不已的瘦骨头。如果这仅仅是为了我，但能使十一二个女人同我一起过两个星期好日子，我也很高兴。我们这几天受到的待遇可真够宽厚的，居然还让我们乘运货电梯去放风。这些特殊待遇也使我认识到，监禁远非必须采取如此惨不忍睹、如此令人屈辱的

方式，监禁者在迫不得已的时候，也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使用。

由于不理解情况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好，自然就会产生许多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的逻辑思维已经无能为力，只能请神灵来回答。监狱里总是弥漫着迷信，而传播各种装神弄鬼方法的，往往是个人的现身说法或者亲身经验。我的新同伴兹登尼奇卡，当然还有以前的赫尔嘉，靠解牌来算命。赫尔嘉可以从牌里解出整部整部小说故事来，我可以从她的小说故事中猜出，关于我她还知道哪些更多的情况，这里说的更多情况，是指她不可能从我这里了解到的情况。她们通过解牌可以回答各种问题，如你想知道什么，你的前途如何，谁想你，谁爱你，谁恨你。我经常抽到梅花 K 和红桃 K，梅花爱司很少有，红桃爱司却老是抽到，她们认为我是个幸福的女人，爱与恨为我而相互争斗。但牌的随意性太大，你的命运完全取决于解牌人的想像，所以，监狱直接呼唤神灵到场。过去我们也曾请过神灵，但自从到了七楼以后，我们被如此多的善意弄糊涂了，因此，我们发疯似的想求助于其他世界的神灵。差不多每个钟头都有某个死者的幽灵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已经很累了，所有的问题也都问完了，可还是一次又一次地问：我们为什么会来这儿？会让我们回家吗？什么时候？

现在，当我写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又露出了不相信的微笑。可当时，那阴森森的招魂术让我全身毛骨悚然。我们靠一本书来召唤亡灵，它已经残破，只剩下一部分招魂咒语。这里书的内容并无关系，主要是用它来做招魂的工

具，只是书不能太重，也不能太厚。首先把书页分为两半，用两把同样的牙刷分别从两头插进书脊，牙刷柄必须平整，插入时柄朝里，毛刷留在书脊外，面朝上，这样做是为了形成一根长出一截来的轴，使书在轴上摆动。牙刷插好后，用橡皮筋把书缠紧，使牙刷同书成为一个整体。然后，两个人相对而坐，一个人向神灵提问，一个人当她的助手，两个人都把右手食指最后一节伸到露在外面的牙刷头下面，神灵进到书里来后就会使书在两根食指尖上转动。神灵如果想回答“是”，书就会在食指尖绷得紧紧的光滑皮肤表面上，沿着慢慢滑动的轴向右转动，如果回答“不”，书就会向左转动。如果神灵沉默不语，不管原因是他不了解情况，或者是他生气了，或者他对问题的提法不满意，书就会停在手指头上不动。我从来没有召唤过任何亡灵，我不愿去惊扰这些我不认识，也不相信，因而可能对我抱有敌意的鬼神，我自己的生活要自己过，要靠自己的才智和力量去考察自己的命运。但我经常当助手，所以我可以证实，没有任何人操纵这本书，它完全是自己在食指尖上转动，而且还会等候，只是在被招来的灵魂回答问题时才转动。答案也不为提问者的愿望所左右，很多时候都是同提问者的希望背道而驰的。我还必须证明，每一个提问者，无一例外，在提了几个问题后，她的食指——书就在她的食指上转动，而且，她正是通过这根食指在肉体上和神灵连成一体——会变得冰凉。助手们虽然也在做同样的动作，但她们只是被动地同神灵接触，因而她们的食指仍然是温热的。也可以在一个人身上验证，只要她开始

提问，食指就冰凉；而当她只是帮助托起这本书时，食指又暖和了。反过来我也可以证明，神灵常常答错，但犯错误乃人之常情，而我们招来的都是死人的亡灵。当然，我们不曾想到召唤上帝或者魔鬼。

现在我觉得好笑，可当时我也屏息静气，全神贯注，一时间如果不是完全相信，至少也压抑了自己的怀疑。那时候我同那些相信招魂的人一样，完全沉浸于其中，同其他人一样浑身发抖，感到紧张。当书轻微一动，宣布灵魂已到时，我不由得激动起来，被这神秘的仪式所征服。当然，现在想起来，使我激动的，与其说是亡灵来到牢房，倒不如说是那些招魂的妇女。请想一想吧！牢房，一间阴暗的、丑恶的牢房，一个凄凉的、生犹如死的世界，一些有家不能回的人，一些埋在心底深处的奄奄一息的希望。几个衣着丑陋的妇女，虽然尽可能打扮了一下，但眼睛陷进深深的黑圈，脸色因疲倦而发灰，目光暗淡无神。她们紧紧靠在一起，挤在一个监视镜难以看清的角落里。在我们这个信奉无神论的、反对精神生活的监狱里，招魂自然是被严格禁止的。四个、五个、六个女人，六种不同的想法，每一种又包含有十个、二十个乃至上百个刺骨揪心的问题，都是一些充满血与泪的问题。有多少毁掉的希望，失去的爱情，可望而不可及的机遇啊！回首过去，是被糟踏了的生活，展望未来，是毫无意义的、没有生命的岁月。她们想要知道个究竟，探索出真情，寻找到希望，这难道有什么奇怪吗？谁有这种勇气、这种知识、这种准备来回答她们？活人？他们要不是高不可攀，就是已经令她

们失望了。所以，她们呼唤亡灵。

“已故瓦茨拉夫·沃伊吉舍克的亡灵，我呼唤你，请你从死者的天国到我们中间来。”

一阵紧张的寂静，书起初微微地，后来明显地向右动了一下。

“已故瓦茨拉夫·沃伊吉舍克的亡灵，你在我们当中吗？”

声音颤抖着，书做了肯定的回答。

“已故瓦茨拉夫·沃伊吉舍克的亡灵，谢谢你应我的呼唤而来。”

书不动，在等待。不过。对亡灵们最好还是要有礼貌，而且，仪式中呼唤的用语都是规定好了的。

“已故瓦茨拉夫·沃伊吉舍克的亡灵，你愿意回答我的问题吗？”

书不动。

“已故瓦茨拉夫·沃伊吉舍克的亡灵，我问你，你愿意回答我的问题吗？”

书犹豫未决，终于向右动了一下。

“谢谢你，已故瓦茨拉夫·沃伊吉舍克的亡灵。现在我可以向你提第一个问题吗？”

同亡灵谈话是很讲究礼节的。书又向右动了一下。

我们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悄然无声地、非常紧张地听着别人问的问题。问的时候要大声说，让亡灵听见，我们也可以听见，这样我们就成了忏悔的旁听者，因为每个人问的都是使她最揪心的事，而且，提问要真实，要坦

率，你可以欺骗活人，但骗不了亡灵。我们相互紧挨着坐在一起，抱成一堆，几个小时不停地听着自己和别人的真实故事。非常奇特的是，后来没有哪个女人在同别人吵架时使用过在这些令人激动的问话中听到的秘密，这样的事从未发生过。在有些情况下吐露真诚是神圣的，不容触犯的，就是最油滑的人也知道。而且，如果有谁滥用招魂仪式，是会遭报应的。

这种神秘莫测的仪式，其实是呼唤仁慈，考察命运，而每个提问的人首先要考验自己，考验自己的诚意：我母亲会来这儿吗？或者她是个规矩人，不愿到这儿来？我父亲会回答我提的所有问题吗？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一位父亲只回答了部分问题，其余的他认为会伤女儿的心，就避而不答。爸爸，您生我的气吗？沉默，书一动不动。另一个女人的奶奶则根本不回答涉及孙女离婚的问题，因为她生前就不同意他们结婚。奶奶，我和卡莱尔还没来得及结婚，他会把我忘了吗？沉默，书一动不动。另一个女人，为了避免类似的家庭冲突和令人难看的考验，干脆只召唤外国的亡灵。有一次她开玩笑，呼唤了阿道夫·希特勒的亡灵，来后阿道夫·希特勒却不愿意离开牢房了。我不喜欢死者的天国，不顾我们的一再请求，就是不愿回去。阿道夫·希特勒的亡灵，我要求你回到死者的世界去！可是，书老是沉默不语。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把书放在招魂的女人身旁过夜，让她跟他睡在一起。牢房里的人忧心忡忡，谁知道这个希特勒的亡灵会搞出些什么名堂来！早晨那个姑娘说，他已经离开牢房了，因为她觉得轻松了。亡灵们

的表现也是各式各样的，有些一叫就到，有些则要再三邀请，但所有亡灵无一例外对嘲笑和侮辱都十分敏感。谁要是不相信他们，千万不要召唤他们，否则会遭他们报应。赫尔嘉曾经嘲笑招魂，结果她呼唤的灵魂一个也没有来，书在她手里根本不动。而这还是同一本书，它在别人手里曾经很乐意地转动。亡灵一旦喜欢上你，会为你做很多好事，只要你不伤害他，他会努力保佑你。

我们紧紧地挤在一起，相互鼓励，相互提醒，尽量使用正确的提问咒语。对于否定的答案，我们正面去解释，并且商量再提些什么补充问题。得到正面的答案，大家一起高兴。在这些时刻，从前相互间的一些怨恨和摩擦消失了，大家都感到宁静和亲切。别人的问题被看做是自己的，对别人的回答也跟自己的一样怀着真切的心情去感受。亡灵们肯定帮我们改善了牢房里的相互关系。我会很快出庭受审吗？是在 3 月？还是在 4月？会给我判最高刑罚吗？还是最低刑罚？或者中等刑罚？ 4年 ？5年 ？7年 ？会送我去劳改营吗？这以前还会有人来探监吗？丈夫会出庭吗？妈妈会来吗？卡莱尔会原谅我吗？杨会原谅我吗？妈妈会收留我的女儿吗？会没收我的房子吗？存款会被没收吗？丈夫会提供反对我的证词吗？会提出跟我离婚吗？会带走我的孩子吗？孩子们会原谅我吗？他们会嫌弃我吗？家里人会原谅我吗？我会成为孤魂野鬼吗？我还会有家可回吗？我还有可能回家去看看吗？我会病倒吗？我会死吗？妈妈经受得住我被判刑吗？我会成为人人嫌弃的野狗吗？辩护律师对付得了对方的王牌证人吗？丈夫会为我

掏钱行贿吗？上司会想起对我的承诺吗？家乡的人什么时候才停止说我的坏话？我会收到包裹吗？明天？一个星期以后？会有我的信吗？辩护律师会来找我吗？我还会受审讯吗？他们有反对我的新证人吗？问题必须简单明了，让亡灵能够做“是”或者“不”的回答。因各人的遭遇和案情不同，她们的问题也各式各样，有的兜着圈子问，有的老是纠缠细节，也有的单刀直入，紧主要的问。由于智力有高有低，问的方式也千差万别，但到最后所有的人都会提出一个相同的问题：大赦。当审讯、法庭判决、家庭关系等一切都弄明白了之后，最后一个问题来了：今年会宣布大赦吗？是不是5月前宣布？按惯例最通常的是5月，因为有国庆节。瓦茨拉夫·沃伊吉舍克的亡灵，这一次是普遍赦免吗？还是局部赦免？是大赦？还是特赦？我触犯的那条刑律也在赦免之例吗？到时候我是不是已经去劳改营了？或者还在我的预审拘留期间？已故的瓦茨拉夫·沃伊吉舍克的亡灵，我将在什么地方获释回家？亡灵们是很仁慈的，他们都点头说会有赦免，如果不是普遍的大赦，至少也是局部的特赦。书左右转动着，有时犹豫，有时猛然跳一下，有时回答来得如此迅猛，以至于书都掉到地上了。

以前我也和黛妮萨一起召唤过亡灵，她简直不理解为什么我不能问问自己的前途，于是她就代我问了她招来的亡灵，这些亡灵都说不会开庭审判我，但他们说不准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星期一是春天的第一天，太阳暖洋洋的，头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雪，远处的雪地闪闪发亮。我刚

写完了一封长信。就在这个星期一，我们获释了。当我和伊琳娜在过道里拥抱在一起时，她说：“我昨天才终于认命，认为他们会判我们刑。”她准备被判 8 年，我准备被判 3 至 4 年。

我亲爱的诸位亡灵，请到我这儿来回答我的问题：

我的女友们还都活着吗？

她们有没有生病？

她们冷不冷？

她们饿不饿？

没有让他们去干苦活儿吧？

工资多不多？零用钱够花吗？

有茶喝吗？

能买块肉改善改善生活吗？

有快活点儿的时候吗？

有没有人打她们？

是不是感到孤独？

孩子们留下来了吗？

丈夫和情人还爱她们吗？

允许探视她们吗？

能往家里写信吗？

收到家里的信啦？

有没有被送进地窖？

常收到包裹吗？

有没有人偷她们的东西？

能战胜绝望吗？

能战胜孤独吗？
有没有变坏？
能不能自卫？
是不是失去了希望？
那些已经回到家里的，她们幸福吗？
没有又陷入不幸吧？
我亲爱的诸位亡灵，我的女友们有时还会想起我吗？

写于布拉格，1984 年